

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

中国南来作者 与新马华文文学

郭惠芬 著



厦门大学出版社



郭惠芬，福建省漳州市人。198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后在集美大学任教。于1992年获讲师任职资格。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文学硕士。现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博士生。

研究方向为新马华文文学。已发表关于东南亚华文文学学术论文十余篇，包括《生命依旧如斯热情灿烂——茜茜丽亚诗歌中的生命意识》、《笔画展汗青——论梁许钺诗歌〈笔画极短篇〉》、《中国南来编者及所编刊物——1949年以前新马华文文学刊物探析》、《中国南来作者对马华新文学的贡献》、《西方戏剧的引介与早期新马华文文学：〈戏剧世界论析〉（1924—1936）》、《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抗战救亡文学》、《潘受与早期新马华文文学》，等等。目前主要从事新马华文新诗研究。

中國南來作者與

新馬華文文學子 (一九一九—一九四九)

潘文題



郭惠芬 著
厦門大學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1919~1949/郭惠芬主编. —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 11

ISBN 7-5615-1553-7

I. 中… II. 郭… III. ①现代文学-人物研究-中国-1919~1949②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新加坡-1919~1949③现代文学-文学研究-马来西亚-1919~1949 IV. I3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7820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厦门新嘉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厦门市莲前北路 77 号 邮编:361009)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插页:2

字数:266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定价: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本书承蒙

李氏基金会资助出版经费

谨此 敬致谢忱

郭
厦



目 录

早期南来知识分子的心态:困虑与振奋(代序)	杨松年(1)
读《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	庄钟庆(1)
第一章 绪论	(1)
一、研究的动机	(1)
二、中国南来作者的界定	(3)
三、研究的年限和分期	(4)
四、研究的方法和原则	(5)
五、研究的意义	(8)
第二章 中国南来作者介绍	(12)
第一节 南来作者的籍贯分析	(13)
第二节 南来作者出生年份与南来年代分析	(16)
第三节 主要南来编者介绍	(25)
第四节 主要南来作者介绍	(34)
附表 中国南来作者资料表(1919—1949)	(52)
第三章 中国南来作者的编务活动	(75)
第一节 侨民意识浓厚的时期	(76)
第二节 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	(81)
第三节 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时期	(104)
第四节 本地意识挫折时期	(112)
第五节 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角斗时期: 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时期	(126)

附表	中国南来作者所编副刊和期刊统计 (1919—1949).....	(132)
第四章	中国南来作者的文学主张.....	(137)
第一节	侨民意识浓厚时期.....	(138)
第二节	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	(141)
第三节	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时期.....	(157)
第四节	本地意识挫折时期.....	(165)
第五节	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角斗时期： 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时期.....	(185)
第六节	其他.....	(194)
第五章	中国南来作者的创作活动.....	(220)
第一节	南来作者的文学创作概述.....	(221)
第二节	侨民意识浓厚时期.....	(229)
第三节	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	(238)
第四节	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时期.....	(250)
第五节	本地意识挫折时期.....	(260)
第六节	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的角斗时期： 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时期.....	(273)
第六章	中国南来作者对新马华文文学的贡献.....	(298)
第一节	南来作者在编务方面的贡献.....	(299)
第二节	南来作者在文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302)
第三节	南来作者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贡献.....	(305)
第四节	南来作者在社会活动方面的贡献.....	(310)
参考资料		(315)
一、报章		(315)
二、专书		(316)
三、论文		(321)
后记		(326)

编辑例言



一、东南亚华文文学是东南亚各国文学的组成部分，在海外华文文学、世界文学中占有显著的位置，它们与中国文学有着语言同源的血缘关系。因之出版《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将有助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交流，推动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的发展，促进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繁荣，共同为世界文学的进步作出贡献。

二、本丛书既收入创作，也收入文论，同时也需要研究著作及史料汇编，有个人专集，也可以多人集，有专书，也可以有多部书合集。作者不受国籍限制。

三、本丛书由庄钟庆、陈育伦、周宁任主编，郑楚、杨怡任副主编。

早期南来知识分子的心态： 困虑与振奋(代序)

杨松年

一个国度或地区的人士，当移植到另一个国度和地区时，他们会面对怎样的问题？面对问题时，心态又是如何？如何适应新的环境？如何处理这些问题？以上所举的不但是研究文学者所感兴趣的课题，也是研究其他学科如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等所留心的课题。

19 世纪末期 20 世纪初期，大量华人从中国南来。其中包括为数不少的知识分子。这里不想探讨这些华人南来的原因，也不想说明他们南来的情形，这里所关心的，是这些南来的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作者，他们南来后所直接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所主要关心的问题是什么？面对这些问题时，他们的心态又是如何？他们怎样对待新的生活环境？当适应新的生活环境之后，他们又怎样为他们的理想付出他们的努力？可以说，面对上述问题，他们的内心是充满着困惑，焦虑，不安；但同时又有振奋，积极，与具备信心的另一面。这也是本文用“困虑”与“振奋”分别表示他们不同心态的原因。

20 世纪初期，从中国南来的文人不少，直至这一世纪的中期，南来的文人仍然不断。早期南来的文人，和其他华人一样，多因为经济的问题、生活的困难而南来。然而刚南来时，多数居住环境差，又不太适应，如衣虹曾如此说明他刚南来时的感受：“我因为来星只有 20 天左右，暂时寄居在一间很狭窄的小公寓，除了吃饭、洗

澡、谈话之外,全不能做半点儿工作。加之一星期来失眠症复发,每晚最多是睡两个钟头,闹得身心俱惫,昏瞆异常。”^①他们工作非常忙碌,南来作者吴仲青就曾如此对他的朋友禾草说:“猎犬般的忙;校刊,编剧,日课,还有夜课。”^②

生活的奔波使他们挣扎的生命愈显得渺小,流浪漂泊的生活更使他们没有安定之感,这是他们内心困惑、焦虑之一。开武在一首诗中就如此表示上述的心态。《露台上》写道:“渺小的生命舟挣扎在茫茫的人海中,\东飘西泊何处是我们归宿之地?”^③有时看到某个地方不能发展,就流浪到另一个地方去,希望有所收获。然而流浪漂泊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改变实际的情况,还是解决不了他们的生活的问题,因此他们的无奈与焦虑更加地增重了。林雪棠《给衣霞》表示:“于今我寄迹滨江,\生活仍是一样的流浪,\继着我而重上飘泊旅途的你,\奔波到暹罗去又怎样?”^④周了因《赤道上的呼声:别辞》更清楚地说:“这真是百无聊赖的人间,晓得这样,从前也不来了,在英属想去荷兰走一次,在荷兰又要去仰光安南走一次。”^⑤

飘泊不安定的生活,更加深他们对故乡、亲人、朋友的思念。思念令他们更加的焦虑。思归成为早期南来作者作品的主要题材。失钧如是唱道:“苍茫茫秋色里,\一片愁惨底景致,\一个孤独底旅客,\在那边放歌吁气.\他唱着,\归兮归兮不得归;\风声飒飒的和着;\悲兮悲兮更可悲。”^⑥然而家乡还是一片昏暗,污浊,人民还是

① 衣虹:《编后》,《叻报》副刊《椰林》,1930年3月24日。

② 禾草:《最后的话》,《浩泽》第2期,1927年1月。转引自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出版史料),新加坡世界书局,1972年,第28页。

③ 见《南洋商报》副刊《压觉》第17期,1930年11月10日。

④ 见《光华日报》副刊《绝缘回线》第7期。

⑤ 见《叻报》副刊《星光》,1925年11月9日。

⑥ 见《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1923年10月4日。

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甚至比过去更为悲惨，丝露写道：“青天霹雳——传来一阵消息，\啊！我的故乡已不像从前：\我现在的故乡啊！已住满了残暴的贼兵；\全村弥漫着杀气腾腾，\交连的禾田，已堆满了死尸，\苍翠的青山，遍染了血痕。”^① 低也用以下的文字写下他眼中的中国：“你落魄归来的游子哟！\当那步儿跨入久别的故乡，\映现在你的眼帘上的是一片荒凉，\它深深地给你感到凄沧，愤恼，激昂。”^②

南洋的生活让他们深感无奈，困惑。南来后他们所认识的南洋，和他们还没有南来前所听闻的南洋不同，是他们深感失望的重要方面。周了因说：“我们从前以为黄金那般最灿烂的南洋，如今都做梦想。”^③ 谭云山在《星光》发刊辞中说：“我们到了这里看看，所谓黄金世界，原来黄金已变成黑金了！”^④ 不过在深感失望之后，南来的知识分子的心态又有所不同，有的在困虑之后，决定背起包袱，回返老家，如周了因说：“呵！我亲爱的朋友，我亲爱的生徒，以及一切相识与不相识的人，我是走了，这样随随便便地走了。”^⑤ 有的虽然失望了，但仍然正面地看待眼前的事物，特别是文化教育的工作，谭云山就持着这样的态度。他说：“我们既到了这里，不论是黄金世界，还是黑金世界，我们暂时居于斯，立于斯，衣食于斯了，我们就不能不尽点小小的责任，对于斯不能不有点暂时的小小贡献，也可说是报酬。”^⑥ 对于谭云山来说，这报酬就是《星光》副刊的编辑。

^① ① 丝露：《我孤独的徘徊在海滨》，《南洋商报》副刊《压觉》第16期，1930年8月4日。

^② ② 见《故乡》，《南洋商报》副刊《压觉》第7期，1930年9月8日。

^③ ③ 见《叻报》副刊《星光》，1925年11月9日。

^④ ④ 谭云山：《这是什么》，《叻报》副刊《星光》创刊号。

^⑤ ⑤ 见《叻报》副刊《星光》，1925年11月9日。

^⑥ ⑥ 谭云山：《这是什么》，《叻报》副刊《星光》创刊号。

至于一些到南洋来本就怀有重大抱负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是带着振奋心态来对待南洋的文艺的。许杰是其中的一个鲜明的例子。在所编的《益群日报》副刊发刊词《枯岛题词》中,他说:“人间是一座枯岛,我们须用文艺的锄头去开垦它;人类心田中滋长着的是一丛荒草,我们须用科学的锄头铲除它。”^① 他们或者在编辑工作上,积极负起开垦荒原的责任,如许杰所表示的,积极负起改造南洋社会,刷新南洋文坛的责任,如段南奎在《〈星光〉今后的态度》的启事中所表示的:“南洋的社会是沉沦的、堕落的、静止的、停滞的、臃肿的、麻木不仁的、半身不遂的病社会。我们这流浪的一群,在无论何时何地都感到不满,尤其对于南洋这样的病社会,分外觉得不满。有时还觉得不安。……而今后,我们愿本着评判的态度,来重新估定南洋的一切的价值。我们愿改造南洋的社会,我们愿澄清南洋的思想,我们愿刷新南洋的文坛,我们愿诅咒黑暗的旧时代快去,我们愿祈祷光明的新时代速临。”^② 积极地扮演雄鸡的角色,歌唱光明的到来,如陈炼青《晓天月刊》所表示的:“夜色已深沉了,岂无鸡声来报晓。暂时的黑暗断不能使我们绝望,这正使我们格外发奋以寻找光明之决心。所以这刊物的发行,不外凭我们生命的核心里发抒出来的微弱的喊声,藉以诅咒这死色沉沉的黑暗,要讴歌未来那种生气勃勃的晓天,而望读者共鸣共感。”^③ 这样的意志甚至让他们积极地在新加坡提倡南洋色彩的文艺,如许杰就是如此,他在副刊《枯岛》的编后话说:“南洋有南洋的历史、风俗、人情、风景,作者不要何如穷搜远处,是俯拾即是东西,譬如土人底情,土人底恋爱、情歌、生活,等等,中国人在这里的生活情形,等等,各色人,这里的措施影响,等等,都是绝好的文学题材。”又说:“文学要有地

① 见《益群报》副刊《枯岛》创刊号,1928年8月23日。

② 见段南奎:《星光今后的态度》,《叻报》副刊《星光》第45期。

③ 陈炼青:《关于创刊的话并我们的态度》,《晓天周刊》创刊号,1928年11月8日。

方色彩,譬如我们一说到南洋,便觉有椰林、草屋、牛车,等等,回现在我们的脑际。如果作者能够把这种地方色彩捉住,表现在文艺里,那便是绝好的文艺了。”^① 大男(曾圣提)也在《南洋商报》的副刊《文艺周刊》表示:“南洋究竟有没有文艺之宫,究竟可否建立文艺之宫,或南洋究竟有没有文艺可以寻找,我欲登高疾呼,昭告海内外之爱好文艺之青年曰:南洋乃现代文艺之宝库,乃取之无尽用之无竭的文艺之源泉。”^②

于是,这些知识分子他们不但在理论上从事新马文学的建设工作,在编刊与杂志上致力于新马文学的推展工作,也积极进行文艺创作的工作。郭惠芬的《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详尽地展现了这些作者丰厚的文学成果,正是得益于这些知识分子的文学成就。

非常高兴郭惠芬同学能将她勤奋研究的成果出版成书。作为郭惠芬同学这本书的序言,我觉得如果只是重复书中所说过的问题,是没有太大的意义的,因此乃提出上述的一些个人浅见。

① 许杰:《尾巴的尾巴》,《益群报》副刊《枯岛》,1928年10月25日。

② 大男:《南洋地文艺》,《南洋商报新年增刊》,1929年1月1日。

读《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

庄钟庆

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大陆研究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风气日益形成,90年代起有了发展,论文多起来,汇集出版的有:《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庄钟庆编);专著开始出现,如《东南亚华文戏剧概观》(赖伯疆)、《新加坡华文作家作品论》(陈实)、《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苏菲)。近年来又有新的论著问世,如史的研究,有周宁教授的《新加坡华文文学论稿》,还有作家论,如杨怡副教授的《黄东平创作论》;专题研究的有来自新加坡留学生郭惠芬女士的《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这些研究成果表明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逐步引向深入。

郭著是一部有特色的论著。从选题上说,是新颖的,学术界似乎没有见到系统论述中国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关系的专书,而这类论著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既可以了解两者的历史风貌,又有利于中新的文化交流。骆明先生曾多次谈及这个选题的重要意义,希望学者们对此作出探讨,郭女士赴新留学后,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在她的导师杨松年副教授的支持下,选取了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的论题。

郭惠芬女士从新马华文文学研究者的角度观察、审视中国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的关系,充分肯定了中国作者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巨大贡献,例如在编务、文论、创作及社会活动等方面的作用。在对待文学史上的问题,如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著者采取比

较客观、全面的分析，颇有说服力。

郭著以丰富、翔实的材料，阐发自己的看法，充分运用身在异域，又是研究当地华文文学的优势，获取了国内不能见到的报刊、书籍及其他资料，这些为她的立论提供了许多第一手的有用材料。这是十分可贵的。

中国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关系这一课题，还可以作多方面的研究。例如两者关系，指出中国作者对于新马华文文学作者的贡献，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新马华文文学对于中国作者的影响，同时也要总结两方面关系的经验。又如，中国作者在新马华文文学形成、发展过程中作用的估量，新马华文文学独特性如何表现等等都是值得探究的。

第一章 绪 论

一、研究的动机

中国南来作者是战前新马文坛极为重要的作家群。新马华文文学基本上由他们推动发展起来。从 30 年代开始,新马作者或学者在论述新马华文文学时,已注意到南来作者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如林参天的《马来亚文艺沉寂的原因》⁽¹⁾、陈村(黄望青)的《关于整理马华文运史料的建议》⁽²⁾、马达(张晓光)《我对于文艺论争的管见》⁽³⁾、铁戈(陈果来)的《文艺独特性·任务·及其他》⁽⁴⁾、以多(赵戎)的《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⁵⁾、王赓武的《马华文学导论》⁽⁶⁾、李汝琳的《马华文艺的起源》⁽⁷⁾、苗秀的《马华文学史话》⁽⁸⁾和《马华文艺的方向》⁽⁹⁾、方修的《马华文学史稿》⁽¹⁰⁾和《中国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¹¹⁾等等。铁戈在《文艺独特性·任务·及其他》中道:

马华文艺的萌芽是在中国新文学运动步入“革命文学”那个阶段。这就是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知识分子,在残酷的白色恐

怖威胁下,流亡到马来亚,他们在这儿散播着革命的种子,同时也带来了中国的“革命文学”。后来中国文学运动不断地向前发展,直接地影响到马来亚,以及不断地向马来亚移植,终于形成中国文艺运动的一股海外支流。⁽¹²⁾

赵戎在《论马华作家与作品》也指出南来作家对马华文学所作的巨大贡献:

马华文学运动,完全得力于中国南来的作家们的大力推动,才有今日的成就。30年来的马华文学运动史,大半部是南来作家们以热血以生命在恶劣的环境中辛勤写下的。他们在这文化落后的殖民地社会里,不顾一切歧视、冷笑与压抑,披荆斩棘,尽了开路先锋的任务,如许杰、马宁、林参天、郑文通、吴天、金枝芒、铁抗、金丁、郁达夫、张一倩、陈如旧、王任叔、胡愈之、沈兹九、张楚琨、丘士珍、杜边、韦葶、絮絮、夏衍、韩萌、米军、李汝琳、李星可、汉素音等,都曾为马华文艺而努力。同时,还须着重地指出,他们的影响是健康的、正确的,而不是破坏的、麻醉的、毒害的。他们之中即使有些微不足道的缺点,也无伤其贡献与成就的。⁽¹³⁾

不过这些作者或学者论及南来作者与本地文学关系时,都只是简单论述或顺笔带过,缺乏系统和全面的研究。首次对中国南来作家进行系统研究的学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高级讲师林万菁博士。林博士在1976年开始对中国作家在新加坡的文学活动及其影响进行系统研究。他所界定的“中国作家”概念主要有:(一)身份属于中国,南来后又回返中国;(二)南来前是全国性、地方性知名作家,或回国后成为全国性作家;(三)回返中国后继续从事创作活动。⁽¹⁴⁾他据此筛选20余位中国南来作家如洪灵菲、老舍、艾芜、吴天、郁达夫、胡愈之、高云览、沈兹九、杨骚、王任叔、金山、王纪元、

陈残云、杜运燮、夏衍、巴金、徐志摩、马宁、汪金丁、冯伊媚、王莹、岳野、米军等，对他们在新加坡的文学活动、社会活动及其影响进行详细精到的论析，于1978年完成学术论著《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成为学术界研究中国作家与新马华文文学关系的重要专著。

由于林万菁博士对“中国作家”概念的严格界定，另有一批为数不少的南来作者无法列入其研究范围，因此本文作者拟以较宽泛的“中国南来作者”概念，对中国南来作者在新马期间的文学活动进行总体研究，以期探讨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的关系及其对本地文学的贡献。

二、中国南来作者的界定

本论文所界定的“中国南来作者”，是指那些在中国出生而后南渡新马，在新马从事过文学活动，或在本地产生过影响的文学作者：

(一)南来作者可以是成名作家，如艾芜、老舍、巴金、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也可以是普通作者，如华国、邹子孟、更生、丁琅、王映霞、罗依夫、林仙峒等。

(二)在新马居留期间从事过文学活动，编辑文艺刊物，发表作品或论文，如拓哥在新马编辑过《新国民日报》的文艺副刊《南风》，丘士珍在《南洋商报》《狮声》等副刊发表作品，许杰在吉隆坡编辑益群报文艺副刊《枯岛》时，频频发表关于提倡革命文学的论文。

(三)有些作者逗留新马期间虽未直接从事文学活动，但南来前其作品已被本地报刊登载，或回返中国后发表与新马有关的文学作品，如聂绀弩、洪灵菲、巴金、老舍、徐志摩、艾芜、刘延陵等。

基于上述界定，那些出生于新马而后前往中国受教育，之后又回新马的作者(如米军、萧村、杜运燮、流冰、韩荫、戴英浪)，或出生于其他国家，之后回中国读书，而后南渡新马的作者(如出生于泰

国的黄征夫、陈国华),均不在本论文研究之列。

三、研究的年限和分期

本论题选取 1919 年至 1949 年作为研究中国南来作者的年限,是因为新马华文文学从 1919 年同时包含了新旧两种文学形式。根据方修的研究,马华新文学以 1919 年为起点。⁽¹⁵⁾从马华新文学萌芽开始,中国南来作者就亲身参与和推动着新马华文文学向前发展,直到 1948 年英殖民政府颁布“紧急法令”,以及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南来作者纷纷返回中国,或前往他乡,留在本地的南来作者也大多改变自己的侨民身份,认同新马为自己的国家,此后新马华文文学在较长时期内与中国新文学的联系被切断,新马华文文学从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因此本论题以 1919 年至 1949 年为研究年限。

由于 1919 年到 1949 年研究的跨度较长,本文作者拟将南来作者在这 30 年间的文学活动进行分期研究与论析。至于有关分期法,一些知名的文学史家已对新马华文文学发展史进行过分期,如方修以新马文坛创作状况的兴盛衰落作为分期标准,⁽¹⁶⁾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杨松年博士则以新马华文文学中本地意识在文学上不同时期高低起伏的变化和波动状况作为分期依据。⁽¹⁷⁾为便于对南来作者的文学活动进行研究与论析,本文将采用杨松年博士的分期法。

近年来,杨松年博士对这一分期略加调整和补充,将独立前的新马华文文学分为如下几个时期:

- (1)1919 年至 1924 年——侨民意识浓厚的时期
- (2)1925 年至 1933 年——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
- (3)1934 年至 1936 年——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时期
- (4)1937 年至 1942 年——本地意识挫折时期
- (5)1945 年至 1949 年——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角斗时期:

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时期

(6)1950年至1954年——本地意识的拓展时期:

反对黄色文化时期

(7)1955年至1957年——本地意识的腾涨时期:

爱国主义文学提倡时期⁽¹⁸⁾

本论文研究的年限以1949年为下限,故只采用上述分期中的前五个时期,即:

(1)1919年至1924年——侨民意识浓厚的时期

(2)1925年至1933年——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

(3)1934年至1936年——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时期

(4)1937年至1942年——本地意识挫折时期

(5)1945年至1949年——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角斗时期:

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时期

四、研究的方法和原则

从1919年至1949年在新马华文文坛从事文学活动的作者上千人,如何从众多的作者中甄别其是否属于南来身份,是本论文面对的最大难题。所幸的是马著有《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825—1990)》⁽¹⁹⁾一书,收录1825年至1990年新马3000多位文坛人物的简介。依据《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825—1990)》的人物介绍与参考其他报刊书籍资料,本论文终能选定159位南来作者作为研究对象。遗憾的是一些对新马华文文学有所贡献的作者,如早期的双双、陈桂芳、邓丽诚(LS女士),或30、40年代的慧聆、静海、谛克等,作者查阅所有相关书籍,均未能考订其是否出生于中国。为确保论文的准确性与科学性,只好将这类作者排除在研究之外。此外,有些作者已确定南来身份,但现有书籍中有关生平介绍十分简略,为进一步发掘更多生平履历,须多方查寻资料,而且往往得从旧报章中查找。如早期优秀的南来作者张叔耐,其南来年代均不见

书籍记载。经查阅报刊书籍,终于从张氏发表在《新国民日报》上的《贺新凉》⁽²⁰⁾一词得知其南来时间为1919年,这种收获的喜悅是难以形容的。不过,由于年代久远、材料散佚或人事变迁等缘故,不少南来作者的出生年份、南来年代和具体籍贯都无从考稽,这实在遗憾,只能期待将来能有新发现。

确定159位南来作者为研究对象后,作者即着手收集他们发表的作品,而后加以整理、阅读和研究。本论文收集与研究的南来作者的作品,主要有四类:一、南来作者居留新马期间在本地报刊发表的作品。这在所有作品中占绝大部分。二、南来前后被本地报刊刊登的作品。如刘延陵、郁达夫、沈兹九、俞颂华南来之前,其作品已发表在新马报刊上,艾芜、吴天、张楚鸣、陈炼青回国后仍寄来作品发表。三、南来作者居留新马时发表在外地的作品。如谭云山、林参天、冯蕉衣、铁戈、胡愈之在新马期间,曾在广州、上海、香港等地出版单行本。四、南来作者回返中国后撰写的与新马有关的作品。如聂绀弩、洪灵菲、巴金、老舍回国后相继发表和新马有关的小说、散文等。

1949年之前的新马华文文学主要以报章副刊和少量的期刊(杂志)为发表园地,单独印行出版的书籍很少,得从1919年到1949年的旧报章副刊和期刊中广泛搜集他们的作品。其中报章如《新国民日报》、《星洲日报》、《光华日报》、《南洋商报》、《星中日报》、《总汇报》、《槟城新报》、《南洋时报》、《益群报》、《新益群报》、《中兴日报》、《叻报》、《华侨日报》、《新民主报》、《公报》、《民国日报》、《南侨日报》、《民生报》等,期刊杂志如《天声旬报》、《今代》、《马来亚月刊》、《现代周刊》、《南洋周刊》、《南洋风》、《风下》、《新妇女》等,都是收集南来作者发表作品的资料来源。由于日军对新马的侵略战争,新加坡沦陷前的1941年10月至1942年2月的报章已毁于战火之下。加上沦陷期间的三年零八个月(1942年1月至1945年8月),新马文学几乎一片空白,因此无法获得这段时期

的创作资料。

再者,有些报刊如《叻报》、《新国民日报》的缩微胶片字迹模糊难辨,有的地方甚至残缺不全或字迹损坏,阅读时只能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进行揣摸推敲。为忠实于现存的报刊内容,本论文在引用原文时,只能将模糊不清或损坏的字词以方框“□”代之。

其次,1949年之前的新马作者,大多使用笔名发表作品,有的作者笔名多达一二十个,如张叔耐、曾圣提、张楚琨、杨实夫、曾梦笔、王君实、黄科梅、李润湖等都有多个笔名。这也给收集工作增加了难度,因为稍不留心,就可能因为作者笔名的频繁更换而遗漏其作品。因此在从事资料收集工作时必须格外细心谨慎。

需要说明的是,有些报刊如《消闲钟》、《曼舞罗》、《晓天周刊》、《南薰三日刊》、《南洋文艺》、《南岛》、《新星》、《文化丛报》、《南星导报》、《华侨周报》、《电影与文化》、《南潮半月刊》、《大华周报》等不见于新加坡国立大学图书馆,而收藏在大英图书馆,只能依据杨松年博士的《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²¹⁾和其他书籍间接获得相关资料。

在广泛收集所有与南来作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认真研读文学史家的论著,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以及向专家学者请教,访问在世的南来作者,从活生生的回忆中了解当时社会状况及南来作者的文学活动,也是重要的研究方法。

尤其必须提及的是,导师的悉心指导与严格要求使本文作者能够掌握良好的研究方法,遵循正确的研究方向,从而建立研究信心和提高研究能力。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1949年以前的新马社会属于英殖民地,本地华人多以中国为祖国宗邦,他们既有爱国的一面,又有立足于本地社会的现实功利要求。南来作者大多成年后从中国南来,许多人在中国已是成名作家或活跃作者。他们深受中国传统文化与新文学的影响,南来后生活在多元种族的新马社会,在心态上交织着

热爱祖国与热爱新马的双重感情,在创作上交杂着中国文学的深刻影响和塑造本地文学独特个性的矛盾,因此,在研究本论题时,本文作者遵循横向联系与纵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即在论析南来作者在新马的文学活动时,既要横向研究中国文学和政治局势,以及本地多元种族社会和文化对南来作者的影响,又须纵向研究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史,以考察南来作者文学创作和文学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以及他们对本地文学的推动作用。

五、研究的意义

1919年至1949年的新马华文文学基本上依靠南来作者的大量参与和推动而发展壮盛。本文作者经多方收集资料和仔细研究,发现能够确认南来身份的作者至少有159位,其中许多作者是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代表作者或优秀作者,如林稗生、张叔耐、林独步、拓哥、谭云山、曾圣提、丁琅、陈炼青、陈树南、许杰、林姗姗、柳鞭、吴仲青、曾华丁、曾玉羊、马宁、丘士珍、王哥空、林参天、张天白、叶尼、铁抗、丁倩、王君实、流浪、张楚琨、张曙生、黄科梅、老蕾、李润湖、吴广川、絮絮、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洪丝丝、金丁、王任叔、岳野、杨嘉、丁家瑞、白寒、白塔、张漠青、姚紫等,他们创作了大量优秀作品,其中有些成为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代表作。研究南来作者在新马文坛的文学活动,具有多方面意义:

(一)1919年至1949年的新马华文文学各时期文学的兴盛衰落和起伏波动,都与南来作者的文学活动密切相关,研究南来作者在新马的文学活动,对我们了解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史具有重大意义。

(二)新马华文文学经历了由中国文学海外支流的附庸地位,到逐步演进为塑造自己独特个性,终至成为独立国家文学的过程。这与南来作者对本地社会归属感的逐渐加强,以及对文学与社会现实关系的深刻认识,从而努力塑造新马华文文学的独特个性有

着密切关系。研究南来作者本地意识的演进过程,以及认识文学和社会现实的重要关系,对建立本地文学的独特色彩,促进文学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三)南来作者中不少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名作家,如巴金、徐志摩、艾芜、老舍、洪灵菲、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俞颂华,其在新马的文学活动也是他们整个文学生涯的一环。研究他们与新马的关系,对全面研究这些作家的文学活动具有积极意义。

(四)新马与中国一直有着密切关系,两地华文文学同根同源,文学作者在1949年之前往还频繁,文化交流十分频密。从80年代以来,新马与中国邦交日益改善,不少从新马回返中国的南来作者也重新和本地文坛取得联系,如广州归侨作家联谊会的石韞真、杨嘉、杨樾,北京的洪丝丝、张楚琨等人与本地文学界保持紧密联系,留在本地成为新马公民的南来作者潘受、姚紫等也曾前往中国,彼此进行双向交流访问。本论题的研究,对促进新马与中国的文化交流具有积极意义。

注 释

- (1)林参天《马来亚文艺沉寂的原因》,见《星洲日报·新年特刊》,1935年1月1日。
- (2)陈村(黄望青)《关于整理马华文运史料的建议》,见《星洲日报·晨星》,1941年1月9日。
- (3)马达(张晓光)《我对于文艺论争的管见》,见《民生报·新风》,1948年2月15日。
- (4)铁戈(陈果来)《文艺独特性·任务·及其他》,见《民生报·新风》,1948年2月18日。
- (5)以多(赵戎)《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新加坡:南洋大学创作社,1959),页6。
- (6)王康武《马华文学导论》,见赵戎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史料》(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3),页8。

- (7)李汝琳《马华文艺的起源》，见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编《马华文艺的起源及其发展》（新加坡：狮岛书报社，1964），页2。
- (8)苗秀《马华文学史话》（新加坡：青年书局，1968），页408~409。
- (9)苗秀《马华文艺的创作方向》，见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编《马华文艺的起源及其发展》（新加坡：狮岛书报社，1964），页6。
- (10)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下卷（新加坡：世界书局，1976），页143、146。
- (11)方修《中国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见《新马文学史论集》（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页42。
- (12)同(4)。
- (13)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1967），页82。
- (14)林万荅《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新加坡：万里书局，1978），页4~5。
- (15)方修《马华新文学简说》，见同作者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一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2），页8。
- (16)方修根据新马文坛创作的兴盛衰落状况将新马华文文学发展史分为如下几个时期：

(1)1919年——1925年	萌芽期
(2)1925年——1931年	扩展期
(3)1932年——1936年	低潮期
(4)1937年——1942年	繁盛期
(5)1942年——1945年	被占领期
(6)1945年——1948年	高潮期
(7)1948年——1953年	紧急状态时期
(8)1953年——1956年	反黄运动时期
(9)1957年——1965年	复兴期
(10)1965年——1976年	低潮期

见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页15~16。

- (17)杨松年博士以新马华文文学中本地意识的演进在文学上高低起伏的变化和波动状况，将新马华文文学发展史分为这几个时期：

(1)1919年至1924年——侨民意识浓厚的时期

(2)1925年至1926年——南洋思想萌芽的时期

(3)1927年至1933年——南洋色彩提倡的时期

(4)1934年至1936年——马来亚地方性提出的时期

(5)1937年至1942年——本地意识挫折时期

(6)1946年至1949年——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的时期

(7)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接管国家政权,新马与大陆之间外交关系中断,使新马华文文学更集中精力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

(8)1956年至1959年——爱国主义的提倡标志着本地人民的本地认同感越来越强烈,越鲜明。

(9)1965年——新加坡独立后,新加坡华文作家以新加坡共和国公民之一份子建设新加坡文艺。

见杨松年《新马华文文学论集》(新加坡:南洋商报,1982),页18。

(18)杨松年《独立前的华人文学》,未刊稿。

(19)马《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825—1990)》(柔佛:书辉出版社,1991)。

(20)痴鸠(张叔耐)在《贺新凉》词中有“自来星洲,弹指一载,身心交困,闲趣都捐”句,故知张氏南来时间为1919年。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0年4月7日。

(21)杨松年《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新加坡:同安会馆,1988)。

第二章

中国南来作者介绍

从 1919 年到 1949 年,在新马文坛上创作过文学作品的华文作者中,能够确认南来身份的作者至少有 159 位。在这 30 年的新马华文文学历程中,如果没有这批南来作者在新马文艺园地里辛勤拓荒和努力耕耘,新马华文文学就不可能发展成蔚为大观的局面;如果没有这批南来作者支撑着新马文坛,新马华文文学也不可能有各个时期的文学成就。因此,本文将 159 位南来作者的资料(包括姓名、笔名、籍贯、出生年份、南来年代、作品发表刊物、擅长文体、编刊名称)制成附表,以使读者对这批南来作者及其文学活动有个总体的认识。

本章共分四节。第一节分析南来作者的籍贯。第二节分析南来作者的出生年份与南来年代。第三节和第四节介绍主要的南来编者与南来作者。至于南来编者在新马编辑刊物的情形将在本文第三章详细论述。南来作者的文学主张和创作活动则见本文第四章和第五章。

此外需要说明的是,中国作者的南来有着政治、经济、文化等

背景因素,这在杨松年博士的《本地意识与新马华文文学》⁽¹⁾和林万菩博士的《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²⁾中已有详细分析和精辟论述,这里就不再赘述。

第一节 南来作者的籍贯分析

南来作者的籍贯,是本文甚为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这批中国作者的南来,除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外,大多具有地缘性的关系,即与他们的籍贯有关。本文将南来作者的籍贯制成表2—1“中国南来作者籍贯统计表”如下:

表2—1 中国南来作者籍贯统计表

省份	广东	福建	浙江	湖南	江苏	四川	安徽	北京	山东	湖北	河南	不详	总计
人数	56	46	11	7	6	6	3	3	2	1	1	17	159
百分比(%)	35	29	7	4.4	3.8	3.8	1.9	1.9	1.3	0.6	0.6	11	100

表2—1显示,在159位南来作者中,广东和福建两省籍的作者最多,共有102人,占总数64%左右。其中广东籍的南来作者56人,约占总数35%。在广东籍作者中,又以潮州地区居多,计有27人。他们是潮安的陈炼青、冯蕉衣、李润湖、刘思、曾圣提、曾华丁、曾玉羊、曾曼青、潘醒农、桃木、杨樾、张漠青、周心默、丁之屏、杜门、普洛、洪灵菲和柳北岸,潮州的林鲁生、曾奋和方图,澄海的王君实和以今,揭阳的黄科梅,汕头的陈白影,惠来的方北方和潮阳

的铁亢。海南作者 5 人,他们是王哥空、黄玉尧、白路、林穉生、和张一倩。广州的作者是陈残云、大礼和杨嘉 3 人。普宁的作者 2 人,即玛戈和李紫凤。南海的作者是何采菽和李一息 2 人。此外,尚有中山的于沫我,升平的梅秀,海丰的彭成慧,及不明县市的刘克非。广东籍的作者也有客籍人士,他们是大埔的柳鞭、罗依夫、饶百迎、杨实夫、杨实君和陈树南,梅县的胡一声、李梅子、文彪、林英强、梁浩养,平远的张天白,惠阳的冯伊媚,海丰的彭成慧,计 13 人。

福建籍的南来作者人数仅次于广东籍作者,共有 46 人,约占总数 29%。其中以闽南地区(泉州、厦门、漳州)居多,计有 34 人:泉州地区的有傅无闷、张放、张楚琨、姚紫、老蕾(永春)、李冰人(南安)、李铁民(永春)、林独步(惠安)、衣虹(南安)、王探(南安)、王秋田(晋江)、西玲(永春)、曾梦笔(惠安)、郑文通(永春)、朱绪(晋江)、白寒(惠安)、洪丝丝(金门)、郭史翼(金门)等 18 人;⁽⁹⁾厦门地区的有高云览、杜边、吴广川、林姗姗、许欲鸣、施骚、黄望青(同安)等 7 人;漳州地区的有温志新、杨骚、郑子瑜、林革尘(东山)、李词佣(诏安)、谢幼青(诏安)、武陵(诏安)、邱菽园(海澄),以及不明县市的张曙生等 9 人。其次是闽西的作者:有龙岩的连啸鸥、林岩、丘絮絮、丘士珍、马宁,永定的胡浪漫、林建安、林仙娇,共 8 人。此外,其他地区的有福州的白塔、福安的连士升,邵武的常夫 3 人。另外有不明地区的秋枫 1 人。

南来作者中以广东籍和福建籍为多,是有其原因的。由于闽粤两省在地缘上比中国其他省份靠近南洋,这两个省份的人民又有漂洋过海到南洋谋生,而后衣锦还乡的传统,所以新马的华人移民中以闽粤两省居多。南来作者中广东籍与福建籍的作者超过半数,也是由于历史与地缘的关系。在福建籍的华人移民里,闽南地区的人士最多。在广东籍的新马移民中,文化人最多的是潮州人氏。这就是为何闽粤两省籍的南来作者多数是闽南人和潮州人的缘故。这也是本文分析南来作者籍贯的目的及其意义。

浙江籍的南来作者人数位居第三位,共有 11 人。他们是杭州的夏衍、沈兹九和王映霞,上虞的胡愈之,郅县的吴仲青,富阳的郁达夫,温州的周了因,天台的许杰,奉化的王任叔,海宁的徐志摩,及县市不明的林参天。浙江籍的南来作者大多是中国著名的文化人,如郁达夫、夏衍、胡愈之、许杰、王任叔、沈兹九等,他们多是应邀前来新马主持报政。

湖南籍的作者有 7 人:茶陵的谭云山,长沙的任宇农,汉寿的邹子孟,浏阳的莹姿,祈东的吴天,沅陵的金山和不明县市的流浪。

江苏籍和四川籍的南来作者各有 6 人。江苏籍的作者有南京的曹兮,镇江的王仲广,泰昌的依藤,太仓的俞颂华,松江的张叔耐,泰兴的刘延陵;四川籍的作者有新繁的艾芜,成都的巴金和丁琅,郫县的张紫薇,以及不明县市的杏影和朱梅子。

此外,分布在其他省份的作者有 10 人。北京籍的作者 3 人:老舍、金丁和张明慈。安徽籍的作者 3 人:芜湖的王莹和丁家瑞,及不明县市的拓哥。山东籍的作者是郛城的岳野和济宁的上官豸 2 人。河南籍的作者仅有沁阳的李汝琳 1 人。湖北籍的作者也只有京山的聂绀弩 1 人。

再者,由于人事变迁或材料散佚,另有 17 位南来作者籍贯不明。他们是蔡高岗、常焱、曹国宾、段南奎、华国、林连夫、石韞真、铁戈、王纪元、殷枝阳、王炎之、更生、黄振彝、郭碧峰、周钧、有秋、胡戌女等。不过这部分作者较少。只占总数 11%。

综上所述,在 159 位南来作者中,将近三分之二的作者是广东和福建两省籍,他们成为南来作者中一队阵容庞大的生力军。此外来自其他省籍的南来作者,综合起来也是一支数量可观的作家队伍。他们共同为新马华文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节 南来作者出生年份与南来年代分析

南来作者的出生年份与南来年代,是本文作者极为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因为他们的出生年份与南来年代,与他们在新马的创作活动息息相关,也与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和壮盛有着密切关系。以下将分析南来作者出生年份和南来年代与他们在新马文学活动的关系。

一、南来作者出生年份分析

为便于对南来作者的出生年份进行分析,本文作者将南来作者的出生年份制成统计表 2-2 如下:

表 2-2 中国南来作者出生年份统计表

出生年份	1870—1889	1890—1899	1900—1909	1910—1919	1920—1929	不详	总计
人 数	1	12	38	39	10	59	159
百分比(%)	0.6	7.5	24	24.5	6.3	37.1	100

从表 2-2 可见出,1870—1889、1890—1899 和 1920—1929 这三个年代出生的作者较少,总共只有 23 人。1870—1889 出生的仅邱菽园 1 人;1890—1899 出生的也只有 12 人,即胡愈之、老舍、李铁民、林鲁生、沈兹九、徐志摩、俞颂华、张叔耐、刘延陵、郁达夫、傅无闷、林稗生;出生于 1920—1929 的仅有大礼、普洛、岳野、张漠青、丁之屏、白塔、姚紫、白路、常夫、武陵等 10 人。这 23 位作者只占总人数的 14% 左右。但其中却有值得注意的现象,即 1870—1889 和 1890—1899 出生的南来作者虽少,却有不少是中国著名的文化人,如胡愈之、沈兹九、徐志摩、刘延陵、俞颂华、郁达夫等。他们基本上是在创作年龄十分成熟的时候南来新马,并且以他们

的知名度和创作成就享誉新马文坛,充分发挥了显著的文艺与社会、政治效应。

在这批文化名人中,有些作者如老舍和徐志摩,他们在新马逗留的时间不长,也少与本地文坛接触,但他们回中国后创作的与新马有关的作品,已为新马文学界所熟知。徐志摩于1928年途经新加坡时,居留的时间只有数日,回国后写了一篇题为《浓得化不开——新加坡》⁽⁴⁾的散文体小说,形容新加坡的女人、气流和芭蕉都是“浓得化不开”。后来本地出生的作者杜运燮创作的散文《热带三友》⁽⁵⁾,其中提到南洋的椰树“不如其他热带植物,给人‘浓得化不开’,脑满肠肥的印象”,显然受到徐志摩这篇散文的影响。另外如老舍由1924年至1929年应聘在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担任教职,来回都途经新加坡。1929年回中国途中,在新加坡逗留了半年,在华侨中学担任国文教员。留新期间构思了一部以新加坡为地理背景、且充满童趣的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⁶⁾,但只创作了前半部分,回国后才完成该小说稿,于1931年首次在中国文学刊物《小说月报》连载。这部小说虽然并非在旅新期间写成,也并非发表于本地,却是新马文学界所津津乐道的作品。老舍回国后,其散文《不泄气真诠》于1938年2月至3月间分别刊登于《大众阵线》和《南星导报》。⁽⁷⁾1946年,老舍又在《公报》的副刊《公余》发表论文《创作经验谈》⁽⁸⁾和散文《旅美观感》⁽⁹⁾,《创作经验谈》这篇论文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新马文坛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遗憾的是老舍回国后在新马报章杂志上发表的这些篇章,至今尚未为新马文学史家所注意。

由此可见,这些在中国文坛上著名的文化人,他们在旅居新马时虽然没有直接在新马报章杂志上发表作品,但或多或少都对新马文学界产生过影响。

此外,在这批作者中,有些在南来之前,就已名透新马文坛,他们的作品早已被本地报章所登载。如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刘延

陵和俞颂华还在中国时,其文章已分别被刊登在《关仔角》、《轮》、《益群报副刊》、《星火》、《妇女世界》、《新国民杂志》、《叻报附张》、《新国民日报·评论》、《展望台》等副刊或版位上。⁽¹⁰⁾有些新马作者甚至还给他们去信,如曼华(曾曼华)于1930年在《南洋的文艺》发表一篇《剩语——一封信寄给达夫先生》⁽¹¹⁾,信中除了叙述与郁达夫在文学上的交往外,也表达了对这位著名作家的景仰之情:“达夫先生……是我所尊敬和景仰的。他的生性,就是如他的名字口样地豪迈,一样地超脱,在人群。他口口热烈的感情,它是时常表露在他口口的面容。他对于我,或者对于年轻的我们,是常看作他弟弟;而我,或者我们,也就对于他如兄长般看待。”由此可见当时新马的年轻作者对这些著名作家如何仰慕。这批著名作者在南渡新马后,以他们在文艺界和政治社会方面的活动,更对新马文坛产生不可低估的影响。(关于张叔耐、李铁民、林穉生、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等人的介绍详见本章第三、四节。)此外,少小由中国南来,而后曾回中国考中举人的邱菽园,由于其在社会政治和文学上的突出表现,使之一度成为新马文坛领袖,对新马文学界产生不小的影响。

从表2-2,本文发现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在1920—1929出生的南来作者,他们的年龄是南来作者中最为年轻的一批,其中多数成为战后“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的角斗时期: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时期(1945—1949)”的活跃作者。岳野在戏剧创作与演出方面成就卓著,白塔是当时创作力颇为旺盛的女性散文作者和小说作者,姚紫以小说《秀子姑娘》登上文坛而一举成名,普洛参与战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重大文艺论争。另外如大礼、丁之屏、张漠青、白路、常夫和武陵也是当时年轻有为的作者。紧急法令宣布后,南来作者纷纷北归或远走他乡,这批年轻作者中留在本地的如姚紫、大礼、常夫、武陵等,在50年代活跃于本地文坛,为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发挥一定的作用。(关于岳野、白塔、姚紫等作者的介

绍详见本章第四节。)

再者,表 2-2 显示,南来作者约有半数出生于 1900—1909 和 1910—1919 这两个年代,共计 77 人,占总数的 49% 左右。1900—1909 出生的作者有 38 人:巴金、陈炼青、冯伊媚、林革尘、洪丝丝、胡浪漫、胡一声、连士升、连啸鸥、林参天、林独步、林姗姗、柳北岸、玛戈、秋枫、饶百迎、谭云山、王秋田、王任叔、王映霞、王仲广、吴广川、吴仲青、夏衍、许杰、丘絮絮、杨骚、莹姿、曾梦笔、曾圣提、张天白、张紫薇、丘士珍、方图、马宁、杜门、聂绀弩、洪灵菲。1910—1919 出生的南来作者有 39 人:曹兮、陈残云、丁家瑞、杜边、冯蕉衣、高云览、金山、老蕾、李梅子、林岩、刘思、衣虹、汪金丁、王莹、上官豸、吴天、西玲、杨嘉、依藤、以今、于沫我、曾奋、张楚琨、张一倩、郑子瑜、周心默、黄望青、铁亢、任宇农、黄科梅、彭成慧、杨守默、白寒、陈白影、郭史翼、施骚、方北方、文彪、李汝琳等。这批数目庞大的青壮年作者活跃于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为清楚表示他们在新马文坛各个时期的活跃情况,本文依据掌握的资料,列表如表 2-3。

由于仍有 59 位南来作者出生年份不详,因此在 1919—1924 活跃于新马文坛的南来作者只能举出林独步 1 人。

表 2-3 显示,创作活动贯穿四个时期的作者有:林参天、洪丝丝、张天白;经历三个时期的作者有:陈炼青、连啸鸥、玛戈、林岩、吴广川、曾梦笔、张楚琨、彭成慧、以今、胡一声等;持续两个时期以上的有:胡浪漫、吴仲青、黄科梅、老蕾、丘絮絮、王仲广、西玲、莹姿、高云览、黄望青、汪金丁、王任叔、上官豸、吴天、杨嘉、刘思、马宁、丘士珍等。

这批在 1900—1919 出生的青壮年作者,在新马文坛基本上经历了两个时期以上的创作活动,他们的文学活动主要在 1925 年至 1949 年间,这正是新马华文文学开始发展,而后经历两个创作高潮(即 1927 年至 1930 年第一次创作高潮,以及 1937 年至 1942 年第二次创作高潮)的时期。其中如林独步、陈炼青、林参天、吴仲青、

表 2-3

创作时期	作 者	人数
1919—1924	林独步	1
1925—1933	陈炼青、胡浪漫、胡一声、连啸鸥、林参天、洪丝丝、林姗姗、玛戈、彭成慧、林岩、吴广川、吴仲青、许杰、衣虹、丘士珍、王仲广、马宁、依藤、曾圣提、曾梦笔、张楚琨、张天白。	22
1934—1936	陈炼青、洪丝丝、胡浪漫、胡一声、彭成慧、黄科梅、老蕾、连啸鸥、林岩、林参天、玛戈、丘士珍、王仲广、吴广川、吴仲青、西玲、以今、莹姿、曾梦笔、张天白。	20
1937—1942	陈炼青、冯蕉衣、高云览、洪丝丝、黄科梅、黄望青、林岩、林参天、刘思、老蕾、彭成慧、汪金丁、王任叔、王仲广、上官豸、吴天、西玲、丘絮絮、杨嘉、以今、曾梦笔、莹姿、张楚琨、张天白。	24
1945—1949	曹兮、丁家瑞、杜边、高云览、洪丝丝、胡浪漫、胡一声、黄望青、连啸鸥、林参天、刘思、玛戈、秋枫、汪金丁、王任叔、上官豸、吴天、吴广川、夏衍、丘絮絮、张楚琨、杨嘉、以今、张天白、马宁。	25

许杰、曾圣提、张天白、老蕾、丘士珍、莹姿、刘思、汪金丁、上官豸、吴天等以他们突出的文学业绩，成为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优秀作者。因此，上述这批青壮年南来作者实际参与并推动了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与壮盛。

二、南来作者南来年代分析

为进一步论述南来作者与新马文学的密切关系，本论文作者将南来作者南渡新马的年代制成表2-4。必须说明的是，有的南

表 2-4 中国南来作者南来年代统计表

南来年代	1880—1899	1900—1909	1910—1919	1920—1929	1930—1939	1940—1949	不详	总计
人 数	1	1	3	47	45	24	38	159
百分比	0.6	0.6	1.9	29.6	28.3	15	24	100

来作者在新马不只逗留一个时期,如曾圣提、张楚琨、马宁、杨骚等人多次南来,在新马居住两个时期以上。统计时以他们第一次南渡时间为准。

表 2-4 显示,1880—1899 年和 1900—1919 年两个年代南渡新马的作者最少,只有邱菽园、林姗姗、谢幼青、张叔耐、曾梦笔 5 人。其中邱菽园成为 20 年代新马最大的诗社团体“檀社”的领袖;张叔耐是 1919 年创办的《新国民日报》主笔,亦兼编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为马华新文学草创时期几位活跃的南来作者之一;林姗姗、谢幼青和曾梦笔也在 20 年代末成为《微光》、《海丝》、《诗》等文艺副刊的作者,从此步入新马文坛。

中国南来作者大量南渡新马主要有两个时期:一是 1927 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破裂后,大批中国作者为躲避政治迫害而纷纷南来;二是 1937 年“七七”事变前后,也有许多中国作者南来新马。表 2-3 表明,1920—1939 年南来的作者人数最多,计有 92 人,他们多数是在上述两个时期南来的。这批作者占南来作者总数的 59% 左右,他们是:艾芜、巴金、陈炼青、大礼、杜边、段南奎、冯蕉衣、冯伊媚、傅无闷、高云览、胡一声、老蕾、老舍、李冰人、李词佣、李梅子、李紫凤、连啸鸥、林岩、林参天、林鲁生、林仙峤、林英强、流浪、刘思、柳鞭、柳北岸、罗依夫、衣虹、普洛、饶百迎、谭云山、桃木、拓哥、汪金丁、王莹、王君实、王秋田、王映霞、王仲广、上官豸、温志新、吴天、吴广川、吴仲青、西玲、徐志摩、许杰、许欲鸣、丘絮絮、杨骚、依藤、以今、莹姿、于沫我、郁达夫、曾华丁、曾圣提、曾玉羊、曾曼青、张放、张楚琨、张明慈、张曙生、张天白、张一倩、郑文通、郑子

璩、周了因、陈树南、丁之屏、丘士珍、黄望青、铁亢、任宇农、朱绪、王炎之、黄科梅、彭成慧、黄玉尧、马宁、更生、李一息、杜门、刘延陵、施骚、方北方、文彪、聂绀弩、洪灵菲、有秋。

在上述南来作者中,聂绀弩、洪灵菲、艾芜、巴金、老舍和徐志摩等在居留新马期间并未发表过作品,但后来的创作曾涉及与新马有关的事物。聂绀弩于1923年从厦门乘船到新加坡,停留一个月后转赴吉隆坡运怀义校当教员,同年前往缅甸。他后来写了《上岸》和《华民政务司》二文记述这段经历。⁽¹²⁾洪灵菲于1927年4月至6月间由汕头经香港流亡到新加坡,半个月后又流亡到暹罗。回中国后先后创作长篇小说《流亡》⁽¹³⁾、短篇小说《在木筏上》和《在俱乐部里》,⁽¹⁴⁾反映了当时新加坡的社会现实。艾芜于1930年从缅甸仰光途经马来亚来到新加坡,目的是去参加马来亚共产党召开的会议,但未果。在新加坡逗留一个多月后回仰光。后来根据新马之行的印象创作了《南国的小屿》、《过槟榔屿》、《马来亚旅感》,⁽¹⁵⁾以及《南行记》⁽¹⁶⁾里的部分篇章。巴金于1927年1月15日赴法国留学时途经新加坡,后在散文集《海行杂记》⁽¹⁷⁾的“新加坡”篇中提及有关新加坡的印象。

这批1920—1939年南来的作者,许多是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活跃作者。本文将他们在新马文坛各个时期的活跃情况列表如表2—5。

由于这批南来作者是在1920年以后才南渡新马的,而1919—1924年还是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所以此时参与本地文学活动的是1920年以前南来的张叔耐、林稗生、李铁民等人。吴仲青虽然曾在《文艺栏》上发表过一首旧体诗,但本文作者并未将其列入1919—1924年的活跃作者中,所以这批1920年以后南渡的作者在马华新文学草创时期的文学活动几近空白。但是他们之中大部分成为1925—1949年新马华文文学发展历程中的活跃作者。

表2—5加“*”的南来作者名单,显示这批南渡的活跃作者,

表 2—5

创作时期	作 者	人数
1925—1933	陈炼青*、胡一声*、连啸鸥*、林岩*、林参天*、马宁*、彭成慧*、丘士珍*、王仲广*、吴广川*、吴仲青*、许杰*、衣虹*、张天白*、依藤*、曾圣提*、张楚琨*、傅无闷、李词侗、李梅子、李紫凤、林鲁生、林仙峤、柳鞭、罗依夫、张放、谭云山、拓哥、王炎之、温志新、许欲鸣、曾华丁、曾玉羊、张明慈、郑文通、陈树南。	36 * 17
1934—1936	陈炼青*、胡一声*、黄科梅*、老雷*、连啸鸥*、林岩*、林参天*、彭成慧*、莹姿*、丘士珍*、王仲广*、吴仲青*、西玲*、以今*、张天白*、吴广川*、傅无闷、李冰人、李词侗、李紫凤、流浪、桃木、王炎之、曾华丁、张明慈、郑文通、朱绪。	27 * 16
1937—1942	陈炼青*、冯蕉衣*、高云览*、黄科梅*、黄望青*、老雷*、林岩*、林参天*、刘思*、彭成慧*、汪金丁*、王仲广*、上官豸*、吴天*、西玲*、丘絮絮*、以今*、张楚琨*、莹姿*、张天白*、李冰人、李词侗、林鲁生、林英强、流浪、普洛、桃木、铁亢、王君实、王炎之、郁达夫、张放、张明慈、张曙生、郑文通、朱绪。	36 * 20
1945—1949	杜边*、高云览*、胡一声*、连啸鸥*、林参天*、刘思*、马宁*、汪金丁*、上官豸*、吴天*、吴广川*、丘絮絮*、以今*、张楚琨*、张天白*、丁之屏、普洛、桃木、张放。	19 * 15

与前文有关出生年份分析的那批 1900—1920 年出生而活跃于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南来作者正好相同。由此表明这批青壮年作者于 1920—1939 年南渡新马后,从 1925 年就登上新马文坛,此后二十几年间活跃于新马文学界,促进了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与壮大。除了那些能够确认出生年份与南来年代的作者(加“*”的作者)外,另外一些能够确认南来年代的作者如李梅子、李紫凤、林仙峤、柳鞭、罗依夫、谭云山、拓哥、王炎之、温志新、曾华丁、曾玉羊、张明慈、郑文通、陈树南、李冰人、林英强、张放、流浪、桃木、朱绪、李词侗、铁亢、张曙生等人,也是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重要或活

跃的作者。其中如李紫凤、王炎之、曾华丁、李冰人、朱绪等经历两个时期的文学活动；张明慈、桃木、张放、李词侗、郑文通等的创作活动则持续了三个时期。

此外，从表 2—4 可见出，1940—1949 年南渡的作者有 24 人，他们是：蔡高岗、曹兮、陈残云、丁家瑞、胡愈之、金山、连士升、秋枫、沈兹九、王纪元、王任叔、夏衍、杨嘉、杨樾、俞颂华、岳野、张漠青、白塔、杨守默、姚紫、白寒、常夫、李汝琳、郭史翼等。

这批作者中的陈残云和夏衍居留新马时间不长。陈残云于 1941 年下半年南来新加坡，在报章文艺版发表过新诗。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他辗转于新马之间。后于 1943 年回中国。夏衍于 1947 年初由香港来新加坡，协助胡愈之主持《南侨日报》编务，也在《风下》周刊发表散文。1948 年在英殖民地政府施压下返回香港。但曾于同年 4 月 13 日至 14 日从香港发来《马华文艺试论》⁽¹⁸⁾一文，参与“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成为这场论争中的一篇重要文献。

这批作者里的沈兹九、胡愈之、俞颂华、王任叔、杨嘉、张漠青等在战前已开始登上新马文坛。除了俞颂华于 1941 年 8 月辞去《星洲日报》总编辑职位而离新赴港外，其余作者与战后南来的曹兮、白塔、白寒、秋枫、岳野、杨樾、丁家瑞等，成为战后 1945—1949 年马华新文学作者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战后南来的杨守默、姚紫、李汝琳等，在 40 年代末的新马文坛崭露头角，至 50 年代日趋活跃，各领风骚。

综上所述，从南来作者出生年份与南来年代分析中，我们可以见及南来作者在新马文坛的活动时期，以及他们在新马华文文学发展与壮盛历程中的重要贡献。

第三节 主要南来编者介绍

战前的新马华文文学,主要以报章副刊和少量期刊为登载园地。可以说,没有战前的报章副刊,就没有战前的新马华文文学。即使是战后的1945年到1949年,报章副刊仍是新马文坛的重要支柱。从1919年至1949年,至少有78位南来作者直接创办或编辑了114份文艺副刊、综合性副刊和期刊(详见本论文第三章附表)。这些南来编者在新马华文文学的园地里努力耕耘,为本地华文文学作出重要的贡献。

本节将分期介绍新马华文文学各个不同时期的主要南来编者。不过有的编者编辑的刊物较多,编刊时间也较长,如张楚琨、洪丝丝、郑文通、吴广川等编者,其编刊时间跨越二至三个时期,本文将他们归入编辑活动最活跃或最重要的那个时期。

再者,有些南来编者同时又是活跃的作者,为能够条分缕析地介绍他们在编刊与创作两方面的贡献,本节只着重介绍他们的简历与编务活动,至于创作方面的活动,将留给下节另文介绍。

以下介绍各个不同时期的主要南来编者:

一、侨民意识浓厚的时期(1919—1924)

这时期的报章只有少量的综合性副刊。能够确认南来身份的编者有张叔耐、刘克非、邱菽园三人。

张叔耐 笔名痴鸠、叔耐、鸠、耐、且耐和公叔且耐。原籍江苏松江,约生于1895年,1919年南来。1919年10月1日《新国民日报》创办时,出任该报主笔兼总编辑,亦兼编综合性副刊《新国民杂志》。张氏工于书法,《新国民杂志》的刊名即他亲笔题字。张氏亦曾在新加坡华侨中学担任过兼课教师。已逝世多年。

刘克非 笔名克非。原籍广东。1920年5月主编吉隆坡《益群报》，亦兼编该报综合性副刊《自由谈》，着力提倡新思想新文化。次年3月离职他去。其余不详。

邱菽园 一署啸虹。福建海澄县人。1874年生。7岁南来。曾回中国考中举人。1898年创办《天南新报》，自任总主笔，支持康有为维新变法。1922年曾代张叔耐主持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编务。擅长旧诗词，为当时新马诗坛领袖。1941年在星洲逝世。

二、南洋思想萌芽与提倡时期(1925—1933)

这时期主要的南来编者有拓哥、谭云山、黄振彝、曾圣提、郑文通、罗依夫、杨实夫、许杰、陈炼青、陈树南、林姗姗、曾华丁、李铁民等十三位。

拓哥 原名金拓，笔名梦苇、应平。原籍江苏。约于1923年或1924年南来。1925年7月15日在《新国民日报》创办马华新文学第一份纯粹新文艺副刊《南风》，自任编辑、作者和校对。共出版9期。至1925年11月停刊。后赴日本。1926年为爱情自杀身亡。谭云山与学尼分别作《悼梦苇》和《死神的权威——悼梦苇》诗哀悼之。

谭云山 笔名T. P.、云山。湖南茶陵人。约于1901年生。是早期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员。1924年南渡。曾任新加坡工商学校教职。为新加坡《叻报》文艺副刊《星光》(1925年10月发刊)的第一任编者。1926年9月创办另一文艺副刊《沙漠田》(附于《新国民日报》出版)。1928年应聘赴印度国际大学任教授。曾任印度国际大学中国学院院长多年。1983年在印度菩提伽耶逝世，享年82岁。

黄振彝 生卒年不详。曾毕业于上海国民大学。约1927年南来。《荒岛》于1927年附于《新国民日报》创刊时，黄氏出任主编，首倡突出南洋色彩。黄氏亦负责该刊“时评”和“瞎三话四”栏的写作，笔名岩、梅郎、武、依依、CZ、酷、EE、伊伊、严、YC、SY、CY等。《荒

岛》停刊后不知所终。

曾圣提 原名曾曼尼,其他笔名大吉、出丈、白丁、前壁、黑玉、小伟、大男、M。广东潮安饶平县凤凰乡人。1901年生。在厦门集美学校毕业。1922年南来新加坡。在道南小学执教半年后回中国。1925年到印度追随圣雄甘地先生左右,翌年又回原籍。1927年再度来新任《南洋商报》电讯翻译及副刊编辑等职。同年与窦秦白、张放在该报创设文艺副刊《洪荒》。1929年又创办《南洋商报》另一副刊《文艺周刊》。1930年升任《南洋商报》第7任总编辑,兼编该报副刊《商余杂志》。1932年再度赴印度追随甘地。1936年回槟城创办《现代日报》。其弟曾华丁、曾玉羊和曾曼青也都是南来作者。日本南侵前后回中国,定居天津。1979年偕夫人抵达印度舍瓦阿须蓝甘地的隐庐从事著述。1981年来新加坡探亲。1982年病逝于印度阿须蓝。

郑文通 郑氏是位编刊较多的南来编者。原籍福建永春。约20年代来新加坡。从1927年至1939年,共主持过8个副刊的编务:《新国民日报》的《绿漪》(1927—1928)、《瀑布》(1928—1930)、《新国民文学》(1938—1939)、《新园地》(1939),《南洋商报》的《曼陀罗》(1929)、《文艺工场》(1930)、《雷鞭》(1931),以及《民国日报》的《文艺》(1933)。也以钟之陵、陵华、郑灵先、文、问农、灵先等笔名发表过作品。战后曾任《建国日报》总编辑。1949年在新加坡病逝。

罗依夫 原名罗永年,笔名依夫、亦夫、一夫。广东大埔人。1927年南来槟城,主编《中南晨报》副刊《南针》。1929年至1930年,与郑文通、李梅子分别合编《南洋商报》的《曼陀罗》和《叻报》的《奠基》副刊。1931年在星洲主编《民众》周刊。约于1931年底离新,此后下落不明。

杨实夫 原籍广东大埔。曾担任《槟城新报》主笔。1929年至1933年主持过该报《椰风》(1929—1933)、《浪花》(1929)、《碧野》(1930—1932)、《学生园地》(1930)和《关仔角》(1930—1933)等几

个副刊。以半聿、聿、油炸鬼、实夫、迂夫、彬彬、半峇峇、阿Q、朴天、泼皮男、油子等笔名发表散文。后离开报界经营印刷业。于1979年前逝世于槟城。

✓ **许杰** 原名许世杰，另名张士仁，笔名士仁、六叔、小梦、知山等。浙江天台人。1901年生。曾毕业于绍兴第五师范。就学期间与同学组织微光文艺社，出版《微光》半月刊(1922)。许氏为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员。1926年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惨雾》，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以后又出版《飘浮》、《暮春》、《火山口》等。1928年，由于局势关系，许氏南来马来亚任吉隆坡《益群日报》总编辑，兼编该报文艺副刊《枯岛》，宣传新兴文学理论。1929年底辞职回上海。不久出版两本与新马有关的书《椰子与榴槿》(一名《南洋漫记》)和《新兴文学短论》。1984年许氏参加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第12届年会，应新加坡国立大学教师吴茂生博士的请求，影印《椰子与榴槿》寄交国立大学图书馆保存。许氏曾被推为全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担任过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兼主任。1993年在上海病逝，享寿92岁。

陈炼青 广东潮安人。1907年生。1921年随父南来。是南来作者中幼小南渡的少数作者之一。1928年进入《叻报》工作。同年创办文艺杂志《晓天周刊》。1929年接编《叻报》副刊《椰林》，进行两次重大改革，使该刊成为20年代末30年代初新马文艺界一份相当有影响力的文艺副刊。陈氏也以未见、未兆、炼青、炼、青、子陈子、老五等笔名发表散文和论文。1931年辞职回原籍养病。1940年在出生地病逝，年仅33岁。

陈树南 又名陈天放。广东大埔人。笔名旧燕、陈飞鸟、呢呢、喃喃、墨鸥、树、记者等。约于1927年南来。曾任槟城《南洋时报》主笔。1928年至1930年，编过《华侨周报》杂志，以及《南洋时报》的《南洋的文艺》、《民国日报》的《新航路》和《公共园地》等文艺副刊。1930年后回原籍，此后下落不明。

林姗姗 原名林铁魂,学名林毓梅。笔名寸铁、短兵、黄瑰、啸秋、SS、宋玫、姗姗等。1900年生。祖籍福建厦门。约1917年南来槟城。1919年离槟赴菲律宾。后回厦门。1926年再度来槟城。约于1929年曾任《光华日报》主编。1930年至1932年,林氏分别与朱梅子和李少岳合编《光华日报》的文艺副刊《南国的雨声》和《蜕变》。战后数十年来,林氏是《星槟日报》总编辑,主编该报的《星艺》、《莲花河》等副刊。于1980年辞世。

曾华丁 原名曾曼华,笔名华丁、昭。广东潮安县凤凰乡人。为曾圣提的三弟。曾圣提等人出版的《洪荒》于1928年迁往槟城《南洋时报》,曾由曾华丁主持过一段编务。从1930年至1935年,曾华丁先后主编过《光华日报》的《绝缘回线》、《南洋商报》的《压觉》,以及《总汇新报》的《曝谷场》三个文艺副刊。曾华丁也擅画插图,南洋商报副刊《文艺周刊》的许多插图,即他所绘。曾华丁于30年代中期弃文从商,往还于新加坡、香港和仰光之间。日军侵入马来亚前夕,由仰光回新加坡携眷避难,不料新马陷入日军之手,曾氏因被检举而遭杀害。

李铁民 原籍福建永春。约于1895年生。南来年份不详。战前于陈嘉庚公司任职。曾长期担任陈嘉庚秘书。李氏擅长旧诗词和杂文。笔名半鰈。早在1920年就在《新国民杂志》发表一些旧诗词。1926年至1927年主编《消闲钟》杂志。1933年主持《南洋商报》副刊《晓风》。1933年至1935年,曾两度主编《狮声》(《南洋商报》副刊)。战后除任职《南侨日报》外,亦是南洋工商补习学校董事及产业信托人。李氏于50年代回中国。曾任中国中央侨务委员会副主席。1956年逝世于北京。

三、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时期(1934—1936)

这时期主要南来编者有李紫凤、王炎之、王哥空、曾玉羊、吴广川、林建安6位。

李紫凤 原名李树梧，笔名树梧、S·W、是吾、桐弟、紫凤、吾、梧、病虹等。广东普宁人。曾赴日本留学。20年代末已活跃于新马文坛。30年代中期在编务方面亦较活跃，主编《南洋商报》的《狮声》、《晓风》、《展望台》、《沙滩》、《妇女与家庭》等副刊。1941年，与李词侬、林英强合编《大华周报》杂志。亦曾担任过吉隆坡《马华日报》主笔。战后流落在香港。约于70年代初在香港病逝。

王炎之 亦名王肖吾、王宣化。笔名炎之、厌之、寒波、宣化、肖吾生等。1925年至1926年，主编过《消闲钟》和《曼舞罗》杂志。1935年，在新加坡主持《电影与文化》周刊。从1936年至1937年，在马来亚怡保编辑过《中华晨报》的《银幕与舞台》、《大众副刊》、《青年大众》、《妇女呼声》四份副刊。1937年南下星洲办报。1938年离星返沪。

王哥空 琼州人。战前南来。原姓曾，新马沦陷时被日军捉去打伤，后改名换姓。1935年至1936年，曾主编《星洲日报》的副刊《文艺周刊》。1935年，创设了当时唯一的纯文艺杂志《椰风月刊》。在《星洲日报》当外勤和新闻编辑20多年。1959年因患肠癌病逝。享年50余岁。

曾玉羊 原名曾曼方，笔名曼四、丙。为曾圣提的四弟。原籍广东潮安。在厦门中华中学毕业。20年代中期南来新加坡。曾任《总汇新报》翻译和副刊编辑。1933年至1935年主编《槟城新报》的副刊《轮》。日军入侵马来亚时，他在缅甸仰光。后由滇缅公路回原籍。解放后遭受批斗，并被判刑入狱。刑满后即病逝。

吴广川 福建厦门人。1910年生。笔名川、广川、川川、广、一村、邝山、邝村、吴广略、拓夫、拓、村、奚因等。曾在菲律宾报界服务，亦曾在厦门担任教职。1929年南来。在新马从事过文学活动。后返回厦门。1933年再次南渡。从1935年至1939年，主持过《新国民日报》的《新国民杂志》、《新野》、《新园地》、《蕉影》、《文艺》、《影与剧》等多份副刊。战后曾担任《中南日报》和《南侨日报》新闻

编辑，亦主编《南侨日报》副刊《南风》。吴氏于1950年回中国，定居于广州。为归侨作家联合会重要成员。

林建安 福建永定人。南来编者林仙峤的胞弟。笔名鲁存、白雪、红冰、刘郎等。林氏编刊时期很长。1930年从兄长林仙峤手中接过《星洲日报》副刊《繁星》的编务，1932年又编辑《晨星》（《星洲日报》副刊），至1939年方由郁达夫接任。战后约1945年至1947年，林氏再度主编《晨星》。后《晨星》改为《星云》（1952年），林氏仍主持该刊编务，至70年代方卸任。

四、本地意识挫折时期（1937—1942）

这时期主要南来编者有张楚琨、李润湖、流浪、吴天、铁亢、郁达夫、王纪元等七位。

张楚琨 福建泉州人。约于1911年生。笔名楚云、郁、郁如、楚琨、张冲、柯游、章南石等。为南来作者张放（张楚鸣）的胞弟。9岁时南来。1930年曾以郁如为笔名协助陈炼青编辑《叻报》副刊《椰林》。后离新北归。1937年再次南渡，主持《南洋时报》副刊《狮声》的编务，鼓吹抗战救亡文学甚力。日军南侵前夕，与郁达夫、胡愈之、汪金丁等人避难印尼苏门答腊岛。战后从商，并出任《南侨日报》总理。后回中国。曾任厦门市副市长、全国归侨联合会副会长、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委员等。曾数次来新加坡访问。现居北京。

李润湖 原籍广东潮州。笔名宋千金、柳红玉、华尼、林曼、陈建、严韦蒙、梅颂明、英英、建芬、邓匡君、陆幼琴、文淑娟、庞曼坚、江上三郎、欧阳寒吟、尉迟华非、陈玉琼等，计有十余个。1913年生。1934年开始步入新马文坛。曾任《新国民日报》采访主任。从1936年至1939年，主持过《新国民日报》的《新路》、《新天地》、《新光》和《新园地》几份著名副刊。是位活跃的编辑和作者。1947年，突患疾病去世，年仅34岁。

流浪 原名刘道南。湖南人。约于1935年南来。1937年任职

于《南洋商报》，至次年共编辑过《南洋时报》的《狮声》、《南洋的文艺》和《今日文学》等副刊。日军南侵时，于1942年避难苏门答腊，不幸因食物中毒而病逝。战后新马作者谛克（陈憨生）作《忆流浪与铁抗》一文怀念流浪。1980年方修编选出版《流浪作品选》。

吴天 原名洪为济，又名洪为忌、洪昊天，号一舟。曾化名方君逸。其他笔名有叶尼、洪叶、马蒙、高哥、丹枫、天等。原籍湖南祁东县。1913年生于江苏扬州市。曾留学日本。1936年南来马来亚，在新加坡、芙蓉等地中小学任教职。曾集合一些话剧爱好者组织“星洲业余话剧社”。1937年至1938年，编辑过《星中日报》副刊《星火》，和《星洲日报》副刊《现代戏剧》。1939年春回上海。后成为著名戏剧家和导演。晚年居于广州。1989年逝世。

铁亢 原名郑卓群。其他笔名铁抗、明珠、君羊、金铁皆鸣、金鉴、金箭等。广东朝阳人。1913年生。1936年南渡新加坡，1937年至1939年，先后主持过《星洲日报》副刊《文艺周刊》，和《总汇新报》副刊《世纪风》的编务。1939年创办文艺杂志《文艺长城》（在上海印刷和出版）。新马沦陷时，不幸在大检证时遭日军捕杀，年仅29岁。战后南来作者石韞真作《记郑卓群》、上官彥作《三人行：王君实、铁亢和郁达夫》等文悼念之。

郁达夫 中国现代著名作家。1896年出生于浙江富阳县。1913年东渡日本留学。后成为中国创造社主要成员之一。抗战时和妻子王映霞南来新马（1938年），从事宣传抗战救亡运动。担任过星洲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从1939年到1942年，为新马华文文学作出不少贡献。共主持过《星洲日报》的《繁星》、《晨星》、《文艺周刊》、《教育》和《星洲日报》的《文艺半月刊》等副刊的编务，并发起组织南洋学会。1942年1月新加坡沦陷前夕，与胡愈之、汪金丁、王任叔、沈兹九等人避难印尼苏门答腊岛。在苏岛巴爷公务化名赵廉，以商人身份隐居下来。后被日本宪兵发现他精通日语，被迫在宪兵部担任翻译。期间救助了不少抗日华侨，也暗中为当地人

民作了不少好事。日本投降后，日军顾忌他目睹许多宪兵的罪行，故于1945年8月29日或30日将他秘密绑架后杀害，终年50岁。胡愈之作《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一文追悼之。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政府追认他为烈士。

王纪元 生卒年不详。于1932年开始写作。同年进上海《申报月刊》工作。曾去过香港和日本。“七·七”事变后回上海。1940年随胡愈之南来新加坡，任《南洋商报》编辑，并成为该报副刊《狮声》最后一任编者。日军南侵前夕，与胡愈之、郁达夫、汪金丁、张楚琨等避难苏门答腊。日寇投降后，回椰加达创办《生活三日刊》和《生活报》。1951年离开印尼回中国。1963年赴香港三联书店工作。

五、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的角斗时期：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时期（1945—1949）

这时期的主要南来编者只有胡愈之、沈兹九和洪丝丝三人。

✓ **胡愈之** 原名胡学愚，字愈之。1896年生。在新马期间以沙平为笔名发表作品。为鲁迅的学生。曾留学巴黎修读国际法，并研习世界语。早年到过欧洲和苏联。是位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1940年12月与王纪元一起应聘来新加坡，担任《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曾负责新加坡抗敌动员委员会宣传部工作。新马沦陷前夕，与郁达夫、汪金丁、王任叔、张楚琨、沈兹九等流亡印尼苏岛。战后重返新加坡，于1945年至1948年出版《风下》周刊。1946年出任陈嘉庚创办的《南侨日报》社社长。1948年3月离星，经香港回中国。1950年，担任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1959年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党委会委员。同年出任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1986年在北京逝世，终年90岁。1996年，在中国召开“胡愈之诞辰100周年纪念会”，纪念这位优秀的文化名人。

✓ **沈兹九** 笔名兹九、兹。浙江德清县人。1898年生。毕业于日本女子师范专门学校。1933年任《申报》副刊《新妇女》主编。1941

年南来新加坡,不久与胡愈之结婚。曾积极参与宣传抗战救亡工作。新加坡沦陷之前,与胡愈之等流亡印尼苏岛。1946年3月出版并主编《新妇女》杂志。1948年与胡愈之回中国。曾任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常务委员、宣传教育部部长,并主编《新中国妇女》。1990年逝世,享年92岁。

洪丝丝 原名洪永安。笔名漱玉、诗棍、徐必达。1907年生。福建金门人。南来日期不详。1932年至1935年,洪氏出任《光华日报》副刊《槟风》的主编。1939年至1942年初,及1946年至1948年,洪氏两度主持《现代周刊》的编务。1946年至1948年,主编《南侨日报》副刊《南风》。1950年《南侨日报》被封闭后,回返中国。曾担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新闻社理事长,华侨大学董事等职。1989年在北京病逝。

以上是关于30位主要南来编者的介绍。至于他们编刊的详细情形,以及其他南来编者在新马的编辑活动,请详见本论文第三章。

第四节 主要南来作者介绍

在159位南来作者中,有些只是新马的匆匆过客,逗留时间只有半年数月,甚至仅仅十日半旬,如聂绀弩、徐志摩、艾芜、巴金、洪灵菲等人;有的表现不俗,可惜由于生活动荡不安或其他原因而有如昙花一现,从此在新马文坛消失了踪影,如邹子孟、华国、段南奎等人。不过,在这些南来作者中,有相当一批作者活跃于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有些甚至成为某个时期的文坛领袖或具有代表性的作者,如曾圣提、郁达夫、胡愈之等人。本节将对主要南来作者进行介绍。不过,由于有些南来作者同时又是活跃的编者,如拓哥、曾

圣提、谭云山、张楚琨、铁亢、李润湖、郁达夫、胡愈之等人，他们的简历已见于上节南来编者介绍，故本节在介绍这类作者时将略去简历部分，以避免重复，只在他们的名字后面加“*”，请参阅上节有关他们简历的部分。

由于有些作者文学活动时期较长，如洪丝丝、连啸鸥、林建安、丘士珍、吴广川、张天白、林参天、马宁等，他们的文学活动往往持续二至三个时期，本文主要根据他们的创作表现，将他们归入创作活动较活跃或较有成就的那个时期。以下是各个时期的主要南来作者介绍：

一、侨民意识浓厚的时期(1919—1924)

这时期的主要南来作者有林穉生、张叔耐、林独步三人。

林穉生 本名林克谐，海南文昌人。生于1892年。壮岁南来。1919年至1921年任星洲《叻报》编辑，主持多版编务工作。任职《叻报》期间，为“时评”和“社论”栏的主要撰稿人。在该报发表的百余篇政论散文，文言与白话约各占半数，大多是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民生等问题而发。为马华新文学初期政论散文的开创者之一。林氏于1954年辞世。其后人林徐典于1970年编辑出版《林穉生政论集》。

张叔耐* 早期著名的政论散文作者。从1919年至1927年，林氏在《新国民日报》的“社论”、“时评”、“评论”等栏位，以及《新国民杂志》副刊，以文言和白话发表800余篇政论散文，为南来作者中创作篇数最为可观的作者。此外，也在《叻报俱乐部》、《谈丛》等刊登古文和旧诗。直到1936年，张氏仍有散文发表于《檳城新报·大千世界》。

林独步 福建泉州惠安人。约生于1903年。早年留学日本。新加坡《新国民日报》于1919年10月1日复刊时，林氏任该报编辑。1924年至1927年，担任《南洋商报》编辑主任。林氏是马华新

文学初期杰出的作者,在诗歌和小说创作方面独步一时。从1920年开始,年仅十余岁的林氏在《商余杂志》、《新国民杂志》以及新国民日报的“社论”、“时评”等副刊和版位上发表散文、小说、新诗、论文、神话、翻译及旧文学作品,且致力于外国文艺理论的介绍。可惜林氏从1927年后淡出新马文坛,其后似乎不再创作。林氏晚景凄凉,约于80年代初在星洲郁郁而终。

二、南洋思想萌芽与提倡时期(1925—1933)

这时期主要南来作者有拓哥、陈树南、丁琅、何采菽、连啸鸥、陈炼青、衣虹、林鲁生、柳鞭、罗依夫、谭云山、吴仲青、郑文通、曾圣提、曾华丁、曾玉羊、马宁等17人。

拓哥 * 简历见上节。为马华新文学第一份纯粹新文学副刊《南风》的创刊者。在该刊发表诗歌、小说、散文、剧本、论文等作品共24篇。由于受中国创造社作家的影响,其作品富于浪漫主义色彩和感伤情调。此外,在《新国民日报》的“评论”及《新国民杂志》也发表过散文和论文。

陈树南 * 简历见上节。陈氏擅长散文、小说、论文等文体创作。从1927年至1930年,陈氏在《文艺周刊》、《绿漪》、《新航路》、《椰风》、《关仔角》、《南洋的文艺》、《流连》、《椰林》、《叻报俱乐部》、《公共园地》上发表散文、诗歌、论文、小说、剧本和旧文学等约60篇作品。

丁琅 原名宴秦白,其他笔名蓉女、花都蓉女、宴秦伯等。四川成都人。1927年与曾圣提、张放合编《洪荒》副刊。擅长散文和诗歌,在《洪荒》刊登十余篇作品,是当时优秀的诗歌和散文作者。在星洲居留时间不长,后回中国。80年代末仍居住于成都。

何采菽 笔名旭、昶、蔚蓝、CY、绿水等。广东南海人。曾于1929年创设《昶旭》副刊,自编自撰,共出16期。何氏是位文艺全才,擅长各种文体创作。从1926年至1935年,何氏在《昶旭》、《绿

漪》、《瀑布》、《新国民杂志》、《商余杂志》、《小说世界》、《诗歌世界》、《翠兰》上刊登散文、小说、诗歌、散文诗、剧本、论文和旧诗等作品近百篇。作品富于浪漫主义气息。于战前回中国。后病逝。

连啸鸥 本名连兴梓,其他笔名介亮、曼曼、萧鸣、啸鸥、鸥等。福建龙岩人。1909年生。毕业于福建省立第9中学。1929年登上新马文坛后,在《椰林》、《新航路》、《狮声》、《诗专号》、《商余杂志》、《读者园地》、《南洋风》等刊物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在新马的文学活动历时近20年。连氏曾任《南侨日报》编辑,亦编过《狮声》(《南洋时报》副刊)、《南风》(《南侨日报》副刊)以及综合性杂志《南岛》等刊物。现居印尼巨港。曾任当地华侨总会中文秘书。

陈炼青* 简历见上节。为20年代末杰出的马华作者。由于幼小南来,对新马颇有感情,力倡南洋色彩的文艺。在自己编辑的《晓天周刊》、《椰林》及其他副刊如《狮声》、《晨星》、《前驱》、《星火》等发表百余篇散文、论文等作品。其中部分作品是他于1932年回原籍养病后寄回新马报章发表的。陈氏文笔清新刚健,尤其是早期作品颇有思想与见解,对当时文坛有着不小的影响。1962年,新加坡南洋文艺出版社印行《陈炼青文集》。

衣虹 原名潘受,又名潘国渠,字虚之,号虚舟。福建南安人。1911年生。19岁南来星洲。1930年曾协助陈炼青编辑《叻报》副刊《椰林》。在该刊登载诗歌、散文、论文、小说等。其中关于新兴文学理论的论文,对当时新马文坛盛行的新兴文学理论进行系统的总结,向来为新马文学史家所重视。“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潘氏担任南洋华侨筹赈会主席陈嘉庚的秘书。战后曾从商。1955年任南洋大学秘书长。1960年退休,从事文化艺术研究及创作。曾荣获新加坡及海外多项奖章。1995年,被新加坡政府宣布为国宝。潘氏后来主要从事旧诗词创作。1987年在中国出版诗集《海外庐诗》。1997年,在新加坡印行《潘受诗集》,内收1937至1997年创作的1177首诗歌。

林鲁生 原名林雪棠,其他笔名鸣爽、陆升、依仁、雪棠。广东潮州惠来县人。1898年生。1928年南来槟城。20年代末崛起于北马文坛。在《顽石》、《海丝》、《绝缘回线》、《槟风》、《星火》等副刊上发表作品。1936年曾赴日本攻读政治经济学。1937年回潮州。1938年再度南来槟城,主持《现代日报》的副刊《前驱》和《火炬》编务。日本南侵时避难泰国。约于1946年回返中国,在原籍教书。1948年第三次来槟城。曾出任威省高洋培德学校校长。其后在《莲花河》、《文艺公园》发表一些作品。著有两本散文集:《自己的文章》(1961)、《自己的文章续集》(1983)。

柳鞭 原名刘柳鞭,笔名柳戟、戟、戟子。广东大埔人。约于1927年前后南来,在吡叻和丰兴中学教书。从1928年至1930年,在《南洋的文艺》、《压觉》、《南星》等刊物发表小说、散文和论文。其中以小说《饥饿的狗》最为有名。也曾与陈树南合编过《华侨周报》杂志和《南洋的文艺》(《南洋时报》副刊)。1930年后下落不明,不见其再发表作品。

罗依夫* 简历见上节。为新马文学界最早主张新兴文学的南来作者之一。从1929年至1933年,罗氏在《瀑布》、《曼陀罗》、《奠基》、《压觉》、《椰林》、《椰风》、《学生园地》、《狮声》等副刊登载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其中散文《如此上海》在《狮声》连载159期,为当时所罕见。

谭云山* 简历见上节。从1925年至1927年,谭氏在《星光》、《沙漠田》和《新国民杂志》上刊登散文、诗歌、论文和古文近60篇,为当时高产作者。谭氏1930年在广州出版的诗集《湖畔》,为新马华文文学史上第2本诗集。

吴仲青 笔名白龟、西摩、吴菁等。浙江嵊县人。1900年生。毕业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和国立测量专科学校。20年代南来,服务于教育界,曾担任过巴生中华学校校长。从1922年至1936年,吴氏在《文艺栏》、《教育》、《商余杂志》、《叻报俱乐部》、《戏剧世界》、《浩

泽》、《新国民杂志》、《风篁》、《椰林》、《文艺周刊》、《狮声》发表小说、散文、翻译散文和旧诗等。吴氏创作以小说见长，为20年代中后期优秀的小说作者。曾于1926年编过《新国民日报》副刊《浩泽》。1948年病逝于星洲。

郑文通* 简历见上节。为新马文坛高产量作者，且兼写新旧文学。从1926年起，郑氏在《文艺周刊》、《瀑布》、《曼陀罗》、《文艺工场》、《华侨周报》、《益励》、《新国民杂志》、《小说世界》、《诗词专号》、《狮声》、《展望台》、《新园地》等刊登小说、散文、论文和旧文学百余篇。郑氏写过不少短篇小说，有的连载多期，可惜都不特出。不过其作品产量颇为可观。

曾圣提* 简历见上节。曾氏在新马的文学活动主要在20年代下半期。从1925年步入新马文坛，至1932年，曾氏在《星光》、《洪荒》、《文艺周刊》、《马来小报》、《商余杂志》、《关仔角》等刊物登载数十篇小说、诗歌、散文及翻译散文等作品。曾氏具有深厚文学功底，其作品艺术性较高。亦擅长翻译，在《文艺周刊》上发表过一些译作。曾两次到印度追随圣雄甘地，1943年写成《在甘地先生左右》一书。1980年至1981年间，在新马《乡土》、《文艺春秋》、《读者文艺》等副刊发表不少创作及译文。

曾华丁* 简历见上节。主要文学活动在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曾氏擅长小说和散文创作，其中小说《五兄弟墓》最为著名。曾氏也是当时少有的优秀童话作者。其作品多数刊登在《洪荒》和《文艺周刊》，少数发表于《南洋的文艺》、《咖啡》和《繁星》等副刊。

曾玉羊* 简历见上节。主要文学活动也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作品发表于《压觉》、《文艺周刊》、《南洋的文艺》、《关仔角》、《轮》等副刊上。作品文笔细腻，词采秀丽，且作风大胆，在曾氏三兄弟中独具一格。除创作小说、散文、剧本外，也从事翻译工作，尤其热衷于译介马来文学。曾译过《马来民歌选》，内收马来民歌81首，为当时重视马来文学的少数作者之一。

马宁 原名黄震树,现名黄振椿,笔名静倩、马宁、王八蛋。1901年出生于龙岩。1930年参加中国作家联盟。1931年南来。在新马居留三个时期:1931年至1934年;1941年7月至12月;1946年至1948年。在新马《戏剧》、《南风》、《文艺》、《风下》等刊物发表剧本、小说、散文、论文、翻译童话等。1946年在新马和香港出版中、长篇小说《椰风蕉雨》、《将军向后转》、《香岛烟云》、《顽固份子》。后回中国。从1989年开始,中国的几家出版社如华侨出版公司等出版了他的十余部作品,有长篇小说《将军向后转》、《香岛烟云》、《扬子江摇篮曲》、《处女地》、《红白世家》第一部《香港小姐奇婚记》;中篇爱情小说《铁恋》、《灰恋》、《新恋》、《武夷山上的白蝴蝶》;中篇自传故事《南洋风雨》;戏剧集《主仆之恋》;杂文集《哭笑不得集》、文艺回忆录《欲哭无泪》;《马宁选集》(两卷)等。

三、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时期(1934—1936)

这时期主要南来作者有林参天、林建安、丘士珍、王哥空、吴广川、张天白、李紫凤、林岩等八位。

林参天 笔名林莽。原籍浙江。1904年生。1927年南来。在华校教育界服务37年。从1930年始,在《瀑布》、《野葩》、《文艺周刊》、《新航路》、《南岛》、《晨星》、《商余杂志》、《星火》、《公共园地》、《南风》发表小说、戏剧、散文、论文和翻译论文等,尤擅长小说与戏剧创作。1935年完成的长篇小说《浓烟》,曾震撼当时的新马文坛。为新马华文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林氏后来出版的单行本有:《头家和苦力》(1951);短篇小说《余哀》(1960);《热瘴》(1861)。1972年病逝于吉隆坡,享年68岁。

林建安* 简历见上节。为新马文坛上的高产量作者。于1927年开始步入文坛。1930年从胞兄林仙峤手中接编《繁星》,勤力笔耕,每隔数日即有文章见报。林氏先后在报章上发表的作品近700篇,多数刊登在他主编的《繁星》和《晨星》副刊上。作品多为杂

感和评论,只有一两篇诗歌和小说。

丘士珍 又名丘家珍,笔名废名、丘天。福建龙岩人。1905年生。毕业于厦门集美中学师范班。20年代南来。文学活动主要在30年代中期。曾在《晨星》、《商余杂志》、《槟风》、《文学周刊》、《妇女周刊》、《星火》、《关仔角》、《今代》、《狮声》、《南岛》、《现代周刊》、《风下》、《文艺》、《南侨》、《读书生活》等刊物上登载小说、散文、论文等。尤擅长小说。1934年出版中篇小说《峇峇与娘惹》和短篇小说集《没落》。前者是新马华文文学史上第一部中篇现代小说。1934年因发表论文《地方作家谈》而引发一场关于“地方作家”的论争。这场论争在新马华文文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1948年印行中篇小说《复仇》。1949年回返原籍。现居福建龙岩。

王哥空 * 简历见上节。从1930年起,在《野葩》、《椰林》、《新航路》、《文艺周刊》、《晨星》、《繁星》、《狮声》、《今代》、《妇女周刊》等发表作品,主要是小说和散文。1934年出版短篇小说集《面包及其他》。这本集子与丘士珍的《峇峇与娘惹》和《没落》,为新马文坛最早出版的一批单行本。

吴广川 * 简历见上节。为高产量作者。在《曼舞罗》、《枯岛》、《电影与文化》、《新园地》、《新国民杂志》、《新野》、《新路》、《星海》、《自由天地》、《南风》、《小说世界》等发表小说、散文、诗歌、论文等近百篇作品。1950年回国后长期搁笔。约80年代初,在新马报刊上刊登数篇以南洋为背景的短篇小说。

张天白 现名张晓光,笔名伦父、马达、晓光、太阳、炎炎、东方生、丘康、丘幸之、莘莘、杨明、张晨。广东平远人。1902年生。在广东已从事创作。1930年南来。在《雷报》、《晨星》、《狮声》、《繁星》、《南侨教育》、《文艺》、《野火》、《星火》、《文会》、《新路》、《诗词专号》等发表的作品字数超过100万字。多数为散文(杂文)和论文。张氏约于40年代末回返中国,定居广州。1979年,方修编辑出版《张天白作品选》。

李紫凤* 简历见上节。20年代末出现在新马文坛,30年代中期最为活跃。在《八月》、《新航路》、《狮声》、《繁星》、《展望台》、《商余杂志》等刊登百余篇散文、诗歌、论文等作品。李氏当时年轻气盛,曾因为批评态度不好而引发数场论争。

林岩 原名陈子彬,其他笔名有一萍、一礁、林影、林棘、林之间、陈一萍等。福建龙岩人。1910年生。1929年南来槟榔屿。1930年左右开始发表作品。1940年北归,想回国参加抗战,却在重庆滞留六年。1946年再次南渡马来亚,重新提笔创作。林氏在马来亚期间,在《繁星》、《晨星》、《狮声》、《新光》等刊登散文、论文、小说等。曾撰文评论林参天的长篇小说《浓烟》。1949年又返回中国。现居住在广州。

四、本地意识挫折时期(1937—1942)

这时期主要南来作者有冯蕉衣、高云览、黄科梅、黄望青、老蕾、李润湖、流浪、刘思、桃木、铁亢、丁倩、汪金丁、王君实、上官豸、吴天、絮絮、殷枝阳、莹姿、郁达夫、张楚琨、张曙生、朱绪等22人。

冯蕉衣 笔名拉因、砂金。广东潮安人。1914年11月21日生。1937年南来,在商店任书记。在《晨星》、《文艺周刊》、《文艺》、《新流》、《新光》、《大路》、《新园地》、《狮声》、《吼社诗专》、《南洋周刊》、《南风半月刊》发表诗歌和散文。冯氏擅长创作诗歌,曾于1937年由文芬书屋出版诗集《衡窝集》。这在战前的新马文坛是很突出的。冯氏因长期失业,生活穷愁潦倒,于1940年贫病交加而亡。郁达夫在《星洲日报·晨星》副刊出版“纪念诗人冯蕉衣特辑”,亲笔为特辑刊头题字,并作《悼诗人冯蕉衣》文以悼之。其好友白荻、王君实等搜集冯氏生前诗作,手印《冯蕉衣遗诗》,请郁达夫作序,凡50册,赠送有关人士留念。

高云览 本名高怡昌,又名高咏览,笔名芸览、高健尼、万云霓、高友庆、高法鲁、仲约、也鲁等。福建厦门人。1910年生。约21

岁时,经杨骚介绍,在上海参加中国作家联盟。亦结识当时在上海的张楚琨。不久张楚琨南来,高氏亦于1937年南渡新马。曾在麻坡中华中学任教务主任。后在新加坡南洋女中任教。1938年参加抗日团体“抗敌后援会”。1939年,与张楚琨以《南洋商报》特派记者身份回国,在西南大后方和前线采访。1940年,参加陈嘉庚领导的“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到西北视察访问。返新加坡后,在《南洋商报》发表大量报道。日军入侵星洲前夕,与胡愈之、郁达夫、张楚琨等避难于印尼苏门答腊。战后和杨骚等人经商,曾是《南侨日报》的大股东。文学活动主要在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作品多数发表在《狮声》副刊,也见于《南洋周刊》、《现代周刊》等。高氏擅长小说创作,长篇小说《春秋劫》曾在1946年的《现代周刊》连载。紧急法令后,于1949年被英殖民政府驱逐出境。1950年定居于天津。1956年病逝,年仅46岁。其长篇小说《小城春秋》由作家出版社印行后,被译为英、法、西班牙、俄、日等五国文字。中文版发行量达150万册,并被改编成电影。

黄科梅 笔名白荻、黄莺、瓢儿、胡图、白琳、萧琴、楼雨桐、田家瑾等。原籍广东揭阳。1915年生。1932年南来星洲。约于30年代初期开始创作,以30年代中后期较为活跃。在《晨星》、《文艺》、《狮声》、《大路》、《星火》、《世纪风》、《新路》、《新光》、《新流》、《文艺界》等副刊上登载作品,以散文、小说和诗歌较为出色。曾于1938年编辑过《新国民日报》的《文艺》副刊。战后一直在报界工作。50至60年代编过《新报》和综合性杂志《行动周刊》。亦于1960年创立《民报》。1960年在新加坡辞世。1979年方修编辑出版《白荻作品选》。

黄望青 笔名耶鲁、郭安、陈村、李秋等。祖籍福建同安。1913年生于厦门鼓浪屿。193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在中国已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和译作。1936年南来新加坡。曾在华侨中学任文史地教师,兼授英汉对译课程。从1936年开始活跃于

新马文坛,在《狮声》、《晨星》、《星火》、《南潮半月刊》刊登作品,其中以论文和散文为主,也有少数诗歌、小说和译作。战后从商。1973年任新加坡驻日大使。1981年出任新加坡广播局主席。1978年荣获新加坡总统颁给“高级勋绩奖章”。曾任中国厦门大学、西南师范大学、河北财经学院、福州大学客座教授或顾问教授。

老蕾 本名许清昌,笔名许凤、佛特、欧阳之青、罗汉明。福建永春人。1915年生。1937年肄业于厦门大学。同年与友人西玲(吴章庆)一起南渡。在马来亚任教多年。30年代下半期至40年代初较为活跃,在《狮声》、《文艺》、《晨星》、《新流》、《世纪风》、《星河》、《文会》、《南洋周刊》、《南洋文艺》等刊登作品,多写小说、论文和散文。晚年退休后寓居星洲。1979年新加坡上海书局出版《老蕾作品选》。

李润湖* 简历见上节。为30年代下半期至战后初期的活跃作者和高产作者。战前曾在《晨星》、《槟风》、《星火》、《展望台》、《文艺》、《新光》、《新路》、《新园地》、《南洋风》发表大量论文和散文,为战前的文艺界注入新生命。战后又在《突击》、《南风》、《读者园地》、《新民主报》等登载杂文,曾数度引起论战。李氏在新马报刊发表的作品超过百篇。方修于1980年编选出版《李润湖作品选》。

流浪* 简历见上节。主要文学活动在30年代下半期。作品刊登在《星火》、《槟风》、《晨星》、《狮声》、《南洋文艺》、《今日文学》等刊物上。善写小说和杂文。芦沟桥事变发生后,积极参加新马文艺界抗战救亡宣传工作,并力倡文艺通俗化和大众化运动。1980年方修编辑出版《流浪作品选》。

刘思 原名刘世潮,其他笔名高云、方达。广东潮安人。1917年生。1935年南来星洲。1937年开始发表诗作,在《狮声》、《吼社诗专》、《生路》、《南洋周刊》、《世纪风》、《文艺》、《晨星》、《繁星》、《日落》、《商余杂志》、《大路》、《新光》、《诗歌专页》、《南风》等刊登百余首诗歌,为战前五年活跃的诗人。日军南侵时,为当时诗歌团

体“吼社”的主干，积极推进诗歌运动。曾编辑过《吼社诗专》（《南洋商报》副刊）。战后转向旧诗词创作。亦发表一些散文和新诗。1956年在中正中学兼课。1970年因病辍笔至今。著有《刘思诗集》（1981）、《刘思诗词集》（1982）。

桃木 原名王崑。其他笔名洪半呆、山兄、蒲剑、兆木等。广东潮安人。生年不详。1936年南来。随后在《南洋风》、《大众副刊》、《新光》、《新路》、《新园地》、《狮声》、《南洋周刊》、《世纪风》、《文会》、《忠言半月刊》、《南风》等发表诗歌、散文、论文等作品。1941年，积极提倡“诗歌大众化运动”。曾于1939年至1941年主编《总汇新报》的副刊《文会》。战后亦曾编辑《南侨日报》的《南风》副刊。后回返中国。1960年病逝于北京。

铁亢* 简历见上节。为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主要的新马作者。在《文艺》、《晨星》、《大路》、《新野》、《世纪风》、《忠言半月刊》、《新国民文学》等刊登大量小说、散文、论文等，在小说创作和文艺理论方面卓有成就。著有小说集《白蚁》、《义卖》、《山花》、《阴影》，以及文艺论著《马华文艺丛谈》等。1979年，新加坡上海书局出版《铁亢作品选》，内收铁亢生前发表的部分作品。

汪金丁 原名汪林钰，号竹铭。笔名金丁，乃各取竹铭之半倒写而成。北京人。1910年生。曾在北京与师陀、徐莹合编《尖锐》杂志。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1937年南来新马，在南洋女子中学任教。日军入侵新加坡前夕，与郁达夫、胡愈之等一行人避难苏门答腊。战后回星洲，在胡愈之主持下的《风下》杂志、《南侨日报》、《自由丛刊》担任编辑。金丁为战前新马活跃作者，在《狮声》、《南洋文艺》、《南洋周刊》、《文艺周刊》、《槟风》、《学文周刊》、《星火》、《晨星》、《文艺》、《南潮半月刊》等发表大量论文、散文等作品，尤其善写文艺评论。亦发表过小说和翻译论文。战后在《南侨日报》的《南风》、《文艺》、《民主》及一些特刊上也刊登论文、散文等。后于1949年回返中国。曾任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等。

王君安 为 30 年代末期活跃与高产量的马华作者。原名王惠风,笔名王修惠、王乐怡、蓝田玉、白登道、横光、陈清浓、朱丽叶等。1918 年生。广东澄海人。曾在广东中山大学肄业。1937 年南来,曾在马来亚和印尼执教。在《狮声》、《文艺》、《晨星》、《华侨公园》、《新光》、《影与剧》、《侨声》、《大路》、《星火》、《世纪风》、《新国民文学》等发表约一百万言的作品。其中有散文、小说、论文、诗歌等。曾积极参加新马文艺界抗战救亡宣传工作。星洲沦陷后,为日军屡次搜捕。因不愿连累友人与陷入敌手,毅然坠楼自杀,年仅 24 岁。

上官翥 原名区文庄,其他笔名有韦晕、韩兵、山霞、山笺一、丁凤、韦多、陈佺、高浪、沙耶、叶霞、秦系等。祖籍山东济宁。1913 年生于香港。毕业于香港官立泽文中学。后进广州美专习画。1937 年南渡,随后活跃于新马文坛。在《狮声》、《新流》、《世纪风》、《新光》、《晨星》等发表小说、散文、论文等作品,尤其以小说著称。从事过多种职业,后从商。出版的作品有:短篇小说集《乌鸦港上黄昏》、《都门抄》、《旧地》、《春冰集》、《韦晕小说选》、《寄泊站》;中篇小说《还乡愿》、《荆棘丛》、《陨石原》;长篇小说《浅滩》;散文集《东海·西海》;游记《野马随风》;文坛轶事《文苑散叶》等。1996 年在马来西亚病逝,享年 83 岁。遗著《海不变》于 1997 年由马来西亚野草出版社印行出版。

吴天* 简历见上节。为 30 年代下半期活跃的作者和戏剧家。在《晨星》、《文艺》、《飞星》、《繁星》、《现代演剧》、《舞台银幕》、《狮声》、《野风》、《星火》、《南潮半月刊》等刊登剧本、散文和论文,尤擅长戏剧创作,亦兼擅散文和论文写作。1939 年回返中国后,仍寄作品来新马报章《南侨日报》和文艺副刊《世纪风》等发表。曾执导新中国第一部电影《走向新中国》。也曾以华侨生活为题材编写多幕剧《海恋》。

絮絮 原名丘絮絮,笔名重阳、哈莱。福建龙岩人。1909 年生。

毕业于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系。1928—1934年间,在中国出版诗集《昨夜》和《骆驼》。1935年已有诗歌在《槟城新报》的副刊《无线电台》发表。1939年南来,在马来亚和婆罗洲等地任教。在《狮声》、《银幕世界》、《怒吼的五月》等登载诗歌、小说、散文等。战后亦在《南侨日报》的副刊《和平》,以及《忠言半月刊》发表作品。1967年逝世。在新马出版的单行本有:小说集《荣归》、《学府风光》、《在大时代中》、《沉滓的浮起》、《大时代中的插曲》、《坎咪之死》;中篇小说《播种者》;诗集《生之歌》、《呼吁》、《龙园小品》等。

殷枝阳 原名陈树英,笔名乳婴、枝阳、周容、金枝芒。生年与籍贯不详。“七七”芦沟桥事变后南来。在《晨星》、《狮声》、《世纪风》、《南洋周刊》、《文艺长城》、《新流》、《星火》、《文艺》、《忠言半月刊》、《赤道文阵》等发表作品,尤擅长小说与散文,为战前活跃的优秀小说作者。日军占领马来亚时期,曾投笔从戎,拿起武器捍卫马来亚。战后因发表《谈马华文艺》一文而引发一场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争。这场论争意义十分重大。后回返中国。于1988年辞世。

✓ **莹姿** 原名刘耘之,另有笔名耘之。湖南浏阳县人。1909年生。曾在上海中国公学就读。1934年与夫君林芳声南来马来亚,在新马等地任教。为战前新马文坛少有的优秀女诗人。在《狮声》、《新流》、《大路》、《新光》、《椰阴》等登载许多作品。擅长写诗,亦兼擅小说和散文。作品大多表现对中国与新马社会现实的关怀。1941年,因父亲病危而独自北归,至1951年林芳声回中国方始团聚。此后一直担任教职,至1967年退休。后定居北京。

✓ **郁达夫*** 简历见上节。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对新马文学界有深远的影响。早在1930年,与新马作者已有文学上的联系。1933年至1934年,作品已刊登在《槟城新报》的副刊《关仔角》和《轮》,以及《益群报》的副刊。1938年底南来新马后,积极从事文学活动与抗战救亡宣传活动,在《晨星》、《救潮》、《繁星》、《文艺》、《世纪

风》、《电影》、《星海》、《星宇》、《星云》、《世纪风》、《中马文艺》、《教育》、《华侨周报》、《电影》、《青年月刊》、《南风半月刊》、《民众校刊》、《南潮半月刊》，以及《星洲日报》的“本坡新闻”和“电讯”栏位等发表散文、论文、翻译和旧诗词三百余篇（其中不包括铭文、楹联、挽联等）。郁氏在新马的创作以散文（尤其是政论散文）为主。1977年新加坡出版林徐典编辑的《郁达夫抗战论文集》。

张楚琨 * 简历见上节。张氏两度居留新马期间，曾是《椰林》和《狮声》的重要作者。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以及30年代后半期，先后在《野葩》、《椰林》、《狮声》、《南潮半月刊》、《堡垒》、《民主》、《小世界》等副刊登载百余篇作品，其中有散文、论文、诗歌、小说、翻译散文和翻译小说等。

张曙生 笔名蓬青。福建闽南人。1936年南来。由于职业经常变动，故多次往返流徙于新马一带。从1937年至1940年，在《晨星》、《文艺》、《狮声》、《今代妇女》、《新光》、《新流》、《新路》、《大路》、《世纪风》等副刊发表诗歌、散文、论文和小说等，总共不下四五十万字，为30年代后半期较为活跃的作者。张氏于1940年冬回中国，在故乡闽南从事新闻工作。业余仍未间断写作。1951年赴香港从事工商业，方停止笔耕。1986年，在新加坡出版作品集《剪刀声里》。

朱绪 原名朱桂棹，另有笔名石灵、石、周苍、悸子、菊子、朱等。福建晋江人。约于1932年南来。曾参与创立和组织的文艺团体有“萤火剧社”、“新野社”、“业余话剧社”等，为较活跃的剧作家与导演。曾在《新野》、《新路》、《新光》、《戏剧世界》、《新国民杂志》、《星火》、《电影与戏剧》、《影与剧》、《今日剧影》、《狮声》等刊登剧本、论文、散文、小说等。约于1941年，在上海出版多幕剧本《未完成的杰作》（与啸平合著）。其他著作有：《春到人间》（1955）、《童话国》（1955）、《海恋》（1960，原著昊天）、《新马话剧活动四十五年》（1985）、《我与戏剧》（1987）等。

五、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的角斗时期：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的时期(1945—1949)

这时期的主要南来作者有白塔、丁家瑞、杜边、洪丝丝、胡愈之、沈兹九、铁戈、王任叔、杨嘉、杨樾、岳野、白寒等 12 位。

白塔 原名赵蔚文，另有笔名李绿、素心、祝兰、新猷等。福建福州人。1928 年生。1946 年毕业于福州陶淑女中，同年底南来马来亚任教职。曾在《和平》、《晨星》、《妇女》、《青年周刊》、《青年》、《南风》等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亦进行多幕剧创作。为战后较为活跃的女作者。1950 年返回中国，长期居住北京，为印度问题专家。80 年代期间，曾有新作在大马报刊登载。

丁家瑞 原名许之正，又名许诺，笔名钱博、青青、蔡俵等。安徽芜湖市人。1916 年生。1946 年至香港参加中国歌舞剧艺社，同年冬南来星洲。曾与南来作者张漠青发起组织星洲青年文艺研究社出版丛书。编辑过《天外》、《爱华周报》等刊物。在新马期间，在《晨星》、《妇女》、《学生生活》、《南风》、《星期俱乐部》等登载诗歌、散文、论文等作品。1948 年底离星赴港。后回中国，长期居住在广州。曾任《广州日报》副总编辑。出版过《雪英下厨》、《拆墙记》、《雾散云开》、《一家人》、《水落石出》等独幕话剧单行本。

杜边 原名苏仲人，笔名许涯、苏夫、力一、拓夫、丹鸣等。原籍福建厦门。1914 年生。约于 1935 年至 1936 年间南来，在马来亚任教职。“七七”芦沟桥事变后，积极参加新马抗战救亡戏剧运动。曾组织过“南岛剧团”、“实验流动剧团”、“茶花歌剧团”等进行抗日戏剧宣传。并自任编辑、导演和演员。新马沦陷期间，仍继续参与马华抗日剧运。战后为“马华文艺工作者联合会”、“新加坡戏剧工作者联合会”、“星华文艺协会”的负责人之一。亦兼任“新加坡海鸥剧团”的领导人及编导。出版过《野心家》、《明天的太阳》等剧本。亦曾在《剧艺》、《南风》、《文艺》等副刊及一些特刊上发表散文、论文、诗歌等。1948 年被英殖民政府逮捕入狱。1949 年初回中国，继续

从事编辑和导演工作。曾担任电影制片厂的编辑等职。1986年离休,仍进行电视、电影、小说的创作。

洪丝丝* 简历见上节。为创作年代较长的南来作者。曾在《槟风》、《大众阵线》、《野风》、《南风》、《现代周刊》等刊登许多作品,其中以散文和论文为主,多为时事评论和文艺评论等。洪氏于1950年返回中国后,于80年代末出版长篇小说《异乡奇遇》。这是他计划创作的反映新马华人历史的3部长篇小说《海外春秋》之一。可惜未能完成创作计划而病逝。

胡愈之* 简历见上节。为高产量的南来作者。在《南洋商报》、《星火》、《南风》、《民主》、《风下》等报章副刊及期刊发表数百篇作品,有散文、论文、小说等。其中以有关国际问题的政论散文最受读者欢迎。1979年新加坡出版《胡愈之作品选》,收录胡氏在新马及苏门答腊岛完成的大部分作品。1997年,北京三联书店印行《胡愈之文集》。

沈兹九* 简历见上节。为南来作者中少有的优秀女作者之一。南来新马之前,作品已刊登在《妇女世界》、《新国民杂志》和《星海》等副刊。居留新马期间,在《南侨日报》、《妇女界》、《新妇女》、《风下》等发表散文、论文。1948年返回中国。1985年与夫君胡愈之合著出版散文集《流亡在赤道线上》,回忆他们夫妇与郁达夫等一批南来作者在新马沦陷时期流亡印尼的情形。

铁戈 原名陈果来。客籍。战前南来。其作品以诗歌为主。与丹影、陈君平、大礼、海郎等为战后初期的新进诗人。在《突击》、《晨星》、《文艺》、《小世界》、《南风》、《青年》等登载不少诗作,反映战后动荡的社会现实及流露反殖思想。1947年在香港出版诗集《在旗下》,凡193页,由南来作者马宁写序。这是战后新马文坛出版的第一本诗集。后在马来亚去世。

王任叔 笔名巴人、赵冷、屈轶、行者。浙江奉化人。1901年生。1923年在中国参加“文学研究会”。曾发表不少关于革命文学

的理论。1941年南来星洲，任南侨师范学校校长。日军南侵时，与郁达夫、胡愈之等人到苏门答腊避难。在新马报章副刊《狮声》、《突击》、《南风》、《星期俱乐部》等刊登散文、论文等。1948年在新加坡出版丛刊《无言抄》。同年因参加印尼人民的反殖斗争，被荷兰殖民政府逮捕入狱，后被遣送回香港。王氏回返中国后，于1950年8月出任中国政府驻印尼第一任大使。1962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杨嘉 原名杨家驹，到南洋后改用现名。笔名有碧如、李玄、杨言、韦如等。祖籍辽宁省铁岭县，1917年生于广东广州市。1938年赴越南从事教育工作和文艺活动。1940年经香港南来新加坡，在育英中学任教。日军入侵新马时，与郁达夫、胡愈之等避难苏门答腊岛。战后在新加坡组织“星洲实验话剧团”。1946年先后担任南洋出版社和南侨日报编辑。1947年主编《音乐·戏剧·诗歌》月刊。1948年与许诺（丁家瑞）合编《爱华周报》。在《狮声》、《文艺》、《南风》、《星期俱乐部》、《自学周刊》、《学生生活》、《学习与修养》、《风下》等发表小说、诗歌、散文、论文、剧本、寓言、翻译小说等，创作体裁较多样。1949年离新赴港，后回中国。曾任广州暨南大学教职。1983年与杨樾、丁家瑞、流冰等发起成立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并出版会刊《回音壁》。曾出任该会刊1983年至1986年的主编。

杨樾 曾用名杨浩泉，笔名方生、万家佛、何龙、横眉冷、于燕郊等。1946年南来星洲。在新马担任过教职。曾在《晨星》、《南风》、《文艺》等发表散文、诗歌、论文等，抨击当时的社会弊端。杨氏于1948年返回中国后，定居广州，至今笔耕不辍，并重视东南亚华文文学的介绍工作。现为大型文学刊物《当代文学》的主编。

岳野 原名岳喜瑞，曾用名岳中平、岳庄，笔名鲁声涛、开平等。山东郓城县人。1920年生。1947年随中国歌舞剧艺社南来星洲。在新马期间计划创作以本地为题材的风雨三部曲，但只出版《风雨牛车水》和《风雨三条石》这两部优秀剧作。1949年初返回中

国前,亦创作长篇朗诵诗《告别马来亚》发表于南侨日报的副刊《南风》上。现居北京,为活跃在电影戏剧界的编辑家和作家。

白寒 原名谢耀辉,笔名李青、林之风、莫千山、李子惠、田家、杜若英、麦苗田。1919年出生于中国福建惠安。1947年南来新马任教。在本地报章副刊发表小说、散文、剧本等。在新加坡出版的著作有:《雕虫集》(1949)、《头家哲学》(1950)、《新加坡河畔》(1950)、《在北京》(1957)。1951年回广州。1954年定居北京。“文化大革命”后从事“华侨问题研究”。现担任中国致公党中央华侨知识分子工作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务。

以上第三、四节介绍的是主要南来编者和南来作者的简历。至于其他南来作者的资料,请见下面附表。

附表 中国南来作者资料表
(1919—1949)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001 艾芜 (汤道耕)	艾芜	四川 新繁	1908	1930			
002 巴金 (李芾甘)	巴金	四川 成都	1905	1927			
003 白荻 (黄科梅)	白荻 黄莺 瓢儿 胡图 白琳 萧琴 楼雨桐 田家瑾	广东 揭扬	1915	1932	散文 诗歌 小说	晨星、文艺、狮声、 大路、星火、世纪 风、新路、新流、文 艺界。	文艺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004 白寒 (谢耀辉)	白寒 李青 莫千山 李子惠 田家 杜若英 麦苗田	福建 惠安	1919	1947	剧本 小说 散文	南风、文艺、文艺 行列。	
005 白路 (符红雨 符萍)	白路 也红 璐鸣 竹风	广东 海南	1929		散文 诗歌	晨星、和平、新风、 星海。	学生月刊 天外
006 白塔 (赵蔚文)	白塔 李绿 素心 祝兰 新猷 蔚文	福建 福州	1928	1946	散文 小说	和平、晨星、妇女、 南风、青年周刊。	
007 蔡高岗 (蔡截生)	高岗			1941	散文	民潮、风下。	
008 曹国宾							星光
009 曹兮 曹兮	曹兮 潮汐 蓝草	江苏 南京	1911	战后	多种 文体	和平、商余、晨星。	
010 常夫 (范经、 范提摩)	常夫	福建 邵武	1923	1947			
011 常焱						星光	星光
012 陈白影 (陈华生)	陈白影	广东 汕头	1916		小说 散文 诗歌	晨星、文艺周刊。	
013 陈残云		广东 广州	1914	1941	诗歌	风下周刊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014 陈炼青	陈秉铨 秉铨 未见 炼青 炼青 子陈子 老五	广东 潮安	1907	1921	散文 论文	椰林、晓天周刊、 前驱、星火、晨星、 狮声、文化丛报。	晓天周刊 椰林 闲暇 杂览
015 陈树南 (陈天放)	陈树南 陈飞鸟 呢呢 喃喃 墨鸥 树 记者	广东 大埔		约 1927	各种 文体	南洋的文艺、椰 风、关仔角、压觉、 文艺周刊、绿漪、 新航路、华侨周 报、叻报俱乐部、 文艺特刊、新国民 杂志、流连、公共 园地。	南洋的文 艺 华侨周报
016 大礼 (黄大礼)	大礼	广东 广州	1924	约 1939	诗歌 小说 散文 论文	星海、无言抄。	
017 丁家瑞 (许之正， 许诺)	青青 钱博 蔡襄	安徽 芜湖	1916	1946	论文 散文	晨星、妇女、音乐 · 诗歌· 戏剧风 下、学生生活。	读书生活 爱华周刊 天外
018 丁琅 (蔡素白)	花都蓉女 蓉女 蔡素伯	四川 成都			散文 诗歌	洪荒	洪荒
019 丁之屏 (刘宁)	司徒然 炮灰 司徒森 潘陶 潘朋 潘常光 潘志陶	广东 潮安	1920	1935	小说 诗歌 散文	晨星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020 杜边 (苏仲人)	许涯 苏夫 拓夫 力一 丹鸣	福建 厦门	1914	1935	剧本	新野、晨星、剧艺、 南风、文艺。	
021 杜门 (杜连孙)	荷花 助之 杜李 杜之诗 李坚 红山楼主	广东 潮安	1909	1932	散文 译文	南潮半月刊、文 艺、南风。	南潮半月 刊
022 段南奎	南奎			约 20 年代中	散文	星光	星光
023 方北方 (方作斌)	方北方 方里 方向之 作兵 黑金	广东 惠来	1918	1928	小说		
024 方图	青天	广东 潮州	约 1909		•杂文		现代公园
025 冯薰衣	拉因 砂金	广东 潮安	1913	1937	诗歌	晨星、文艺周刊文 艺、新园地、新流、 新光、大路吼社诗 专、南洋周刊、南 风半月刊狮声。	
026 冯伊媚		广东 惠阳	1908	1938	旧体诗	繁星	
027 傅无网	傅落红 落红 敬仙 冷眼	福建 泉州	1892	1929	散文 论文 译作	曼舞罗、叻报俱乐 部。	曼舞罗 星报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028 高云览 (高怡昌 高咏览)	高云览 芸览 高键尼 高友庆 高法鲁 仲约 也鲁	福建 厦门	1910	1937	小说 散文	狮声、现代周刊。	
029 更生 (羊更生)				1936	诗歌 散文	晨星、狮声、文艺、 星火、新路、朝阳。	
030 郭碧峰 (郭孝先)	郭碧峰 翠 郭幻禅				诗歌 散文 旧体诗	文苑、诗词专号。	
031 郭史翼	方晴 克仁	福建 金门	1914	战后	散文	公余	
032 革尘 (林革尘)	革尘	福建 东山	约 1900		诗歌 译诗	文艺周刊、洪荒。	
033 何采菽	旭 昶 蔚蓝 蓝 CY 绿水	广东 南海			各种 文体	昶旭、绿漪、瀑布、 新国民杂志商余 杂志、小说世界、 诗歌世界翠蓝、益 励。	昶旭 绿漪
034 洪灵菲 (洪伦修)	洪灵菲 洪灵斐 林曼青 林荫南 李铁郎	广东 潮安	1901	1927			
035 洪丝丝 (洪永安)	洪丝丝 漱玉 徐必达 诗棍	福建 金门	1907		散文 论文	槟风、大众阵线、 野风、南风商余杂 志、现代周刊。	槟风 现代周刊 南风
036 胡浪漫 (胡迈)	胡浪漫	福建 永定	1909		散文	文艺周刊、今代。	文艺周刊 今代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037 胡戌女 (胡如威)	胡戌女 戌女				散文	涸澜、星报。	涸澜
038 胡一声	古月 细明	广东 梅县	1905	1928	散文 诗歌 小说	新国民杂志、南 铎、晨星、读者园 地。	
039 胡愈之	沙平	浙江 上虞	1896	1940	散文 论文	风下、星火、南风、 民主。	风下
040 华国 (永生)	华国				散文	星光	
041 黄望青	耶鲁 郭安 陈村 李秋	福建 同安	1913	1936	散文 论文	南潮半月刊、狮 声、晨星、星火。	
042 黄玉尧	本尧	广东 海南		约 1929	小说	碧野	
043 黄振彝	岩 梅郎 武 依依 CZ 酷 EE 伊伊 严 YC SY CY				新诗 论文 散文 译文 旧体诗	荒岛	荒岛
044 金山 (赵默)	赵洵	湖南 沅陵	1911	1940	剧本	南洋商报 *	
045 老蕾 (许清昌)	老蕾 许风 佛特 欧阳之青 罗汉明	福建 永春	1915	1937	论文 散文 小说	狮声、晨星、文艺、 新流、世纪风、星 河、文会、南洋周 刊、南洋文艺。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046 老舍 (舒庆春)	老舍	北京	1899	1929	散文	公余、大众阵线、 南星导报。	
047 李冰人	唐雪 蓝波	福建 南安		1934	诗歌 散文 论文 旧诗词	狮声、晨星、总汇 副刊。	
048 李词侗	词侗	福建 诏安		20年代	新旧 文学	晨星、海丝、繁星、 新国民杂志、狮 声、咖啡、诗歌世 界、小说世界、儿 童世界、野风。	新生月刊 大华周报
049 李梅子 (李公仪 李维纲)	梅子 黎明 白鸥 希云	广东 梅县	1910	1928	散文	文艺特刊、奠基。	奠基
050 李汝琳 (李宏贵)	李汝琳 李极光 李曼丹 丁宜 崔岚 李廷辉 司徒克 严晖	河南 沁阳	1914	1947			
051 李润潮	柳红玉 林曼 华尼 陈建 严韦蒙 宋千金 梅颂明 英英 建汾 邓匡君 陆幼琴 文淑娟 庞曼坚 江上三郎 欧阳寒吟 尉迟华非 陈玉琼	广东 潮安			散文 论文	晨星、槟风、星火、 展望台、文艺、读 者园地、今代妇 女、新光、新路、新 园地、突击、妇女 与青年、南风、新 潮、南洋风。	新路 新光 新园地 今代妇女 新天地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052 李铁民	半螺	福建 永春	1895		散文 旧诗词	狮声、南洋风、商 余杂志、新国民杂 志、南风、风下、星 云。	消闲钟 晓风 狮声
053 李紫凤	李树梧 桐弟 病虹 SW 是吾 梧 吾 桐梯	广东 普宁		20年代	诗歌 散文 论文	八月、展望台、民 国日报*、狮声、 新航路、繁星、商 余杂志。	八月 狮声 晓风 展望台 海沙滩 妇女与家 庭 大华周报
054 李一息 (李素)	一习 一息	广东 南海		约 1925	诗歌 小说	椰风、南洋的文 艺。	
055 连士升	子云	福建 福安	1907	1947			
056 连啸鸥 (连兴祥)	连啸鸥 介亮 曼曼 萧鸣 啸鸥 鸥	福建 龙岩	约 1909	20年代	小说 诗歌 散文	椰林、新航路、狮 声、商余杂志、诗 专号、读者园地。	狮声 南风
057 梁浩养	拉因 忧患余生	广东 梅县			散文	关仔角、晨星、星 火、新国民杂志。	
058 林岩 (陈子彬)	林岩 一萍 一礁 林影 林棘 林之间 陈一萍	福建 龙岩	1910	1929	散文 论文	狮声、繁星、晨星、 新光。	
059 林参天	林莽	浙江	1904	1927	小说 剧本 散文	泽布、野葩、文艺 周刊、晨星、新航 路、商余杂志、星 火、公共园地、南 风、南岛。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060 林独步	独步	福建 惠安	约 1903		小说 诗歌 散文 译文	新国民杂志、商余 杂志、新国民日 报*。	
061 林建安	鲁存 白雪 红冰 刘郎	福建 永定			散文	晨星、繁星、妇女 界、堡垒、关仔角、 叻报俱乐部、倒霉 专号、今代、新国 民杂志。	繁星 晨星
062 林连夫	马克			战后	小说	现代公园	现代公园
063 林鲁生 (林雪棠)	林鲁生 鸣爽 雪棠 陆升 依仁	广东 潮州	1898	1928	诗歌 散文 小说	星火、槟风、顽石、 海丝、绝缘回线。	前驱 火炬
064 林嫻嫻 (林铁魂 林毓梅)	林嫻嫻 寸铁 短兵 黄瑰 啸秋 SS 宋玫 嫻嫻	福建 厦门	1900	约 1917	诗歌 剧本	诗、新国民杂志、 南国的雨声、微 光。	南国的雨 声 蜕变
065 林仙峒	仙峒 峒	福建 永定		1929	散文	繁星	繁星
066 林英强		广东 梅县		1939	散文	晨星、星河、文会、 新园地、大华周 报。	大华周报
067 林穉生 (林克谐)	穉生	广东 文昌	1892		散文	叻报*。	
068 流浪 (刘道南)	流浪 凡陀	湖南		约 1935	小说 散文	槟风、星火、晨星、 狮声、今日文学、 晨星、南洋文艺。	狮声 南洋文艺 今日文学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069 刘克非	克非	广东			论文	益群报*、自由谈。	自由谈
070 刘思 (刘世潮)	刘思 高云 方达	广东 潮安	1917	1935	诗歌	生路、狮声、吼社诗专、南洋周刊、世纪风、文艺、晨星、商余杂志、大路、诗歌专页、日落、新光、南风。	吼社诗专 赤道文阵
071 刘延陵	延陵 伍芳	江苏 泰兴	1894	1937	小说 论文	新国民杂志、叻报附张。	
072 柳鞭 (刘柳鞭)	柳鞭 柳戟 戟 戟子	广东 大埔		约 1927	小说 散文	南洋的文艺、压觉、南星、华侨周报。	华侨周报
073 柳北岸 (蔡文玄)	柳北岸 白芷 白苇 吴天桥 蔡西门 苏来曼 覃芷 朱贝 李村	广东 潮安	1904	1927	新旧诗 散文 小说 剧本		
074 罗依夫 (罗永年)	罗依夫 依夫 亦夫 一夫	广东 大埔		1927	诗歌 小说	桔岛、椰风、压觉、瀑布、曼陀罗、奠基、学生园地、狮声。	奠基 南针 曼陀罗 民众周刊
075 玛戈 (许钟枯)	玛戈 亚诺	广东 普宁	1908		散文 论文	狮声、南风、展望台、和平、商余杂志。	
076 马宁 (黄震树 黄振椿)	马宁 静倩 忘八蛋	福建 永春	1909	1931	剧本 散文	南风、文艺、星洲日报*、读书生活、戏剧、新流。	
077 曼青 (曾曼青 曾也石)	曼青	广东 潮安		20 年代	散文	洪荒、星云、文艺周刊、教育周刊、天地人、南风。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078 梅秀 (梅金华)	梅秀 墨黑 白雪 林秋 夏怀霜 梅秋 陈梦尘	广东 升平			散文 小说	狮声、新流、南方 文艺、堡垒。	
079 ✓ 聂绀弩		湖北 京山	1903	1923			
080 潘受	衣虹 虹	福建 南安	1911	1930	论文 小说	椰林、繁星。	椰林
081 潘醒农 (潘澄镜)	潘醒农 潘醒依 子淳	广东 潮安			散文	青年、新航路、南 岛、繁星、妇女界、 新国民杂志、晨 星。	青年 南岛旬刊
082 彭成慧		广东 海丰	约 1910	1926	散文 小说	繁星、晨星、诗词 专号、碧野、轮。	
083 普洛 (郑德松)	普洛 歌江	广东 潮安	1923	1939	散文 论文	狮声、忠育半月 刊、繁星、大地半 月刊、晨星、新路、 文艺。	椰风
084 秋枫 (吴歌舟)	秋枫	福建	约 1907	1947	论文	文艺。	
085 邱菽园	啸虹	福建 海澄	1874	1881	旧诗词	新国民杂志、商余 杂志。	新国民杂 志
086 丘天 (丘士珍 丘家珍)	丘天 废名	福建 龙岩	1905	20年代	小说	狮声、晨星、南岛、 横风、商余杂志、 风下、现代周刊、 读书生活、文艺周 刊、妇女周刊、关 仔角、星火、文艺、 今代、南侨。	
087 饶百迎		广东 大埔	1900	约 1921	小说 旧诗词	诗、先驱、文学周 刊、烛火、明星、文 艺。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088 任宇农 (任雨农)	一介 紫云居士	湖南 长沙	1913	1937	散文 论文	晨星、繁星。	
089 上官秀 (区文庄)	上官秀 寒兵 韦皋 山霞 山篴一 丁凤多 韦伶 陈伶 高浪 沙耶 叶霞 秦系	山东 济宁	1913	1937	小说	狮声、新流、世纪 风、新光、晨星。	
090 沈兹九	兹九 兹	浙江 杭州	1898	1940	散文	新妇女、妇女世界、 风下、新国民杂志、 星海、南侨日报。	新妇女
091 施骚 (施嘉禾)	施骚 骚平 一粟 默庵 施默庵	福建 厦门	1911	1935	诗歌 散文 小说	商余。	
092 石蕴真	枕戈				散文 论文	星火、新路、公共 园地、晨星、新国 民杂志、读者园地。	
093 谭云山	T. P. 云山	湖南 茶陵	约 1901	1924	诗歌 散文	星光、沙漠田。	星光 沙漠田
094 桃木 (王崑)	桃木 洪半呆 山兄 蒲剑 兆木	广东 潮安		1936	诗歌 论文 散文	大众副刊、南洋周 刊、世纪风、新路、 新光、狮声、文会、 南洋风、新园地、 忠言半月刊、南风。	文会 文艺
095 铁戈 (陈果来)	铁戈	客籍		战前	诗歌 论文	突击、晨星、小世 界、文艺、青年、南 风。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096 铁抗 (郑卓群)	铁抗 铁亢 明珠 君羊 金鉴 金箭 金铁皆鸣	广东 潮阳	1913	1936	小说 论文 散文	文艺、晨星、忠言 半月刊、新国民文 学、大路、新野、世 纪风、新国民日 报。	世纪风 文艺周刊 文艺长城
097 拓哥 (金拓)	拓哥 梦莘 应平	安徽		约 1923	诗歌 小说	南风。	南风
098 汪金丁 (汪林钰 汪竹铭)	汪金丁 金丁	北京	1910	1937	论文 散文	狮声、南洋文艺、 南洋周刊、文艺周 刊、学文周刊、星 火、晨星、文艺、南 潮半月刊、槟风。	
099 王探	一工 丙三 千一 HT 毁病 乘二	福建 南安			诗歌 小说	荔、骷骰。	荔
100 王莹 (喻志华 王克勤)	王莹	安徽 芜湖	1913	1939	散文	电影与戏剧、大千 世界。	
101 王哥空 (曾哥空)	哥空	广东 海南		战前	小说	野葩、椰林、新航 路、狮声、今代、繁 星、晨星	文艺周刊 椰风
102 王纪元				1940	论文	狮声	狮声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103 王君实 (王惠风)	王君实 王修慧 王乐怡 蓝田玉 白登道 横光 陈清浓 朱丽叶	广东 澄海		1937	散文 小说 诗歌 论文	狮声、文艺、晨星、 新光、华侨公园、 影与剧、侨声、大 路、星火、世纪风、 新国民文学。	
104 王秋田	范统 鄞申	福建 晋江	1905	1938	剧本		
105 王任叔	巴人 赵冷 屈铁 行者	浙江 奉化	1901	1941	散文 论文	狮声、民潮、突击、 南风、星期俱乐 部。	
106 王炎之 (王肖吾 王宣化)	宣化 肖吾生 寒波 炎之 王庆之			20年代	小说 散文	曼舞罗、狮声、星 火、新流、大众副 刊、银幕与舞台、 今代、电影与文化。 曼舞罗 电影与文化 大众副刊 青年大众 妇女呼声	
107 王映霞		浙江 杭州	1907	1938	散文	妇女界、星中日 报。	
108 王仲广	仲广 予生	江苏 镇江	1903	1926	译文	文艺周刊、每周评 论、马来亚月刊。	马来亚月 刊 新星
109 温志新	士心 志 一心 志心	福建 漳州		20年代	诗歌 散文 论文	海丝、八月、星火、 光华、光华复旦、 杭育、总汇副刊、 诗、繁星、新光、今 代妇女、旗风。	微光 杭育
110 文彪 (李文彪)	文彪	广东 梅县	1911	1936	散文	总汇新报*、马华 日报*。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111 吴天 (洪为济 洪为忌 洪吴天)	吴天 叶尼 洪叶 马蒙 高哥 丹枫 天	湖南 祁东	1913	1936	剧本 散文 论文	晨星、文艺、繁星、 现代演剧、舞台银 幕、狮声、星火、世 纪风、小世界、星 期俱乐部、南潮半 月刊、南星导报、 南洋周刊。	星火 现代戏剧
112 吴广川	拓夫 拓 广川 川 一村 邝村 邝山 奚因 广村 川川 吴广略	福建 厦门	1901	1929	小说 散文	曼舞罗、枯岛、电 影与文化、新园 地、新国民杂志、 新野、新路、星海、 自由天地、南风、 儿童世界、妇女世 界、小说世界。	新国民杂 志 新野 新园地 蕉影 文艺 南风
113 吴仲青	白龟 西摩 吴菁 仲青	浙江 嵊县	1900	20年代	小说	文艺周刊、新国民 杂志、商余杂志、 洪荒、戏剧世界、 野葩、绿漪、瀑布、 叻报俱乐部、椰 林、浩泽、星光、狮 声、风篁、教育。	浩泽
114 武陵 (吴镇洲)	武陵 山人 尚武 云飞	福建 诏安	1929		诗歌 散文 小说		
115 西玲 (吴章庆)	西玲	福建 永春	1914	1935	诗歌	晨星、文艺。	新地 新风
116 夏衍 (沈瑞先)	夏衍	浙江 杭州	1900	1947	论文 散文	风下、南风、总汇 副刊、星期俱乐 部、青年、裙带风。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117 谢幼青	幼青	福建 诏安		约 1914	诗歌	灯塔、微光、帆声、 诗。	
118 徐志摩		浙江 海宁	1895	1928			
119 许杰	士仁 六叔 小梦 知山	浙江 天台	1901	1928	论文	枯岛、南风。	枯岛
120 许欲鸣	欲鸣	福建 厦门		约 1927	诗歌 小说 散文 旧诗	椰风、关仔角、碧 野、诗词专号。	
121 絮絮 (丘絮絮)	絮絮 重阳 哈莱	福建 龙岩	1909	1939	小说	狮声、和平、银幕 世界、怒吼的五月、 忠官半月刊、 无线电台。	怒吼的五月
122 杨嘉 (杨家驹)	杨嘉 杨言 李玄 韦如	广东 广州	1917	1940	小说 剧本 散文	狮声、文艺、星期 俱乐部、学生生 活、南风、自学周 刊、学习与修养、 风下。	音乐·戏 剧·诗歌 爱华周报
123 杨骚 (杨维铨)	杨骚	福建 漳州	1900	1925	散文	民潮、星海。	民潮半月 刊
124 杨守默	杏影 公孙哲 里奇 爱欲生 杨杰	四川	1912	1945	译诗	晨星	
125 杨巍 (杨浩泉)	方生 横眉冷 万家佛 何龙 于燕郊	广东 潮安		1946	散文	晨星、南风、文艺。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126 杨实夫	半聿 聿 油炸鬼 实夫 迂夫 彬彬 半峇峇 阿Q 朴天 泼皮男 油子	广东 大埔			散文 小说	椰风、关仔角、碧 野、浪花、学生园 地、和平、椰林、叻 报俱乐部。	关仔角 碧野 椰风 浪花 学生园地。
127 杨实君	实君 白燕 衣云 依云	广东 大埔			诗歌 散文	关仔角、碧野、椰 风、轮、学生园地	
128 姚紫 (郑梦周)	黄槐 贺斧 欧阳碧 向阳戈 唐兮 符剑	福建 泉州	1920	1947	小说		
129 依藤 (汪开竞)	依藤 南岛居士 仲平 陶然 金惠吾 落人 慎良 汪慎良 丁丁 克铨	江苏 泰昌	1912	20年代	诗歌	玫瑰	玫瑰
130 以今 (沈侠魂)	以今 侠魂 热流 林辉 灵根 李真 秋云 非闲 野草 崇实	广东 澄海	1915	1935	散文	晨星、妇女周刊、 星火、新国民杂 志、新路、民主、文 艺、出版周刊、学 习与修养。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131 殷枝阳 (陈树英)	殷枝阳 乳英 枝阳 周容 金枝芒			30年代	小说 论文	晨星、狮声、世纪 风、南洋周刊、文 艺长城、新流、星 火、文艺、忠言半 月刊、赤道文阵。	新风
132 莹姿 (刘耘之)	莹姿 耘之	湖南 浏阳	1909	1934	诗歌 小说	狮声、新流、大路、 新光、椰阴。	
133 有秋 (卢心远)	有秋 君璐 芦秋			30年代	论文	狮声、晨星、南洋 周刊、风下。	狮声
134 于沫我 (杜又明)	于沫我 卞之门 曾起飞 冷桦	广东 中山	1915	1935	小说	晨星	
135 俞颂华		江苏 太仓	1893	1940	论文	新国民杂志、晨星 台、新国民日报*。	
136 郁达夫		浙江 富阳	1896	1938	散文 旧体诗	晨星、繁星、救潮、 文艺、星海、关仔 角、轮、益群报副 刊、星云、南风半 月刊、星宇、世纪 风、青年月刊、华 侨周报、电影、民 众月刊、中马文 艺。	晨星 繁星 文艺周刊 文艺
137 岳野 (岳喜瑞 岳中平 岳庄)	岳野 鲁声涛 开平	山东 郛城	1920	1947	剧本	南风	
138 曾奋 (曾纪礼)	曾奋 阿苏	广东 潮州	约1913		小说 散文	狮声、晨星、文艺 周刊。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139 曾华丁 (曾曼华)	曾华丁 曼华 华丁 昭	广东 潮州		20年代	小说	洪荒、文艺周刊、 繁星、咖啡、南洋 的文艺、绝缘回 线、压觉、曝谷场。	绝缘回线 压觉 曝谷场
140 曾梦笔 (瑞熊)	曾梦笔 大觉生 哑夫妇 罗亚 亚罗 神仙 乐天 乐天生 疯汉 古松梅 玉华人 幽吟居士 梅毒医生 栗生	福建 惠安	1903	1906	旧诗词	海丝、诗、关仔角、 微光、倒霉专号、 帆声、孔明、一苇、 新国民杂志、繁 星、文苑、曝布、诗 词专号、槟城杂 志、无线电台、咖 啡、同善。	诗词专号 豆蔻
141 曾圣提 (曾曼尼)	曾圣提 圣提 大吉 出文 白丁 前壁 黑玉 小伟 大男 M	广东 潮安	1901	1922	诗歌 散文 小说	洪荒、文艺周刊、 商余杂志、关仔 角、星光、马来小 报。	洪荒 文艺周刊 商余杂志
142 曾玉羊 (曾曼方)	曾玉羊 玉羊 曼四 丙	广东 潮安		20年代	小说 诗歌 译诗	压觉、文艺周刊、 关仔角、轮、南洋 的文艺。	轮
143 张放 张放 (张殊明 张楚鸣)	张放 张震	福建 泉州		20年代	诗歌	洪荒、狮声、新国 民杂志、突击、南 风、风下。	洪荒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144 张楚琨	张楚云 楚云 郁 郁如 楚琨 张冲 柯游 章南石	福建 泉州	1911	1920	散文 小说 诗歌	野葩、椰林、狮声、 南潮半月刊、堡垒、 民主、小世界。	椰林 狮声 今日文学 南洋文艺
145 张明慈 (张幼怀)	张明慈 张铭慈 老张	北京		约 1930	旧诗词 散文	狮声、风下、南岛 旬刊、晨星、觉华、 新园地、新路、诗 词专号、轮、青年。	
146 张溪青	溪青 叶浓	广东 潮安	1924	1946	小说 散文	晨星、堡垒、和平、 读者园地、学习与 修养。	学生生活 天外
147 张叔耐	痴鸠 叔耐 鸠 耐 公叔且耐	江苏 松江	约 1895	1919	古文 散文	新国民杂志、叻报 俱乐部、新国民日 报”。	新国民杂 志
148 张曙生	蓬青	福建 (闽南)		约 1936	诗歌 论文	新路、新光、新流、 晨星、狮声、今代 妇女、文艺、大路、 世纪风。	
149 张天白 (张晓光)	张天白 马达 太阳 晓光 炎炎 东方生 丘康 丘幸之 莘莘 杨明 张晨	广东 平远	1902	1930	散文 论文	雷报*、晨星、狮 声、繁星、南侨教 育、文苑、哈哈、今 日学术、诗词专 号、益群杂志、轮、 小世界、忠言半月 刊、酒澜、荔、野 火、星火、总汇副 刊、文会、新国民 杂志、新路。	
150 张一倩 (张业隆)	张一倩 丁倩 葛蒙 张路 方野	广东 文昌	1915	1937	小说	南洋周刊	

(续表)

作者 (原名)	笔名	籍贯	出生 年份	南来 年代	擅长 文体	作品发表刊物 (在新马)	编刊名称
151 张紫薇 (张朝佐)	紫薇 了娜	四川 英县	1900		小说 诗歌	洪荒	
152 郑文通	文通 凌华 郑灵先 文 问农 灵先	福建 永春		20 年代	小说 论文	文艺周刊、绿漪、 瀑布、曼陀罗、文 艺工场、狮声、华 侨周报、益励、新 国民杂志、小说世 界、展望台、新园 地、世纪风、文苑、 诗词专号。	绿漪 瀑布 文艺 新国民 文学 曼陀罗 文艺工场 雷鞭
153 郑子瑜		福建 龙溪	1916	1938	散文	晨星、文会、南风。	
154 周均	静穉				散文	星光	星光 公共园地
155 周了因	金岳 了因	浙江 温州		20 年代	散文 旧诗	曼舞罗、文艺周 刊、叻报俱乐部、 星光、闲暇。	曼舞罗
156 周心默 (周金海)	周心默 云山 卡达 耶夫 丁山 周力达	广东 潮安	1913		散文	晨星、文会、南风。	
157 朱梅子	梅子	四川			散文	南国的雨声	南国的雨 声
158 朱绪 (朱桂棹)	朱绪 石灵 周苍 棒子 菊子	福建 晋江		约 1932	剧本	狮声、戏剧周刊、 今日剧影、新国民 杂志、新野、文艺、 新流、新光、新路、 影与剧、同乐园、 世纪风、电影与戏 剧、星火、现代戏 剧、南洋周刊、南 薰三日刊。	
159 邹子孟	子孟 漫郎	湖南 汉寿			散文	星光	星光

注：(1)表中“作品发表刊物(在新马)”一栏只收入南来作者在新马报章副刊和期刊发表作品的刊名，至于他们出版的单行本和在外地刊物发表作品的刊名，均未收入本栏内。

(2)栏中加“*”注明的是报章，而非副刊和期刊。

注 释

- (1) 杨松年《本地意识与新马华文文学》，见同作者《新马华文文学论集》（新加坡：南洋商报，1982），页1~22。
- (2) 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新加坡：万里书局，1978）。
- (3) 《泉州市华侨志》将金門列入泉州市辖区内。见泉州市华侨志编纂委员会编《泉州市华侨志》（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6），页12~13。
- (4) 徐志摩《浓得化不开——新加坡》，见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一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页23~27。
- (5) 杜运燮《热带三友》，见同作者《热带风光》（香港：学文书店，1953），页1~5。
- (6) 老舍（舒庆春）《小坡的生日》（上海：生活书店，1934）。
- (7) 老舍（舒庆春）《不泄气真诠》，见《南星导报》第4期，1938年2月13日。又见《槟城新报·大众阵线》，1938年3月5日。
- (8) 老舍（舒庆春）《创作经验谈》，见《公报·公余》，1946年5月21日。
- (9) 老舍（舒庆春）《旅美观感》，见《公报·公余》，1946年7月2日。
- (10) 郁达夫、胡愈之、沈兹九、刘延陵和俞颂华南来之前，其作品被新马报章刊载情形如下：
郁达夫：《说公文的用白话》、《谈结婚》，分别见《槟城新报·轮》，1933年11月28日，1934年2月13日。《西游日录》，见《益群报·副刊》，1934年5月1日。
胡愈之：《上海抗战的一个月》，见《星中日报·星火》，1937年9月27日。
沈兹九：《娜拉在中国》，见《新国民日报·妇女世界》，1935年3月18日。《恋爱与杀人》，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35年4月13日。
刘延陵：《哲学家家言》、《近代的合作运动》、《蓝猿》、《诗神的歌哭》，分别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19年10月6日至21日，1921年10月8日，1922年8月11日至18日，1923年4月7日至10

- 日。《戏仿红楼梦好了歌》，见《叻报·附张》，1922年6月2日。
- 俞颂华：《改造中国并非难事》，见《新国民日报·评论》，1923年6月23日至7月2日。《中国晚近社会思想之变迁》，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8年3月8日、9日、15日、20日、21日。《青年修养与职业问题》，见《南洋商报·展望台》，1936年8月30日。
- (11) 曼华(曾曼华)《剩语》，见《南洋时报·南洋的文艺》，1930年1月21日。
- (12) 聂绀弩《上岸》和《华民政务司》，见同作者《脚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13) 洪灵菲(洪伦修)《流亡》(上海：现代书局，1928)。
- (14) 洪灵菲(洪伦修)《在木筏上》和《在俱乐部里》，见同作者《归家》(上海：现代书局，1929)。
- (15) 艾芜(张道耕)《南国的小屿》、《过槟榔屿》、《马来亚杂感》，见《漂泊杂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 (16) 艾芜(张道耕)《南行记·海》(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
- (17) 巴金(李芾甘)《海行杂记》(香港：南国出版社，1960)。
- (18) 夏衍(沈瑞先)《马华文艺试论》，见《文艺生活》第2期，1948年3月。

第三章

中国南来作者的编务活动

本章将论述南来作者在新马文坛的编务活动。本论文所界定的南来编者,是指那些在新马文学界创办或编辑过报章副刊和期刊的南来作者。

战前的新马华文报章副刊,在新马华文文学发展史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当时新马作者发表的作品,绝大多数刊登在报章副刊和少量的期刊(杂志)上。可以说,没有当时的报章副刊,就没有战前的新马华文文学。即使在战后报章副刊篇幅减少,质量下降的情况下,报章副刊仍支撑着当时的新马文坛。可见新马报章副刊在新马华文文学历程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而在当时创办与编辑副刊的新马文学编辑中,中国南来作者是一支极为重要的编辑队伍。从1919年到1949年间,能够确认南来身份的编者至少有78人,而他们直接创办或编辑过的文艺副刊、综合性副刊和期刊,就达114份以上,其中副刊84份,期刊30份。(请参阅附表“中国南来作者所编副刊和期刊统计表”)这些编者在新马文坛勤力耕耘,为新马华文文学的萌生、发展与壮盛开垦了一片片沃土,培养了一

荏荏文艺新苗,同时也以他们的编辑方针影响甚至左右着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创作方向。他们编辑的刊物在当时的新马文坛,或者具有开创意义,如拓哥创办与编辑的《南风》成为马华新文学史上第一份纯粹新文学副刊;或者以大刀阔斧的改革而在当时影响巨大,如陈炼青编辑的《椰林》主张废除剪稿,采用本地作者来稿;或者提倡某种文学潮流而产生一种流派,如许杰主持的《枯岛》极力倡导新兴文学(即普罗大众文学);或者萌发与提倡某种创作色彩,如黄振彝、陈炼青、曾圣提、陈树南等在他们各自编辑的《荒岛》、《椰林》、《文艺周刊》、《南洋的文艺》等副刊上提倡文艺的南洋色彩,而促使一批具有本地特色的作品涌现;或者编辑的刊物内容充实、富于水准而在新马文坛长期发挥着影响力,如李铁民、流浪、张楚琨、有秋、王纪元等人编辑的《狮声》维持了九年之久……这显示南来作者对马华新文学的萌生、发展和壮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本章分为五节,分别从五个时期论述南来作者在1919年至1949年间各个不同时期的编务活动,以见及南来作者对新马华文文学的贡献。

第一节 侨民意识浓厚的时期

1919年至1924年的侨民意识浓厚时期,为马华新文学初创时期。当时尚未出现纯粹的新文学副刊,只有一些文白混杂的综合性副刊,如《叻报》的《叻报附张》和《叻报俱乐部》,《新国民日报》的《新国民杂志》,《光华日报》的《华侨俱乐部》、《笔余墨渾》、《光华杂志》,《南洋商报》的《新生活》、《商余杂志》,《国民日报》的《国民俱乐部》,《益群报》的《自由谈》、《晨光》、《天声人籁》、《民口》等。由于本章论析的是1919年到1949年南来作者的编务活动,故1919年

之前的南来报章编者如《槟城新报》的力铿、刘允承、何渔古、碌碌子等不在论析之列；有些副刊如《叻报附张》、《叻报俱乐部》、《商余杂志》、《天声人籁》、《民口》等未注明编者，也无从考查，故这些副刊编者不可考；有些报章已散佚，如《光华日报》在1927年8月以前的报纸已佚，该报上述副刊编者不详；有些副刊编者已能确认，如《新生活》的编者方怀南、《国民俱乐部》的编辑姚鹤雏、《晨光》的编者何心谷，其身份却不可考，因此能够确认南来身份的编者只有张叔耐、刘克非和邱菽园三人。其编刊情形如下表3-1所示：

表3-1 中国南来作者与所编副刊(1919—1924)

南来编者	所编副刊(综合性)	编刊日期	所属报章	备注
张叔耐	新国民杂志	1919.10.1—1922.5	新国民日报	
刘克非	自由谈	1920.5.15—1922	益群报	
邱菽园	新国民杂志	1922.5.—1924	新国民日报	
3人	2份			

张叔耐和刘克非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在新加坡和吉隆坡主持报政。张叔耐(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四节)于1919年10月1日主持《新国民日报》编务，亦兼编该报综合性副刊《新国民杂志》。张叔耐工于书法，《新国民杂志》的刊名即他手书。张叔耐后于1922年5月至8月因事返国，《新国民杂志》曾暂交邱菽园(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节)编辑。刘克非(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节)于1920年5月5日任《益群报》编辑主任，5月17日创办该报综合性副刊《自由谈》。这些早期南来编者在新马编刊之际，正值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地展开。加上新马两地在地缘上与中国接近，文艺刊物交流的频繁，自然深受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他们南来主持报政，原本肩负重大使命感，正如刘克非之友铁汉在《送克非》中道：

送你拥着无冠帝王底权威，雄视无比。

希望你，抖擞着那奋斗和牺牲底精神，挺着那偌大如椽底笔，凭着那清白似雪底纸，作一个陷阵的先锋，把那些跋扈的武人、阴谋底政客、黑心底官僚，打他一个落花流水，好极回了那些被欺凌底“自由”“平等”“博爱”“互助”的正义。⁽¹⁾

他们深切认识报章在改良社会、提倡新文化、灌输侨民爱国思想方面的重大作用。刘克非在接编伊始的《本报宣言》⁽²⁾中宣称《益群报》的办报“目的”为“改革前社会之旧文化，提倡将来之新文化”。张叔耐在《新国民日报》“社论”栏上发表用白话文写的《例言》⁽³⁾，阐明办报“大纲”是：(1)言论尽可自由，但以不背于居留地政府（指英殖民地政府）的法律为范围；(2)促进共和国民的程途，发挥平民政治的意义，使侨胞趋于进化方向；(3)改良社会，鼓吹教育，提倡实业，用浅近的文法，纯正的意思，诱发侨胞的爱国热情。

为此他们开辟综合性副刊《新国民杂志》和《自由谈》，以“实行灌输文化及推广学理讨论”⁽⁴⁾，或“补助学问”和“促进社会的进化”⁽⁵⁾。刘克非主持的《自由谈》包括“问题讨论”、“新思潮”、“学术研究”、“读者意见”等。他们都认识到文学作品在教化方面的特殊功能。张叔耐在《例言》中针对《新国民杂志》刊登文学作品的意义说：

至于这些诗词小品，小说谐文，都不过用于补助余兴而已，但也不是胡乱拉着的。……虽则嬉笑寓言，却也含着正经道理，便是谏于东方，滑稽诙谐的意思。一则普遍心理，庄言逆耳，科诨动听
.....

张氏认为文学作品可以通过轻松愉快的方式向读者灌输“正经道理”，在寓教于乐方面起着一本正经的“庄言”所无法达到的特殊效

果。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张叔耐、刘克非和邱菽园旧学根底深厚，都写得一手漂亮古文。但他们也认识到“文言难详，陋辞易解”，在编刊时对于白话文不但不抵触，反而大力提倡。张叔耐道：

总之，报纸是开通风气的东西，自要使得人人能看。人人能懂才好，若满口之乎者也，说着经书上的话头、孔孟的道理，只讨好了旧派的人，新派的人便不赞成了，并且也太不合时宜。……眼前我们报纸上应当讲的，是极要紧极浅显的话头，因为国家已在危险的地位了，所以要讲爱国，将这两个字唤起民心，故对于下等社会，比上等社会更为注意，因此这些滑稽科诨、浅显的说话，更少不了，便是本片用着白话，也就是这个意思了。⁽⁶⁾

由于南来作者大多带着浓烈的侨民意识，他们办报和编刊的目的是要唤起侨胞改革中国这个“暮气之社会”的热情，张叔耐尤其注重激发那些文化水准低下，然而人数众多的“下等社会”的“爱国”热情，所以对于白话文的提倡是十分卖力的。

张叔耐、邱菽园二人编辑的《新国民杂志》，以及刘克非编刊的《自由谈》，由于属综合性副刊，故内容较为繁杂。因处于新文学向旧文学过渡时期，也和其他报章副刊如《叻报俱乐部》、《新生活》等同样文白参杂，但《新国民杂志》和《自由谈》在提倡与刊登新文学方面的成绩却甚为突出。如马华新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白话小说《洞房的新感想》（作者双双）就于1919年12月23日至26日在该刊连载，当时正值中国“五四”运动发生后数月。另外如胡鉴民的诗歌《奋斗》、《自由人》，石樵的诗歌《海》、陈桂芳的诗歌《黄金》、子淳（潘镜澄）的散文《老人物骂新人物》等都是刊登在《新国民杂志》上。尤其是该刊在1921年至1922年登载了南来作者林独步一系

列优秀新文学作品,其中包括8首诗歌和4篇小说。这些作品焕发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精神,形象生动活泼,技巧也较成熟,为新马文坛空前的创作。刘克非在《自由谈》辟有“新小说”、“新剧本”、“新诗体”、“新文艺”等栏位,专载白话文学作品。有些作品如小说《一日的甜蜜滋味》和《一个不愿卖身的女儿》、剧本《一夜》等连载多期,其中无为的小说《一网的鱼》甚至连载22期。该刊发表的作品有的文笔优美流畅,如日葵的散文诗《春朝》,有的小说能将景物描写与人物心理活动和故事情节互为结合,如无为的《一网的鱼》。在马华新文学初创时期,这两份副刊在刊登新文学方面能有如此佳绩,与这几位编者重视提倡新文学和独具的文学慧眼分不开。

张叔耐、邱菽园和刘克非也重视新文学理论、美学、外国文艺和理论的介绍。早在1922年到1923年间,张氏在《新国民杂志》刊登了林独步关于美学和文艺理论的论文《自然美与人工美》、《新文学概论》、《修辞学概论》等,对文学的特质、文学的鉴赏、文学的批评、文学的修辞,以及文学的美感功能等进行长篇累牍的论述与介绍。另有翻译论文《辞解》,对西方一些文艺运动、文艺理论、哲学、逻辑学等名词进行解释与介绍,如“文艺复兴”、“演绎法”、“归纳法”、“形而上学”、“印象主义”等。其中有关外国文艺流派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拟古主义”等的介绍,对当时新马文学界而言是极为新鲜的。其中《新文学概论》、《修辞学概论》和《辞解》分别连载30多期。这在当时新马其他报章副刊中几乎是绝无仅有的。刘克非在《自由谈》也对外国著名作家如俄国文豪托尔斯泰进行介绍。因此张叔耐、邱菽园和刘克非对早期马华新文学的崛起有着独特的贡献。

第二节 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

1925年至1933年的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是战前新马华文文学创作第一个高峰期。这时期新马文坛人才辈出,报章副刊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文艺界这种蓬勃局面,主要由于1927年与1928年间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分裂,不少亲共与国民党左派人士南来新马,并致力于华文之出版与编辑事业,以及这两三年是中国的小报年,上海等地报章的蓬勃出版影响及新马,而引起新马文艺界的热烈反应。⁽⁷⁾

由于上述原因,南来作者大量从事报章副刊与期刊的编务活动,成为新马文坛重要的编辑队伍。以下将介绍与论析这时期南来作者的编务活动。

一、南来作者的编刊活动概述

这时期的南来编者人才济济,灿若星河。他们是:拓哥、谭云山、周钧、邹子孟、段南奎、常焱、曹国宾、吴仲青、黄振彝、曾圣提、花都蓉女、张放、王探、温志新、汪开竞、李紫凤、陈炼青、衣虹、郁如、杨实夫、陈树南、许杰、何采菽、郑文通、罗依夫、李梅子、曾华丁、林仙峤、林建安、洪丝丝、曾玉羊、连啸鸥、李铁民、朱梅子、林姗姗、胡浪漫、曾梦笔、王肖吾、傅落红、周了因、柳鞭、潘醒农等,计有42人之多。

他们创办与编辑的刊物共有55份,其中文艺性副刊最为发达,计有《南风》、《星光》、《沙漠田》、《浩泽》、《荒岛》、《洪荒》、《荔》、《微光》、《杭育》、《玫瑰》、《椰林》、《椰风》、《浪花》、《碧野》、《南洋的文艺》、《新航路》、《公共园地》、《枯岛》、《绿漪》、《瀑布》、《文艺》、《文艺工场》、《雷鞭》、《曼陀罗》、《文艺周刊》(南洋商报)、《诗词专

号》、《昶旭》、《奠基》、《南针》、《绝缘回线》、《压觉》、《八月》、《南国的雨声》、《蜕变》、《文艺周刊》(星洲日报)等 35 份;综合性副刊不如文艺性副刊繁多,但也有 13 份:《闲暇》、《杂览》、《关仔角》、《学生园地》、《商余杂志》、《繁星》、《晨星》、《槟风》、《轮》、《晓风》、《狮声》、《槟城学生》、《豆蔻》等。他们编辑副刊的情形如表 3—2 所示:

表 3—2 中国南来作者与所编副刊(1925—1933)

南来作者	所编副刊		编刊日期	所属报章	备 注
	文艺性	综合性			
拓哥	南风		1925. 7. 15—1925. 11. 12	新国民日报	
谭云山	星光		1925. 10. 9—1926. 4. 5	叻报	
	沙漠田		1926. 9. 2—1927 年初	新国民日报	
周钧	星光		1926. 4. 12—1926. 7. 26	叻报	
	公共园地		1931	民国日报	
邹子孟 段南奎 常森 曹国宾	星光		1926. 8. 9—1926. 9. 20	叻报	合编
吴仲青	浩泽		自 1926. 12	新国民日报	之前另有月刊
黄振彝	荒岛		1927. 1. 28—1928. 6. 8	新国民日报	1929. 2. 4 复刊,附于《叻报》,出十五期后停刊。
曾圣提	洪荒		1927. 8. 18—1927. 12. 31	南洋商报	与花都蓉女、张放合编。
	文艺周刊		1929. 1. 11—1929. 6. 28	南洋商报	
	商余杂志		1931. 6. 1—1931. 8 月	南洋商报	
花都蓉女 张放	洪荒		1927. 8. 18—1927. 12. 31	南洋商报	合编。1928 年迁到《南洋时报》,由曾华丁编刊,维持一段短时期后停刊。

(续表)

南来作者	所编副刊		编刊日期	所属报章	备 注
	文艺性	综合性			
王探	荔		自 1927 年初	南洋时报	
温志新	微光 杭育		自 1927.12.27 1927—1928	南洋时报	
汪开竞	玫瑰		1927.9.30—1929.11.13	南洋时报	
李紫凤	八月		1927.8 月底或 9 月初— 1929 年 10 月 16 日	南洋时报	
陈炼青	椰林 闲暇 杂览		1929.6.17—1931.1.15 自 1929.7.29 自 1929.7.29	叻报 叻报 叻报	曾与衣虹、郁如合编。
郁如	椰林		自 1930.11	叻报	协助陈炼青编辑此刊。
衣虹	椰林		1930.3 月—1930.6 月	叻报	协助陈炼青编辑此刊。
杨实夫	椰风 浪花 关仔角 学生园地 碧野		1929.4.27—1930.10.4 自 1929.7.4 1930.2.7.—1933.4.4 自 1930.3.20 1930.10.21—1932.5.18	槟城新报 槟城新报 槟城新报 槟城新报 槟城新报	
许杰	枯岛		1928.8.30—1929.10.11	益群报	
陈树南	南洋的文艺 新航路 公共园地		1929.12.9—1930.4.17 1930.1.1—1930.12.27 1930.1.1—1930.11.20	南洋时报 民国日报 民国日报	以“旧燕”为笔名编辑此刊。柳鞭协编。 以“记者”为笔名编辑这两份副刊。
柳鞭	南洋的文艺		1929.12.9—1930.4.17	南洋时报	协助陈树南编辑此刊。
何采菽	绿漪 昶旭		1927.12.20—1928.11 1930.5.21—1930.9.1	新国民日报 新国民日报	

(续表)

南来作者	所编副刊		编刊日期	所属报章	备 注
	文艺性	综合性			
郑文通	绿漪		1927.12.20—1928.11	新国民日报	与何采菽等合编。
	瀑布		1928.12.27—1930.12.23	新国民日报	
	曼陀罗		1929.5.31—1929.6.14	南洋商报	与罗依夫合编。
	文艺工场		1930.8.30—1931.10.4	南洋商报	
	雷鞭		自 1931	南洋商报	
	文艺		1933.4月—1933年中	民国日报	
罗依夫	曼陀罗		1929.5.31—1929.6.14	南洋商报	与郑文通合编。
	奠基		1930.1.17—1930.1.30	叻报	与李梅子合编。
	南针		1930年初—1930年底	中南晨报	
李梅子	奠基		1930.1.17—1930.1.30	叻报	与罗依夫合编。
曾华丁	洪荒		1928.3.2—1928.11.17	南洋时报	
	绝缘回线		1930.2.5—1930.5.27	光华日报	
	压觉		1930.7.26—1930.12.29	南洋商报	
曾梦笔	豆蔻		1929.12.7—1930.2.13	光华日报	
	诗词专号		1930.12.6—1936.5.30	槟城新报	
朱梅子	槟城学生		自 1930.8.26	光华日报	与林姗姗合编。
	南国的雨声		自 1930.8月	光华日报	
林仙桥	繁星		1929.1.15—1930	星洲日报	
林建安	繁星		1930—1939.1.8	星洲日报	
	晨星		1932年?—1939.1.8	星洲日报	
胡戎女	涸涸		1932.1.10—1932.11.20	益群报	
胡浪漫	晨星		自 1932.7.15	星洲日报	
	文艺周刊		1932年	星洲日报	
林姗姗	南国的雨声		自 1930.8月	光华日报	
	蜕变		1931年初—1932年中	光华日报	
洪丝丝	槟风		1933.5.10—1935年	光华日报	
曾玉羊	轮		1933.4.5—1935.4.27	槟城新报	

(续表)

南来作者	所编副刊		编刊日期	所属报章	备 注
	文艺性	综合性			
李铁民	晓风		自 1933.1.5	南洋商报	
	狮声		1933.1.21—1933.8.20	南洋商报	
连啸鸥	狮声		1933.8.21—1934.1.16	南洋商报	
38 人	36 份	13 份			

期刊编辑方面以综合性杂志为主,有《曼舞罗》、《星报》、《消闲钟》、《华侨周报》、《青年》、《民众》等 6 份,另有文艺性期刊《晓天周刊》1 份。其编刊情形如表 3—3 所示:

表 3—3 中国南来作者与所编期刊(1925—1933)

南来作者	所编期刊		编刊日期	备 注
	文艺性	综合性		
王肖吾		消闲钟 曼舞罗	1925 年 1926.10.6—1927.5.7	
李铁民 *		消闲钟	1926.7.14—1927.9.14	
傅落红		曼舞罗 星报	1927.5.14—1927.12.17 1927.6.25—1931.7.19	
周了因		曼舞罗	1927.12.24—1928.1.28	
陈炼青 *	晓天周刊		1928.11.8—1929.1.24	
陈树南 * 柳 鞭 *		华侨周报	1928.9.17—1929.2.19	两人合编
潘醒农		青年	自 1930.11.20	
罗永年 *		民众	自 1931 年秋	
9 人 * 5 人	1 份	6 份		

注:表 3—3 加“*”的期刊编者与上表 3—2 的副刊编者同。

二、主要南来作者的编务活动

这时期从事编务活动的主要南来作者有拓哥、谭云山、黄振彝、曾圣提、郑文通、罗依夫、杨实夫、许杰、陈炼青、陈树南、林姗姗、曾华丁、洪丝丝、李铁民等。以下将论析这些南来作者的编刊情形。

拓哥

拓哥是马华新文学文艺副刊的拓荒者。约1923年或1924年南来。(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四节)拓哥于1925年2月15日创办了新马文坛第一份纯粹新文艺副刊《南风》，附于《新国民日报》出版。然而拓荒者往往是孤独与寂寞的。拓哥在《南风》第7期《编辑丛谈》中说：“有母亲就没有父亲，有父亲就没有母亲的《南风》，自从出生以来，力弱身单，鲜朋寡友，孤危极了。灶上灶下，砍柴挑水，买油买盐，包酱打醋，都只有一个人忙。调养上，自然容易露有不周到的地方。”言下之意，即以《南风》的撰稿、编辑、校对等工作，全由他一人打理。⁽⁸⁾在这种“鲜朋寡友”的“孤危”情况下，拓哥仍以极大的热情来办这份副刊，而且坚持了近4个月，出版了9期，至同年11月12日始告停刊。⁽⁹⁾

《南风》基本上每星期出版一次，除第8期在星期四出版外，其余各期都在星期三出现。九期的《南风》，共发表作品24篇，其中诗17首，小说2篇，散文1篇，剧本1个。24篇作品中，除署名梦苇、应平各一篇外，其余均是编者拓哥的作品。而且梦苇的小说《爱的死》，应平的诗《南风》，其作品风格、思想和用字都与拓哥相似，疑为拓哥化名。⁽¹⁰⁾

拓荒者是寂寞和痛苦的，然而成就也是非凡的。拓哥创刊的《南风》，以首开先河的气势摆脱了过去和当时副刊依赖剪稿及文白兼蓄的状况，而以一个全部刊登新文学作品的崭新姿态出现，它

标志着新马华文文学开始了另一个阶段的旅程。⁽¹¹⁾为正式的新文艺刊物在形式上树立了一个规范。⁽¹²⁾

谭云山

《南风》发刊两个多月后,当时刚从湖南来新加坡工商学校任职的谭云山(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四节),以及他的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周钧、邹子孟、段南奎、常焱、曹国宾,在《叻报》创办文艺副刊《星光》。这批青年编者生活极不安定,有的甚至过着近似流浪的生活。在编辑《星光》的一年间,编者三易其人,编辑部也一再迁徙。然而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谭云山和他的同人们仍埋首耕耘,大力提倡新文学、新思想,以改造社会思想为己任。

《星光》发刊于1925年10月9日,每星期出版一次至两次。共刊出84期,至1926年9月20日停刊。44期前由谭云山编辑,45期由周钧接编,至74期后,周钧离任,改由邹子孟、段南奎、常焱和曹国宾合编。主要撰稿人有邹子孟、李无隅、常焱、酋犬、寓言、周钧、心朴、宾鹤翔、孤鸿、英华、子达、南奎等。编者谭云山在该刊发表了大量的诗歌、散文等作品。

《星光》在41期前,是三日刊,每星期出版二次,因为编者谭云山课务繁忙,曾暂时改为周刊,至第45期又恢复三日刊。在改为周刊期间,曾有很多读者来信,有的责备、有的鼓励,有的甚至答应尽力供应稿件支持他们。与拓哥在编辑《南风》时读者反应冷淡,只得独力惨淡经营的情形大相径庭,这很可能是马华新文学史上,读者群众发挥出他们的精神力量来支持一个健康的文艺刊物的第一次。⁽¹³⁾方修在评价《星光》的作用和意义时,说“它是马华新文学运动兴起的主力所在”。⁽¹⁴⁾他说:

如果说,《南风》的发刊,为正式的新文艺刊物在形式上树立了一个规范,那么,《星光》的露面,则是为马华新文学刊物在内容上

建立了一个优良的传统,为马华新文学新思想运动掀起了一阵狂飙,影响广泛得多了。⁽¹⁵⁾

《星光》停刊前后,谭云山于1926年9月2日又创办了《沙漠田》,在《新国民日报》上发刊,但翌年初即停版。谭云山也勤力耕耘,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为数可观的作品。其后谭云山受聘前往印度,任印度国际大学教授,从而结束他在新马文坛的编辑创作活动。

黄振彝

黄振彝在主编《新国民日报》的文艺副刊《荒岛》时,刚从上海国民大学毕业后南来(生平介绍请见第二章第二节)。黄振彝在《开场白》和《末谈》中,曾解释创办《荒岛》的意义和取名经过,他把当时的南洋文坛比喻成一个人烟远绝,布满兽蹄鸟迹的孤小荒岛,他与同人要用“现在的力量”对这“小荒岛”下一番“建设的功夫”,⁽¹⁶⁾而且“打算去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里去”。⁽¹⁷⁾

黄振彝创办《荒岛》是在1927年1月28日。最初每周出版一次,第二十三四期后,就不太定期,约两三星期才出现一次,终于在1928年6月8日停刊,前后共出版40期。1929年2月4日曾再复刊,附设于《叻报》,继续出版15期,又告停刊。

在黄振彝主编的55期《荒岛》中,发表的作品共有:诗89首,小说60篇,散文36篇,论文31篇,翻译作品15篇,旧诗词6首。主要作者有黄振彝、朱法雨、撕狮、LS女士等。黄振彝除提倡南洋色彩外,亦有意通过鼓励白话文的写作与整个社会接触,反映社会各个方面,为此刊登不少有关时事和社会问题的批评文字。黄振彝还负责时评和“瞎三话四”栏,专写些讽刺性的杂文,鞭挞现实,揭发丑恶,显得相当突出。

对于《荒岛》在当时文艺建设上的成就,时人及后人都给予了

肯定。杨松年博士在《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中认为，在《荒岛》之前虽然已有表现南洋色彩的作品，但有意识地提倡作品来突出这种色彩的理论文字，则以这副刊最先提出。⁽¹⁸⁾

当时的一名南来作者何采菽在这份副刊创刊不久就撰文推崇：

最近读了荒岛——至第三期，内容别出心裁，在新国民日报的附刊上真难得的一种附刊物。就南洋群岛华侨出版物也少有的——我不是替他们拍马屁，瞒不过读者。——其实，我再赘讲一句，真难得的一种刊物。⁽¹⁹⁾

曾圣提

另一位来自广东的编者曾圣提（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四节），也在此时期集合一批文艺爱好者，创立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文艺副刊《洪荒》。这份副刊的编者同人除曾圣提外，尚有花都蓉女、张放、周寒铮、吴仲青、曾华丁等。曾圣提等人本来打算出杂志的，由于经费问题，结果只好作为《南洋商报》的副刊出版，创刊时间是1927年8月18日，为周刊。《洪荒》在《南洋商报》出20期，至同年12月13日停刊。后脱离《南洋商报》，迁至槟城《南洋时报》，改由曾华丁编辑，出18期后止刊。

曾圣提等人创办编辑的《洪荒》，共刊登诗歌46首、散文25篇、小说12篇、论文5篇、另有启事性质的文字4则。其中主要作者有大吉（曾圣提）、丁琅（蓉女）、张放、华丁、熹然等。编者曾圣提非常重视诗歌创作，刊登的文体中以诗歌为最多。散文作品也是该刊的一大丰收，不少篇章带着丰富的情感且富于诗意。

从这份文艺副刊来看，编者曾圣提与他的同人怀抱“真善美”的理想，⁽²⁰⁾希望“鼓勇前进，创造新生”，⁽²¹⁾也将这种精神贯彻在一

些散文与诗歌作品中。不过不少作品内容褊狭,构成这份刊物的一个显著缺点。但该刊确实出现不少优秀的诗歌、散文,作品雍容典丽,富有绅士风,与《荒岛》同人的浅露平淡恰好成为一个对照。⁽²²⁾

曾圣提在当时文坛上是一位颇具领袖姿态的编者和作者。他挟带着深厚的文学根底及创作经验南来后,醒悟到南洋社会应该建立自己独特的文艺。在1929年主编《南洋商报》的《文艺周刊》时,他就力倡“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这种办刊思想使《文艺周刊》呈现独特的色彩。

《文艺周刊》发刊于1929年1月11日,附于《南洋商报》出版,是该报文艺副刊《洪荒》停刊后另辟的一个定期副刊,初为周刊,后改三日刊,所以又称《文艺三日刊》。共出版41期,于同年6月28日停刊。该刊共发表诗歌45首,小说23篇,散文29篇,剧本3个,散文诗1首,论文1篇。此外有插图6幅,旧体诗6首,朋友消息和格言各3则。该刊主要作者有仲广、王元良、巨鳄、吴仲青、革尘、曼四、巾白女士、曾华丁、左天赐等。曾圣提也分别以大吉、吉、M笔名发表了20余篇作品,有诗歌、小说、散文、翻译散文和发刊词等。

由于曾圣提力倡“南洋色彩”,该刊出现一些较为优秀的本地题材作品,如吴仲青的小说《梯形》,曾华丁的《五兄弟墓》,曾圣提的《生与罪》等,也注重介绍和翻译马来民族的文学艺术。这份刊物存在一些缺点,如作者群太狭小,翻译作品太多,后期水准下降等,但编者“以血和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的办刊精神,在当时影响很大,后来的一些文艺副刊编者就曾秉承这精神并继续发挥,使建立南洋文艺成为早期本地文坛颇具规模的文学运动。⁽²³⁾在20年代本地能出现这样的文艺副刊,未始不是一项丰收。⁽²⁴⁾

继《洪荒》和《文艺周刊》之后,曾圣提曾于1931年6月1日接编《南洋商报》的综合性副刊《商余杂志》,但编辑时间较短,8月份就离职。其后两度在檳城主持《现代日报》,从此未再创办或编辑任何文艺副刊。

郑文通

郑文通是位来自福建的作者，也是一位编辑副刊较多，年代跨度较长的编者。（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四节）他在新马期间创作了不少作品，反映社会各阶层的现实，有“多产作家”之称，然而创作成就平平。其最大贡献是于1927年至1939年间参与创办或主持《新国民日报》的《绿漪》（1927年）、《瀑布》（1929年）、《新国民文学》（1938年）、《新园地》（1939年3—4月），以及《南洋商报》的《曼陀罗》半月刊（1929年），《星洲日报》的《文艺工场》（1930年）、《雷鞭》（1931年），《民国日报》的《文艺》（1933年）等这几份文艺副刊。

郑文通最早创办与编辑的文艺副刊是《绿漪》。同人还有何采菽、李克希、陈彩云。该刊创刊于1927年12月20日，附于《新国民日报》出版。为不定期刊，平均每周出1期，共出11期，至1928年10月19日停刊。共刊出作品62篇。其中小说10篇、散文12篇、诗歌28首、散文诗5篇，剧本1部，论文1篇，刊首语和编后4则。郑文通也在该刊发表散文和小说。

《绿漪》的发刊旨趣，原是想融汇《荒岛》与《洪荒》两个刊物的优点，即《荒岛》的高度冲刺精神和《洪荒》的艺术技巧，但实际上《绿漪》的作品却表现出一股感伤的浪漫主义情调。尽管编者郑文通曾把《绿漪》与《荒岛》和《洪荒》并称为当时“文坛三景”，但《绿漪》由于上述的感伤情调，以及刊期太疏的缘故，并不如另两份刊物给予读者的印象。

《绿漪》停刊之后，郑文通与陈彩云又于1928年12月17日发刊《瀑布》，附于《新国民日报》出版，属不定期刊，约每月出版一次，共出35期，维持至1930年12月30日方告停刊。主要作者有吴仲青、梁流云、何采菽、王元良、旧燕、陈子实等。编者郑文通也发表5篇小说、2篇散文、2篇通讯，以及11则编后语。

《瀑布》虽然前后维持数年之久，但因其时新兴文学已成为文

坛主流,而这份刊物的作品仍属于《绿漪》的旧作风,所以给予文艺界的影响较微薄。

郑文通在编辑《瀑布》的同时,与另一南来编者罗依夫合作,借用《南洋商报》《文艺三日刊》的版位,于1929年5月31日出版《曼陀罗》半月刊,但只出两期,就在同年6月14日停刊。该刊作者只有郑文通、依夫、郑吐飞和孤魂,共发表作品四篇:小说、论文、翻译小说和翻译散文各一篇。

《曼陀罗》停刊后,郑文通仍继续主持《瀑布》编务,同时,以郑灵先为笔名和罗曼合编《星洲日报》的副刊《文艺工场》。

《文艺工场》创刊于1930年8月30日,为不定期刊,出版四期,同年10月4日停刊。作者有流冰、梁流云、周炜、曼虹、无愁女士、胡梦萍女士等。郑文通也以问农、灵先等笔名发表《剧场里——写我们的一点感觉来代序》(发刊词)、小说《途中》(连载三期)和编后三则。《文艺工场》以及郑氏稍后在1931年编辑的《雷鞭》(《南洋商报》副刊),表现均不特出。真正给他编辑生涯带来闪光亮点的是他于1938年编辑的《新国民文学》。

《新国民文学》创刊于1938年12月10日,作为《新国民日报》的晚报副刊,每日半版,由郑文通主编,但前后只维持了两个多月。主要作者有王修慧、啸平、金玻、梅子、高扬、曼依、高风、露瑶等。郑文通主持这份刊物时,曾于创刊之日和新年期间两度献词,表示该刊要着力反映现实,并对此刊寄予厚望。当时为此刊撰稿的作者也能提供一些反映现实的稿件,使这份刊物出现不少内容坚实,颇值一读的作品,如金玻、漫依、王修慧、李梅子等人讨论“通俗文学”问题的文章;高风的《一月的感想》和高扬的《我们对你仍觉失望》等对于《狮声》、《南洋周刊》与《晨星》等刊物的若干批评文字;以及啸平的小说《时代底儿女》和散文《烛与剑》等。这份昙花一现的《新国民文学》副刊,终于为郑文通的编辑生涯划上一个虽然带点遗憾,但仍不失精彩的句号。

罗依夫

罗依夫(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四节)从广东南来,曾与郑文通合编《曼陀罗》。这份刊物只出两期,但罗依夫在该刊发表的论文《充实南洋文坛》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它提出新写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论证了一些旧的文学流派无法适应于新的时代。就现有的资料来看,这几乎是新加坡方面马华新文学界倡导新写实主义的第一声。⁽²⁵⁾

《曼陀罗》中途停刊后,罗依夫于1930年1月17日与另一编者李梅子合编《奠基》,附于《叻报》出版。这份刊物与《曼陀罗》一样,只出两期,同年1月30日收刊。共发表五篇作品和一则刊首语,罗依夫以依夫为笔名,刊登了诗歌《前进》和小说《人生的香料》。

其后罗依夫独力创办一份较有影响力的文艺副刊《南针》,附于槟城《中南晨报》出版,创刊时间是1930年初,每周两三期,至同年底停刊。

这份刊物内容十分坚实,其中不少作品反映了30年代初期经济不景气下南洋城市工人的不满现实的行动,包括组织工会、惩戒工头、争取工友的权益等,成为马华新兴文学运动的一个坚强营垒。

罗依夫在新马期间除编辑过上述几份文艺副刊外,还曾以罗永年原名创办了一份综合性期刊《民众》。这份杂志发刊于1931年秋,周刊,每逢星期日出版。其中多是论文与杂论。此后罗依夫就离开新马,下落不明。

杨实夫

杨实夫也是从广东南来的作者,(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节)他于1929年4月27日创办《椰风》,作为《槟城新报》的文艺副刊

出版,每周一大版。取稿侧重小说创作,曾登过忠实的小小说《笑纹与波光一样柔和》,反映中国北伐革命时期农民的觉醒和进步。杨实夫也以实夫、朴夫、彬彬、油子等笔名在该刊发表小说、散文、论文、译诗和启事等。

1930年初之前,《椰风》编得很精彩,成为当时最重要的新兴文学园地。后来杨实夫渐渐懈怠,连编后语也不愿意写。在另一南来作者曾梦笔提醒下,杨实夫觉醒到应该整顿《椰风》,于是将该刊改头换面,由新的文艺副刊《碧野》取代。

《碧野》于1930年10月21日创刊,为三日刊,每期一大版,前后共出版105期,至1932年5月18日停刊。杨实夫编辑该刊时侧重连载小说,所以作者不多,较活跃的作者有陈敏泰、Y. S. 文、寒剑、梅花、梓川、亚夫和迂夫等。最初十数期,确实刊登了一些内容和技巧都不错的作品,如杨实夫以彬彬笔名写作的反映下层社会生活困苦的《穷人的孩子》。但十三期后,就渐渐缺乏特色了。

杨实夫在《槟城新报》还创办过《浪花》副刊,发刊日期是1929年7月4日,约五天出一期。但只出版五期,就无声无息了。

杨实夫编刊时期较长的是《槟城新报》的综合性副刊《关仔角》。该刊创办于1930年2月7日,日刊,至1933年4月4日停刊时,共出版565期。也刊登不少文学作品。其作者有百余人,主要有:克夫、舒弟、老马、梦笔、欲鸣、云姑、温玉舒、迂夫、振公和亚拉等。编者杨实夫以实夫、聿、半聿、油炸鬼、泼皮男士、半峇峇等发表了数十篇针砭社会、人生的作品,其中多是散文。

许杰

许杰原籍浙江,(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节)南来之前在文学创作和编辑方面均较活跃,曾出版过《越峰日报·微光》半月刊,并被吸收为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员,也出版过短篇小说集《惨雾》(1926年),被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于局势关系,许杰于1928年

离开浙江宁海,前来马来西亚任吉隆坡《益群日报》总编辑,兼编文艺副刊《枯岛》,1929年杪辞职离马。

《枯岛》发刊于1928年8月23日,周刊,至1930年3月6日停刊时,共出版78期(许杰只编至1929年10月11日止)。许杰主编的《枯岛》,立场坚定,态度鲜明。他虽然初来乍到,但很快就了解到在新马提倡具有南洋色彩的文艺的重要性。而他更加强调的是中国新文学中的革命文学的精神,并将“同情”与“反抗”列为选稿的标准,⁽²⁶⁾尽量不用抒发个人情绪的文稿。虽然许杰的文学观有些极左与偏激,但他的办刊态度十分认真,因此获得一大批作者的支持。

许杰编辑的《枯岛》共发表作品281篇:诗119首,散文49篇,小说39篇,论文34篇,剧本4个,翻译作品2篇,启事33则。作者达100多人,较主要是有:六叔、小梦、姗姗、梁育连、衣缔、陈翔冰、光滔、一萍、陈天任、旧燕、陶醉、亦夫、如风、珍哥、亚明、昂丁、云颜、青等。

对于许杰在《枯岛》的编辑活动及其贡献,杨松年博士在《早期中马文艺重镇:〈益群日报〉的〈枯岛〉》中这样评价:

新马华文文学的早期重镇是新加坡和檳城,直至20年代末期,吉隆坡才慢慢露出头角。《益群日报》的文艺副刊《枯岛》的出现,给中马文艺活动带来一个新纪元。⁽²⁷⁾

许杰编辑时期的这份副刊,鲜明地举起了革命文学的大旗,同时重视南洋色彩的提倡,并且不时地以这样的标准要求所投来的稿件,以及指示写作者创作的方向。……难怪《枯岛》能成为当时中马的中坚副刊,成为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的一个突出的文艺副刊。⁽²⁸⁾

陈炼青

20年代末期,尽管各种文艺副刊如雨后天春笋般不断涌现,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多则数十期,少则三五期就告消失,即使能坚持一年半载的,也几乎没有以日刊的面貌出现的。在这种情况下,从广东潮安南来的陈炼青(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节)所编辑的《椰林》,就成为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存在最久、刊期最密的一个文艺副刊。

这位杰出的编者陈炼青,早在1928年就开始创作及编辑活动。他于当年11月8日创办文艺杂志《晓天周刊》,至1929年1月24日停办,共出12期。这份刊物因取材严谨,持论正确,文字别开生面而获得当时社会称许。后因该刊同人为生活职业各奔东西,陈炼青只好提议取消晓天社名义,准备另改刊名,作为《叻报》附刊出版,但此计划并未实现。⁽²⁹⁾

继《晓天周刊》之后,陈炼青于1929年中开始接编《椰林》,至1931年2月停刊离任。在这一年半时期内,他的编刊方针对南洋新文艺运动影响深巨。

《椰林》创刊于1928年12月20日,为《叻报》副刊,每日一版。当时的主持人原是半阍。从半阍的发刊词《通往椰林间去》来看,编者打算将这份刊物办成涵养娱乐的消闲副刊。⁽³⁰⁾初期的《椰林》办得并不好,学术文字较少,新文艺稿件又短缺,唯有陈炼青每日一篇的清新刚健的散文,形成该刊的显著特色。陈炼青接编《椰林》后,就大刀阔斧地进行两次改革,使《椰林》面貌焕然一新。

陈炼青的第一次改革,是在1929年6月17日正式接编《椰林》时。他宣布废除剪稿,采用本地作者的来稿,呼吁写作界源源投稿,共同来培植这块园地。《椰林》改革号刚推出,立刻获得新马文艺界的热烈支持,各种文艺作品如诗歌、散文、小说和理论文章等踊跃投来,使《椰林》成为当时新马文坛上废除剪稿的新文艺副刊

(日刊)。

第二次改革,是在翌月24日。陈氏在《编者第二次献词》中宣布要多登一些关于文艺的论文,少发表消闲性质的文字,最后的目标是一律刊登有关提倡南洋文化和反映南洋生活的作品,创造出一种具有独特内容的南洋文化。

《椰林》经过两次改革后,偏重人生、社会、思想、文学各方面的问题的讨论。从1930年初起,“创造南洋文化”的提倡与当时的新兴思想合流起来,《椰林》开始出现了一批新兴文学的佳作,如浪花的《邂逅》和《生活的锁链》等。

1930年3月,由于陈炼青忙于主持《叻报》编务,就请衣虹协助编辑《椰林》,时间约三个月。同年11月,陈炼青又与郁如合编。其后《椰林》因一宗文字祸而于1931年2月停刊,陈炼青也因健康关系于1932年间回广东原籍休养。

综观陈炼青从1929年中至1931年2月主持的《椰林》改革号,前后共推出了406期,作者超过100多人,主要的有:征夫和尚、楚云、啸鸥、吴艺草、哥空、柳上萤、木然、浪花、慧聆、至诚、衣虹和毅治等。陈炼青也以未兆、炼青、炼、青、子陈子、老五笔名在该刊发表了80多篇散文、论文、杂文、诗歌、剧本等。方修在评及《椰林》时道:

它的存在,几乎贯穿了马华新兴文学运动及其影响下南洋色彩高度发达的整段历程;它的出刊期数之多,更是远远地盖过前此的以及同一时候的一切文艺刊物。这种纪录,要到星洲日报的《晨星》(1932)以及南洋商报的《狮声》(1933)创刊的好几年后,才算被打破了。

所以,《椰林》的内容的繁富,佳作的众多,几乎是一时无两的。它的作者群,一般上都是相当成熟的;特别是1930年上半年出现的许多新兴文学作品,更是突出当时的一般水平。⁽³¹⁾

陈炼青在接编《椰林》不久,曾以未兆这一笔名,于1929年7月29日创办了《叻报》的另一份副刊《闲暇》,也负责该报《杂览》副刊的编务。不过这两份副刊与《椰林》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陈树南

陈树南约于1927年从广东南来,(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节)1929年12月9日以“旧燕”为笔名,在槟城的《南洋时报》创办该报最后一份文艺副刊《南洋的文艺》,每周出版一至二次,共出20期,至1930年4月17日以后停刊。作者有曼弦、柳鞭、华丁、淮清、一息、际云等。陈树南也以旧燕、记者、飞鸟等笔名发表散文和论文。陈树南在编辑这份副刊时,原是打算将它办成一份充满南洋色彩,反映南洋现实的刊物。⁽³²⁾但综观这份副刊发表的作品并未符合编者办刊思想。不过,该刊作者圈较为广阔,文字也较成熟。

陈树南主持这份副刊期间发生过两场讨论和论战,使之成为当时引人注目的一份文艺副刊。

第一场是关于文艺上的人性问题的讨论。这是由于戴淮清(当时在北平燕大就读的大学生)写给陈树南和柳鞭的一封信《心理和革命文学》引起的。戴氏认为从人性出发,“唯心的革命文学”有其提倡价值。这就引发一场热烈争论。如旧燕发表《文艺上的人性问题》,曼弦发表《文艺家的要求》等。

第二场是关于翻译问题的论战。对于雪莱的诗“To Night”如何译法,曼弦和《中南晨报》的罗永年发生了争执,从而引发一场颇为紧张热烈的讨论。这场论战,是马华新文学史上有关翻译问题的第一宗笔墨官司,由于波澜壮阔,对当时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具有莫大的激发作用。⁽³³⁾

当1930年的新年钟声在新马文坛上空敲响时,陈树南以“记者”为笔名,向南洋文艺爱好者献上两份新年礼物,即《民国日报》

的两份文艺副刊《新航路》和《公共园地》

《新航路》创刊于1930年1月1日,属不定期刊,基本上每星期出二至三期,有时也连着数日每天出一期,共出154期,至1930年12月27日停刊。主要作者有陶、曾锐、吟啸、曼曼、蒋山青、丁娜、桐梯等。

陈树南在《新航路》发刊词中,对“浓厚到十分的封建社会遗毒”,“西方披猖而来的个人资本主义”,“压迫者的毒焰”深表不满,想要用“新精神”开辟出一条“新航路”。这也是该刊命名的取义。⁽³⁴⁾不过这段发刊词却缺乏明确宗旨,而这份刊物也未呈现多大的特色。

陈树南以记者的笔名编辑的另一份副刊《公共园地》,也创刊于1930年1月1日,与景三合编,每日半版,至1931年11月20日以后停刊。初时作品未见出色,但到1931年2月间扩大版位,充实内容之后,态度始显得积极,成为星洲方面新兴文运退潮期间的中流砥柱。⁽³⁵⁾该刊登载的虚竹的小说《劳动的代价》,古月的评论《徐志摩的死》等,都是脍炙人口的作品。

“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公共园地》发表了不少斥责日本侵略者的文章,故不为英殖民政府所容,被勒令停刊旬日。

陈树南在编辑上述几份文艺副刊之前,曾与柳鞭合编期刊《华侨周报》。该刊于1928年9月17日创设,至1929年2月19日停刊。此期刊虽为综合性杂志,但文艺气息浓厚。该刊有两个特色:其一强调儿童文学,甚至辟有“儿童园地”版,收集儿童文学问题的文章及文学作品;其二是十分重视文艺作品,陈树南以记者、旧燕、树等笔名撰写了不少时评、杂感、诗、童话故事等作品。

从陈树南在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的编辑活动可见出,陈氏是一位较为活跃的南来编者。遗憾的是他在1930年返梓后行止不明。

林珊珊

林珊珊是30年代初期在编务活动方面颇为活跃的南来作者，(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节)他从福建南来槟城后，曾于1929年担任《光华日报》主编。在此之前，他是马华新文学史上第一个新诗刊《诗》的常见作者。他在1930年8月与李梅子合编过《光华日报》的文艺副刊《南国的雨声》。林珊珊在创办这份副刊时，赋予它“艺术运动”和“文化宣传”的使命，主要容纳艺术理论、艺术批评、创作、翻译类的作品。⁽³⁶⁾

接着，林珊珊于翌年初，与李少岳先后主编《光华日报》的另一副刊《蜕变》。这份刊物每周出版一至二次，侧重登载诗歌、散文、小说及文学理论。其中有些作品具有一定的新兴意识，如宿女的小说《不会站的人》，江上风的论文《南洋作家应以南洋为战野》等。

在30年代初期新兴文学开始退潮时，《蜕变》坚持出版到1932年中才停刊，它与该报的《戏剧》副刊，以及陈树南主编的《公共园地》，为马华的新兴文学运动延长了一年的寿命。⁽³⁷⁾

战后数十年来，林珊珊是《星报》的总编辑，主编《星艺》、《莲花河》等副刊，对北马文风大有影响。⁽³⁸⁾

曾华丁

曾华丁是20年代末及30年代初在编务活动方面极为活跃的南来作者。(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节)他是《文艺周刊》的编者曾圣提的胞弟，是该刊同人中在马来亚的文艺界服务最久的一位。当曾圣提编辑的《洪荒》由新加坡《南洋商报》迁移至槟城《南洋时报》出版时，编务就交由曾华丁负责。曾华丁在1930年2月5日创刊的《绝缘回线》，为《光华日报》第一份纯文艺副刊。⁽³⁹⁾该刊至同年5月27日停刊，前后共出版16期，周刊。

曾华丁编辑《绝缘回线》期间，共登载作品29篇。其中诗歌16

首,小说7篇,散文5篇和启事1则。这份刊物的纯文艺气息极为浓厚,写作者的才气也不弱,主要作者有:昭(曾华丁)、王玉、舒虹、黄霞、柔健、宗华、落人、一息、雪棠、文陶、YF和光字等。

在当时的文艺副刊中,提倡南洋色彩的文艺和新兴文艺是文坛的两大主流。曾华丁编辑的《绝缘回线》却没有鲜明的宗旨,但这份刊物毕竟是《光华日报》早期较具程度与水平的纯文艺副刊。1930年开始,《南洋时报》对文艺的推动已没有过去那样的积极,副刊数目显著减少,《绝缘回线》的出现,多少可填补《南洋时报》的一些副刊停刊后北马文坛所遗下的空白。⁽⁴⁰⁾这份刊物也如编者所希望的,对新马文学的发展尽了一份心力。⁽⁴¹⁾

《绝缘回线》停刊后,曾华丁又于1930年7月26日创办另一份纯文艺副刊《压觉》。《压觉》是《南洋商报》在30年代初期相当杰出的文艺副刊,共出24期,周刊,于同年12月29日停刊。

曾华丁最重视诗和小说,故《压觉》和《绝缘回线》多刊载这两种文体。《压觉》的60多篇作品中,有诗歌25首,小说15篇,译作8篇,剧本4个,散文5篇,朋友通讯4则。主要作者有曾玉羊、陈惠琴、柳鞭、依夫、巨鳄、玳、低等。诗歌一般上颇具文彩,手法作风也多样化;小说内容范围广泛,其中几篇小说如曾玉羊的《生活圈外》和柳鞭的《饥饿的狗》,更是文史研究者经常提及的作品。编者曾华丁也以“昭”的笔名发表了散文《伊》和通讯《给梦笔·实夫》等。总之,在当时文坛出现低沉的迹象下,《压觉》能以一个重视文艺创作,重视作品的技巧的姿态出现,是相当难得的。⁽⁴²⁾《压觉》停刊三四年后,曾华丁在《总汇新报》创办了纯文艺副刊《曝谷场》。创刊时间是1934年5月,共刊出45期,⁽⁴³⁾至1935年4月6日宣告停刊。主要作者有房曼弦、清云、元良、予生、玉羊、残白、惟圣、纪力艺等。

《曝谷场》的出版,正是新加坡的纯文艺刊物陷于青黄不接的时候,《民国日报》的《文艺》已经收盘,《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也

暂告中止出版,这时《曝谷场》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罅,成为当时新加坡方面唯一的纯文艺副刊,保持当地纯文艺刊物出刊的一线脉络。⁽⁴⁴⁾

洪丝丝

洪丝丝是来自福建的作者。(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四节)30年代初期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及英殖民政府制造的多宗文字案,马华文坛陷入低气压状态,洪丝丝仍着力于文学编辑与推动工作。他于1932年5月10日创办《光华日报》的副刊《槟风》。该刊属综合性日刊,作者逾百人,主要有:丝丝、文郎、鸣爽、瞻庐、瀛洲、逸凡、铁马、日头、黄灰、林鲁生、力生、耶鲁、谛克、润湖、太阳、艾狄、钏、雪花和余学步等。

《槟风》对当时文学新思潮的介绍推进最为积极,很多重要的文艺问题的讨论,大多由它最先提出,而且得到热烈响应。例如关于“国防文学”问题的讨论,该刊就发表专论多篇,使讨论的问题不断发展和深化。另一方面,《槟风》对于一些不健康的思想的清除也非常努力。⁽⁴⁵⁾而编者洪丝丝对该刊有这方面的成就,也显然感到欣喜:

在过去一年中,我觉得《槟风》比较可满意的一点,就是时常有人提出问题来讨论。道德问题、文艺问题、大众语文问题,我们都辩论到,辩论是研究的表现,是探讨真理的重要方法,我们希望今后的《槟风》,也时有辩论的文字。⁽⁴⁶⁾

洪丝丝除了主持过《槟风》的编务外,亦曾担任《现代周刊》的主笔。战后主编过《南侨日报》的文艺副刊《南风》。(洪丝丝在战后的编刊情形请见本章第五节)

李铁民

李铁民也是来自福建的作者。(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节)他以“半鰐”为笔名,于1933年1月21日在《南洋商报》推出一份重要的文艺副刊——《狮声》。《狮声》的刊期很密,前后历时9年,共出版1000期左右,容纳了不少当时知名作者的众多作品,成为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的重镇。⁽⁴⁷⁾

李铁民为该刊取名《狮声》有如下意义:

吾中华民族之立国于世界也,历史悠久,文化伟大,土地广阔,物产丰饶,人民众多,以种种崇高博大之特质,置诸环球百十国间,俨然百兽中一庞然宏伟之雄狮也。本刊之立名,爰取此为第一义。

考新加坡之取名,原出马来语之呼音,汉译为狮岛,故也有以狮岛为新加坡之别名者,本刊发刊斯土,关系密切之不待言。本刊之立名,爰取此为第二义。⁽⁴⁸⁾

李铁民编辑《狮声》时期,较侧重登载随感杂录,有时也穿插一些诗歌、小说和论文。主要作者有:连啸鸥、曼倩、鸣吾、紫鹃、逃禅、秋红、志生、曾见、曾奋、侠夫、丘士珍(废名)、未央、刘夏旺、黄发觉、李润湖、李西浪、罗永年、长江等。李铁民也以“半鰐”的笔名发表不少杂感与随笔。

在李铁民主持该刊期间,曾发生几场讨论和论争,如关于自杀问题,关于鸣吾的幽默理论以及废名的地方作家问题的论争。其中地方作家问题的论争,引起文艺界的反应及读者的注意。

李铁民编辑《狮声》至第89期,因随马来亚闽侨回乡团回中国考察,即由连啸鸥接编,至第150期才接回编务。但编至1935年初,又卸下编务,由李紫凤负责。

《狮声》自李铁民发刊始,其声尚弱,后来在几位编者的落力耕

耘下,声渐威猛,并能与时代局势配合,大力推动文艺的发展,与同时出现的《星洲日报》副刊《晨星》,并为30年代与40年代初期新加坡华文文艺的双葩。⁽⁴⁹⁾

李铁民在创办《狮声》之前,曾于1933年1月5日发刊《南洋商报》另一副刊《晓风》。当时许多在南国文坛上夙负盛名的作家,及喜欢摇笔杆子的朋友,都纷纷投稿,故此李铁民另办《狮声》来容纳本地文稿,⁽⁵⁰⁾而《晓风》则专载外地稿。

这里应附带提到的是,李铁民于1926年至1927年间,曾担任《消闲钟》三日刊的编辑。此期刊虽然只是小报,但轻松中又夹带严肃,文艺气氛也不弱。活跃的作者有道学叛徒、西浪、许朗寰、陈鼎、黄白、掬尘天、天错、丘菽园、老徐、炳勋、慕侨、太猛、情蕴、蝶影等人。此外,其后办《海星》的藻卉,办《南薰三日刊》、《高凉周刊》、《消闲三日刊》的翁瘦夫等,也在这期刊发表多篇作品。因此,有人说《消闲钟》开启了20年代末期新加坡小报的盛况,是有一定根据的。⁽⁵¹⁾

第三节 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时期

1934年至1936年是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时期,由于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不景气到这时仍余波荡漾,因此前一时期新马报章副刊蓬勃发展、百花齐放的局面已美景不再。加上英殖民地政府对报刊的管制加严,这时期新马文坛的刊物与编者已大为锐减。不少编者由于经济不景气的冲击,或其他原因而纷纷北归(如许杰、张楚琨、何采菽、罗依夫),或转赴他乡(如谭云山、曾圣提),或沉寂下来(如吴仲青、温志新、汪开竞)。有的编者如林仙峒也因文字祸而离境他去。但仍有一批南来作者坚持在马华文学园地里埋首耕耘。

以下论析这时期南来作者的编务活动：

一、南来作者的编刊活动概述

这时期孜孜于编刊工作的南来编者有曾玉羊、曾华丁、洪丝丝、李铁民、连啸鸥、李紫凤、王炎之、吴广川、王哥空、李润湖、林建安、曾梦笔、胡浪漫、潘醒农、王仲广等人。

由于新马社会经济萧条，人们饱受经济拮据的压迫与精神苦闷的困扰，一般读者对纯文艺副刊已失去兴趣。他们不太喜欢阅读严肃的纯文艺作品，转而喜欢内容庞杂、形式多样的综合性副刊，借轻松幽默的文字排遣郁闷情绪和消遣闲暇时光。因此这时期南来作者所编辑的 22 份副刊中，文艺性副刊直线下跌，仅有《曝谷场》、《新野》、《新园地》、《文艺周刊》、《新路》和《诗词专号》6 份。综合性副刊的数量则略有上升，计有 16 份，它们是《繁星》、《晨星》、《槟风》、《轮》、《狮声》、《大众副刊》、《青年大众》、《妇女呼声》、《银幕与舞台》、《蕉影》、《新国民杂志》、《晓风》、《展望台》、《海沙滩》、《妇女与家庭》等。其编刊情形由下表 3—4 可以见出：

表 3—4 中国南来作者与所编副刊(1933—1936)

南来作者	所编副刊		编刊日期	所属报章	备 注
	文艺性	综合性			
曾玉羊	轮		(见表 3—2)	槟城新报	
曾华丁	曝谷场		1934. 5. 9—1935. 4. 6	总汇新报	
洪丝丝	槟风		(见表 3—2)	光华日报	
李铁民	狮声		1934. 1. 17—1935. 1. 12	南洋商报	李氏在此前曾编过该刊，请参见表 3—2。
连啸鸥	狮声		(见表 3—2)	南洋商报	

(续表)

南来作者	所编副刊		编刊日期	所属报章	备 注
	文艺性	综合性			
李紫凤		狮声	1935.1.13—1936.12.2	南洋商报	
		晓风	1935.1.20—1936.12.3	南洋商报	
		展望台	(同上)	南洋商报	
		海沙滩	(同上)	南洋商报	
		妇女与家庭	(同上)	南洋商报	
王炎之		银幕与舞台	1936—1937年中	中华晨报	
		大众副刊	(同上)	中华晨报	
		青年大众	(同上)	中华晨报	
		妇女呼声	(同上)	中华晨报	
吴广川		新国民杂志	自 1935	新国民日报	
	新野		1935.5.21—1935.12.13	新国民日报	以“一村”笔名编辑此刊。
	新园地		1936.1.18—1936.8.28	新国民日报	
		蕉影	1936.5.21—1936.9.18	新国民日报	以“广川”笔名编辑此刊。
王哥空	文艺周刊		1935—1936.12.27	星洲日报	
李润湖	新路		1936.9.19—1937.10.13	新国民日报	
		新天地	自 1936.9.19	新国民日报	
林建安		繁星	(见表 3—2)	星洲日报	
		晨星	(见表 3—2)	星洲日报	
曾梦笔	诗词专号		(见表 3—2)	檳城新报	
12 人	6 份	16 份			

期刊也较上期减少,只有 4 份综合性杂志《今代》、《南岛》、《马来亚月刊》、《新星》,以及 2 份文艺性杂志《电影与文化》和《椰风》,共计 6 份。表 3—5 显示南来作者所编期刊的情形:

表 3—5 中国南来作者与所编期刊(1934—1936)

南来作者	所编期刊		编刊日期	备 注
	文艺性	综合性		
胡浪漫	今代		自 1934.5.1	
潘醒农 连啸鸥 *	南岛		1934.6.20—1935.7.30	合编
王仲广	新星 马来亚月刊		1935.9.7—1935.10.5 1935.10.10—1937.8.10	
王炎之 *	电影与文化		1935.10.19—1935.12.17	
王哥空 *	椰风		1935 年	
6 人 * 3 人	2 份	4 份		

注：表 3—5 加“*”的期刊编者与表 3—4 的副刊编者同。

二、主要南来作者的编务活动

这时期较为活跃的南来编者有李紫凤、王炎之、王哥空、吴广川。

李紫凤

李紫凤(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节)来自福建,1935 年 1 月 13 日从李铁民手中接过《狮声》编务,至翌年 12 月 3 日才离任,前后将近两年。

李紫凤编辑《狮声》时,偏重刊登短篇散文,及精悍短小的杂评这一类文字。⁽⁵²⁾李氏强调文艺副刊的社会与时代使命,认为不能把副刊当作茶余酒后的资料,以此博取人们低级趣味的满足。因此这一时期《狮声》所登载的随笔杂论,取材范围甚广,或讨论民族问题,或论及为人处世,或探讨妇女问题,以及检讨文人与写作的问题等。这些作品虽然不如后期《狮声》的同类作品主题鲜明,已较李

铁民编辑时期又进了一大步。主要作者有：李紫凤、梁志生、薄丝、军茄、玛戈、瑞元、钟之凌、冰人、彭金戈、古尔提、君侠、紫鹃、饶楚瑜、陈炼青、斐然、雄姿等。

由于李紫凤提倡杂文，喜爱批评时事，词锋犀利，鞭辟入里的文章，^{〔53〕}因此在主持的《狮声》上发生几场论争，如“读庄子与文选”的论争，“关于几个副刊”的论争，“青年的烦闷与出路”问题的论争，“由奶头说到臭与香”的讨论等。甚至连编者李紫凤也介入论争之中。

李紫凤在主持《南洋商报》的《狮声》时，也编辑该报的《晓风》、《展望台》和《海沙滩》副刊。1937年间，编辑此报的《妇女与家庭》副刊。

在编辑《狮声》之前，李紫凤曾在1927年8月底或9月初至1929年10月16日与同人放生、君谷等合编槟城《南洋时报》的《八月》副刊，也是该刊的基本诗作者。此后又于1930年9月8日主持《民国日报》《南洋学生》副刊的编务。

李紫凤从《狮声》卸任后，于1941年1月成为《大华周报》期刊的编委。这份杂志至1941年10月15日停刊。

王炎之

王炎之是位20年代南来的作者。（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节）他在20年代已致力于期刊方面的编辑工作，约在1925年创办《消闲钟》三日刊，后离职。该期刊后改由李铁民任编辑。1926年10月6日，王炎之以王肖吾为名，创设《曼舞罗》小报。这是一份文艺气息颇为浓厚的综合性期刊。至第32期起，编务才由傅落红接任。

30年代中期，王炎之于1935年10月19日创立另一份以刊载文学作品为主的期刊《电影与文化》周刊，共出10余期。王炎之在编辑这份期刊时，于电影与文化两方面，偏重于文化，而在文化的范畴中，更着重文学。他以厌之、肖吾等笔名在该刊发表了不少

杂文、小说、论文等作品。

1936年,王炎之接编《中华晨报》的《大众副刊》(日刊),使该刊摆脱原来旧意识,面貌焕然一新,深受读者大众欢迎。接着,王炎之又发刊《中华晨报》另一副刊《青年大众》(周刊)。这两份副刊在他主持下,比当时《新国民日报》的《新路》,《星中日报》的《星火》和《光华日报》的《槟风》更为活跃,不但积极鼓吹文化新思潮,如大力推进新文字运动等,而且紧密关注当时的现实问题,如讨论青年人的生活实践,推动当地的救亡运动,也为当时中国救亡运动的遭受制约而频频代鸣不平。

王炎之还担任该报《银幕与舞台》、《妇女呼声》的编辑工作。其编务之繁忙与活跃由此可见。王氏于1939年赴上海后去向不明。

王哥空

原籍琼州的王哥空,也是30年代中期较为活跃的南来编者。(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四节)。

王哥空约在1936年由胡少吾手中接编复刊后的《星洲日报》《文艺周刊》。该刊创办于1932年1月3日,最早主编是胡浪漫,至1934年6月10日停刊。王哥空接编《文艺周刊》至1936年12月27日止。主要作者有姚寄鸿、黄微、普之、沈侠魂、西玲、南鸿等。

王哥空在编辑《文艺周刊》之前,与陈羊羽、刘国栋、罗格、韩瑞元等人创办当时唯一的纯文艺杂志《椰风月刊》。发刊日期是1935年10月5日。王哥空等人在发刊词中指出:

文艺,是以形象来说明某一特定的社会的生活,它表现某一特定社会的生活的复杂性,它揭露了现实的罪恶,描写新生的进程,提高人类的生活兴趣,表现大众的感情或启示其思想。⁽⁵⁴⁾

《椰风月刊》发表的作品有诗歌、短论、专论、小品等。主要作者

有林健安、姚寄鸿、丘家珍、詹熹、谢金辉、艾狄、兰加、许雄等，多数是《星洲日报》的《文艺周刊》及《晨星》的活跃作者。因为是同人杂志，所受限制较少，文字生动活泼，深受读者欢迎。《星中日报》《文艺周刊》第7期就刊登胡君华的《读椰风创刊号》推介该刊。

《椰风》月刊只出两期，王哥空及同人因职业关系无法兼顾，也就宣告停刊。

吴广川

吴广川来自福建，(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四节)在30年代中期编刊之多及编辑跨度之长，堪与郑文通媲美。从1935年至1950年间，吴广川先后编辑过的刊物有《新国民日报》的《新国民杂志》(1935年)、《新野》(1935年)、《文艺园地》(1936年)、《蕉影》(1936年)、《文艺》(1937—1938年)、《影与剧》(1937至1939年)，以及南侨日报的《南风》(约1948—1950年)。

《新野》是当时新加坡“新野社”的一个纯文艺刊物，附在《新国民日报》出版。发刊日期是1935年5月21日。周刊。吴广川以“一村”为笔名任该刊编辑。

《新野》共出刊43期，至1935年12月13日停刊。主要作者有周苍、白露、哥空、谷灵、石灵、黄了英、萧亮、詹熹、郑若心、裴君、铁汉、魑、浅白、野蓟、残楚、克夫、二木郎、千嵩氏等。吴广川也以一村、拓夫、奚因、川、拓、邝村、广川等笔名发表不少诗歌、散文、小说、论文。

这些作者多数是新进的文艺青年，作品经常表现出时代青年对光明的向往以及对进步的追求。文字虽然比较稚气，却是热情洋溢，充分体现了当时马华文艺界的生力军的高亢奋进的精神。⁽⁵⁵⁾这批文艺青年，后来不少成为当地重要文化工作者。

《新野》停刊后，《新国民日报》又发刊《文艺园地》，出版时间为1936年1月10日，同为周刊，编者也是吴广川。这份副刊共出38

期,至同年8月28日停刊。主要作者多是“新野社”社友,有拓、邝村(均是吴广川笔名)、钟之梁、曲零、许灵凤、香雪海、许侠夫、辜斧夫等。他们的文字较《新野》成熟,感情也较为沉练。编者吴广川也不时写些编后话谈论有关创作和批评等问题。

吴广川编辑的《新野》和《文艺园地》,均呈露一种青春活泼的气象,而且内容也较为坚实,成为当时带有新写实主义倾向的新人活动园地。它们连同李润湖主持的《新路》等一系列刊物,为马华新文学繁盛时期的届临铺平了道路。⁽⁵⁶⁾

吴广川在主持《文艺园地》时,也同时主持《新国民日报》的另一新副刊《蕉影》。《蕉影》的前身是《新国民杂志》,也是吴广川编辑的。《蕉影》创刊于1936年5月,但至同年9月18日就停刊了,主要作者有黄科梅、李润湖、玉林、竞浪等。

吴广川在《新国民日报》编刊时期,还曾于1937年6月27日至1938年12月中负责该报副刊《文艺》的编务,共出69期,后由白荻接编。1937年6月底至7月初,吴广川也负责编辑该报的《影与剧》,至1939年中才终止编务。

战后,吴广川从连啸鸥手中接编南侨日报的文艺性副刊《南风》,时间约于1948年至1950年间。他一方面推出不少谈论中国问题、反映中国政局的稿件,另一方面也发表反映新马社会现实的作品。较活跃的作者有韩萌、奕熙、黄继续、萧村、丁毅力、林梦、陈言等。

紧急法令宣布后,《南侨日报》被英殖民政府查封,《南风》也告停刊。这位在马华文坛耕耘了10余年的编者,于1950年冬率眷回中国,晚年居住在广州。

第四节 本地意识挫折时期

1937年至1942年是本地意识挫折时期,也是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的第二个高峰期。由于“七七”芦沟桥事变,中国爆发的全面抗日救亡运动,激发了新马华人空前的爱国热情。新马文学界为配合中国的抗战救亡运动,以文艺宣传为武器,动员新马华人支援祖国抗战。南来作者编辑的文艺副刊和期刊,推进了战前五年新马华文文学壮盛地发展。

以下将论析这时期南来作者的编务活动。

一、南来作者的编务活动概述

这时期南来作者的编辑队伍除原有的编者如郑文通、林建安、洪丝丝、张楚琨、王炎之、吴广川、李润湖、王仲广、傅无闷、李树梧外,又增加了大批编辑人才,如郁达夫、流浪、有秋、王纪元、吴天、铁亢、黄科梅、桃木、絮絮、刘思、林鲁生、林连夫、方图、李词佣、林英强、普洛、杨骚等,共计27人。

他们充分利用文艺作为激发新马华人支援祖国抗战救亡的武器,在报章上推出了许多文艺副刊,使这时期的文艺副刊数量大幅上升,达到18份,计有《新国民文学》、《新光》、《新园地》、《文艺》(新国民日报)、《星火》、《现代戏剧》、《世纪风》、《文艺周刊》、《文艺半月刊》、《南洋文艺》、《今日文学》、《文艺》(星洲日报)、《文会》、《怒吼的五月》、《吼社诗专》、《前驱》、《火炬》、《现代公园》等。综合性副刊除原有的《繁星》、《晨星》、《狮声》、《大众副刊》、《青年大众》、《妇女呼声》、《银幕与舞台》,只增加《影与剧》,共8份。其编刊情形如表3-6:

表 3-6 中国南来作者与所编副刊(1937—1942)

南来作者	所编副刊		编刊日期	所属报章	备 注
	文艺性	综合性			
林建安		繁星 晨星	(见表 3-2) (见表 3-2)	星洲日报 星洲日报	
吴广川	文艺	影与剧	1937.6.27—1938.12月 1937.6月底或7月初— 1939年中	新国民日报 新国民日报	以“广川”笔名编辑 此刊
王炎之		银幕与舞台 大众副刊 青年大众 妇女呼声	(见表 3-4) (见表 3-4) (见表 3-4) (见表 3-4)	中华晨报 中华晨报 中华晨报 中华晨报	
流浪	南洋文艺 今日文学	狮声	1937.7.1—1937.8.15 1937.7月初—1938.7月底 1937.7.26—1938.2.6	南洋商报 南洋商报 南洋商报	
张楚琨	南洋文艺 今日文学	狮声	1937.8.16—1939.8月初 自 1938.7 1938.2.7—1938年底或 1939年初	南洋商报 南洋商报 南洋商报	
铁亢	文艺周刊 世纪风		1937.8.8—1938年底 1939.5.16—1939.11.16	总汇新报 星洲日报	
李润潮	新光 新园地		1937.10.15—1938.4.15 1939.4—1939.9月底	新国民日报 新国民日报	
吴天	星火 现代戏剧		1937.11—1938.3.5 自 1937下半年	星中日报 星洲日报	
林鲁生	前驱 火炬		1937—1938? (同上)	现代日报 现代日报	
林连夫	现代公园		1937—1940	现代日报	

(续表)

南来作者	所编副刊		编刊日期	所属报章	备 注
	文艺性	综合性			
黄科梅	文艺		自 1938.12	新国民日报	
郑文通	新国民文学		1938.12.10—1939.2月底	新国民日报	
	新园地		1939.3—1939.4	新国民日报	
郁达夫	繁星		1939.1.9—1941年底	星洲日报	
	晨星		1939.1.9—1941年底	星洲日报	
	文艺周刊		1939.1.15—1941年底	星洲日报	
	文艺半月刊		1939.1—1941年底	星洲日报	
有秋	狮声		1939.8月初—1940.12.4	南洋商报	
桃木	文会		1939—1941	总汇新报	
絮絮	怒吼的五月		1939.5—?	新国民日报	
刘思	吼社诗专		自 1939.4.15	南洋商报	
方图	现代公园		自 1940	现代日报	
王纪元	狮声		1940.12.5—1942年初	南洋商报	
20人	18份	8份			

期刊方面也增设了 7 份,其中文艺性杂志是《文艺长城》、《椰风》,综合性杂志是《民潮半月刊》、《南洋周刊》、《现代周刊》、《大华周报》、《新生半月刊》,加上前期创设的《马来亚月刊》,共计 8 份期刊。表 3—7 显示他们编辑期刊的情形:

表 3—7 中国南来作者与所编期刊(1937—1942)

南来作者	所编期刊		编刊日期	备 注
	文艺性	综合性		
王仲广		马来亚月刊	(见表 3—4)	
傅无闷		南洋周刊	1938.7.11—约 1 年半	
铁亢*	文艺长城		1939.4.2—1939年底	在上海印刷与出版

(续表)

南来作者	所编期刊		编刊日期	备 注
	文艺性	综合性		
洪丝丝		现代周刊	1939—1942年初	
普洛	椰风		1941年	
李树梧		大华周报	1941.1.13—1941.10.15	与李词侗、 林英强合编。
林英强		大华周报	(同上)	与李树梧、 李词侗合编
李词侗		大华周报	(同上)	与李树梧、 林英强合编
		新生月刊	不详	
杨骚		民潮半月刊	1941.8.10—1942.1	
9人	*1人	2份	6份	

注:表3—7加“*”的期刊编者与表3—6的副刊编者同。

二、主要南来作者的编务活动

在编务活动方面较为活跃的南来作者有李润湖、吴天、铁亢、流浪、张楚琨、郁达夫和王纪元。

李润湖

李润湖原籍广东,少小南来。(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四节)30年代中期在文坛上崛起。先后在新国民日报主编过《新路》、《新天地》、《新光》和《新园地》这几个著名副刊。他又是个诗人、作家兼政论家,曾为战前的文艺界注入新生命。⁽⁵⁷⁾

李润湖主编的第一份文艺副刊是《新国民日报》的《新路》。该刊发刊于1936年9月19日,日刊,至1937年10月13日停刊。主要作者有李润湖、萌芽、姚寄鸿、巨星、沈侠魂、慕珍、白荻、吴文翔、

许侠夫、王汇东、辜斧夫、李绍蒙等。

李润湖主持下的《新路》，比较注重理论和创作，因此该刊呈现以下特色：(1)注重对于当时世界文化新动向和一般新书刊的介绍；(2)指导有关文学创作的方法；(3)谈论马华文艺运动问题以及纠正一些错误论调。李润湖选稿较为严格，所以该刊发表的作品大都内容坚实，颇为可读。因此《新路》成为当时马华文坛上极有生气的副刊。⁶

李润湖在主编《新路》的同时，也主编《新国民日报》另一副刊《新天地》。该刊创刊于1936年9月19日，属综合性副刊，又多用剪稿，文艺气息不浓。

《新路》因文字问题停刊后，《新国民日报》推出《新光》代替，于1937年10月15日出刊，仍由李润湖负责编务。

李润湖编辑下的《新光》，内容仍如《新路》那般坚实，作者人数也有所增加，活跃的有：李润湖、张曙生、姚寄鸿、王汇东、白荻、陈子遗、以今、绍蒙、李鸿机、啸平、吴谦裕、黄石、力予、克鲁、绍汉、黎青、林声、东去、炮灰、文翔、村人、钟斯末、呢喃、黄慎之、尼嘉、踵武、义平、华光、蔡厚道、白天等。该刊也容纳多种体裁的文艺作品，有杂文、散文、诗歌、文艺理论等，还有少数的剧本。

《新光》也和《新路》一样由于文字祸而于1938年4月15日停刊。《新国民日报》于同年4月19日推出《新园地》取代《新光》。1939年4月《新国民日报》并入《南洋商报》，《新园地》于此时由李润湖编辑，直到同年9月底李润湖调职而告停刊。

李润湖接编《新园地》后，增添了一批紧密配合现实、具有时代内容的作品，也刊出一些文艺性的政论、时评、漫画等等。较活跃的撰稿人有李迪、露西、子遗、末流、漂青、静海、墨尼、白蒙、炮灰等，使这份刊物的内容显得尤为丰富精进，几乎完全恢复了前期的《新路》和《新光》的光彩。在当时已有些冷落萧条的马华文坛上，《新园地》表现很不俗。

吴天

吴天是 30 年代中后期新马文学界的优秀编者。(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四节)他原是中国留学日本的学生,1936 年从日本南来新马,于 1937 年 11 月接编星中日报的文艺副刊《星火》。《星火》的前任编辑为刘潜迅。

吴天负责该刊编务后,于次年 1 月 9 日发表《一九三八年的〈星火〉》⁽⁵⁸⁾阐述编刊目的,即将《星火》作为救亡的武器,为此拟定了几个编刊原则:(一)直接或间接地援助抗战;(二)配合每一阶段的抗战形势;(三)探讨并建立正确的救亡理论;(四)提倡各种文化运动;(五)提高副刊地位;(六)大众化。并根据这些原则配备《星火》的内容为:短评、专论、讲座、介绍与批评、短篇小说、抗战故事、报告文学、剧本、诗歌、杂文、文化动态、写作研究室、漫画、木刻、连环画、文化往来等等。主要作者有流冰、金丁、张一倩、炼晶、木冷、克锋、丹枫等。

吴天还经常召集《星火》写作人举行座谈会,讨论副刊的编务以及文学问题,其中最热烈的一次是 1938 年 2 月 26 日假天一景酒楼天台的座谈会。该会议题为“怎样建立马华写作人共同阵线”。座谈会记录后来在《星火》连载。

吴天主持《星火》时期,该刊的盛况达到了顶点,不但作者大量增加,文章也更深刻有力,在文学理论批评方面居于更重要的地位,⁽⁵⁹⁾成为当时深受读者喜爱的文艺副刊。遗憾的是吴天于 1938 年 3 月 5 日后离职北归,《星火》不久也就告停刊了。

应附带提到的是,吴天在新马期间,还曾于 1937 年下半年主编过《星洲日报》的《现代戏剧》。这是一份关于戏剧的文艺副刊。

铁亢

与《星火》同为当时最受欢迎的文艺副刊,还有铁亢主持的总

汇新报的《世纪风》。

铁亢原籍广东潮阳, (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四节) 1936 年杪南来, 开始发表一系列散文、随笔和报告文学。1937 年 8 月 8 日至 1938 年底, 接编《星洲日报》的副刊《文艺周刊》, 在该刊撰写了不少的论文和小说。铁亢十分重视文学理论, 因此在编辑期间刊登了许多文学理论作品, 其中尤其强调文学通俗化运动。铁亢也十分重视作品的艺术性, 强调作品要有圆熟的技巧。⁽⁶⁰⁾

铁亢在《文艺》副刊的编务至 1939 年 1 月 8 日停止, 后由从中国南来的郁达夫接编。

真正能够突显铁亢编辑成就的, 是他在总汇新报主持《世纪风》的卓越表现。

《世纪风》创刊于 1938 年 12 月 17 日, 初期编者姓名不详。铁亢于 1939 年 5 月 16 日接编该刊, 至同年 11 月 15 日离职, 共担任 6 个月的编务。

铁亢在接编《世纪风》时, 曾为文宣布他的编刊要求:

为使马来亚一切的社会活动得到迅速的反映, 因此需要一些报告文学与速写, 为报导国内外, 特别是马来亚的文化动向, 因此需要各种文化通讯及零星情报。集体讨论在可能范围将以书面讨论的方式举行。范围内包括社会上的重大事件, 以及学术上的, 特别是文艺上的未决问题。创作, 剧本, 各部门的短论, 木刻画或木刻连环画等都竭诚征求。此外, 可能时将出版各种专页。⁽⁶¹⁾

铁亢在该文还表示要决意发掘新人, 欢迎习作者投稿。

铁亢编辑《世纪风》时, 该刊作品质量显著提高, 文体也更多样化, 而且对当时的各种写作问题如“剧本创作诸问题”、“报告文学写作问题”等展开专题讨论, 吸引不少作者参加。

铁亢也提倡文艺通讯运动, 这是马华新文学繁盛时期最大规

模的文艺运动之一,其影响与活动几乎遍及全马各地,与《狮声》方面所倡导的南洋文学通俗化运动先后辉映。⁽⁶²⁾

铁亢编辑时期的《世纪风》,基本作者有:铁抗、郁达夫、马蒙、上官豸、李湘、末流、郭后觉、思明、老蕾、谛克、萧克、蓝田玉、白光、李迪、夏枫、露西、定华、鼎新、吴浩祥、林豪、吴苓、一息、静海、蓬青、白蒙、蓝特、罗颖、墨尼、克鲁、文之流等。

总之,《世纪风》由铁亢接编后,内容和形式各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成为1939年下半年最热闹的一个文艺园地,在马华新文艺行将退潮期间激射出一片绚烂的光华,其地位超越《晨星》、《狮声》,以至《新园地》各副刊。⁽⁶³⁾

除在《世纪风》出色的编辑活动外,铁亢等人于1939年4月2日创刊《文艺长城》。这是战前新马最具代表性的纯文艺杂志,主要由铁亢负责,共刊出6期,至同年底停刊。

铁亢在《〈文艺长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中提到发刊《文艺长城》的缘起和动机:

提起这刊物的发起筹备,要追述到1938年5月以前,当时星洲的几个朋友感到文艺工作者自身缺少密切的联络,缺少与上海各地文艺界沟通,以及充实自己,表现自己,正确反映自己所居社会,推进南洋文艺运动的独立言论机关,于是发起筹印一种足以肩负上述使命的同人刊物。⁽⁶⁴⁾

《文艺长城》在筹印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如三易印刷地点,负责人大半因故离去等。当时在上海的吴天对《文艺长城》的编印、集稿及销售等也付出不少心血。在铁亢的艰苦支撑下,《文艺长城》筹备近一年才得以问世。

《文艺长城》的主要作者除了新马文坛的铁抗、张晓光、郭安、叶尼、流冰、渔光、叶倾风、李蕴郎、胡桃、王绍清、鼎新和乳婴等人

外,尚有上海文艺作者巴金、巴人、锡金、许幸之等。

《文艺长城》刊出后,引起沪港各地文艺界的特别注意。该刊在上海的通讯处曾收到不少勉励与歌颂的函件,本地不少作者也为文推介。姚寄鸿在《〈文艺长城〉创刊号》中云:

《文艺长城》是探讨华侨文艺唯一的读物,它不但培养南洋文艺作家,使他们致力于抗战后的华侨文艺,而且是沟通祖国与南洋的一座文艺长城,它的值得我们重视是不言而知了。⁽⁶⁵⁾

《文艺长城》在当时受新马文艺界重视的程度以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由此可想而知。⁽⁶⁶⁾

流浪

流浪是湖南籍的南来作者,1935年南渡星洲。(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四节)1937年7月1日,他从前任编者戴隐郎手中接编《南洋商报》的副刊《狮声》。在主持《狮声》的编务时,曾提出两个编辑方针:一是着重于文字的通俗化。流浪认为南洋华侨的文化水准特别低落,因之“通俗化更值得提倡”。二是把《狮声》有关文学的内容方面编成综合性质,包括登载哲学、社会科学、速写、诗歌、杂感、短篇小说、书评、传记等。而其中的速写、诗歌、杂感、小说等文艺文字,尤贵其富有或相当具有“时代”与“地方”色彩。⁽⁶⁷⁾

流浪在编辑一段时间后,进一步提出具体的编辑目标:(1)注重当前的现实,而阐发及鼓励抗战救亡,维护世界和平的文字,更为欢迎。(2)不登风月的作品,不登漫骂的文字。(3)尽可能维持编者、作者与读者的联系……尽可能登载初学写作者的作品,以期养成读者大众对写作感到兴趣。⁽⁶⁸⁾

虽然流浪编辑《狮声》仅有一个半月,至同年8月15日即离任,但他上述的编刊方针对继任者张楚琨有不小的影响。张楚琨后

来的一些编辑方针,是与流浪一脉相承的。

流浪在编辑《狮声》的一个半月期间,共发表作品 14 篇,其中杂文 7 篇,散文 3 篇,论文 2 篇,诗歌一首。流浪选登的作品较注重南洋的社会现实以及强调抗战救亡的重要性。

流浪在主持《狮声》编务时,也于 1937 年 7 月初和 7 月 26 日分别编辑《南洋商报》的另两份文艺副刊《南洋文艺》和《今日文学》。前者编至 1938 年 7 月底,后者编至 1938 年 2 月 6 日。这两份副刊同属《狮声》的姊妹刊物,其作者基本与《狮声》同。流浪离任时,两份副刊也交张楚琨编辑。

张楚琨

张楚琨(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四节)是福建泉州人,20 年代中期随兄长张楚鸣南来。至 20 年代末期已活跃于新马文坛,在《叻报》的《椰林》副刊上发表了不少散文、论文、小说、诗歌和翻译散文等。1930 年 11 月,曾以郁如为笔名协助陈炼青编辑《椰林》,后回中国,至 1937 年再来,从《狮声》编者流浪手中接过该刊编务。

张楚琨编辑期间的《狮声》,是这副刊最光辉的一段时期。当时正逢中国抗日时期,海外华人抗战救亡的情绪十分高涨,张楚琨怀着高度的反侵略与抗战救亡的精神,充分发挥了编者的主动性,尽量使这份副刊在形式上多样化,内容上体现时代精神,使《狮声》达到空前的高峰。

在内容方面,张楚琨呼吁应以抗战救亡为主题,所有作品不要忘记国防意味;在形式方面,注重刊物的“综合化”与作品的“通俗化”。^{〔69〕}他常常推出一些专号或特辑,如“华侨团结救亡问题专号”、“纪念九一八周年专页”、“南洋的通俗文选专号”、“歌咏戏剧运动特辑”等等。同时,也很重视与读者作者的联系,并特辟了“我们的通讯”一栏,以便作者和读者可以讨论。

张楚琨编辑时期的《狮声》,获得了许多写作者的支持。较常给

该刊写稿的作者有：王修慧、乳婴、老蕾、紫焰、流浪、曾见、墨黑、静海、祁岂理、流冰、东方丙丁、刘思、文之流、莹姿、张殊明、李金泉、金丁、啸平、高云览、谛克、南庐主人、蕴郎、拉因、朱绪、陈仲达、陈子遗、谌松奇、微沫、左颂文、寒波、纪芬、诸葛明、梨青、求辉、耘之、唐牧、啸鸥、黄焰等。张楚琨也以柯游、章南石、楚琨等笔名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杂感和翻译作品。

关于张楚琨编辑下的《狮声》，杨松年博士评价道：

张楚琨编辑的《狮声》，更在流浪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除了大量提倡综合化、通俗化的作品之外，更建立了写作者的联络网，吸取各方面的写作者，加强编者与写作人的联系，使到《狮声》气势磅礴壮观，成为当时新马文坛的擎柱。⁽⁷⁰⁾

张楚琨在主编《南洋商报》的《狮声》时，也曾于1937年7月后和1938年2月7日，从流浪手中接过《狮声》的姐妹刊物《南洋文艺》和《今日文学》的编务。《南洋文艺》偏重刊登文艺创作，特别是短篇小说；《今日文学》则专载理论批评文章。这两份刊物在1938年杪至1939年初之间停刊。

郁达夫

郁达夫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四节）他于30年代末期偕眷南来，从而开始了他在新马文坛的文学活动，并对当地文艺界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郁达夫于1938年12月28日抵新后，在新加坡居住的三年零两个月期间，主编了《星洲日报》的《晨星》、《繁星》、《文艺》和《教育》四个副刊，另外还兼编槟城《新槟日报》的《文艺》双周刊，《星洲十年》，《星洲日报》半月刊的《星洲文艺》栏，以及英国情报部出版的《华侨周报》。

郁达夫是在1939年1月9日接编《晨星》的。《晨星》创刊于1932年。郁达夫接编之前,该刊已是马华文化界优秀的副刊之一。郁氏主持编务之后,表示要将这块园地办得“日臻完善”,“日渐近于理想”,使之像稀少晨星一样可贵而可珍,成为“光明的先驱”,“白昼的主宰”,那将是“祖国之光”,“人类之福”。他还表示要在这块园地“培植出许多可以照耀南天,照耀全国,照耀全世界的大作家出来。”⁽⁷¹⁾

郁达夫编辑期间的《晨星》,作品的内容基本上符合编者“文艺应具时代性”的要求。诗歌所抒发的抗战情绪、小说从侧面揭露反面人物、充满教育意义的散文及报导国际形势发展的译文,都围绕抗日救亡的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将现实反映在作品里,去教育大众,刺激大众。⁽⁷²⁾为了紧密配合当时的抗战形势,郁达夫在《晨星》不时推出各种特辑,使内容多姿多彩,形成该刊一大特色。这些特辑有的是筹赈性质,如《新中国剧团首次筹赈献演特刊》;也有纪念性质,如《鲁迅逝世三周年纪念专号》,《七七抗战四周周年纪念号》等。这些特辑对侨民关心国事,加强爱国意识等起了一定的影响作用。主要作者有80多位,他们是:郁达夫、老蕾、谛克、张曙生、上官豸、李蕴郎、云鹏、至诚、罗颖、清才、平澜、李迪、哈莱、林英强、刘思、姚寄鸿、陈孤芬、刘沙、辜石如、晴曦、林英屏、刘前度、淮君、欧阳健、李桂、启林、予生、白鹰、张逸灵、获音、丘幸之、白婴、郭后觉、大白、施五、艾蒙、王文漪、戴润霖、李冰人、王君实、愚王、晚江、漂青、文之流、蓝孔影、林梦影、拉因、钟达琳、冷红琳、韩梅、彭耀芬、紫军、铁髯、家清、于厚、李安东、丁之、赵迁史、金石声、黑罍、奇峰、白龟、张一倩、铁抗、亚明、朱志辉、劲言、谭文郁、仁一介、施维、叶倾凤、子午、张明慈、李词佣、祝实明、李君侠、刘丹青、符冠雄、大顿等。

为了充实副刊内容并扩大读者的见闻,郁达夫也向中国的一些作家约稿。这些中国作家有:老舍、艾芜、叶圣陶、姚雪垠、茅盾、

许地山、汪静之、柯灵、袁水柏、端木蕻良、欧阳山、黄药眠、萧红、孙铤、罗峰、葛一虹、白郎和梅林等。香港的陆丹林、楼适夷和当时旅居新加坡的名画家徐悲鸿等，也为该刊投过稿。

《星洲日报》的综合性副刊《繁星》，创刊于1929年1月15日。在郁达夫接编之前，《繁星》和《晨星》由林健安负责编务。郁达夫在1939年1月9日接编《晨星》时，也同时接编《繁星》，并编至1941年底。

郁达夫编辑时期的《繁星》，内容也繁富琐杂，有时事漫谈，史地知识，旧诗词，通俗化的消闲小说和幽默的漫画等，可谓雅俗共赏，兼收并蓄，以适应各阶层的读者。

郁达夫在《星洲日报》时，还主持该报另一副刊《文艺》。《文艺》创刊于1932年，原名《文艺周刊》，郑卓群（铁亢）1937年8月负责该刊编务时，改名为《文艺》，郁达夫于1939年1月5日从铁亢手中接编该刊，至1940年9月15日停刊，共编80期。

郁达夫接编《文艺》时，也是期望这份刊物能发生新的力量，有助国家民族的复兴成功。^{〔73〕}在该刊发表的诗歌、散文、小说等文艺作品中，不少是反映抗日的题材。郁达夫编辑的《文艺》中，共发表作品255篇，其中诗歌94首，散文82篇，论文56篇，小说15篇，以及译文8篇。作者逾百人，有郁达夫、蕴郎、清木、林英屏、林秋、拉因、白荻、刘思、叶倾凤、吴真、漂青、上官豸、林英强、金箭、哈莱、戴淮君、张一倩、张曙生、谛克、饶百迎、李葆川、温梓川、刘前度等。

郁达夫也于1940年4月7日负责编辑《星洲日报》的《教育》副刊。此外也曾负责槟城《星报》《文艺半月刊》的编务。

就郁达夫在新马期间对报刊编辑的贡献，姚梦桐在《郁达夫旅新生活与作品研究》一书中指出：

《星洲日报》是当时的大报，郁达夫主编该报的数个副刊，对推动马华文运有一定的贡献。

刊载的作品颇能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既能负起宣传抗日救亡的责任,也能符合各界读者的要求。

就因他和读者及投稿者有此密切联系,影响所及,一般作者勤于写作且持久不懈。他一手栽培的新人如:辜石如、林英屏、林英强、淮君、刘思、大白、文之流、艾蒙、漂青等,不但活跃于当日文坛,有的日后成为知名的剧作家(如艾蒙)、小说家(如文之流)和诗人(如刘思)。郁达夫对于编务是积极的,对青年写作者的栽培,功劳更不可抹煞。⁽⁷⁴⁾

王纪元

王纪元是《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的最后一任编辑。(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节)王纪元于1940年11月随胡愈之到新加坡,12月5日接编《狮声》。

王纪元编辑《狮声》伊始,就面临“稿荒”问题。于是他在开场白《今后的狮声》里提出新的编辑方针和计划:一是改变过去该刊过于严肃,过于单调的缺点,希望能有轻松、活泼、对身心有益的文字。二是实现综合化,希望刊登的文章短小精辟,行行皆有,门门皆备。三是每周出版一次,固定在星期三出版。⁽⁷⁵⁾

对王纪元的编辑声明,写作者热烈反应,不少人来信与来稿。但王纪元对稿件的思想内容有一定的要求。他很注重文学的社会价值,认为文艺的社会意识,并不是空想的、摹拟的,而是实际生活的反映。⁽⁷⁶⁾为此王纪元曾在1940年12月30日的《编后》提出设立专栏的原因:“我们打算每期每栏,都以一个问题为中心,而这个问题又是同现实迫切相关的,所以本期的专论和新书介绍,都以民主问题为中心。”所以在设立的专论里常常邀约作者进行一些现实问题的讨论。

由于王纪元的努力,《狮声》曾扩大为四分之三版,也曾改为每日出刊(除星期日外)。当时活跃在《狮声》副刊上的作者有艾蒙、上

官豸、宏铃、文之流、萧蒙、野火、陈南、耘之、金丁、白萍、高启杰、萧魂、巴人、金絮人、萧浪、丁之屏、清才等。中国的名作家如茅盾、胡风、刘白羽、夏衍等也给该刊撰稿。

第五节 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角斗时期： 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时期

战后的 1945 年至 1949 年是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角斗时期，即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时期。

从 1942 年 1 月日军侵入马来亚，至 1945 年 8 月日军宣布投降的三年零八个月里，新马文坛几乎处于冬眠状态。从事编务活动的南来作者有的纷纷避难他乡，如张楚琨、王纪元等，有的沉寂下来，如李润湖、林建安、吴广川等，有的甚至不幸蒙难，如郁达夫、铁亢、流浪等。直至 1945 年日军投降后，新马文坛才从战争的摧残中复苏过来。原有的各家华文报刊纷纷复刊，新创办的报章也不少，马华文艺园地才重新恢复生机。

但战后的新马文坛却呈现着与战前不同的面貌。定期杂志比战前增加，报章副刊数量已比战前减少。副刊虽然仍是文坛的支柱，但其地位与作用已较战前逊退。加上 1948 年英殖民地政府颁布“紧急法令”，以及 40 年代末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大陆政权，许多从事编务活动的南来作者大批北返，因此这时期的新马文坛始终未能再出现战前曾经有过的波澜壮阔的局面。

以下将论析这时期南来作者的编务活动。

一、南来作者的编刊活动概述

由于三年零八个月沦陷的影响，报章副刊的减少，以及英殖民地政府“紧急法令”的实施等等，这时期南来编者的人数仅有 12

人,他们是:林建安、西玲、洪丝丝、连啸鸥、吴广川、白路、丁家瑞、张漠青、王、胡愈之、沈兹九、杨嘉等。

南来作者所编的副刊减少到4份。文艺性副刊为《南风》、《新地》和《新风》,综合性副刊为《晨星》。下表3-8显示这时期南来作者的编刊情形:

表3-8 中国南来作者与所编副刊(1945—1949)

南来作者	所编副刊		编刊日期	所属报章	备注
	文艺性	综合性			
林建安	晨星		1945?—1947.9.13	星洲日报	
西玲	新地 新风		自1945.10.28 自1946.10.21	民生报 民生报	
洪丝丝	南风		1946.11.21—1948	南侨日报	后由连啸鸥接编
连啸鸥	南风		约1948—1950	南侨日报	后由吴广川接编
吴广川	南风		约1948—1950	南侨日报	
金枝芒	新风		不详	民生报	从西玲手中接编
6人	3份	1份			

期刊的数量则超过战前任何时期,计有10份。文艺性杂志有《赤道文阵》、《文艺》、《音乐·诗歌·戏剧》等3份,综合性杂志有《风下》、《新妇女》、《现代周刊》、《读书生活》、《天外》、《学生生活》和《爱华周报》7份。除胡愈之主编的《风下》和沈兹九主持的《新妇女》刊期较长外,其他杂志存在的时间大多不长,有的甚至只是昙花一现,如刘思主编的《赤道文阵》和杨嘉创刊的《音乐·诗歌·戏剧》月刊,前者只出一期,后者也仅出3期而已。这时期南来作者的编刊情形可从下表3-9见出:

表 3-9 中国南来作者与所编期刊(1945—1949)

南来作者	所编期刊		编刊日期	备 注
	文艺性	综合性		
胡愈之		风下	1945.12.3—1948.3	
沈兹九		新妇女	1946.3.8—1948.6.8	
刘思	赤道文阵		1946.2.15	仅出 1 期
洪丝丝 *		现代周刊	1946.5—1948	洪氏战前编过此刊,请见表 3-6
王	文艺		自 1947.2.1	
丁家瑞		读书生活	自 1947.9	与杨嘉合编 与白路、张漠青合编
		爱华周报	1948 年	
		天外	战后	
白路		天外	战后	与丁家瑞、张漠青合编
张漠青		学生生活	战后	与丁家瑞、白路合编
		天外	战后	
杨嘉	音乐·诗		1947.9.10—1947.11.10	与丁家瑞合编
	歌·戏剧			
		爱华周报	1948 年	
8 人 * 1 人	3 份	7 份		

注:加“*”的期刊编者与表 3-8 的副刊编者同。

二、主要南来作者的编务活动

战后在编务方面活跃的南来作者比战前锐减。主要南来编者有胡愈之、沈兹九和洪丝丝。以下将介绍与论析他们的编刊情形。

胡愈之

胡愈之是战后新马文坛上优秀的期刊编者。胡氏于 1940 年 12 月 1 日南来。战时与郁达夫等人避难印尼苏门答腊(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四节)。战后胡愈之回到新加坡,于 1945 年 12 月 3

日创刊综合性杂志《风下》周刊,并亲自担任主编,至1948年3月回中国。唯《风下》继续出版至1948年6月26日,共出132期。

△胡愈之创刊《风下》周刊,就是要理解“风下之国”(指从锡兰以东一直到菲律宾群岛,包括缅甸、马来亚、越南以及整个印度尼西亚民族领域),倾听风下之国的被压迫、奴役的人们的呼声,反映出他们的愿望、要求。⁽⁷⁷⁾

《风下》所登载的稿件主要分为几类:(一)《这一周》及《卷头言》;(二)《专论》;(三)《青年学习问题》;(四)《文艺》;(五)《通讯》;(六)《书刊评介》。较活跃的作者有沙平、金丁、赵、沈兹九等。其他作者有宋千金、杨嘉、丘天、丹影、丁家瑞、金枝芒、陈君平、巴人、杨骚、马宁、张楚鸣、陈残云、艾芜等。中国的名家郭沫若、楼适夷、司马文森、许广平等也在该刊发表过作品。其中主编胡愈之以“沙平”为笔名撰写每一期的《卷头言》。这些功力深厚的议论散文风格清新,多有精辟之论,深受读者的欢迎。

《风下》是综合性期刊,但该刊长130多期,文艺稿的数量是不容忽视的。

胡愈之在新加坡及印尼共居留七年余,于1948年3月离开新加坡,经香港回中国。

沈兹九

沈兹九是战后新马文坛上优秀的女编者。(生平介绍见第二章第三、四节)她除了对夫君胡愈之创办的《风下》周刊给予支持外,也于1946年3月8日创办一份综合性期刊《新妇女》杂志。

在《新妇女》创刊之前,新马文学界尚未出现过专门为妇女而设立的杂志。沈兹九在《创刊的话》⁽⁷⁸⁾中阐明了自己创办此刊的目的,就是要为战后马来亚“英勇的聪明能干的年青新妇女”开辟一块发表作品和发动妇女运动的园地:

马华妇女界,不少多才多艺的人才,可是缺少刊物,将他们的作品多多发表出来。《新妇女》既然是妇女们的园地,它将来是一个提拔女性写作的场所。希望将来在《新妇女》的周围,大家自由组织写作研究会,有的写作投到《新妇女》来。

马来亚的妇女运动,是统一战线的。《新妇女》配合这要求,它不但要和前进的姐妹们同行,同时也要走进还没有走上妇运的姐妹圈子里。

沈兹九正是以上述的编刊宗旨来编辑《新妇女》的。《新妇女》属月刊,从1946年3月8日发刊至1948年3月8月,共出28期。主要以女性读者为对象,内容涉及有关妇女的多方面问题,如妇女运动、妇女与民主、妇女与职业、妇女与法律、婚姻与家庭、妇女生理常识,等等,范围十分广泛,既有世界各国妇女在政治、社会方面的宏观介绍和展望,也有关于新马女性衣食住行的琐事絮语。

《新妇女》虽为综合性的女性杂志,仍有不少文学色彩。该刊载有小说、诗歌、散文、翻译散文、论文等,其中以散文为主。沈兹九每期都有文章发表,如《纪念三八妇女节》、《妇女之路》、《一月时事》、《女学生的出路问题》、《妇女与思想》、《妇女与神》等等。在战后百业待兴,新马妇女地位仍低于男性的社会条件下,沈兹九能创办这样一份女性杂志,为当时的新马妇女提供一块发表作品和发动妇女运动的园地,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而且《新妇女》能维持两年多,也足见沈兹九的编辑功力和该杂志受妇女读者欢迎的情形。

沈兹九于1948年3月与胡愈之相偕离新返国。

洪丝丝

本章第二节曾论析洪丝丝在30年代编辑《槟城新报》综合性副刊《槟风》的情形,由于战后洪氏在编务方面十分活跃,因此本节将着重论析洪丝丝在战后的编务活动。

洪丝丝在战后主持过《现代周刊》和《南风》的编刊工作。《现代周刊》属综合性杂志，早在战前的1939年就由洪丝丝创办，沦陷时停办，1946年5月复刊，编务始终由洪丝丝主持。约出110期，在紧急法令宣布后停刊。该刊的一个特色是经常有一篇长篇小说连载，如林岩的《风波》、高云览的《春秋劫》，内容颇引人入胜。1947年马华文学界发生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洪丝丝主编的《现代周刊》也参与这场论争。

洪丝丝在编辑《现代周刊》的同时，也应当时的南侨日报社社长胡愈之的聘请，于1946年11月21日兼编《南侨日报》的文艺副刊《南风》。洪丝丝在创刊号上发表《谈风》⁽⁷⁹⁾一文解释《南风》取名的意义，实际上也阐述了他的编刊主旨：

自然界的南风，固然常是“风调雨顺”的风，不生风波风浪，但是南侨日报的“南风”，可能是一个暴风。过去，南洋华侨的力量所造成的风，曾助孙中山先生吹倒了满清的政府，曾帮助祖国吹破了日本帝国的国旗，谁说今后的“南风”吹不到祖国？

自然界的风含着湿气，这虽然会使一些物体长霉发腐，但是南洋的文艺园地却迫切需要南风的滋润。

洪丝丝又说：

我们不敢说“南风”一定能有坚硬的风骨，高峻的风格，但是我们希望它对被压迫，被侮辱，被损害的人来，是一阵和畅的惠风，对寄生虫，对吸血鬼，对独裁者，是一阵风暴！

这显示《南风》负有双重任务：一方面它要使该刊的文艺为祖国（中国）服务；另一方面又想扶持南洋的本地文艺。同时也表明该刊的文艺作品将具有浓烈的政治色彩和强烈的战斗性。其后《南

风》确实扮演着双重的角色：一方面它是当时所谓“侨民文艺”的堡垒；另一方面又是当地文艺园地之一。在战后新马报章副刊萎缩的情况下，《南风》成为当时新马作者发表作品的一块重要园地。

作者有洪丝丝、宋千金、杨嘉、丹影、北村、海郎、铁戈、丘天、光明、马宁、白塔、丁家瑞、杜边、李铁民、林参天、刘思、玛戈、汪金丁、王任叔、吴广川、夏衍、张放、征航等。胡愈之也应洪丝丝之邀在该刊撰写一些文章。

1948年紧急法令宣布后，洪丝丝离任，《南风》由连啸鸥接编。1950《南桥日报》被封，洪丝丝也回返中国。

综上所述，从马华新文学萌芽开始，中国南来作者就大量参与报章副刊和期刊杂志的编辑活动，其编辑人数之众，所编刊物之多，是令人瞩目的。他们在开垦和建设新马华文文坛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统计前面各个时期从事编务活动的南来作者计有 77 人，所编文艺性副刊 60 份，综合性副刊 24 份，文艺性期刊 8 份，综合性期刊 22 份，共计 114 份。关于南来作者所编副刊和期刊的统计，请参见附表。

附表 中国南来作者所编副刊和期刊统计(1919—1949)

南来作者 (人数)	所编副刊			所编期刊			总计
	文艺性	综合性	合计	文艺性	综合性	合计	
1919—1924 3 人		2	2				2
1925—1933 43 人	36	13	49	1	6	7	56
1934—1936 10 人 * 5 人	2 * 4	7 * 9	9 * 13				9 *
				2	4	6	19

(续表)

南来作者 (人数)	所编副刊			所编期刊			总计
	文艺性	综合性	合计	文艺性	综合性	合计	
1937—1942	1 *	7 *	8 *		1 *	1 *	
10 人 *	17		17	2	5	7	9 *
17 人							24
1945—1949		1 *	1 *				1 *
4 人 *	3		3	3	7	10	13
10 人							
总计	3 *	15 *	18 *		1 *	1 *	19 *
78 人	60 份	24 份	84 份	8 份	22 份	30 份	114 份

注: (1)表中综合性副刊和期刊,均指文艺气息较浓的综合性副刊和期刊。

(2)表中“*”表示该编者和该刊物已在此前出现过。

注 释

- (1)铁汉《送克非》,见《益群报·自由谈》,1920年5月26日。
- (2)克非(刘克非)《本报宣言》,见《益群报》,1920年5月5日,6日,7日,8日,11日,12日。
- (3)痴鸪(张叔耐)《例言》,见《新国民日报》,1919年10月1日至6日。
- (4)《编辑部启事》,见《益群报》,1920年5月14日。
- (5)同(3)。
- (6)同(3)。
- (7)杨松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马华文文坛》,见《五四文学与文化变迁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学生书局,1990),页238~239。
- (8)杨松年《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析论(甲集)》(新加坡:同安会馆,1986),页24。
- (9)杨松年认为《南风》第9期应为1925年11月9日,作1925年11月12日当是排印的错误。见注(8),页21~22。
- (10)同注(8),页24~25。

- (11)同注(8),页 21。
- (12)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十)·出版史料》(新加坡:世界书局,1972),页 5。
- (13)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上卷)修订本(新加坡:世界书局,1975),页 90。
- (14)同注(12),页 5。
- (15)同注(12),页 5~6。
- (16)黄振彝《开场白》,见《新国民日报·荒岛》,1927年1月28日。
- (17)撕狮《漫浪南洋一年的荒岛》,见《新国民日报·荒岛》,1928年2月2日。
- (18)杨松年、周维介《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1927—1930)》(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0),页 114。
- (19)何采菽《我对于荒岛的建设和改造》,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7年2月16日。
- (20)本刊《恭祝新禧》,见《南洋商报·洪荒》,1927年12月30日。
- (21)蓉女(丁琅)《我们的前途》,见《南洋商报·洪荒》,1927年12月19日。
- (22)同注(13),页 108。
- (23)同注(18),页 36。
- (24)同注(18),页 53。
- (25)同注(13),页 147。
- (26)编后话《尾巴的尾巴》,见《益群日报·枯岛》,1928年8月23日。
- (27)同注(8),页 99。
- (28)同注(8),页 128~129。
- (29)同注(13),页 145~146。
- (30)半阕《遁往椰林间去》,见《叻报·椰林》,1928年12月20日。
- (31)同注(13),页 135。
- (32)陈旧燕《〈南洋的文艺〉发刊的说明》,见《南洋时报·南洋的文艺》,1929年12月9日。
- (33)同注(13),页 124。
- (34)记者(陈树南)《〈新航路〉发刊词》,见《民国日报·新航路》,1930年1月1日。
- (35)同注(13),页 162。

- (36) 姍姍《〈南国的雨声〉前奏曲》，见《光华日报·南国的雨声》，1930年8月25日。
- (37) 同注(12)，页11。
- (38) 马《新马文坛人物扫描(1825—1990)》(柔佛：书辉出版社，1991)，页127。
- (39) 同注(8)，页135。
- (40) 同注(8)，页147。
- (41) 同注(8)，页138。
- (42) 同注(8)，页172。
- (43) 方修认为曾华丁的编务似乎至1934年12月29日第32期即已停止，其后十数期由别人接编。见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中卷(新加坡：世界书局，1969)，页28。
- (44) 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中卷，同上注，页30。
- (45) 同注(44)，页55。
- (46) 丝丝《一九三五年的〈槟风〉》，见《光华日报·槟风》，1935年1月5日。
- (47) 杨松年《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新加坡：同安会馆，1990)，页3。
- (48) 半鰈(李铁民)《初吼》，见《南洋商报·狮声》，1933年1月21日。
- (49) 同注(47)，页3。
- (50) 半鰈(李铁民)《晓风与狮声的一个分野》，见《南洋商报·狮声》，1933年1月21日。
- (51) 杨松年《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新加坡：同安会馆，1988)，页194。
- (52) 紫凤(李紫凤)《启》，见《南洋商报·狮声》，1935年1月31日。
- (53) 编者《编后》，见《南洋商报·狮声》，1936年4月14日。
- (54) 编者《发刊词》，见《椰风月刊》，1935年10月5日。
- (55) 同注(44)，页46。
- (56) 同注(12)，页18。
- (57) 同注(38)，页188。
- (58) 叶尼《一九三八年的〈星火〉》，见《星中日报·星火》，1938年1月8日。
- (59) 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下卷(新加坡：世界书局，1965)，页41。
- (60) 铁亢《致亲爱的作者》，见《星洲日报·文艺》，1937年8月8日。

- (61)铁亢《今后的世纪风》，见《总汇新报·世纪风》，1939年5月16日。
- (62)同注(59)，页50。
- (63)同注(59)，页48。
- (64)铁亢《〈文艺长城〉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见《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8月10日。
- (65)寄鸿《〈文艺长城〉创刊号》，见《光华日报·文艺》，1939年4月30日。
- (66)林锦《铁抗的文学理论及其对新马文坛的推动》，见《亚洲文化》第9期（新加坡：亚洲学会，1987），页202。
- (67)流浪（刘道南）《狮声月终例话》，见《南洋商报·狮声》，1937年7月31日。
- (68)同(67)。
- (69)张楚琨《开场例话》，见《南洋商报·狮声》，1937年8月16日。
- (70)同(47)，页134。
- (71)郁达夫《晨星的今后》，见《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1月9日。
- (72)姚梦桐《郁达夫旅新生活与作品研究》（新加坡：新社，1987），页94。
- (73)郁达夫《接编文艺》，见《星洲日报·文艺》，1939年1月15日。
- (74)同注(72)，页224。
- (75)纪元（王纪元）《今后的狮声》，见《南洋商报·狮声》，1940年2月5日。
- (76)纪元（王纪元）《七日读书稿记》，见《南洋商报·狮声》，1940年12月11日至12日。
- (77)沙平（胡愈之）《风下释名》，见《风下》创刊号，1945年12月31日。
- (78)沈兹九《创刊的话》，见《新妇女》，1946年3月8日。
- (79)丝丝（洪丝丝）《谈风》，见《南侨日报·南风》，1946年11月21日。

第四章

中国南来作者的文学主张

从 1919 年到 1949 年,新马华文文学文艺理论从摸索、探讨到丰富发展,以致形成各种文艺潮流和文艺运动,都与南来作者密切相关。无论是早期对文学社会功能与美学功能的重视,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两大文艺潮流(南洋色彩文学与新兴文学)的形成,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时期倡导的马来亚地方性文学观念,以及战前五年抗战文学理论的探讨,文艺大众化与通俗化运动的提倡,文艺通讯运动的热烈开展,或是战后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重大论争,南来作者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他们在新马华文文学史上这些重大文艺运动或文艺潮流中,或是首倡者,或是领导者,或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说,没有南来作者的倡导与推动,新马华文文学就不可能有 1949 年之前丰富多采的文艺理论和波澜壮阔的文艺运动。因此探讨与论析南来作者在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文学主张,对我们了解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文艺理论及文艺运动具有重要意义。

此外,南来作者对一些文学基本原理,如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

理论也进行探讨和论析,对新马华文文学的理论建设发挥了作用。

本章分为六节。前面五节论析南来作者在各个时期的文学主张,第六节论析南来作者对文学基本原理——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理论的看法。

第一节 侨民意识浓厚时期

1919年到1924年是侨民意识浓厚时期,也是马华新文学草创时期。由于这时期新马华文文学理论尚处于探讨与摸索阶段,加之能够确认南来身份的作者仅有张叔耐、林独步、刘克非、李铁民、吴仲青、潘醒农、邱菽园等人,因此南来作者探讨与论析文艺理论的篇章并不多,只有张叔耐和林独步对文艺理论较有涉猎。他们的文学主张主要秉承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理论,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外国文艺理论的传播,他们也吸收其中有关文学美感功能的理论,对文学的美感功能很重视。

这时期南来作者的文学主张主要表现以下两方面:

一、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

南来作者在新马时是侨民身份,面对政治腐败、国势垂危的中国,他们怀抱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希望以文艺作为拯救危亡祖国的工具,因此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十分重视。

他们深切认识报章在改良社会、提倡新文化、灌输侨民爱国思想方面的重大作用。张叔耐在1919年10月主持《新国民日报》时,在该报《例言》^{〔1〕}中阐明办报的“大纲”包含:一、“促进共和国民的程途,发挥平民政治的意义,要使得我们侨界同胞,人人趋于进化方向”;二、“改良社会,鼓吹教育,提倡实业,用浅近的文法,纯正的意思,诱发吾们侨胞,使得人人脑筋里印着极大的爱情,这爱情

……便是中华民国四个字”。刘克非在1920年接编《益群报》伊始，也在《本报宣言》⁽²⁾宣称《益群报》的办报“目的”为“改革前社会之旧文化，提倡将来之新文化”。

他们重视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希望以浅近的白话文学作品唤起人数众多的“下等社会”的爱国心。张叔耐在《例言》中针对《新国民杂志》刊登文学作品的社会功能说：

至于这些诗词小品，小说谐文，都不过用于补助余兴而已，但也不是胡乱拉着的。……虽则嬉笑寓言，却也含着正经道理，便是谆于东方，滑稽诙谐的意思。一则普遍心理，庄言逆耳，科诨动听……总之报纸是开通风气的东西，自要使得人人能看，人人能懂才好……眼前我们报纸上应当讲，是极要紧极浅显的话头，因为国家已在实在危险的地位了，所以要讲爱国，将这两个字来唤起民心，故对下等社会，比对上等社会更为注意，因此这些滑稽科诨，浅显的说话，更少不来。⁽³⁾

由此可见，早期南来作者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希望以此唤起新马华人的爱国心，并达到改良社会、鼓吹教育、提高民智、促进时代进步的社会功效。

二、重视文学的美感功能

由于五四时期外国文艺理论的大量传播，南来作者在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时，并未一味陷入纯功利的文学观中。他们对文学的美感功能也相当重视。早期杰出的南来作者林独步在《论艺术与道德之关系并所望于评剧家和编剧家》⁽⁴⁾、《新文学概论》⁽⁵⁾、《自然美与人工美》⁽⁶⁾等论文中对文学的美感功能进行深入论析。林氏认为艺术的任务并非直接的“教训”与极端的“实利”，否则将失去文艺之意义：

要知道“教训”是文艺间接的事，若直接的教训，是道学家、宗教家的任务，这就是艺术，和宗教道德各不同点中之一不同点。

因为若是极端视实利之有无，不论文艺之高下，而专讲道德，求利用，就象上头所述，成为讲道德、说仁义的无趣味训言了。⁽⁷⁾

他认为文学可以给人超乎现实功利的美感：

文学之目的：是在给人们于实生活的幸福以外，更贡献一种文化的，高尚悠远情趣，享受“真善美”融化的精神快乐美感幸福，把人生美化！⁽⁸⁾

因此他认为文艺是“快乐”与“利用”的统一，即社会功能和美感功能的统一，而其依归则在“美”之一字：

文艺要同时具有利用和快乐两要素，并且不是象水和油同一器，而不能调和的，是要化合为一的，不是混合散漫的，始可为有价值的艺术品。文艺是一种快乐的东西，同时含有一种和人生有关系的利用，不像别种游戏的东西，为一种利用的东西，而同时具有一种爱而莫释的美感，这就是所谓“美”，美是文艺的统一目的。⁽⁹⁾

林独步认为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在语言方面具有独特的美感功能，可以运用文字的描绘，从声觉、视觉、味觉和感觉等方面补足绘画所不能尽的事物，他说：

画家只能画色，不能写声，只能画静的状态，不能写动的，连续的，时间事物，或事物的无形活动。要补画图所不能尽的事物，就是

要用文字之艺术,美文——文艺家、诗人的文词来表现之。好比图画的_山,虽然有色,可是图画的水,是无声,其时若得了文字的艺术_家,用美文的文艺说:“流水潺潺”,就成了有声之水了。又画中的虫_鸟是无声,若用“虫声唧唧”,“嘤嘤鸟鸣”,就有声了。其他如画中所不能尽的“风雨潇潇”、“花香扑鼻”……亦是这个理。⁽¹⁰⁾

此外,林独步也涉及有关文学情感特质的论析。他指出“文学以感情为最重要内容”,“感情为文学之特质”,⁽¹¹⁾但并非所有的感情都可以成为文学的内容,只有“美的艺术的感情”才是文学内容的感情。⁽¹²⁾

由上可知,早期南来作者从马华新文学萌芽开始,就认识到文学具有社会功能与美学功能,是这二者的统一。由于中国文学中爱国主义传统与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深刻影响,南来作者更孜孜于文学的社会功能。他们对国家、民族及社会现实的关怀,使其后来对文学社会功能的重视,远远超过对美学功能的重视,这是时代使然的局限。

第二节 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

1925年到1933年是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由于中国作者的大量南来,文艺刊物的蓬勃出版,文学创作的百花齐放,这时期成为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第一个创作高峰期。文艺理论方面也有新的发展。在南来作者努力倡导与积极推动下,新马文坛形成两大文艺潮流,即南洋色彩文学的提倡与新兴文学的倡导。这两大文艺潮流对当时文学创作产生巨大影响,由此出现大批表现南洋色彩和反映新兴文学意识的作品。其后这两大文艺潮流互相交融,催生

出一些具有本地色彩又有反抗意识的佳作。〉

一、南洋色彩文学的提倡

(1) 南洋色彩文学提倡的理论基础

马华新文学从 1919 年开始萌芽,发展到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终于产生提倡南洋色彩的文艺运动,是有深刻理论基础的。它主要源于南来作者对新马土地感情的日益深厚,以及南来作者对文艺与社会环境相互关系的深刻认识。

在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南来作者侨民意识十分浓厚,他们最为关心的是宗邦祖国,创办的报刊大多介绍和反映与中国有关的事物,办刊的宗旨是以“爱国”二字来“唤醒民心”。⁽¹³⁾然而,1925 年以后,从发表的作品,我们看到一种迹象,即文人越来越关心南洋的问题,“南洋”的字眼一再出现在他们的著作中。⁽¹⁴⁾这主要因为南来作者在新马这块土地居住日久,对南洋的感情也与日俱增,他们开始关心起本地社会,想对南洋社会有所回报。《叻报》副刊《星光》的编者谭云山就表达南来作者的这种思想变化。他说:

我们几个小小的人物,因得好奇心的驱使,想看看南洋的所谓“黄金世界”,于是离开我们的故乡,跑一万多里路,来到这里。……我们暂时的已是“居于斯”、“立于斯”、“衣食于斯”了,我们就不能不尽点小小的暂时的责任,对于“斯”不能不有点暂时的小小的贡献,也可说是报酬。⁽¹⁵⁾

对这些南来作者而言,对南洋社会的贡献与报酬,莫过于创办文艺刊物,用文学语言来吐露他们这颗诚敬的“赤子之心”。《椰林》的编者陈炼青在《南洋的文艺批评》里也坦露他对南洋的深厚感情,他说:

本文完全站在南洋的地位以论,里头所要讲的,都是以南洋为中心。作者自幼就来南洋,对于南洋,常常觉得它可爱,实际上它已经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在文艺上,我总喜欢谈它,无论说它的好与坏;中国的呢,我却不大高兴。我们处在南洋,应该多谈南洋的事,这也许是我的偏见。⁽¹⁶⁾

这种对南洋日益深厚的感情,使他们在从事文学创作和活动时,自觉地将文学视角从中国转移到南洋社会,愿意甚至更为喜欢描写与南洋有关的事物,由此产生新马华文文学应该具有南洋色彩的文学主张。

另一方面,一部分南来作者认识到文学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地理环境等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南洋这个独特的社会条件和地理环境下,新马华文文学自然应该呈现独特的面貌。陈炼青在《南洋的文艺批评》里提出:

我们南洋这个地域,自有它的特殊的位置,兼之华侨南来拓殖,已经有历过数世的悠远的历史,与马来民族杂处而居,平日呼吸着马来文化(谁敢否认马来没有文化——文化只有高下之分,无有无之别)的气息,加以处在热带下的生活,情性之潜移默化,自和中国的有些差异,文艺原是表现人生和创造人生,受其影响,当然不言可喻。所以,南洋因环境的特殊,有另辟新途径,建树南洋文学的必要。⁽¹⁷⁾

《枯岛》的编者许杰 1928 年才到马来亚,但很快就了解到在新马提倡南洋色彩文艺的重要性,⁽¹⁸⁾他认为文学要有地方色彩,南洋的历史、风俗、人情、风景等具有独特性,作者不要何如穷搜远处,是俯拾即是的东西,譬如土人底情形,土人底恋爱、情歌、生活等等,中国人在这里的生活情形等等,各色人在这里的措施影响等

等,都是绝好的文学题材,他说:

文学是要有地方色彩,譬如我们一说到南洋,便常有椰林高树旷野、草屋、牛车等等现在我们的脑际。如果作者能够把这种地方色彩捉住,表现在文艺里,那便是绝好的文艺了。⁽¹⁹⁾

这表明南来作者充分认识到新马地区与中国在自然环境和社会形态上的差异,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南来作者由此认识到新马华文文学应该另辟新途径,建立具有南洋色彩的新马华文文学。

(2) 南洋色彩文学的提倡及其内容

早在1925年《叻报》文艺副刊《星光》创刊之初,南来作者谭云山及几位同人邹子孟、段南奎等,在《这是什么》⁽²⁰⁾、《本刊今后的态度》⁽²¹⁾和《再向读者说几句》⁽²²⁾等文中抨击当时腐朽麻木、病态的南洋社会,以及南洋的思想界和文艺界,表示要用文学的力量改造南洋的一切,驱除黑暗,创造光明。⁽²³⁾

随着《星光》同人南洋色彩文学主张的萌芽,新国民日报《荒岛》的南来编者黄振彝于1927年正式高举提倡南洋色彩文学的大旗。《荒岛》创刊于1927年1月28日。主编黄振彝在筹办《荒岛》时,明确表示“打算去把南洋的色彩,放入文艺里去”。⁽²⁴⁾在发刊过程中,黄振彝和其他编者自始至终不懈地鼓吹文艺本地化,使这份副刊成为马华文艺史上首先有意识地提倡具有南洋色彩的文艺副刊。⁽²⁵⁾其后,南来作者曾圣提(曾曼尼)在创办《文艺周刊》时,进一步提出该刊志愿是想在这万里炎阳的热国里寻找一些土产土制的粮料,“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²⁶⁾

不过,在理论方面建立一个较完整系统的,还是《叻报》副刊《椰林》的作者群。⁽²⁷⁾南来作者陈炼青在1929年中正式接编《椰林》副刊之后,在《编者第二次的献词》中表露他“憧憬于创造一种南洋文化”,⁽²⁸⁾随后发表一系列提倡南洋色彩的论文,如《文艺与

地方色彩》⁽²⁹⁾、《南洋的文艺批评》⁽³⁰⁾、《文艺批评在南洋社会的需要》⁽³¹⁾等,把南洋色彩的范围扩大到学术文化各方面。

南洋色彩的文学主张由萌芽至提倡,逐渐形成文学运动,并产生巨大的影响。一些南来作者表示文艺作品必然要受环境的影响,他们所编刊物会以南洋色彩的面容来呈现给读者。《枯岛》的编者许杰在编后话《尾巴的尾巴》中表示,因为《枯岛》的产地是在南洋,所以该刊负有创作、栽培有南洋色彩的文艺的使命。⁽³²⁾《南洋的文艺》的编者旧燕(陈天放)指出,《南洋的文艺》的取名是为了说明该刊既产生在南洋,当然会穿起南岛的衣装,以南岛的面影,来与人们相见。⁽³³⁾《南国的雨声》的主编林姗姗同样表示自己曾有过建设南洋文学的意见。他认为在南洋方面表露南洋的土风,地方色彩,本来就在文艺创作的条律内。⁽³⁴⁾

南来作者提倡的南洋色彩,主要包括对南洋自然景物的描写与社会生活的反映。

陈炼青在提倡南洋的地方色彩时,对景物描写十分重视。他在《文艺与地方色彩》指出南洋的作家不能离开现实的生活,而去对一些生平不曾鉴赏过的东西做不忠实的描写,他说:

现在暂把文学是什么这些大问题搁在一边,而来谈谈关于景物方面的描写吧。

谁都承认文艺断不能超出时间与空间的限制,及作品中关于景物的点缀一端,就绝对不容作家随便的。……成功的作家,无论诗歌小说抑或散文,里头所取的景物,总就作者日常所接触者写出。……如司蒂文生,因尝往来南洋养病,以故他中年的作品,也充满了很浓厚的南洋的风味。⁽³⁵⁾

他批评那些“溺在椰丛下”,却不曾改掉“写着桂花,雪片,杨柳等东西”的习惯的作家。他认为南洋的景物并不见得比中国的不好看,

用自己的眼光看起来也未必够不上赏鉴，他用充满喜爱的口吻赞美南洋美丽的景物道：

这里的本地风光，倒也不见得这样的难堪。你看，苍翠的椰林，浓密的树胶，茂盛的芭蕉，耸立的老树，实在觉得可爱；兼之那富于雨量的气候，“一雨便成秋”的热带生活，似乎不无一点诗意；即如落日斜晖，我们在海边眺望，大自然的壮丽奇伟，似不能说比中国的不好看些。⁽³⁶⁾

他鼓励从中国来的作家，在这里创作时，最低限度也要激起一点灵感来抒写出一两篇具有地方色彩的作品，才不致于变成超人，弄至写些不受制于时间空间的文艺来；同时也鼓励身在南洋的写作者多开掘本地的创作宝藏，他说：

在艺园里，南洋尚有许多宝藏没开掘过，中国国内的作家，要想开掘这些新宝藏，而非亲自南来一回不可，我们的作家又怎可却弃我们的任务和机会，把摆在眼前的景物轻易放过呢。⁽³⁷⁾

陈炼青对地方色彩的重视，使他在评论一些作家的文艺作品时，也常常把地方色彩（主要是自然景物的描写）作为文学批评的一个标准，如他在提到张冲（张楚琨）的散文《飘流到狮子岛去》时，特别指出其中关于新加坡“老皇山”的水池及芽笼的景物描写一段，“地方色彩颇浓厚，读后如身历其境一般”。⁽³⁸⁾

另一方面，南来作者在重视描绘南洋自然景物时，也提倡反映南洋独特的社会风貌与现实生活。他们认为新马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形态，足以构筑富于南洋色彩的文艺铁塔。曾圣提在《〈文艺周刊〉的志愿》中提出“想在万里炎阳的热国里寻找一些土产土制的粮料”，“以血与汗铸造南洋文艺的铁塔”，⁽³⁹⁾就是希望以

具有本地特色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生活作为创作题材。曾氏在另一篇热情洋溢的散文《醒醒吧！星城的艺人》中提醒作者应抓住本地新鲜的景物和无穷的材料，深入到工厂、矿洞去追寻创作的灵感和题材，他热情地呼吁：

醒醒吧！星城的艺人！旧的世界已在烈日之下销熔了。百尺之高，可以飘挂我们的旗，万里无云的长空表示我们的坦白，大众象征我们的巩固；长绿的叶子宣告我们的新鲜的环境，供给我们无穷的材料。让我们来，一锤又一锤的，一层又一层的，筑造我们的艺术的铁塔。醒醒吧！星城的艺人，请你不要回顾，不要踌躇，不要追怀，青春领着你，时光的马已经在你的跨下，只要你鞭，它便前进了。穿过了椰子的长林，走上沥青的马路，驰进黑烟漫天的工厂，进入暗无天日的矿洞。你将看见，真理在那里徘徊。……⁽⁴⁰⁾

这些南来作者提倡的南洋色彩，大多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而是在独特的南洋热带景物下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林姗姗在《〈南国的雨声〉前奏曲》里表示：“洋楼汽车下，椰风蕉雨中，是有许多惨声，佳话，可以充实我们的材料。”⁽⁴¹⁾旧燕在《〈南洋的文艺〉发刊的说明》也表示南洋的自然景物，汽笛机声和各民族的苦难生活，都是南洋文艺的创作题材和表现主题。他说：

文艺作品，必受环境的影响，南洋青年的环境，有椰林橡树的叶影，同时也有烟突黑烟的怒愤与舟车汽笛的悲鸣，有升旗山上的清风，同时也有海旁街心的牛粪，午夜屋角飞来一片凄绝的马来民族的悲歌，白日街头陈着无数苦难的神明华胃的奴颜，这些这些，是南洋文艺的精灵。南岛的艺人！你听海涛的激荡，试问那是为谁在奏薤露之歌！你听机声的噪杂，试问那是为谁在唱新生之曲？⁽⁴²⁾

旧燕这份发刊词，其实就是一篇富于南洋色彩的写景抒情文。

(3) 南洋色彩文学的建立

南来作者认为要建立南洋色彩的文学，⁽⁴³⁾一是需要南洋文艺批评家负起“鼓动”“文艺思潮”的工作，⁽⁴²⁾二是对本地其他民族的文化兼收并蓄。

陈炼青在《文艺批评在南洋社会的需要》中提出应以文艺批评促成南洋文学的建立，他说：

南洋因环境的特殊，有另避新途径，建树南洋文学的必要；而负着鼓吹的责任，必然地需要南洋文艺批评家。南洋意识的中心在那里，怎样表现群众的思想，怎样创作才能动人，这些都需要批评家指示与鼓动，然后南洋的文艺才能由发芽而至发叶、含蕊、开花。⁽⁴⁴⁾

由于南来作者所要建立的南洋文艺是立足于本地社会，因此他们认为对本地其他种族的文化应兼容并蓄，才可能建立具有南洋色彩的文艺。陈炼青指出“要研究南洋文艺，最不可少的是了解马来文化”。⁽⁴⁵⁾大男（曾曼尼）在《南洋的文艺》⁽⁴⁶⁾中提出要建立南洋文学，宜从两方面着手：其一，采访马来人的文化；其二，描写华侨及其他人种的生活。曾圣提在主持《南洋商报》副刊《文艺周刊》编务时，发表了革尘、穗仙、毓才等翻译的马来民歌，以及桂昌创作的马来漫画，这是当时其他文艺副刊未曾有过的事。曾玉羊也致力于马来民歌与马来文化的译介工作，翻译《马来民歌选》81首，及英国作家威廉氏的《马来民间传说之研究》，认为有“无穷的价值”。⁽⁴⁷⁾南来作者建立南洋色彩文学所作的努力，由此可见一斑。

南洋色彩文学的提倡，在新马华文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它表明南来作者已开始意识到新马华文文学应该摆脱中国文学的

影响而另辟新途径,从而建立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学^[1]。由于南来作者首倡南洋色彩的文学,这一文学主张影响及当时的文艺创作,因而出现一批反映本地题材的优秀作品,如曾圣提的《生与罪》、曾华丁的《五兄弟墓》等,而且还影响到后来的文学创作与文艺理论。30年代的马来亚地方性文学观念和40年代的马华文艺独特性,都是与南洋色彩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并发扬光大,最终才形成独立发展的新马华文文学。

二、新兴文学的倡导

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由南来作者倡导推动的新兴文学,是当时另一大文艺潮流。它直接受中国创造社、太阳社作家郭沫若、蒋光慈等人提倡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影响而产生。

革命文学最早由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恽代英首先涉及而引起文艺界注意。后经郭沫若、蒋光慈等努力探求,在认识上前进了一步。1927年蒋介石发动政变,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破裂,中国革命进入由无产阶级(经过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新的历史时期。为使文学适应新的革命形势的需要,创造社和太阳社便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⁴⁸⁾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⁴⁹⁾中提出:“凡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而且是反抗浪漫主义的便是革命文学”,“革命文学家”的任务是要“点醒”无产阶级的“理想”与“实写”无产阶级的“苦闷”。蒋光慈在《关于革命文学》⁽⁵⁰⁾文中论及革命文学及其内容时说:

革命文学是以被压迫的群众做出发点的文学!

革命文学的第一个条件,是具有反抗一切旧势力的精神!

革命文学是反个人主义的文学!

革命文学是要认识现代的生活,而指示出一条改造社会的新途径!

郭沫若、蒋光慈等倡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 20 年代后半期的中国文坛影响很大，革命文艺界内部于 1927 年下半年到 1929 年围绕革命文学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展开热烈的论争。由于中马文艺界的联系和中国作者的大量南渡，革命文学也传播到新马，而形成新马文艺界的新兴文学运动。

1928 年，南来作者许杰在吉隆坡主编《益群报》的文艺副刊《枯岛》时，极力倡导革命文学，向南洋青年传播革命文学：

革命文学是因着革命潮流在澎湃的激进中，而且已经因了世界的革命的趋向，已经有些趋于无产阶级文学的一条路上了。但是在南洋，我们文艺青年，却还滞留在恋爱文学的境遇里而没进步，这不是很可惜的吗？⁽⁵¹⁾

他以“六叔”为笔名，在论文《恋爱文学之没落》中呼吁青年们抛开恋爱文学，迎接“新兴的革命文学”的到来：

有志文学的青年们，不甘堕落在时代的后面罢，且抛开爱人，前来革命。你看，代恋爱文学兴起的革命文学已经抬出大旗，放出大炮来了，我们且暂时把恋爱文学送入墓矿里去，我们且放开胸怀，来欢迎接受这新兴的革命文学的洗礼。⁽⁵²⁾

许杰在倡导革命文学时，十分强调革命文学中的“同情”与“反抗”精神。他在《枯岛》第 15 期的编后话《尾巴的尾巴》中说：

编者相信，《枯岛》所抱的使命，现在是没有错的。……编者在《枯岛》上曾提出两个简单的标语，即同情与反抗。同情的自然是被压迫阶级，被压迫的民众，而反抗的也当然是同情的阶级的敌人

了。从同情与反抗的两层精神出发,于是我们在南洋的文艺界中,树起了一面革命文学的大旗,在这大旗下,站着许多努力战斗的青年。⁽⁵³⁾

许杰所倡导的革命文学,即后来其他南来作者罗依夫、杨实夫、衣虹等人极力提倡的“新兴文学”。由于新马社会处于英殖民政府统治下,“革命文学”口号过于敏感,故以“新兴文学”的提法代替“革命文学”,实际上内容并无二致。当时论述新兴文学的理论,以衣虹(潘受)的一系列新兴文学论文为代表。作者总结当时有关新兴文学的理论,集为系列论文:《新兴文学的意义》⁽⁵⁴⁾、《新兴文学的背景》⁽⁵⁵⁾、《新兴文学之历史的使命》⁽⁵⁶⁾、《新兴文学的内容问题》⁽⁵⁷⁾、《新兴文学的形式问题》⁽⁵⁸⁾、《新兴文学的大众化问题》⁽⁵⁹⁾,成为新兴文学理论的集大成者。

综观衣虹和其他南来作者的新兴文学理论,可以见及中国革命文学理论的深刻影响。以下是南来作者关于新兴文学理论的主要内容:

(一)新兴文学的定义和特质

对于什么是新兴文学,衣虹在《新兴文学的意义》中指出“新兴文学就是普罗列搭利亚文学”,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认为新兴文学的产生是由于普罗大众(无产阶级)力量壮大,在与传统“支配者”的对立中需要一种为自己服务的文学,由此产生新兴文学。他说:

也许“新兴”二字稍微广泛些、模糊些,但我们仍可以应用。在现时代,无疑地,普罗已蓬蓬勃勃抬起头来,占据了世界的一角,而与传统的支配者尖锐地对立着。资本社会发达后及大战失败的国度里,这新旧冲突的迹象尤其格外彰显。从这获得新的意识形态的新兴阶级所创造出来的以供本身需求的文学,当然可以名之曰新

兴文学。⁽⁶⁰⁾

南来作者认为新兴文学既然是普罗大众(即无产阶级)的文学,就必然是,也应该是“集团”的文学,因此必须反对个人主义。衣虹指出:

新兴文学的工作,不可不是全部普罗者的一部分,而对于个人的工作应该极力扬弃、极力克服。

为此,新兴文学应该努力和灰色的、颓废的、被支配阶级所定购所折服的个人主义的文学作战,而努力握住正确的、向上的、集团的意识。⁽⁶¹⁾

此外,衣虹指出新兴文学的另一特质是“在哲学上的倾向是唯物物的,它采取历史的唯物辩证法来建筑自己的艺术之宫”。⁽⁶²⁾

(二)新兴文学的历史使命

对于为何要倡导新兴文学,南来作者认为倡导新兴文学可以提高大众意识,改造社会,促进时代进步。衣虹在《新兴文学之历史的使命》中指出:由于普罗大众经济力的贫困,不能象有产者得以无忧无虑地沾受高深教育。他们除了栉风沐雨,忍饥耐寒,终朝劳碌地过活着,大多数不能再意识什么需求,实际上也没有容许他们意识其需求之余裕。这种状况若再继续下去,不但对本阶级文化的进展上有莫大的障碍,即将来所欲实施的各种建筑也会受到了无穷的影响,因此教导群众便成为眼前唯一的急务,而教导的责任,无疑地要推给文学。他说:

新兴阶级要举起双手建筑所有光明的事业,第一应该做的,是得先把一般知识逐渐扩展输灌于大众,使大众能够捕捉那更正确、更纯洁的意识。而这最善良的工具,就是艺术。⁽⁶³⁾

衣虹认为新兴文学应把周遭环境被掩蔽的一切赤裸裸地暴露出来,把它的内幕和错误给予严格的指摘,教导,然后再把真正的唯一的出路指示出来。他引用马克思的话:“如果一方面,人是环境的产物,那另一方面,环境正是人来改变的。”他认为真正的文学“应该是时代的产儿,同时并能够产生时代”,⁽⁶⁴⁾新兴文学可以引导大众共趋于“大同”之轨道。⁽⁶⁵⁾

(三)新兴文学的题材和内容

关于新兴文学应表现哪些方面内容,衣虹在《新兴文学的内容问题》⁽⁶⁶⁾中提出四方面内容:

(1)着重正面的描写。新兴文学应“拿着唯物辩证法,把握复杂茹乱的社会现象中的本质在进行着什么方向的观点上来描写。换言之,即是把握着‘进行中的社会’而向新兴群体胜利方面前进的这事用艺术手腕摹绘了出来”。对于“黑暗”面,新兴文学仍然暴露它、不掩蔽它。不过是得放在次要的地方,作为烘托陪衬之用。

(2)注意本阶级的宣扬。新兴文学者应该能够摄取一切恰当的题材,获得更多的社会意义,一方面与支配势力战,一方面又为了自身在这成长的时代、未来的时代,作强有力的推进,使渐次造成“一个广的所有者”。不过新兴文学决不单单采取斗争一面作题材,其领域和其他文学流派都一样大,劳动者、资本家、农民、地主、兵士等一切与新兴者解放上有关系的都可兼收并蓄,若能包罗现社会的各面者更佳。

(3)要有鼓舞的气氛。新兴文学不妨有“鼓舞的气氛”,以唤起群众。在这变革的过渡时期,惶惑与迷乱是不可避免的现象,非有大声的呼喊,强烈的刺激,是不容易引导大众共趋于“大同”之轨道的。为此,新兴文学者也应该证明这一点去从事他们的工作。

(4)不忌嫌有益的传道。所有伟大的艺术都常是载道的。一切的传道者常常是艺术家,而伟大的艺术家恰正是传道者。新兴文学

对于传道的题材也该是一律欢迎才是。

陈炼青在《椰林通讯——关于新兴文学等几个问题的讨论》中谈及新兴文学题材时也认为应以无产者为中心,他说:

论到题材问题……主旨应以无产者为中心,而其他则可拿来陪衬,无论多与少,只要不离开它的立场,社会一切都是绝好的材料。倘若没有它的立场,则失却了这个时代的价值。⁽⁶⁷⁾

(四)新兴文学的大众化

南来作者认为“新兴文学负起的使命是教导大众的使命,那末,新兴文学应该向着‘大众化’这标准努力,更是不容疑义的极合理的事情”⁽⁶⁸⁾。罗依夫在《充实南洋文坛问题》中也指出:“这个香艳的桂林,美丽温柔的玫瑰,清丽的夜莺,是少数的司文艺的女神给予金字塔上层的少数支配者享受的,其他的饥饿的大众,得来都无用。”⁽⁶⁹⁾因此南来作者认为新兴文学必须大众化。

衣虹在《新兴文学的大众化问题》⁽⁷⁰⁾中认为可以从选材和技术两部分进行大众化。一、选材要精明、不随便,要适合大众的脾胃,要与他们发生紧密的关系。作者应“到大众中去”意识他们的需求,以“精审的观察”了解他们的生活形态。二、技术方面不可过于雕章镂句,应是单纯和平易的表现,以免使作品和大众绝缘。

不过南来作者认为新兴文学的大众化,并未意味艺术性的放弃。衣虹认为作品如果没有艺术性,就不成其为艺术。他批评郭沫若在高唱“文艺通俗化”时所谓“通俗到不成文艺都可以,你不要丢开大众”的论调,认为这不是文艺。⁽⁷¹⁾

南来作者倡导的新兴文学理论,对当时新马文坛影响极大,从而形成浩浩荡荡的文艺潮流,出现一大批反映新兴意识的作品,优秀者如曾华丁的小说《五兄弟墓》、罗依夫的诗歌《憔悴了的橡树》、海底山的小说《拉多公公》、忠实的小说《笑纹与波光一样柔和》等。

(但由于中国革命文学理论注重强调对黑暗社会与压迫阶级的反抗而忽视艺术形象的创造,也使革命文学产生概念化和口号式的流弊)有的南来作者意识到革命文学理论的缺陷,如张冲(张楚琨)在《椰林通讯——关于新兴文学等几个问题的讨论》中批评革命诗人王独清、蒋光赤(蒋光慈)的标语诗很“糟糕”,认为作者没有实地去经验普罗阶级的意识,又不是真情的流露,只是为着要做革命诗才去做革命诗。⁽⁷²⁾圣提(曾曼尼)在《醒醒吧,星城的艺人》里也对“自号自召,竟以刀、枪、血、泪等肤浅字面表现他们的所谓革命文学”的作者表示唾弃。⁽⁷³⁾但在当时新兴文学方兴未艾时,这类清醒认识并未引起文坛足够重视,因此一些新兴文学作品受到革命文学流弊的影响,也出现概念化与口号式毛病,这是新兴文学运动的局限。

三、南洋色彩与新兴文学的结合

南洋色彩文学与新兴文学在 20 年代末和 30 年代初的新马文坛形成两大文艺潮流后,并非各行其事,而是出现互相结合的现象。因为南洋色彩文学如果仅仅注重表现地方色彩而忽视文学与时代的重要关系,势必局于一隅而成为缺乏时代精神与意义的落伍之作;反之,新兴文学若是一味照搬中国革命文学理论而脱离所处具体环境,也将成为脱离新马社会现实的无水之鱼。可喜的是提倡南洋色彩文学与新兴文学的南来作者大多认识到这一点,因而使这两大文艺潮流出现互相融合的现象。

许杰在强调革命文学时,并未使之孤立于新马社会之外。他在《时代精神与地方色彩》中表示他理想中的作品,是时代精神(直线)与地方色彩(横线)两者的交叉点:

一切的事物,都不能离开了时间与空间两个范畴而绝对独立。文学亦何独立而不然?……你把捉得到时代使命,在文字里面了这

便是时代精神,但是,这还是一条直线,还有一条横线呢,那便是地方色彩。

论到地方色彩,我不愿多说。读者们请闭目想一想,弄一点本地风光。胶林、椰子、锡矿场、牛车、阿搭、吉林人、沙笼、大耳饰,各种声调语言,各种皮色的人种,各种错离的悲意底历史与故事,还有猛虎的纸币,高鼻……面底神人,这些,这些,就够想象了。

现在,我们把这些划作一条横线,与那一条直线交叉在一点上,便是我所(求)的焦点。在这点上的作品,便是我所渴望的作品。

我希望,因为时与地的关系,《枯岛》上的作品,都是在这焦点上的。⁽⁷⁴⁾

陈炼青在改革《叻报》《椰林》时,曾表示改革的最后目标是一律刊登描写“南洋生活和景物”的作品。⁽⁷⁵⁾然而他在极力提倡南洋色彩的文学,甚至憧憬于建立一种“南洋文化”时,并未划地为牢,排斥从中国传入新马的新兴文学。他一再表示“文学本来就有阶级性”,伟大的作品“代表当时社会上底意识的写照,亦就是那个时代的重心”,“普罗文学”是“此刻的文学主潮”,他说:

我却以为文学本来就有阶级性的。社会既有阶级,文学是社会的反映,自然文学亦是有阶级性。我们的生活固不能超出社会之外,那末我们底意识何能不受它的支配?资产阶级有资产阶级底文学,小资产阶级亦有小资产阶级的文学,乃至无产阶级也同样有它的文学。固然,现在的普罗文学,尚在萌芽时期,但是我们敢确信它此后将必发叶以至开花的必然性,而且它在此刻正是我们文学的主潮。如果我们明了这个时代的重心站在那里,一定我们对于它的成立,当不会否认,且应极力提倡以促成它的进展。⁽⁷⁶⁾

因此他在提倡南洋色彩文学时,也对意识“左”倾的新兴文学表示

喜爱。他在《左》中道：

我们这里的社外附刊，新近又出了一个《奠基》，它的意识很好，我十分愉快。它第一次出世就喊着一个“走向左边去”的口号，这颇有点意思。20世纪一切都向左边来，文艺的阵地，自然把握着这条战线——时髦点说，就是运用艺术的武器，猛烈地向伪的营垒进攻。我喜欢向左转的一切，尤其是革命的时代。⁽⁷⁷⁾

他在《〈椰林〉的再革新》里表示：“此后要多登些批评的文字，如批评社会、人生、文艺等等，同时也想多登些有时代性的随笔。”⁽⁷⁸⁾他在《椰林》上登载衣虹一系列关于新兴文学的论文，以及海底山的小小说《拉多公公》、浪花的小小说《生活的锁链》和《邂逅》等反映新兴文学意识的创作。在称赞《邂逅》南洋色彩的气息“颇浓厚”时，也赞扬它在“意识上无悖于时代的精神”。⁽⁷⁹⁾

由此可见，南洋色彩文学与新兴文学的合流，是南来作者把中国文学理论与南洋地方特色相结合的成果，它为新马华文文学消化、吸收外来文艺理论并付诸实践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第三节 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时期

1934年到1936年是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时期。由于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这时期的文学创作不如上时期繁荣。但南来作者在文艺理论方面对新马华文文学有了新建树：一是提倡并建立马来亚地方性文学观念，二是重视华侨文艺与其他种族的关系。

一、马来亚地方性文学观念的缘起

前文论析过南来作者在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倡导南洋色彩

的文艺潮流(见本章第二节)。这一倡导显示南来作者对新马华文文学地方特色的觉醒与重视,但是南洋色彩的提法较笼统,涵盖面较广,并非专指马来亚地区的文学。直到1934年中国南来作者丘士珍发表《地方作家谈》,第一次提出“马来亚地方文艺”,新马华文文学地方特色的概念才由笼统的南洋色彩缩小到马来亚地方性文学观念。这是南来作者关于新马华文文学地方特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1934年,南来作者丘士珍因为有感于苏联作家会议鼓励对地方作家的重视,以及检讨地方趋附莫斯科的错误,由此激发他对当时新马文艺界趋附上海文坛的不满。他以“废名”为笔名,于同年3月1日在南洋商报《狮声》发表题为《地方作家谈》的文章,第一次提出“马来亚文艺”这个概念,并推举14位他认为够得上负起“马来亚地方文艺”的“地方作家”:符国汉、吴仲青、陈一萍、连啸鸥、忘八蛋、熊蕾影、郑维圣、巨鳄、枕戈、哥空、老张、郑文通、廖月英、金洪等。

当时主编《狮声》的南来作者李铁民对丘士珍推举地方作家抱着鼓励的态度,认为这是一桩有趣味而且重要的事,希望读者能够多推举出其他的地方作家。⁽⁸⁰⁾

《地方作家谈》发表后,在文艺界引起不小反响。本地出生的作者C君(梁志生)撰文《地方作家介绍的商榷》⁽⁸¹⁾,批评丘士珍对马华文艺界趋附上海文坛的异议,认为丘士珍介绍的地方作家“太不科学”,只是“主观感情流露的捧场”。另一作者则余也以《地方作家谈的检讨》⁽⁸²⁾,根本否定丘士珍所推举的那些马来亚地方作家。之后,丘士珍发表《总算是我抛了一块作家谈的砖》⁽⁸³⁾,答复C君的批评,再次认为地方作家应着重地方文艺,同时辩解自己推举地方作家并非出于捧场。C君又撰文《显微镜下废名先生的理论的细察》⁽⁸⁴⁾进行反击,言语间已出现意气之争。于是丘士珍致函《狮声》编者李铁民,宣布从此退出辩论,表示“对南洋文艺界作一个深长

的苦笑”。⁽⁸⁵⁾这时却有一位作者姜生出来支持丘士珍,写了几篇介绍“地方作家”老张、金洪、郑文通的略历,结果这场论争转而成为梁志生与姜生的论战。到后来,另有几位署名黑子、长江、小白灰、柳何依、苔莉、乌卒、裴然等的作者也加入论争,形成一场混战,两个月后才偃旗息鼓。

虽然丘士珍在论争中半途退出,实际上在这些论争者中,他是最有见地的。在当时新马文艺界,丘士珍首先认识到马华写作人既然居留在马来亚,就应该来长谈关于马来亚的文艺和马来亚的地方作家,而不能盲目趋附上海文坛。他批评那种盲目崇拜中国文坛,以上海为文坛中心的观念:“马来亚的文艺作家应该除去趋附上海文坛去登龙的谬见!”⁽⁸⁶⁾而肯定马来亚有地方文艺存在:

关于马来亚有无文艺,这是不成问题的,在这里,我们应该肯定地说马来亚有文艺,就是居留或侨生于马来亚的作家所生产的文艺!⁽⁸⁷⁾

接着,丘士珍提出“地方作家”这一观念:

我们应该抓紧了“地方作家”这个含义来承认马来亚的文艺,同时要坚决地反对以上海才有文艺的谬误的高调!⁽⁸⁸⁾

对于什么样的作家才是“地方作家”,他提出这样的划分标准:

我以为地方作家的解释应该是:凡是在某个地方,努力于文艺者,曾有作品贡献于某个地方者,无疑我们应该承认他是一个某个地方的地方作家!⁽⁸⁹⁾

丘士珍认为现代文艺已不是个人茶余酒后的消遣品,而应该

是反映社会现实生活基调与动向的产物。他认为一个作家如果不能完成文艺的社会任务,即使能够在文坛中心的地方登龙一时,也不算什么;反之,一个作家虽然被埋没在一个地方里,但他所做的文艺的社会任务是那样的有成就,大家就应该重视他。他肯定地方作家应该和上海文坛中心的作家群站在同等地位,他说:

关于地方作家的地位这个问题,我以为最重要的,我们应该严正地说:地方作家应该让他与文坛中心地的作家群站着同样无高低的地位!质言之,一个作家的地位应该视其作品所负之社会任务积极与否为转移!再换言之,我们不应该盲目地重视以上海为中国文坛中心的中国文艺作家!我们也应该推崇马来亚的地方作家!⁽⁹⁰⁾

丘士珍对马来亚文艺作家的责任 and 作用是寄予愿望的,他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坚强的马来亚文坛。他在文中呼吁道:

马来亚的文艺作家应该老实地坚决地在马来亚地方有组织地团结起来共同担负推进与提高马来亚文艺的社会任务,例如出版单行本的文艺刊物,除努力创作地方文艺外,应该严谨地介绍与批评国内国外的文艺创作和理论,以及国外国内的文坛要训等。⁽⁹¹⁾

丘士珍在这里所表现的实际上是一些相当先进的主张与见解,论述方面大体上也是正确的。丘氏是陈炼青以后第一个注意到当地文艺的独特意义的作者,他们先后在理论上为马华文艺的确立铺下了一条坦途。⁽⁹²⁾不过,陈炼青在提倡南洋色彩时,更多地是着重于地方色彩,尤其是景物的描写。他憧憬于建立一种“南洋文化”,但并未对文化的建设者作家给予更多的重视。与丘士珍同时期的其他新马作者,也同样没有意识到马来亚应该形成独特的马

来亚文艺和马来亚地方作家。丘士珍第一次提出“地方作家”这个名称,使当地文艺界注意到马来亚地方作家这个创作主体应有的地位和特色,新马华文文学地方特色观念才由笼统的南洋色彩缩小到马来亚地方文学。

丘士珍推举的14位地方作家,其中7位是南来作者。他们是:吴仲青、连啸鸥、丘士珍、忘八蛋(黄震树)、枕戈(石蕴真),哥空(王哥空)、老张(张明慈)、郑文通。(请参见第二章中国南来作者介绍)按照丘士珍对地方作家的定义,这些南来作者是在马来亚努力于文艺,曾有作品贡献于马来亚文坛者。

√ 尽管C君(梁志生)、则余等人对丘士珍推举的地方作家持有不同看法,这场论战带有意气之争,但其意义是可以肯定的。论者双方不仅肯定马来亚应有其地方的文艺,同时进而提出马来亚地方文艺的特色,以及能够成为马来亚地方作家的标准。而论争的激烈,引起了文艺界及读者的注意,马来亚地方文学更深深地烙印在人们的心中。⁽⁹³⁾现在我们大家所熟悉的“马华文艺”这个名称,也是由丘士珍的“马来亚文艺”派生出来,从这时开始采用。⁽⁹⁴⁾

二、马来亚地方性文学观念的确立

此后两年,新马作者曾艾狄受丘士珍“马来亚地方文艺”这一概念的影响而发表一篇题为《马来亚文艺界漫画》的论文。曾艾狄认为每个地方的文学应该有地方独特性,他为此批评马来亚的杂文家是靠国内的言论“搬尸”过来榨取稿费,⁽⁹⁵⁾由此触发一场关于“马来亚诸问题”的论争。参与论争的作者有马达、文翔、一礁、保罗、豫观、陈玉兰、石等。

南来作者一礁(陈子彬)在《关于马来亚文学的诸问题》⁽⁹⁶⁾也认为马来亚的作者既然生活在这个社会,就应该肃清移民的观念,为马来亚尽一份社会责任,他说:

各民族留居于此的侨民，大都有它们的远在“祖国”的家，因之侨民的生活是游移不定的。然而，各民族的侨众都应该获得这个认识：我们生活着的社会是马来亚的社会，却不是远在他方的“祖国”。因之，我们应尽的社会任务，是对于马来亚的，却不是对于“祖国”的。只要我们在这里生活一天，便得为这里的社会进化而努力一天！

他指出马来亚的杂文作者们“不应该再在公式主义里兜圈子”，应“把视线放到马来亚社会新闻上去，从那儿去找写作的题材”。

南来作者马达(张天白)在《一九三六年马来亚文坛》⁽⁹⁷⁾中则针对曾艾狄的批评为马来亚的杂文家辩护，他尤其指出几位南来作者的杂文都有其独特风格，他说：

曾君(指曾艾狄——引者注)还因此，忽视眼前的杂文家关于“地方性创作”。其实，像刘郎君(林健安——引者注)的时事小品，林棘君(陈子彬——引者注)的文艺时谈，谛克君的文艺批判，都有他们特别的风格，为着偏重“地方性的创作”，正当的介绍工作也认为是“搬尸”，这不能不说是失言。

这场论争终于促成“马来亚文学”名称的确立。一礁在《零零碎碎——给曾艾狄先生》⁽⁹⁸⁾中提出应放弃原有的“南洋文学”名称，而代之以“马来亚文学”：

目前我们的文坛上与“马来亚文学”并行着的，还有“南洋文学”的一个名称，我认为事实在要求着我们把后者放弃。因为“南洋”不仅在区域上是广宽散漫的，就是在政治关系的隶属上，也有着它们的各自不同的宗主国(暹罗，它的政治形态及其文化与其他各地还存在着更大的差异。)何况，实际上，我们目前的工作范围，

也只在马来亚。

对于如何建立“马来亚新文学”，一礁认为“可用居留于此的各民族的文字来写”，但在目前马华作者大半心还偏在“祖国”，不曾“明确地把握住”“地方的特殊性”，以及“马来亚各民族的文学界还在‘各自为政’”的情况下，马华工作者当务之急，是在“翻译的努力上，实践沟通马来亚各民族的文学之任务”。⁽⁹⁹⁾马达在《一九三六年马来亚文坛》中总结这场论争时，除了肯定其纠正马来亚文艺理论的移民观念，还认为马来亚文艺运动应和新文字运动联合起来，他说：

由一礁君《马来亚文学诸问题》及零零碎碎的提起，至保罗君的《马来亚文学试论》，纠正移民观念的马来亚文艺理论，渐次确立了。但我认为这种文艺运动的建立，应和新文字运动联合起来，还是当前紧要的关键。⁽¹⁰⁰⁾

△ 由于丘士珍首倡“马来亚地方文艺”，其后“马来亚文学”这一名称开始盛行起来，南来作者中有的始以“马来亚文艺”为题写论文，如林参天的《马来亚文艺沉寂的原因》⁽¹⁰¹⁾；有的以“马来亚”为他们的刊物命名，如王仲广于1935年创设的《马来亚月刊》；有的更以“马来亚文坛”为题来总结一年的文学活动，如王哥空的《一九三五年的马来亚文坛》⁽¹⁰²⁾，李润湖的《一九三六年的马来亚文坛》⁽¹⁰³⁾，马达的《一九三六年马来亚文坛》⁽¹⁰⁴⁾等，这是前一时期所不曾出现的现象。⁽¹⁰⁵⁾

三、重视华侨文学与其他种族的关系

在此之前，南来作者曾提倡南洋色彩文学，（见本章第二节）但当时并未重视华侨文学与其他种族的关系。这时期南来作者在确

立马来亚地方性文学观念时,更加注重文学的地方性,开始意识到华侨文学在马来亚各民族文学范畴中的定位问题。林参天在《马来亚文艺沉寂的原因》⁽¹⁰⁶⁾中已意识到南作的作家,“无论马来人、华人、以及其他各民族人,都有在埋头苦干,冀图着建树独立性的南洋新文艺”。一礁在《关于马来亚文学的诸问题》中进一步指出:

我们必须清楚,马来亚是各民族侨居之地,因之,在文学上,也就有巫人的马来文学,英人的英国文学,印人的印度文学,华人的中国文学等等的分别。所以,把马来亚的华侨文学强调为“马来亚文学”,这,我们纵不必自认是荒唐无稽,也免不了蒙蔽于有语病的术语中,而不自觉之嫌。⁽¹⁰⁷⁾

一礁认为马华作者应重视民族关系,以建设马来亚社会未来的繁荣乐园,他甚至提倡在创作中融入各民族人物:

马来亚既是个各民族集居之地,那末,唯有大家破除民族的成见,兄弟般地携手,亲亲爱爱地共同努力,这样,才能够促进马来亚社会,建设未来的繁荣乐园。然而,不幸得很,因为语言、风俗等等的异趣,各民族间的隔膜是坚厚的。尤其是“夜郎自大”的我们华侨,对马来人、印度人往往看不上眼。所以,我们的作者该善意地来介绍各民族的生活,或还可把一篇创作的人物,全备着各民族的份子。这样,会让人们激悟,我们为什么要兄弟般地生活着,而且,我们原是兄弟般地生活着。⁽¹⁰⁸⁾

一礁在这里所表现的观点,显示南来作者在建立马来亚地方性文学观念时,已注意和重视与文学有着密切关系的社会环境和民族关系等。后来一礁以另一笔名“林之间”发表论文《关于〈浓烟〉》⁽¹⁰⁹⁾,批评林参天的长篇小说《浓烟》对印度教师佛生所作的

恰当描写,会造成华、印民族间的恶感,也是与南来作者重视华侨文学和其他种族关系的文学主张一脉相承的。

第四节 本地意识挫折时期

1937年到1942年是本地意识挫折时期。这是新马华文文学战前第二个创作高峰期。由于中国全面抗战局势的刺激,新马华人爱国情绪空前高涨。文艺界为配合抗战救亡运动,提出新马抗战文学的口号。南来作者十分重视文艺的宣传作用和教育作用,围绕着如何使文艺更好地为抗战救亡服务而深入探讨各种文学课题,如抗战文学理论、文学的通俗化与大众化、文艺通讯运动等等,使战前五年新马的文学理论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

本节着重论析南来作者关于抗战文学、文学通俗化与大众化,以及文艺通讯运动等理论主张。

一、抗战文学理论

“七七”芦沟桥事变发生后,新马文艺界掀起抗战救亡热潮。为使文学成为抗战救亡的有力武器,更好地为抗战服务,文艺界提出“抗战文学”的口号。

对于“抗战文学”在新马文坛提倡的缘起,方修在《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二集导言》中指出:

在中国,抗战文艺的口号,早在一九三六年底至一九三七年初时候就已提出。这似乎是前此发生论争的“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的一种折衷。但在马华文坛,抗战文艺这名词却是七七抗战发生后才开始出现,而于一九三八年初正式提出。在这以前,一般上还是使用“国防文学”等两个口号。然而马

华抗战文艺运动也可以说是一九三七年初就已经发轫了。因为实际上由一九三七年初起,抗战文艺的精神就已经统摄了整个的文学创作活动。⁽¹¹⁰⁾

抗战文学在新马文艺界提出后,南来作者围绕着抗战文学的作用、主题、内容和形式等展开热烈讨论,对抗战文艺理论建设作出积极贡献。

(一)抗战文学的作用

南来作者认为在现阶段,文艺是宣传工具和救亡武器,可以教育民众并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吴天(洪为济)在《论战时文艺》中指出,战时的文艺必须成为一种救亡武器,必须配合着目前抗战的形势,完成宣传和鼓动的任务,使救亡的意识象铁一样地生长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他引用王统照和辛克莱的话说:

王统照在《抗战的文艺运动》一文中曾说:“文艺从原始以来就少不了宣传性——无论是自我的宣传还是集团的宣传,现在,我们应切实周密地藉文艺的工具,达到热烈宣传的目的。”辛克莱也曾说过:“一切艺术是宣传”的话。(语见《拜金艺术》一书)所以我们并非使文艺卑俗化,而是在抗战中,明显地发挥了文艺的力量。⁽¹¹¹⁾

絮絮(丘絮絮)在《论文艺通俗化问题》中也表示:文学可以灌输人民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以便唤起他们敌忾同仇的激情。⁽¹¹²⁾更生《文学问题漫谈救亡运动》里也指出:文学应该配合救亡运动的步伐,用各种各样的内容和形式来揭穿敌人的阴谋,暴露敌人的残酷,以提高人民的激情,激发士兵为国牺牲的精神。⁽¹¹³⁾

张天白在《七七抗战后的马华文坛》中认为抗战文学作者应负起“时代喇叭手”的责任:

文艺作者虽然事实上应该是站在时代前头的喇叭手,但他们决不以前头的岗位,脱离广大的群众,恰恰相反,他们的工作,却是教育群众领导群众的责任。⁽¹¹⁴⁾

(二)抗战文艺的主题与内容

随着抗战文学的开展,南来作者对其主题与内容展开热烈讨论。他们的观点综合起来,认为抗战文学应该围绕抗战救亡的主题,表现这几方面内容:

(1)全面反映抗战救亡运动

南来作者认为新马抗战文学应该全面反映中国与新马人民的抗战救亡运动,既要描写前线的英勇战斗,也要表彰后方的大力援助;既要反映中国的抗战运动,也要歌颂新马人民踊跃输将的感人事迹。吴天在《论战时文学》提出战时文艺的主题应包括多方面内容:

1. 报告前方英勇抗敌情势以鼓励大众;
2. 配合每个当前政治形势加以说明,而使大众有正确的认识;
3. 消除“恐日病”、“主和派”以及其他一切汉奸理论;
4. 反汉奸;
5. 劝募公债及捐款等;
6. 暴露敌人国内的情况,而指出它必然崩溃的结果;
7. 呼吁于国际人士,以求有力的援助;
8. 其他。⁽¹¹⁵⁾

一息(李一息)在《文艺的现实性》认为抗战文学应全面反映前方与后方的抗战事迹,他说:

我们的抗战文艺,决不是描写抗战的一面,而是要写抗战的全

面。前方有抗战英勇的将士,后方有热烈输将的民众;前线有执枪卫国、壮烈牺牲的民族烈士,后方有荷锄耕种,凿石开路,加强战时生产,建筑国际援助通路的工农大众。⁽¹¹⁶⁾

丁倩以为作者如果对中国抗战情形了解不深,就应该反映南洋现实。他认为抗战文学也须表现南洋社会在抗战救亡活动中的复杂情况,他在《抗战文艺的多样性》里道:

假使对于祖国的冲锋杀敌或战区悲惨的题材是没有深知,倒是不写为妙。因为闭门造车这一套手法,未见得是反映现实。在南洋,我们可写的还很多。于抗战的场合中,南洋也有着复杂的矛盾的、有着光明与黑暗面的,斗争与革命的大时代的现实生活。⁽¹¹⁷⁾

张楚琨也强调抗战文学应以南洋现实为题材,表现南洋的抗战救亡运动,他在《〈文章漫谈〉读后》中指出:

我们愿意忠告马华的写作人:我们生活在南洋,应该以南洋现实为题材,南洋虽然是抗战后方的后方,但是仍不乏动人的题材,这里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对于从事文学的人,将是一个发掘不尽的宝藏。⁽¹¹⁸⁾

(2) 坚持反封建与反侵略精神

马华新文学从1919年萌芽以来,一直深受中国新文学反帝反封建精神的影响,即使是战前五年抗战救亡文学成为这时期文学主流时,南来作者对文学作品肩负的反封建反侵略任务仍未忽视。金丁(林竹铭)在《抗战文艺讲座》⁽¹¹⁹⁾中指出:

新文学运动一开始便是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目前对日抗

战的主要内容,也还不外继续五四以来的未曾完成的反帝反封建任务。因此抗战文学,是继承了新文学运动的反帝反封建的传统,而发扬光大。

南来作者十分重视文学作品反封建的任务,因为如果抗战文学不达到反封建的目标,抗战救亡的工作将不能顺利完成。张曙生在《现阶段马华文艺现象与本质的诸检讨》⁽¹²⁰⁾里指出新马华人存在严重封建意识:

移植南来的华人,大半自闽粤的内地农村而来,过去的华人的思想意识,也就停留在当时封建制度的一般形态。在教育不普及的环境下,从事工农业务的华人,多数是少有文化教养,间或有一小部分读过旧书的,意识也为当时现实所决定,恪守传统的忠君孝亲诸类教条,向往人才子的风趣文化追求。

丘絮絮在《论文艺通俗化问题》⁽¹²¹⁾中也指出,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并未影响到广大的群众,“像剑侠小说,连环图书,这一切带着浓厚封建思想的和低级趣味的读物,依然在散播着毒菌,占有着群众。”吴天在《论战时文艺》中也表示,南洋“民众文化很是落后,有人希望‘真命天子’出世,又有人为其他封建思想的束缚包围着,阻碍他们参加抗战”。⁽¹²²⁾

南洋民众思想上的封建意识,将不利于抗战救亡工作的开展与进行。南来作者认为必须推行反封建任务。张曙生在《现阶段马华文艺现象与本质的诸检讨》提出反封建要求,他说:

带有封建色彩的宗派集团尖锐对立,摩擦,私斗等现象的不幸存在,以及党派的分裂,都可能促成我们文艺工作出现各自为政的倾向。我们要求集中力量打击敌人,实现大团结,永远为我们民族

利益而努力,至少我们须克复前述的现象。⁽¹²³⁾

金丁在《抗战文艺讲座》也指出,在抗战时期,文学应该以反封建为主题,发展而为以抗战为前提的各党各派各阶层的文学。⁽¹²⁴⁾

南来作者在强调反封建时,对反侵略主题表现出更高热情,因为当时面临日本侵略中国并策划南侵的严重局势,以及德国、意大利法西斯对欧洲民主国家的侵略战争。新马社会反侵略与反法西斯的情绪十分高涨。巴人(王任叔)在《展开反法西斯文学运动》⁽¹²⁵⁾里分析反侵略反法西斯口号能够在马来亚提倡的原因:

1. 马来亚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更迫切需要建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
2. 马来亚是防卫法西斯侵略者向太平洋挑战的第二个堡垒,它需要用反法西斯文学去号召广大民众,保卫马来亚;
3. 在马来亚的华侨社会里,反民主进步的力量不大,反法西斯的思想容易抬头。

由于新马社会存在反侵略反法西斯的社会基础,南来作者认为抗战文学应该体现反侵略与反法西斯精神。张曙生在《现阶段马华文艺现象与本质的诸检讨》表示:“马华抗战文艺的被强调,是与反侵略的运动结合着。”⁽¹²⁶⁾实君(杨实君)在《南洋的通俗化文艺》里也指出:

法西斯的势力伸张显然是人类和平的一大劲敌;东西法西斯势力的伸张,直接间接都影响到南洋的安全。因此,南洋的通俗化文艺,同时应该是反法西斯的。⁽¹²⁷⁾

南来作者对反侵略文学的推动是不遗余力的。王纪元主编的

《南洋商报》副刊《狮声》于1941年9月5日和9日,各推出两个“反侵略文学专号”,其中有南来作者巴人的《关于反侵略文学》⁽¹²⁸⁾、杨骚(杨维铨)的《以纸弹配合子弹》⁽¹²⁹⁾、金丁的《在反侵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¹³⁰⁾。桃木(王崑)编辑的总汇报《文会》也发表不少反侵略文学的文章。

由此可见,反封建与反侵略精神是新马抗战文学一大重要内容,正如铁抗(郑卓群)在《论马华文艺》里所言:“如果我们将反帝反封建这些骨髓从马华文艺中抽出,则她是会立即死亡的。”⁽¹³¹⁾

(3) 抗战文学的形式

关于新马抗战文学的形式,金丁在《抗战文艺讲座》中提出分两步走的看法:一、在抗战文学运动初期,“应当运用而且必须运用文艺上的一切形式,所以并不绝对地排斥旧诗、骈体文或鼓词等等旧形式”,而后“过渡到新形式的运用”。二、战争发展的形式非常迅速,时代走得太快了,它不允许每个最能反映这一时代动态的作者们经年累月的写长篇。而战时生活的紧张,又使每个读者迫切地要求着文艺作品上,对于每一事变的简洁明确的反映,因此“墙头小说、速写、通讯、诗歌、杂文,成为抗战文艺的主要形式,也是抗战文艺的最适合的形式”。⁽¹³²⁾

从当时抗战文学的演进情况看,文艺界常常为了特别强调某一种内容或样式而派生出另外一些文学艺术运动来,⁽¹³³⁾如“文学通俗化与大众化运动”、“马来亚文艺通讯运动”等,而这些文艺运动所提倡的文学形式,基本上是抗战文学的主要形式,因此关于抗战文学的形式问题,将在下文“文学通俗化与大众化”和“文艺通讯运动”部分进行详细论析,这里就不再赘述。

二、文学的通俗化与大众化

文学的通俗化与大众化运动,是为使抗战文学深入民间,而由抗战文学派生出来的文学运动,也是新马抗战救亡时期一个声势

浩大的文艺运动。

南来作者从20年代末期新兴文学在新马文坛流行时,就开始提倡文学的大众化。(见本章第二节)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展开,南来作者将文学作为教育民众,加强民族意识,支援祖国抗战的有力武器,这就需要将文学进一步大众化。丘絮絮在《论文艺通俗化问题》⁽¹³⁴⁾中阐述文艺为何需要通俗化时说:

为了要使文艺深入民间,并加强劲力起见,“通俗化”被迫要求着。从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其影响还止于上层的知识分子,并未争取到广大的群众。像剑侠小说,连环图书,这一切带着浓厚封建思想的和低级趣味的读物,依然在散播着毒菌,占有着群众。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新文艺的形式,不能为下层的广大读者所理解所接受之故。

南来作者认识到民众文化仍很落后,文学要负起教育大众,纠正其封建意识,激发抗战热情的责任,就必须使文学大众化和通俗化。吴天在《论战时文艺》中指出:

为了争取广大的(除了汉奸的全部)群众,战时文艺作品首先要大众化,适应大众的需要,使大众理解而获得大众的热烈的拥护。……在战时也同样,首先要文艺作品作为大众看得懂的东西,同时不要忘了教育大众,我们民众文化很是落后,有人希望“真命天子”出世,又有人为其他封建思想的束缚包围着,阻碍他们参加抗战,因此我们不能忘了“教育大众”这一工作。⁽¹³⁵⁾

桃木在《漫谈诗歌大众化》中也指出,具有艺术性的大众化诗歌可以表达大众心声,同时纠正大众的封建意识,提高其认识和文化水准。他说:

大众化的诗歌工作者,是用他的艺术,写出大众的情绪、写出大众所需要的东西,所要说而苦于说不出的意思;同时要提高大众的认识,提高大众的文化水准,决不是“见一说一”、“听一记一”的。因为在封建遗传下的大众习惯中,有许多意识是应该予以纠正的(如迷信命运等)。⁽¹³⁶⁾

因此丘絮絮在《论文艺通俗化问题》中指出:在现阶段,一方面为发挥文艺的革命力量,一方面为完成文艺本身的革命,文艺通俗化,已成为一种普遍的有力的运动。⁽¹³⁷⁾

“文学通俗化”与 30 年代初期中国文坛提出的“文学大众化”定义虽不完全相同,但对当时一般新马作者来说,“通俗化”即“大众化”,“大众化”即“通俗化”,二者并无差异。⁽¹³⁸⁾至于何谓“通俗化文学”,实君在《南洋的通俗化文艺》中提出:用大众的口语,或用明白如话的白话文写成的文艺作品,就是通俗化文艺。⁽¹³⁹⁾上官彖(区文庄)在《漫谈“通俗文学”》里更具体说明,“通俗文学”就是具有新文学的一般灵魂的文学,不过现在更求其普通化,即将比较艰深的辞汇,冗长的字句,空洞的性格描绘,尽量减少,更不折不扣的充实内容和艺术性的趣味。⁽¹⁴⁰⁾叶尼(洪为济)则在《论南洋文艺大众化运动》中指出通俗化文学的意义为:

- 一、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是配合着祖国抗战的;
- 二、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是配合着马华救亡运动的;
- 三、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是配合着马华新启蒙运动的。⁽¹⁴¹⁾

至于怎样才能使文学大众化与通俗化,南来作者认为可以从这几方面着手:

(一)内容与选材的大众化

南来作者意识到要使文学大众化,内容与选材的大众化至关重要。金丁在《抗战文艺讲座》中谈到文学的通俗化时,非常强调内容大众化的重要性,他说:

作品通俗化,第一条件,必须是那作品的内容有最大限度的一般性;换言之,那作品的内容一定要使生活环境不同的多数人,都能接受。⁽¹⁴²⁾

有的南来作者如上官彖认为通俗文学作者必须参加实践,才可以使作品的内容与选材大众化。上官彖在《漫谈“通俗文学”》中指出,努力于“通俗文学”的人,非跟着大众过着同等的实生活,便很难得到大众读者的同感。他举例说明新俄的报告文学和雷马克的《西线无战事》的材料都是从一般大众生活里吸取的,所以除了文盲,没有谁看不懂。他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通俗文学。⁽¹⁴³⁾

叶尼在《论南洋文艺大众化运动》中更进一步提出选材与内容的通俗化,应与南洋地方性相结合的问题。他批评金丁的童话《谁说我们年纪小》不能被南洋小孩理解,原因是描写中国小孩逃难,从事救亡工作而与南洋小孩隔膜的缘故。他说:

反过来说,如果这儿有一篇童话(其实岂独童话?)是写的南洋的儿童生活,那末结果又怎样呢?南洋的儿童看了会不会感到亲切呢?我以为是会的,而这便是内容的大众化。而这“内容的大众化、通俗化”是最为重要。……这便是所谓南洋地方性的问题。南洋的“通俗文艺运动”,应该特别强调这一点,否则,通俗文学只是皮相的而已。但是,我并不反对描写国内的现实,不过得以南洋大众了解不了解为根据。如果内容与此地大家生活无关(或不亲切),不怕再用通俗的形式,(章回小说、小调都好)也没有用处。⁽¹⁴⁴⁾

(二)旧形式的利用与新形式的创造

关于通俗文学的形式问题,有的南来作者认为可以利用旧的形式。杨实君在《南洋的通俗化文艺》中分析道:在一定的条件下,旧形式仍然可以某种限度的适合新的内容;尤其是在比较落后的社会条件之下,利用“旧瓶装新酒”去接近大众、教育大众,这应该是非常正确的。⁽¹⁴⁵⁾金丁在《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的几个问题》中解释为何“旧形式的利用”那样被重视时道:

所谓旧形式,在大众眼中看来,还并不是陈旧的、要不得的,像懂得欧化形式的作家那么讨厌它。它是大众最熟悉的形式。但利用旧形式,这因为它虽然一方面是“单纯的观念的因循的形式,但一方面也包括着简明确定的表现”。利用旧形式,决不是生存活剥,或把新内容和旧形式极不调合的勉强结婚,而是批判地吸收它那明朗健康的真正大众的要素。……

文艺通俗化工作者,如果把教育广大落后读者当作自己的责任,那就还要把那些神怪的连环图,或武侠及色情的小说的读者争取过来,从而也就要看重旧形式。⁽¹⁴⁶⁾

由于南来作者提倡文学通俗化时对旧形式的重视,因此章回小说、民歌、民谣、旧诗等旧形式,甚至大鼓、弹词也成为通俗文学利用的形式。不过对于大鼓弹词这种来自中国北方的文艺形式是否适合南洋民众,有的南来作者提出异议,如叶尼在《论南洋文艺大众化运动》里认为弹词大鼓不能吸引南洋的一般读者。⁽¹⁴⁷⁾

为使旧形式能够为文学通俗化服务,南来作者纷纷探讨如何利用旧形式问题。他们对章回小说、旧诗、民歌小调、大鼓等创作问题进行探讨。

关于章回小说创作问题,张楚琨、金丁和李润湖等在“章回小说座谈会”上指出,章回小说应综合新小说与旧章回小说的优点,

即：(1)要有头有尾的描写，少暗示，但要学习新小说的表现力；(2)标题不必用对联，用“论说”及“且听下回分解”等等；(3)在表现方面，必须着重描写；(4)吸收大团圆结局的优点，扬弃它的缺点；(5)采取活的口语。⁽¹⁴⁸⁾

对于利用旧诗问题，在流浪(刘道南)主催的《“诗歌”座谈》⁽¹⁴⁹⁾上，金丁认为“旧诗可以利用，但应当要有现代化的内容和大众化的感情”，流浪则表示“我们不提倡写旧诗，但也不反对写富有爱国情绪的旧诗。”拉因(冯蕉衣)在《谭诗歌的形式问题》⁽¹⁵⁰⁾中则认为旧诗在形式上达到完美的境界，可以新酒装旧瓶，利用它来表现新内容。

在讨论民歌与小调的创作问题时，张楚琨和刘思(刘世潮)认为：(1)在运用民歌时，得先了解当地人们所喜欢的民歌种类和形式；(2)运用民歌的形式不是无条件的，那些萎靡的、感伤的调子，必须加以淘汰；(3)内容与情绪必须与调子配合，才能和谐。因此民歌作者一定要熟悉各种调子，以便运用时不至生吞活剥。⁽¹⁵¹⁾

大鼓基本上是属于诗歌类的文学作品，在南来作者提倡文学通俗化时期，大鼓也成为流行的一种诗歌形式。流浪在《略论“大鼓”》中指出大鼓的特点，并提出创作要求：(1)大鼓是一种边唱边讲、以唱为主的艺术形式。唱的一部分，总是用“韵文”组织之，讲的一部分，则为散文；(2)大鼓的创作，须特别注意词曲文学的修养。因词曲结构，与大鼓的韵文部分相近，故须多阅读或参考一些词曲的作品，但须采用现代生活经验的语汇，才易使人感动或受影响；(3)大鼓的创作最要注意的是简洁明快。因为大鼓的目的在于如新闻式的“报导”，故要以最经济的篇幅和字眼，使读者用最经济的时间获得一定的目的。⁽¹⁵²⁾

在利用旧形式的同时，有的南来作者认为文艺大众化、通俗化，是应该由旧形式的利用到新形式的建立，而不能只终止在旧形式的阶段，如叶尼的《论南洋文艺大众化运动》⁽¹⁵³⁾；有的认为旧形

式的利用应该与新形式的创造兼行并顾,如杨实君的《南洋的通俗化文艺》⁽¹⁵⁴⁾,为此报告文学、速写、文艺通讯、街头剧、活报、墙头小说等受到南来作者青睐,成为文学大众化与通俗化的新形式,不少南来作者纷纷探讨如何利用这些新形式为文学通俗化服务。

报告文学是散文的一个种类。老蕾(许清昌)在《关于马来亚的报告文学》中指出,报告文学应具有现实性、客观性和时间性。写作者要深入到现实中去观察和实践,在实践中吸取丰富的创作题材。报告文学可以从“平淡中找题材”,也需要“悲愤壮烈”的现实题材。⁽¹⁵⁵⁾上官彖(区文庄)在《对马华报告文学的小提供》中指出作者要把视野放开阔,才不会形成报告文学陈陈相因的毛病。⁽¹⁵⁶⁾老蕾认为报告文学作者要有准确的世界观,要排除写作中的情感冲动,才能反映社会的真实而不会粉饰和歪曲事实,造成“艺术上的欺骗”;在时间上,报告文学要很快地反映现实,不要使事件成为回忆。至于篇幅大小,老蕾认为可长可短,不应视之为“轻骑兵”而排斥长篇巨制。他也指出报告文学作者的技巧是异常重要的。⁽¹⁵⁷⁾

关于速写的特点与创作要求,金丁在《抗战文艺讲座》中的观点归纳起来如下:(1)速写的特征是能非常迅速地反映那非常紧张的现实,能立刻通过形象传达给读者对那个社会现象的分析与批评。(2)速写的作者要去把握那最能表现本质的要点,而不去描写与故事上无关的细节。(3)最好的速写有这两个特点:①它的主人公往往不是一个人,而是那速写情节中的许多人,是由许多现实生活的情节,烘托出故事中必不可少的许多人;②它反映现实中的情节,往往不是一个事件,而可以写许多较有关联的事件。(4)文学的调子要非常明快。⁽¹⁵⁸⁾

为了使小说大众化,张楚琨主催的“怎样写新形式作品座谈会”认为可采用新兴的墙头小说。墙头小说的创作有如下特点:(1)可以根据一定的目的意识,规定具体的纲领,按照这个纲领,去编制故事;(2)少描写,多叙述,不要用联想来暗示主题,而要用正

确的说明来表现主题；(3)文字浅显简洁，尽量渗入口头语，要力避欧化的方法。⁽¹⁵⁹⁾

为使戏剧大众化，街头剧和活报这两种戏剧形式获得南来作者们的青睐。叶尼在《论街头剧》中指出街头剧的创作应注意三方面：(1)取材一定要现实；(2)演员和观众要配合为一，使观众产生情绪共鸣；(3)对白切忌冗长，剧本要短小扼要。⁽¹⁶⁰⁾至于活报，张楚琨认为它是一种综合了歌咏、戏剧、演讲、舞蹈等因素的戏剧形式。⁽¹⁶¹⁾

由此可见，南来作者在力倡文学通俗化与大众化时，对旧形式的改造利用与新形式的创造是十分重视的。

(三)语言的大众化

在30年代初期，由于受到鲁迅等人倡导的“大众语”的影响，新马文坛展开关于大众语的讨论。张天白在《关于“提倡大众语”》中支持实行大众语，认为这一进步主张是“深入群众的最好方法”，可以“防止旧文言的死尸复活及新文言的脱离群众”，可以使作家接近现实，深入现实的阶层，逃出脱离现实的环境”。⁽¹⁶²⁾

抗战救亡时期，通俗文学如火如荼展开时，有的南来作者提出语言大众化与通俗化的问题，认为应采用方言写作。南洋商报《狮声》主编张楚琨主催的“南洋通俗文学座谈会”指出，旧形式的问题应与方言文学联系起来，所以旧形式的利用，须完全采用方言创作，才能达到通俗的目的。⁽¹⁶³⁾叶尼在《论南洋文艺大众化运动》⁽¹⁶⁴⁾中指出文艺大众化首先要注意用语的大众化。他批评文学通俗化运动中有些作者在语言运用上所犯的两种毛病：一是采用“半白的文言”，二是“新八股”的“欧化文艺”。他认为采用大众熟悉的方言，可以使通俗文学真正大众化：

有些人以为用方言会不大众化，其实并不见得，正因为是用大众最习惯的语言，所以才能做到真正大众化的地步。

不过他也提出在利用方言的过程中,不放弃普通话文学的推进,这样能使文学的大众化获得更高级的结果:

苏联文艺用 80 种语言来推动,可说是真正地大众化,而统一的普通语言(俄罗斯语)是更发扬光大来。南洋也一样,在利用方言的过程中不放弃普通话(所谓国语)的推进……一定获得更高级的结果。⁽¹⁶⁵⁾

有的南来作者如王修慧(王惠风)在《方言文学一问题》中却不赞同通俗文学完全采用方言,认为“方言文学”“顾名思义”,只局限在通用这种方言的地方,“甲是甲,乙是乙,甲乙不通俗”,用方言写的作品许多人看不懂,不比用国语写的文学通俗。⁽¹⁶⁶⁾

有的南来作者认为要使语言大众化,应采用拉丁化新文字。金丁在《抗战文艺讲座》中指出文字之必须拉丁化,其作用不但可以消灭文盲,还可以造就新作者,而且是使抗战文艺广泛地深入群众的一种有力工具:

我们认为抗战文学的任务,不仅是使抗战文艺作品,普遍地为大众接受,我们还要在人堆中造成许多新的作者。由于生活体验的丰富,以及观点的正确,有很多并非专门写作的人,他们可以写出很好的作品来,但是他们不会写,中国的文字阻碍了他们畅所欲言地写,许多人没有这样繁多的字汇来表现他要写的话,而要等到把汉字学好再写,却起码要用两年以上的功夫。

生活的紧张、不安和艰难,已不容许人们悠闲地去慢慢识字来,一种比较容易学习的文字,却成为今日的必需。文字之必须拉丁化,其作用不但可以消灭文盲,而且还是使抗战文艺广泛地深入群众的一种有力的工具。⁽¹⁶⁷⁾

在南来作者推动下,拉丁化新文字成为文学通俗化的一种新文字。张楚琨在他主持的南洋商报副刊《狮声》每月推出一期“新文字专页”,一共刊出十余期。

在主张文学大众化与通俗化的同时,有的南来作者认为文学的大众化是在艺术范围内的大众化,不可离开艺术。杨实君在《南洋的通俗化文艺》里提出文学的通俗化决不是庸俗化,把通俗化的文艺和纯艺术的文艺对立起来,是不对的。通俗的文艺作品,并不是放弃艺术的制作,而是文艺本身的艺术的通俗化。⁽¹⁶⁸⁾桃木也认为诗歌的大众化不是抹杀艺术,而是提高艺术的。⁽¹⁶⁹⁾这显示南来作者关于文学通俗化与大众化的文学观,是较全面和中肯的。

三、文艺通讯运动

文艺通讯运动是从抗战文学派生出来的另一个文艺运动,也是战前五年新马文艺界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它主要由南来作者铁亢开展和推动。

文艺通讯运动的推行,深受中国左联在 30 年代初开展的“文艺通讯员运动”的影响。当时左联为了提高大众文化水平,将报告文学与“文艺通讯员运动”相结合。文艺通讯作者除专门文艺工作者外,还有店员、工人、学生、各种劳动者,以及一部分农村知识分子。因此,通讯报告的题材扩大至中国各个角落,反映了日本的侵略给中国人民所带来的严重祸害和中国人民的日益炽热的抗日要求。⁽¹⁷⁰⁾

对于文艺通讯运动在新马文艺界的开展经过,铁亢在 1941 年发表的《马华文艺通讯及其运动》里已有说明:

在今日的马来亚号召文艺大众参加“马华文艺通讯运动”,并不是怎样新鲜动人的举措了。远在四五年以前,便有人在谈论如何组织文艺通讯员的问题;抗战发轫以后,由于客观环境要求反映的

迫切,这问题受到一般更密切的注意。终于,在1939年,星华文艺工作者在理论的探讨之后开展实际的活动,与星加坡及其他各地组织文艺通讯员支站,负起了富有历史性的任务。⁽¹⁷¹⁾

铁亢在这个运动中扮演着推动者的角色。他于1939年11月8日和9日,在其主编的总汇报《世纪风》推出两个“文艺通讯专页”。他在《我们的话》⁽¹⁷²⁾里宣布建立“马来亚文艺通讯总站”的消息,并附有征求通讯员登记表,由此正式拉开文艺通讯运动的序幕。

(一)文艺通讯运动的意义

铁亢在《文艺通讯的写法》⁽¹⁷³⁾、《马华文艺通讯运动检讨》⁽¹⁷⁴⁾、《马华文艺通讯及其运动》⁽¹⁷⁵⁾中一再说明开展文艺通讯运动的意义:一、使马来亚活生生的现实获得迅速、广大的反映,使马华文艺更能发挥反映现实和推动现实的作用;二、培养马华文艺新干部。

铁亢在《马华文艺通讯运动检讨》中针对开展文艺通讯运动的第一方面意义阐述道:

若干年来,由于各种人事努力的限制,马华文艺几乎和现实脱节;一般工作者,不是在琐屑的“现实”上耕耘,便是不敢正视现实或歪曲现实;这种缺憾,大家企图以文艺通讯来填补它。⁽¹⁷⁶⁾

铁亢在《马华文艺通讯及其运动》中进一步阐述文艺通讯运动的第二方面意义,他说:

文艺通讯却有机关(总站和分站、支站)主持,它不但为通讯员计划工作范围,而且特别注重通讯员的培养。一个幼稚的通讯员,可能被培养为优秀文艺通讯写作者,同时可得成为优秀的报告文学者,更进而为水准以上的作家。这种培养,在今日文艺干部特别

缺乏的马来亚,正是一项极有意义的工作。⁽¹⁷⁷⁾

此外,金丁在《关于写通讯》里也指出文艺通讯在质和量上有其不可忽视的优点:文艺通讯比较容易写,在量方面一定比其他文学作品多;在质方面比其他文学作品更真实的反映广泛的社会。他进一步指出文艺通讯在抗战文艺运动中的作用:文学作品的写作与欣赏,不应该是少数人的事,但是直到现在,文学作品还不曾普遍到人群中去。因此,必须运用文艺通讯来展开抗战文艺运动。⁽¹⁷⁸⁾

(二)文艺通讯运动的组织形式

文艺通讯运动与其他文艺运动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它有具体的组织形式。铁亢在《我们的话》对其组织形式即“马来亚文艺通讯员的组织大纲”进行详细说明:

一、通讯员组织系统:

文艺通讯总站 分站 支站 通讯员

二、总站设于星洲,支站散布于农村、城市、学校、工厂、交通线等。

三、三个通讯员以上即可成立支站,遇必要时由星洲文艺通讯总站指定重要地区设立分站。

四、各级站内设组织、指导、编辑(支站暂无编辑)、服务四股。

各股工作分配如下:

1、组织股——管理组织及发展新通讯员,召集会议及负对外代表之责。

2、指导股——管理问题解答,写作指导,集体创作的推动,大众化运动的推进,研究大纲,写作大纲的制发等。

3、编辑股——管理编辑及分配稿件。

4、服务股——管理收发文件,保管文件,会计,联络,代各

分支站或通讯员购书籍刊物等。

五、文艺通讯总站由六人至九人组成，分站由五至八人组成，支站由三人至五人组成，每股推一人至三人负责。⁽¹⁷⁹⁾

铁亢在该文甚至表示准备将马来亚文艺通讯运动扩展开，至与香港、桂林、重庆的文艺通讯站取得联络。

(三)文艺通讯的写作要求

对于文艺通讯这种新文体，铁亢在《马华文艺通讯及其运动》里说明其特点是：文艺通讯是一种异于新闻报导的文体，为文艺与现实报导的结合；和报告文学速写等有些血缘，但更自由多样；新闻是枯燥和缺乏文艺气息，文艺通讯则活泼而富有文艺形象性；它和报告文学是姐妹，但更自由轻快；和报告一样，最重要的机能是迅速，全面地反映现实、批判现实和推动现实。⁽¹⁸⁰⁾

铁亢在《文艺通讯的写法》中对文艺通讯的写作方法提出具体要求，综合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要点：

一、文艺通讯必须具有真实性、明快性、时间性和地方性；

二、应该抓住一个主题，把一切材料组织起来；

三、写文艺通讯时注意这些基本常识：

(1)避免琐屑的描述；

(2)不要使用诗化的句子，尽可能吸取大众用语；

(3)尽量灵活采用对照、特写、叙述等技巧；

(4)避免概念式的报导，将那具体的事实通过形象加以反映；

(5)要用少量的文字，反映大量的事实；

(6)极力避免使用专门术语及外国文字；

(7)材料太多时可以分节写作；

(8)写作者最熟悉的事件，如亲身参与的事实和周围环境

的综合报导,但应避免日常学校生活、家庭生活和平凡的街道小景等。⁽¹⁸¹⁾

此外,铁亢在《文艺通讯的写法》里也指出文艺通讯员应具备三个条件,即:(1)要有毫不歪曲报告事实的意志。(2)要有强烈的社会感情。(3)要与被欺侮者联结在一起共同努力。⁽¹⁸²⁾

在铁亢推动下,其他南来作者也对马来亚文艺通讯运动给予大力支持。他们有的撰文讨论文艺通讯运动,如张曙生认为文艺通讯一方面应作为抗战御侮的武器,一方面应加紧深入现实的核心,摄取客观事物,创造出灿烂的艺术作品。同时也指出,文艺通讯运动应有指示写作方法的理论作中心,使每个文艺通讯员对文艺通讯都能得着充分的认识;⁽¹⁸³⁾有的在自己主持的刊物上推出文艺通讯专号或刊登讨论文艺通讯的文章,如郁达夫主编的星洲日报副刊《晨星》、桃木编辑的总汇报副刊《文会》、有秋(卢心远)主持的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等,都对文艺通讯运动进行热烈讨论和推动。⁽¹⁸⁴⁾

在南来作者,尤其是铁亢的倡导和推动下,文艺通讯运动在马来亚如火如荼地展开,几乎遍及马来亚。铁亢在《马华文艺通讯运动检讨》中指出:

十一月间在星洲《总汇报》出版的“文讯”专页,是马华“文讯”运动的第一炮,总站设在星洲建立,各处登记的约莫有十二三个单位,共四十几人。在总站推动之下,吉隆坡成立分站。在马华日报刊发专页;十几个小山芭建立支站,分隶于星隆两处;只有北马如怡保、檳城等地对于这一运动未曾反应,其余地方,正猛烈地期待着它的开展。⁽¹⁸⁵⁾

文艺通讯运动开展后,也产生一些优秀的文艺通讯,如刘思的

通讯《C市》⁽¹⁸⁶⁾通过作者三次到柔佛一个小埠C市的所见所闻,反映当地人民精神面貌的深刻变化、文化水准的迅速提高,以及高昂的抗战救亡热情。

然而,由于罗致干部人才的困难、环境的限制、帮派分歧、作者不团结等因素,文艺通讯运动虽然在刚开展时反应热烈,却无法长久维持下去,总站在征求第一次通讯员之后,便停止活动。⁽¹⁸⁷⁾1941年中以后,这一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渐渐销声匿迹了。

第五节 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角斗时期: 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时期

战后的1945年到1949年是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角斗时期,即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时期。当时马华文艺界发生一场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重大论争,对新马华文文学具有非凡意义。它是中国南来作者关于新马华文文学地方特色理论发展的最高潮,终于促成新马华文文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一、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的缘起

马华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激发下萌生起来的,在发展过程中也深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尽管一些卓有见识的南来作者一再提出南洋色彩的文学以及马来亚地方性文学的理论,认为马华新文学应具有地方特色,但由于一部分新马作者的侨民意识仍很浓厚,加上中日战争的爆发,激起新马作者强烈的抗战救亡意识,因此战前五年新马华文文学关于地方特色的理论在抗战救亡的形势下被淡化了。

战后初期新马人民掀起反殖独立运动高潮,这就要求新马作者立足于本地反映新马社会现实;另一方面,中国方面的民主运

动,也迫切要求马华文艺工作者给予大力声援,而且不少南来作者侨民意识十分浓厚,他们无视新马社会现实,大量描写中国题材,引起主张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作者强烈的不满。

为解决这二者之间的矛盾,并纠正一般“侨民作家”创作上的侨民意识,1947年1月新加坡后觉公学举行一个写作人座谈会,提出“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各报刊如星华文艺协会的《文艺》、吉隆坡《民声报》的《新风》、《星洲日报》的《晨星》也发表一些文章进行探讨,其中如南来作者杜边的《抗日卫马文艺与“华侨”文艺运动》,当时刚从中国南来的中艺人员秋枫(吴荻舟)的《文艺创造的社会基础》等。秋枫从艺术形式方面探讨“马华文艺的独特性”⁽¹⁸⁸⁾,马华作者凌佐等人则从思想内容方面强调“独特性的意义”。⁽¹⁸⁹⁾这显示大家对“马华文艺独特性”的看法不一。

接着,星洲华人文艺协会于1947年11月召开“马华文艺独特性”座谈会,主席是秋枫。与会者除佐丁(凌佐)、吴楚等外,普洛、杜边、刘思、王崑、马宁、杨嘉等都是南来作者。大家一致肯定马华文艺有其独特性,要求中国来的作家深入马华社会,反映马来亚的现实。⁽¹⁹⁰⁾

但是,随后另一南来作者周容(陈树英)发表一篇《谈马华文艺》⁽¹⁹¹⁾的论文,大力支持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倡,同时指责侨民文艺的倾向,讽刺那些与新马社会脱离的侨民作家为“手执报纸而眼望天外”来创作,使马华文艺成为中国文艺的“海外版”。

周容这篇文章受到新加坡《南侨日报》方面与中国民主同盟有关的沙平(胡愈之)、李玄(杨家驹)等人的激烈反驳,从而引发一场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大论争。沙平撰文《朋友,你钻进牛角尖里去了》⁽¹⁹²⁾,李玄发表《论侨民文艺》予以驳斥。他们都坚持马华文艺应该描写中国现实,侨民文艺的存在,并不妨碍马华文艺的发展,⁽¹⁹³⁾因此马来亚不怕有中国文艺的“海外版”,怕的是“海外版”出得太少,甚至没有。⁽¹⁹⁴⁾

之后,周容又发表《也论侨民文艺》⁽¹⁹⁵⁾答复沙平和李玄的批评。同时,另有不少作者卷入这场论战,其中有吉隆坡《新风》副刊方面的知角、海郎、光明、丘天、铁戈、马达、冰梨、符人、冠雄、引流等,《星洲日报》《晨星》方面有小郎、西樵、闻人俊,《现代周刊》杂志方面有洪丝丝、克刚等。后来,连远在香港的郭沫若和夏衍也介入这场论争。⁽¹⁹⁶⁾

这场由“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引发的大论争终于在1948年初宣告结束。星华文艺协会在1948年3月中召开第二次座谈会。座谈会记录由秋枫整理,题为《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一个报告》⁽¹⁹⁷⁾。该报告否认侨民文艺的存在,认为凡是写祖国现实的,都归入中国文艺,反映马华现实的,统称之为马华文艺。该报告再次肯定马华文艺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应具有独特性。马华文艺工作者的正确方向是努力去反映马华的现实,通过自己的艺术唤醒大众,鼓励马华大众去奋斗。

二、“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论争的焦点

这场“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论争的焦点,主要集中在马华文艺是否有独特性,是应该反映马来亚的现实,还是反映中国的现实。在这场论争中,中国南来作者由于观点分歧而各执一端。有的研究者将这场论争视为主张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侨生作家与成年后从中国南来的侨民作家之间的论争。他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在本地出生的年青作者就是主张马华文艺独特性,从中国南来的作家就是坚持侨民文学。其实这种看法并不符合论争的实际情况。当时支持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作者固然有本地侨生的西樵(赵戎)、闻人俊(苗秀)等人,但从马华文艺独特性提出后,南来作者杜边(杜仲人)、秋枫(吴荻舟)、刘思(刘世潮)、普洛(郑德松)、王堃、马宁(黄震树)、铁戈(陈果来)、马达(张天白)、丘天(丘士珍)等

都是主张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而触发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论争的作者周容(陈树英)也是南来作者,而且他们都是成年后才从中国南来新马,有的作者如秋枫甚至只是初来乍到。(详见第二章有关这些作者南来情况介绍)

周容、秋枫、铁戈、王堃、马宁、普洛、刘思等主张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南来作者认为,马华文艺具有独特性,作家应该为马来亚的人民利益服务,必须表现此时此地的现实,反映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 and 斗争,负起文学的反殖责任。周容在《谈马华文艺》中指出侨民作家是非现实主义作家,他们身在马来亚,却与当地社会现实脱离,写些回忆湘北流亡的作品,或手执报纸一张叱骂中国政府官员贪污和赞叹人民翻身的伟大,这种和马华社会脱离的侨民文艺,怎么能够对马华利益有所帮助呢?⁽¹⁹⁸⁾铁戈在《文艺独特性·任务·及其他》中认为“所谓此时此地的事件,是包含着马来亚人民现阶段的贫困,痛苦,喜,怒,哀,乐,仇恨和要求”,“马华要以马来亚人的一份子去爱护马来亚,使马来亚从殖民地变成非殖民地”。⁽¹⁹⁹⁾秋枫在《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一个报告》中也表示:

马华文艺为什么写呢?无疑的是为了马来亚的新民主革命。马华文艺为谁写呢?无疑是为马华大众写。马华文艺写什么呢?无疑的要写马来亚广大群众的生活,生活希望,和生活斗争以及暴露国特的无耻,马华社会的封建残余,以及英国在马来亚统治上的不民主和帝国主义偏向等具体现实。⁽²⁰⁰⁾

沙平、李玄等主张侨民文艺的南来作者则坚持文艺的普遍性而否定马华文艺独特性存在的必要。李玄在《论侨民文艺》中强调文艺有其普遍性,有其“此地”与“彼地”都适用的原则。马来亚“此时”的社会改革工作,也许与中国“此时”的工作有所不同,但要达到改革而获得民主自由的目的则无二致。因此一些侨民作家为了

热情所驱使,而写些叱责贪污和赞叹人民翻身的文章,与马华作家所需要写的突入现实的斗争文字,在文艺的终鹄目标上,并没有什么违忤的地方。他认为侨民文艺的存在,并不妨碍马华文艺的发展,只要在政治观点上没有错误,也该有它存在的余地。⁽²⁰¹⁾沙平在《朋友,你钻进牛角尖里去了》中也认为,马来亚是殖民地社会,所以凡是反映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封建性剥削制度与奴役制度的文艺,都是反映马来亚此时此地的现实的文艺。如果马来亚文艺在内容上应有独特性,则主要的独特性不是别的,正是周容所反对的人民翻身。除此以外,没有更适合于此时此地需要的现实了。他认为文艺形式可以是各民族的,特殊的,而内容一定是国际的,文化水准低落的国家,一定要通过翻译与介绍,把外国文艺思想移植过来,以期在本国的土壤内,产生出新品种。因此,在马来亚,作家应当努力的是多多介绍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作品,也就是要出中国文艺的“海外版”,怕的是“海外版”出得太少,甚至于没有。因为有新的种子,才有新的收获。外来的肥料,可以增进本地土壤的生产,这是极浅显的道理。⁽²⁰²⁾

此外金丁(林竹铭)的《开窗子、透空气》⁽²⁰³⁾、丝丝(洪永安)的《侨民作家与逃难作家》⁽²⁰⁴⁾等基本上站在坚持侨民文艺的立场。

三、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的内容

从总的来看,在这场论争中主张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中国南来作者占大多数,而坚持侨民文艺的南来作者则只是少数。

主张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南来作者的观点综合如下:

(一)马来亚的社会有其独特性,所以马华文艺也自有其独特性。

关于马来亚社会的独特性,铁戈在《文艺独特性·任务·及其他》⁽²⁰⁵⁾中指出,马华社会的性质情况和中国不同,马来亚是完全的殖民地,中国则是半殖民地。马来亚的华族,正如同半岛的其他民

族一样同是被帝国主义所直接统治和剥削着。秋枫在“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座谈会上总结时指出：马来亚的现实任务，有它特殊的内容。比方说中国今天是以无产阶级领导，团结各民主党派，反独裁反美帝的民主斗争，而马来亚是联合各独立要求的党派，争取自治与民主。今天华人是以来来三大民族的立场，参加这个行动的，自然也是有着与祖国不同的任务和不同的行动方式。所以从马来亚的革命的现阶段特殊任务来说，马华文艺是有其独特内容的。⁽²⁰⁶⁾

南来作者也认识到马华的文化虽然与中国文化保留着血统的关系，并且绝大地吸取着中国的文化，但由于马来亚的种族那么复杂，种族间的经济生活关系，亦使马华不可避免地受着多少外族的影响，这可从马华的语言，生活，习惯，兴趣等方面的某种程度的逐渐变化中看出。⁽²⁰⁷⁾秋枫在“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座谈会上谈道：

马印两大民族的和西欧人的生活，尤其是前两者，给了华人很大的影响，这些异族的艺术，有的已为华人熟染了，已为华人喜闻乐见了；在热带的地方的日常生活也和祖国那种酷热奇寒的，包括了寒暑温热气候的日常生活，有很大的差别。由于这种种因素的影响下，马华的生活方式与祖国社会生活方式，是有其不同的，对艺术的喜好，也自有若干不同。根据这样的社会基础创造艺术，自应有其特殊的。⁽²⁰⁸⁾

(二)马华文艺必须摆脱“侨民文艺”即“中国文艺海外版”的倾向。

由于对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认识，主张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南来作者强烈要求摆脱“侨民文艺”的倾向。周容在《谈马华文艺》中认为，马华文艺要为此地此地的人民利益服务，必须表现此时此地的现实，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 and 斗争。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学艺术的唯

一源泉,是人民生活。侨民作家是“手执报纸眼望天外”来创作,他们不必熟悉现实,不必和此时此地人民结合,不必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要求,不必熟悉他们的生活、行动、战斗,不必脚踏实地表现、关心马来亚的现实,这种和马华社会脱离的侨民文艺,怎么能够对马华利益有所帮助呢?因此“侨民文艺”的倾向,或者说中国文艺的“海外版”的倾向,必须及时加以矫正。⁽²⁰⁹⁾铁戈在《文艺独特性·任务·及其他》中指出,马华文艺 20 多年来都在跟着中国文艺运动的方向跑,而被认为是中国文艺运动的一支海外支流,主要原因是马华作者忽视了马来亚社会的性质和情况。他呼吁马华文艺必须摆脱中国文艺海外版的倾向,走自己的方向,他说:

在今天,马来亚政治运动更迫切地要求我们文艺的结合,我们不能再让马华文艺成为“中国文艺的海外支流”了!我们不能再像以前追随中国文艺运动的方向和口号跑了,我们的文艺,要有自己的方向。⁽²¹⁰⁾

(三)马华作家必须走现实主义道路。

主张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南来作者认为,马华作家必须走现实主义道路。秋枫在“马华文艺独特性”座谈会上总结时指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必须确定自己对马来亚现实的态度,认识马华文艺的独特性,他没有理由,也不会与生活的现实脱离,他必须深入马华社会,理解马来亚,写马华与马来亚。如果以旅客自居,不过问马来亚,不去注意和写他,那自然是错误的。秋枫在最后总结这场论争的记录中再次强调:马华文艺独特性的提出,目的是希望作家多注意此地的革命现实,多写此地的革命现实,配合此地的革命要求。他指出,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要写熟悉的东西,那么,他对那一地域的情况熟悉了,就可以写,也应该写。他表示中国南来的这些站在国际主义观点上来写作的进步作家,既到了什么地方,就更应该

向什么地方的人民学习,服务什么地方的人民。⁽²¹¹⁾

周容在谈到马华作家应有的创作态度时说,一个现实主义作家,要忠实于现实。他认为作家必须熟悉生活,但熟悉的应该是最有时代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生活,而不是个人生活小圈子。他说现实主义的作家固然要写自己所熟悉的东西,然而自己熟悉的东西并不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作家的创作源泉。时代要求一个作家的,不是只写他所熟悉而不为此时此地所最大需要的作品,而是要写此时此地最大要求的作品,因而他要求作家突入现实生活,去体验、熟悉和了解。⁽²¹²⁾

(四)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形式,暂时可以是中国的。

主张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南来作者虽然要求马华文艺在内容上反映此时此地的马来亚现实,但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形式,基本上同意暂时保留中国的形式。周容针对这个问题分析道:由于马华文艺向来存在着中国文艺海外版的倾向,由于语言文字的隔阂,对于巫印文艺缺乏调查、研究、介绍,因而怎样建立马华文艺的独特性,也许一时得不出具体的结论。因此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形式上暂时可以是中国的。⁽²¹³⁾铁戈认为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形式基本上应该和中国的民族形式相似,他说:

马华的文学是中国底,马华文化和中国文化有着血统的关系,马华文化,主要地是接受着中国文化而发展底,马华社会生活在今天仍大部分保存着中国固有的方式,因而,马华文艺形式底创造,是还不能不较像中国底;换句话说:从今天的马华社会基础上看来,目前的马华文艺独特性形式,和中国底民族形式还不至有多大的差别。⁽²¹⁴⁾

不过,主张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南来作者基本上都同意马华文艺形式应是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他们认为应尽可能吸收马华社会

上还流行的民间形式,尤其是马华基本来源的中国南方民间艺术,并吸收马来亚各民族的,为马华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间形式的特质,去揉和、创造,去融汇发展。尽管这些南来作者希望建立一种与祖国新文艺形式有共同处,也有差异处,独特的马华民族文艺形式,⁽²¹⁵⁾但这只是一种构想,因为始终没有出现这样的马华文艺形式。

四、马华文艺独特性论争的复杂性

这场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论争,终于以肯定马华文艺具有独特性而告终。但是整个论争的情况较为复杂,并不像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主张侨民文艺的作者都是成年后从中国南来的成名作家。当时在马来亚土生的年青诗人米军就曾发表文章,以马华文学为中国文学的海外支流,主张在本地成立“中华文艺联会马来亚分会”。⁽²¹⁶⁾而且当时主张马华文艺独特性与侨民文艺的两派作者,他们的观点也不是像有的研究者认为的那样绝对对立和不可调和。不少主张马华文艺独特性的南来作者并不排斥反映中国题材,如铁戈就认为马华作家具有双重身份,既是马来亚人又是中国人,因此也面临着双重任务,他所表现的此时此地的事件,既包含着马来亚人民现阶段的贫困痛苦,喜怒哀乐,仇恨和要求,同时也包含着马来亚人民现阶段的爱国运动和马华的爱国事件,如反美反党团,及顽固份子的活动等,因为这也是现实。他认为只要作家敢于面对现实,只要他投身于民主行列,只要他的作品是配合此时此地人民的要求的话,就不能反对他特别注意了哪一方面。⁽²¹⁷⁾有的作者对“独特性”与“此时此地”的看法也较有弹性,并未一味僵化理解,如马达的《我对于文艺论争的管见》在肯定马华文艺独特性时,认为“独特性是正面的,似乎也要容许侧面”,如高尔基逃亡到意大利,虽然也写《意大利童话》,同时也写了《我的童年》,前者是意大利的现实,后者却是俄国的背景。马达提出创

作的“时地”的宽度也应该更有伸缩性。宣传文学往往出于急就,较高度艺术的创作,就需给予较长的时间,因此除了适时的作品外,也容许反映过去某一时代的作品;创作地点也不必有所限制,作家可以把握中国的现实从事创作,只要是真正现实主义的作品就行了,民族和国际,是相互关系的。⁽²¹⁸⁾此外主张侨民文学的南来作者有的也并不完全排斥描写马来亚现实,如金丁在《开窗子,透空气》中就发挥马华作家“二重任务”论,认为没有必要把马华文艺和中华文艺在主观上划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²¹⁹⁾洪丝丝也承认马华文艺负有反映马来亚现实和服务于马来亚民主运动的任务。⁽²²⁰⁾另外夏衍(沈瑞先)在《马华文艺试论》中也是主张马华文艺“双重任务论”的。⁽²²¹⁾由此可见当时论争的双方并非水火不相容,而是有相互包容性。

这场论争的意义十分重大。1948年以后,注重此时此地,已经成了普遍的创作现象。⁽²²²⁾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主张,是中国南来作者关于新马华文文学应具有地方特色理论的更进一步发展。它是继南来作者提倡南洋色彩文学、马来亚地方性文学之后的最大收获,从此确立了新马华文文学独立发展的正确方向。

第六节 其他

以上五节论析的是南来作者在1919年到1949年各个时期的重要文学主张。南来作者注重文学社会功能的现实主义理论,对新马华文文学有着深刻的影响,新马华文文学各时期的主要创作方法,基本上沿袭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他们在各时期倡导的文艺潮流或文艺运动,如南洋色彩文学和新兴文学,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抗战文学,文学通俗化与大众化,文艺通讯运动,马华文艺独特性,等

等,都对各时期的文学创作产生重大和深远的影响,新马华文文学各时期文学创作主要体现这些文艺潮流或文艺运动的精神,也由此产生不少优秀作品。

此外,南来作者对一些文学基本原理,如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理论也进行探讨与论析。由于它们属于一般性文学原理探讨,不包括在各时期重大文艺理论体系中,因此在上文论析各时期南来作者的文学理论时没有提及,而留待这里补充论析。

一、文学创作论

南来作者关于文学创作的理论,除上文论析的各时期的文学主张外,还包括对作家本身必备条件的要求,以及文学的现实性与典型性等文学基本原理的论述。以下简略论析他们的有关论述:

(一)作家必备的条件

南来作者十分重视写作者自身必备的条件。他们认为,成功的作家,绝非一朝一夕可以达到,不是偶尔的侥幸可以获得的,⁽²²³⁾没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没有广博的学问,没有写作的技能,是写不出好的东西来的。⁽²²⁴⁾要成为一名作家,必须具有这三方面的条件:

(1)广博的世界观。

金丁在《抗战文艺讲座》中指出:“每个作者,必须站在这一时代最前面的世界观上面,从事写作。”⁽²²⁵⁾玛戈(许钟祜)在《关于艺术之产生及影响》中也指出“艺术家为时代的先驱”。⁽²²⁶⁾张曙生认为,诗人的才能不是天赋的,诗人的技巧也不是神传的。广博的世界观是促成人们为诗人的主观条件。诗人也需比一般人们具有更敏锐的感官,他能在很微小的地方窥见广大的天地。诗人的艺术才能完全建筑在这里。⁽²²⁷⁾

(2)文学的素养。

钟之陵(郑文通)在《一个作家的必要条件》里指出,一个作者,至少要先懂得文学是什么,要明了文学的变迁,与古今的异同,然

后始有摇动笔杆,着手去创作的资格。⁽²²⁸⁾天(洪为济)在《由〈秘密的日本〉说到散文的创作》中谈到散文的创作经验时说,高尔基写文艺的散文,鲁迅写杂文,都由于他们异常的努力和有极高的文学素养才成功的。⁽²²⁹⁾

(3)生活的体验。

南来作者对于作者的生活体验是十分重视的,他们在谈到作者必备的条件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强调作者要体验生活、观察生活。陈炼青在《论创作与体验》中以高尔基为例,强调作者体验生活的重要性,批评那些一味迷信书本,轻视体验的错误观念。⁽²³⁰⁾老舍谈到自己创作《骆驼祥子》时,曾花了半年时间亲身到洋车夫家里,到茶馆去观察和体验他们的生活,从而创造出令自己满意的作品。他认为亲身体验生活是十分重要的。⁽²³¹⁾

郑文通也认为作家不能抛弃自身观察探讨人类生活诸般形态的责任,要对生活的训练投下精力。他批评一些普罗文学作者关在洋房里闭门创作,以致写出来的作品不符合现实生活。⁽²³²⁾

(二)文学的现实性

由于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南来作者在探讨文学创作理论时,大多主张文学现实性。他们认为:

(1)文学应来源于现实生活,并能反映现实的本质。

金丁在《抗战文艺讲座》里指出,一切文艺创作的根源并不是文艺写作者的什么观念、感觉、心理乃至作者的天分等等,而是作者的生活。⁽²³³⁾天白(张天白)在《文艺写作底热情》中也宣称:“文艺不是凭空的想象,也不是凭空的幻写,应该是:真实的生活的描写,时代热情的涌现。”⁽²³⁴⁾石韞真在《题材论》中认为“文学是表现人生的,并不是仅仅发泄个人的情感”,文学是应尽自己的力,来表现整个人生。⁽²³⁵⁾老蕾(许清昌)在《论文艺作品与批评问题》中表示,文艺作品必须是从生活中提炼出来,并能反映生活的本质。他认为文学作品只有能够从现实的表皮去掘发现实的核心,这样不

仅是真切感人,而且可能得到更高的评价。⁽²³⁶⁾

(2)作者应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

由于南来作者坚持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因此他们强调作者应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样才能如实地反映现实。石韫真在《题材论》中认为“文学青年们与其写些他所未知的,超出自身阶层的东西,不如暂时把握着自己能够体验出来的,自身阶层的文章为妙”。⁽²³⁷⁾铁亢在《文艺通讯的写法》中谈及文艺通讯的写作常识时,要作者写自己最熟悉的事件。他认为可以从两方面摄取材料:一是亲身参与事实,二是周围环境的综合报导。⁽²³⁸⁾

(3)作品应能够指导生活,创造人生。

张曙生在《现阶段马华文艺现象与本质的诸检讨》中,认为马华文艺军应指导华人大众跑上求民族解放,求生活改善,求社会权益,地位平等之路。⁽²³⁹⁾金丁在《苏联几部文学名著》中指出高尔基的作品《大灾星》和《莫尔多姑娘》“激起了我们对于生活的淤浊与黑暗的愤怒,也鼓励了我们对于光明的向往与追求”。⁽²⁴⁰⁾陈炼青在《文艺批评与南洋社会的需要》里指出,文艺的使命是包括“批评人生,指导人生,和创造人生”三大要素,他尤为注重文学在创造人生方面的重要作用。⁽²⁴¹⁾晓光(张天白)在《文艺的现实性》认为文艺是“对于生活的认识”,也是“对于生活出路的指示”。⁽²⁴²⁾

(三)文学的典型性

文学典型性是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中的重要部分,它可以是具体的典型人物,也可以是典型事件与典型环境等。现实主义关于文学典型性的理论对南来作者产生一定的影响,他们对于小说中典型人物的创造方法,尤有详细的论述:

(1)典型人物必须具有代表性。

李冰人在《小说中的典型人物》中认为,典型人物应有职业性、阶级性和民族性,即要有“类性”的性格。他以鲁迅《阿Q正传》为例,认为阿Q这个典型是由各等类人物综合而成的,具有“类型”

性格的典型人物。⁽²⁴³⁾

(2)典型人物须有独特鲜明的个性。

李冰人认为典型人物如果只具有“类性”性格,是称不上典型性的,还须有鲜明独特的个性。他认为作家笔下的典型人物,还要有他独特的思想、性格、习惯等,这样的描写才是成功的。⁽²⁴⁴⁾金丁在《苏联几部文学名著》中批评初期的苏联文学重视人物群性,而忽视鲜明生动的人物个性;只有集体的主人公,而没有个人的英雄。⁽²⁴⁵⁾

(3)典型人物的形象要有社会意义。

李冰人对小说中人物形象的作用十分重视。他认为典型人物的形象须包含着社会的教训,才能扩大和深化读者对人类与生活的认识;否则即使作者能稍成功地特别作出了一个人的照片,这样的创作仍不算是一篇绝妙的作品。⁽²⁴⁶⁾金丁在《苏联几部文学名著》中指出苏联文学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往往是有理想又有行动的人物。作者恰如其当地强调了人类的意志和智慧在改造社会的作用,强调了理论对于实践的影响。⁽²⁴⁷⁾

(4)塑造典型人物的方法。

金丁认为在塑造典型人物时,应把人物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来表现他们的理想和行动,从而创造出鲜明生动、富于人性的人物形象。他指出在苏联文学作品中,人不是简单地作为抽象的心理解剖的东西,人们的喜怒哀乐,是在为人类平等,而从事现实斗争的具体环境中表现出来的,是历史上的人性。⁽²⁴⁸⁾

李冰人认为作家在塑造典型人物之前,对于人物的各部分,应有精密的分析,深刻的了解,然后先从人物的职业特性和阶级特性着手,才进而描写人物的自我的思想、个性。⁽²⁴⁹⁾李冰人关于典型人物的塑造,实际上已涉及想象与虚构的方法。

天(洪为济)谈到他的散文《秘密的日本》创作经验时,指出文艺作品与报纸新闻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运用了想象的方法。他认

为文学不一定要具有生活的真实,也可以进行适当的想象与虚构,只要具有典型性,就能达到艺术的真实。⁽²⁵⁰⁾

金鉴(郑卓群)在《马华文艺现实化问题》里检讨马华的小说创作和报告文学时,曾论及文学的典型性问题。他指出有的作者所描述的故事只是“琐屑”和“零星”的,不具备“普遍”意义,这些都“离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极远”,因为“现实主义的马华文艺是在使一般的、典型的‘人’直立起来,而决不是以个别的事象来代替一般事物的本质”。⁽²⁵¹⁾

二、文学批评论

南来作者关于文学批评的基本原理的探讨,主要涉及到文学批评家的素养与态度、文学批评的任务、文学批评的标准与方法等方面,有的作者还提出整理马华文运史料的问题,因为这也是文学批评工作重要的一环。他们在探讨文学批评基本原理时,也重视外国文艺理论的介绍。下面简略论析南来作者的文学批评理论。

(一)文学批评家的素养与态度

(1)文学批评家的素养。

南来作者对文学批评家的素养十分重视。陈炼青在《南洋的文艺批评》里指出,“没有一个文艺批评家不需要夙养而能成就”,“有志于做文艺批评者千万不可忽视”。⁽²⁵²⁾鸣珠(郑卓群)在《漫谈马华文艺理论批评界》中表示,马华文艺理论和批评的能否进步,几乎全是文艺工作者的修养问题。⁽²⁵³⁾

南来作者认为文学批评家应具备这几方面的素养:

A. 正确的世界观。钟之陵(郑文通)在《似乎“言之过早吧”——关于文艺批评适当与否的问题》指出,文艺批评者必须站在社会客观的立场上,理智的安心定性地摇着笔杆,用时代的眼光去认识一切的作品,而确定它的命运。⁽²⁵⁴⁾一村(吴广川)在《编后——并略谈批评》里也认为文学批评家应该有客观明确的认识,才

不会失却他作为批评家的使命。⁽²⁵⁵⁾老蕾认为一个批评家须有正确的世界观,才能对作品进行中肯的批评,他的批评是根据现实主义的,否则“不是给宗法主义的铁钳钳住了,就是被丢入片面的,或‘主观’的泥潭,无法自拔”!⁽²⁵⁶⁾

B. 广博的知识。南来作者认为文学批评家须有广博的知识,才可能胜任批评的工作。陈炼青在《南洋的文艺批评》里提出,文学批评家“不但要有艺术的品味,并且还要多方面的学识,例如社会、政治、经济、哲学、人类学等科学,皆须有深刻的研究,正确的了解”,才能透视时代的全图,指示作家以正当的道路,纯正的思想。⁽²⁵⁷⁾钟之陵在《似乎“言之过早”吧?——关于文艺批评适当与否的问题》中认为,文学批评者要负起观察作品与估量其艺术价值的工作,就不能不有文学的素养。⁽²⁵⁸⁾

C. 冷静的头脑。陈炼青在《南洋的文艺批评》里指出,批评者应有“沉静的观察人生,和观察人生的全体”此种态度,“始不致仅看人生的黑暗面(或光明面)而不能把握着它的全部,无论外或内,过去与未来”。批评家“绝对不能像做普遍政治家的宣传文字那样的只一味呼号,只一味热烈便完事。如此才能悦服人心,接近真理”。⁽²⁵⁹⁾

此外,南来作者认为文学批评者还须具备其他的条件,如朱绪(朱桂棹)《提高剧艺水准》中指出剧评家应有充分的社会生活体验,才能对戏剧的演出有明确的评价。⁽²⁶⁰⁾陈炼青认为批评家须有一颗大公无私的心,与一副纯客观的头脑,须有灵敏的观察力。⁽²⁶¹⁾吴广川则提出批评家应有锐利的见解,才能完成批评的使命。⁽²⁶²⁾

(2)文学批评家的态度。

南来作者在阐述文学批评理论时,十分强调文学批评家要有正确的态度。他们认为文学批评家在从事文学批评时,应该有:

A. 亲切善意的态度。老蕾在《论文艺作品与批评问题》中指出:批评家要与作者保持“亲切”的态度,万不可摆出教训“人家的

架子，”批评家也需要同样的向作家学习。⁽²⁶³⁾陈炼青在《文艺批评在南洋社会的需要》中表示“文艺批评家，偶有涉及作品之处，他们批评的只是作品的本身，绝对不能涉及个人的人格；如有指摘，应该是诚恳的善意的，绝对不应该涵有一些儿的恶念”。⁽²⁶⁴⁾老蕾认为批评文学作品，要“力避攻讦作者的私生活”，或“牵涉到创作家的私生活”。⁽²⁶⁵⁾流浪在《关于批评的态度》中也持同样看法，不过他认为“友善”不是把批评的标准降低，更不是“取消”或“削弱”自己的主张的意思，它含有“说服”的意义在内。⁽²⁶⁶⁾

B. 客观公正的态度。陈炼青在《我们批评家》中指出，文坛上所谓批评是不离“恭维与攻击”，即朋友之间互相恭维，对于异己却吹毛求疵肆意攻击谩骂。他认为这种失之公正客观的批评态度，是造成作家对批评家轻蔑与鄙视的心理。⁽²⁶⁷⁾鸣珠（郑卓群）在《漫谈马华文艺理论批评界》里指出这种“朋友主义”的批评态度，其消极面“只有吹捧而已”，对于“文艺创作或者文艺运动”，“都不能尽她的任务，并且妨碍了文艺界的进展”。⁽²⁶⁸⁾

南来作者认为文学批评家的态度应该是客观公正的。陈炼青在《南洋的文艺批评》中指出：“真正的文艺批评者应该没有党同伐异的成见”，“他的态度是公允的、忠实的、诚恳的、善意的”。⁽²⁶⁹⁾郑文通在《似乎“言之过早”吧？——关于文艺批评适当与否的问题》认为文学批评家应有一个忠实的态度，而不能以个人的爱憎作为毁誉作品的标准。他指出：批评文章“需要拿出严肃的面孔，和平的意气，尤其是忠实的态度，把作品放在技巧与意识互为构成的天秤上，给他一个大公无私的权衡”。⁽²⁷⁰⁾老蕾在《论文艺作品与批评问题》里认为批评文学作品，“不能偏重于个人的印象，也不能杂以友情作用”，而应“正视作品的分析、指摘、纠正、补充”等。⁽²⁷¹⁾

不过，对于文学批评者的态度是否应该纯客观的问题，有的南来作者提出不同看法。横光（王惠风）在《创作的批评》中认为文学批评不是一种纯客观的工作，而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批评的通

过个人的感受、观点、见解,是主观的,但感受的观点,观点的根据,见解的真实性,就是客观的”。⁽²⁷²⁾

(二)文学批评的任务

南来作者认为文学批评负有这三方面的任务:

(1)指导写作,开避正确创作途径。

流浪在《关于批评的态度》中指出批评的任务在于“指示或创作家或创作者,应该如何去体验实生活,摄取创作题材,及运用表现的手法,以期适应大众的要求”。⁽²⁷³⁾李润湖在《一九三六年的马来亚文坛》中提出文学批评的任务是指导作家在创作时树立什么“任务”和什么“观念”,“评判,可以在理论上修养自己,可以正确地理解和估量艺术的作品”。⁽²⁷⁴⁾

陈炼青在《文艺批评在南洋社会的需要》指出,“因为批评家会努力传播思想、激荡潮流,以便作家得有丰富的营养、充实的理智,和正确的道路,然后作家才可利用它来反射到作品上去。像这样,写出来的作品才有价值,才符合于批评人生指导人生和创造人生之意义”。⁽²⁷⁵⁾

(2)建立南洋文学的基础。

陈炼青在《文艺批评在南洋社会的需要》中指出,“南洋因环境的特殊,有另辟新途径,建树南洋文学的必要;而负着鼓吹的责任,必然地需要南洋文艺批评家”,“真正的批评家好像是一个开辟荒径者,用他的犁锄,用他的双手,在烈日之下工作着,把芜秽而崎岖的地方铲除,而现出一条平坦的大道来”。⁽²⁷⁶⁾

(3)评介作品,促成伟大文艺的萌芽。

郑文通在《似乎“言之过早吧”——关于文艺批评适当与否的问题》指出,文艺批评者应责无旁贷地切实负起观察作品与估量其艺术价值的责任。⁽²⁷⁷⁾老蕾在《论文艺作品与批评问题》中认为对文艺作品的评介批判,可以提高作品的质量,使其可能向更高的阶层发展。⁽²⁷⁸⁾陈炼青在《南洋的文艺批评》认为真正的文艺批评是

“时代的喇叭”，将“促成伟大文艺之萌芽”。他表示只要批评家肯努力，文艺创作的前程将是伟大光明的。⁽²⁷⁹⁾

(三)文学批评的标准与方法

(1)文学批评的标准：

从南来作者的文学批评理论来看，他们的批评标准基本上是这两种，即：

A. 美学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林独步在《论艺术与道德之关系并所望于评剧家和编剧家》中指出，文学批评的标准是美感与功利的统一，“自古以来文艺之目的，常常往来于两个方面，一是快乐，一是利用，而其依归在‘美’之一字”，“所以文艺要同时具有利用和快感两要素”，而这两要素是要“化合为一的，不是混合散漫的”。⁽²⁸⁰⁾

老蕾在《论文艺作品与批评问题》中指出，“文艺的社会性是重要的，然而文艺技巧的运用上也应同样的注意。虽说‘内容决定形式’，然而它不是要我们去抹杀形式的作用”，“所以我们要求批评家对作品的批评，要能够把握美学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²⁸¹⁾

B. 时代的标准。这一批评标准是陈炼青提出的。陈炼青在《南洋的文艺批评》和《文艺批评在南洋的社会需要》里提出文艺的批评应以“时代”为标准。他认为“批评家无论批评什么作品，他那唯一的标准，便是一个‘时代’。时代需要那种文艺，它的重心在那里，其标准就建筑在那里。时代是演进的，故其标准也就因之而推移”，“我们现在要批评一种文艺作品，我们就先要明了这个时代的重心是在什么地方，并透视南洋社会的全图，然后因时代之需要而得到一个正确的标准”。⁽²⁸²⁾

(2)文学批评的方法。

在南来作者中，能够具体提出批评方法的，只有陈炼青和铁亢（鸣珠）。他们两人的批评方法，都是注重从整体的宏观的角度去批评作家和作品，而反对孤立和缺乏联系地评论作品。陈炼青在《南

洋的文艺批评》指出：“不专批评某一篇作品和某一个作家，关于文艺理论的建树、引申、阐明；关于纯正思想的指示、解释、传播，这些都是批评家一种神圣的工作、积极的任务。”他继而提出批评方法是：“除第一步先透视何种作品是时代需要之外，第二步就是检查作品里头所表现的事物和所反映的意识；第三步就要探讨作者对于社会和人生是取着何种程度，和与时代环境的关系；最后，才讨论作品中的技巧和情节。”⁽²⁸³⁾

鸣珠的批评方法是紧密联系文学创作与文艺运动的。他不满足于那种寻章摘句式的批评方式。他在《漫谈马华文艺理论批评界》⁽²⁸⁴⁾中批评马华文艺理论界存在的“注释或抄录主义”，认为这种琐碎的批评方式对作者毫无益处。他提出的文学批评方法是：

A. 每篇批评必须指出那作品（或戏剧的演出）的社会意义，特别要从马华文艺的规律性及其他应具有的特质上去指出，从马华救运的现实基础上去指出。

B. 应该指出那作品（或演出）以后的正确方向，说明应该怎样怎样，才能使马华文艺进一步发展。

C. 将以前的文艺劳绩作为底子，从作品的表现方法方向，或者演剧艺术方面，考察他的成就。

（四）整理文艺运动史料

整理文艺运动史料，是文学批评的重要一环，也是具有重大实践意义的一项工作。早在战前的1941年，南来作者陈村（黄望青）就发表《关于整理马华文运史料的建议》，率先提出这一问题。稍后的1948年，南来作者马达（张天白）在《我对于文艺论争的管见》也重提这一建议。这显示南来作者在探讨与研究文学批评理论时，已意识到整理文运史料对马华文艺运动的重要意义。

但是除陈村与马达外，似乎尚无其他南来作者提出这一问题。下面综合他们这两篇论文，从中见出他们关于整理文运史料的观点：

(1)整理马华文运史料的意义。

马达在《我对于文艺论争的管见》中表示：马华文艺的素材是非常丰富的，可是救亡时期、沦陷时期，以及战后争取自治的合法斗争时期三个重要阶段的面貌，还没有较为完整的巨著去反映，而一些生动有力的零星作品，也未曾搜集起来，编成文艺运动的总集，这是马华文艺界说来惭愧的事，希望有人提早加以完成。⁽²⁸⁵⁾

陈村在《关于整理马华文运史料的建议》⁽²⁸⁶⁾中提到整理马华文艺运动史料有两方面意义：一是可以了解过去的新马文学史，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以求将来提高与发展；二是只有在了解马华文运发展史后，才能依照两大基本方向（服务于祖国抗战与马华救运，建立马华新民主主义文化），来确定马华文运今后的发展方向，最后达至马华新民主主义文化体系的真正建立。

(2)整理马华文运史料的方法。

陈村在《关于整理马华文运史料的建议》中提出几点整理办法：

其一：应该从动的事物互相联系演变观点上，从近十年来祖国民族解放运动，马华救运以及马华文化运动的发展上，来理解每一时期每一地域每一部门每一集团或甚至个人的文化史迹，确定其内容、特点、成就、缺点，与其承先启后的作用，以便从局部的整理中完成马华文化史全貌的认识。

其二：要求马来亚过去或现在的每个副刊杂志编辑，每个文艺团体、诗社、剧团、合唱团、研究班，座谈会的成员或负责人，每个曾以发动或参加任何一次文化运动的文化工作者，能够依照上述原则，站在纯客观的立场，把该副刊、杂志、集团、运动的经过情形与时代意义，作成一个个的报告书，在报章杂志上发表出来，使零星的文运断片首先变为史料，以备全盘整理时之用。各副刊杂志应该尽量刊载这种报告书，或由有关集团以单行本方式刊印发行。

其三：全马文化工作者，不论是诗人，小说家，剧作者，理论家，

歌手,画家,如果在创作过程中,曾经有所贡献于马华文运,应该根据自己与马华文运的创作关系,作一个纯客观的史底叙述,从个人反映全盘,以补充上点之不足。

其四:如果有耐心苦干的文化工作者,手头存有系统的材料,如像每一时期或每一部门的报章杂志,应该花费多少工夫,把它们整理出来,使得我们或者可以得到1937年马华文运的初稿,或者可以得到四年来马华文艺运动的初稿,这种工作对马华文化史的完成帮助是很大的。

其五:全马各地耐心苦干的文化工作者,从今天起应该集合有志于此事的同道,纷纷建立地域或一部门的整理委员会,来注意搜集和整理自己可以得到的材料,采访接取其他文友发表的材料,然后在适当时机,集合全马文运工作者,再作一个全盘的整理,就可以多少总结我们过去的历程,把马华文化史的骨口建立起来,以俟日后进一步的添补充实。

(五)译介外国文艺理论

南来作者对于外国文学理论的翻译和介绍也很重视。早在马华新文学萌芽时期,南来作者林独步已开始从事外国文学理论介绍工作。他于1923年2月至6月间,在《新国民日报》副刊《新国民杂志》发表翻译论文《辞解》,其中有关外国文艺流派如“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拟古主义”等的介绍,对当时新马文坛是一种新知识。稍后的曾圣提、林参天、金丁等南来作者,也陆续向新马文艺界介绍外国文学作品与文艺理论,如大吉(曾圣提)的《波斯之艺术及教化》⁽²⁸⁷⁾、林参天的《戏剧批评概观》⁽²⁸⁸⁾、金丁《一年来的苏联文学》⁽²⁸⁹⁾等,这对于丰富新马华文文学文艺理论,无疑具有一定的作用。

注 释

(1)痴鸠(张叔耐)《例言》,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19年10月1日

至6日。

- (2)克非(刘克非)《本报宣言》,见《益群报》,1922年5月5日,6日,7日,8日,11日,12日。
- (3)同(1)。
- (4)林独步《论艺术与道德之关系并所望于评剧家与编剧家》,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2年4月5日至7日。
- (5)林独步《新文学概论》,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2年10月18日至11月25日。
- (6)林独步《自然美与人工美》,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2年10月10日至30日。
- (7)同(4)。
- (8)同(5),1922年11月25日。
- (9)同(4)。
- (10)同(6)。
- (11)同(5),1922年10月28日。
- (12)同(5),1922年11月13日。
- (13)同(1)。
- (14)杨松年、周维介《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 1927—1930》(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0),页12。
- (15)T. P. (谭云山)《这是什么》,见《叻报·星光》,1925年10月9日。
- (16)炼青(陈炼青)《南洋的文艺批评》,见《叻报·椰林》,1930年9月15日。
- (17)同(16)。
- (18)杨松年《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析论》(甲集)(新加坡:同安会馆,1986年),页107。
- (19)编后话《尾巴的尾巴》,见《益群报·枯岛》,1928年10月25日。
- (20)同(15)。
- (21)南奎(段南奎)《本刊今后的态度》,见《叻报·星光》,1926年4月12日。
- (22)子孟(邹子孟)《再向读者说几句》,见《叻报·星光》,1926年8月9日。
- (23)同(21)和(22)。
- (24)撕狮《漫浪南洋一年的荒岛》,见《新国民日报·荒岛》,1928年2月2日。

(25)同(14),页93。

(26)圣提(曾圣提)《〈文艺周刊〉的志愿》,见《南洋商报·文艺周刊》,1929年1月11日。

(27)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一集导言》(新加坡:世界书局,1972),页9。

(28)炼青(陈炼青)《编者第二次献词》,见《叻报·椰林》,1929年7月24日。

(29)炼青(陈炼青)《文艺与地方色彩》,见《叻报·椰林》,1929年9月23日。

(30)同(16)。

(31)炼青(陈炼青)《文艺批评在南洋社会的需要》,见《叻报·椰林》,1929年7月26日。

(32)同(19)。

(33)旧燕(陈天放)《〈南洋的文艺〉发刊的说明》,见《南洋商报·南洋的文艺》,1929年12月9日。

(34)林姗姗《〈南国的雨声〉前奏曲》,见《光华日报·南国的雨声》,1930年8月25日。

(35)同(29)。

(36)同(29)。

(37)同(29)。

(38)同(29)。

(39)同(26)。

(40)圣提(曾圣提)《醒醒吧!星城的艺人》,见《南洋商报·文艺周刊》,1929年1月18日。

(41)同(34)。

(42)同(33)。

(43)同(16)。

(44)同(31)。

(45)同(16)。

(46)大男(曾圣提)《南洋的文艺》,见《南洋商报·文艺界》,1929年1月1日。

(47)玉羊(曾曼方)《马来民间传说之研究》,见《檳城新报·轮》,1933年5月9日。

- (48)《“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页1。
- (49)郭沫若《革命与文学》,见《创造月刊》第1卷第3期,1926年5月6日。
- (50)蒋光慈《关于革命文学》,见《太阳月刊》2月号,1928年2月1日。
- (51)编后话《尾巴的尾巴》,见《益群报·枯岛》,1928年9月20日。
- (52)六叔(许杰)《恋爱文学之没落》,见《益群报·枯岛》,1928年9月27日。
- (53)编后话《尾巴的尾巴》,见《益群报·枯岛》,1928年11月30日。
- (54)衣虹(潘受)《新兴文学的意义》,见《叻报·椰林》,1930年4月16日。
- (55)衣虹(潘受)《新兴文学的背景》,见《叻报·椰林》,1930年4月17日。
- (56)衣虹(潘受)《新兴文学之历史的使命》,见《叻报·椰林》,1930年4月18日。
- (57)衣虹(潘受)《新兴文学的内容问题》,见《叻报·椰林》,1930年4月21日。
- (58)衣虹(潘受)《新兴文学的形式问题》,见《叻报·椰林》,1930年4月24日。
- (59)衣虹(潘受)《新兴文学的大众化问题》,见《叻报·椰林》,1930年5月3日。
- (60)同(54)。
- (61)同(54)。
- (62)同(54)。
- (63)同(56)。
- (64)同(56)。
- (65)同(57)。
- (66)同(57)。
- (67)张冲(张楚琨)、炼青(陈炼青)《椰林通讯——关于新兴文学几个问题的讨论》,见《叻报·椰林》,1929年8月30日。
- (68)同(59)。
- (69)罗依夫《充实南洋文坛的问题》,见《南洋商报·曼陀罗》,1929年5月31日至6月14日。
- (70)同(59)。
- (71)同(59)。
- (72)同(67)。

(73)同(40)。

(74)六叔(许杰)《时代精神与地方色彩》，见《益群报·枯岛》，1928年12月14日。

(75)同(28)。

(76)同(67)。

(77)未兆(陈炼青)《左》，见《叻报·椰林》，1930年1月18日。

(78)炼青(陈炼青)《〈椰林〉的再革新》，见《叻报·椰林》，1930年2月14日。

(79)炼青(陈炼青)《编后》，见《叻报·椰林》，1930年3月1日。

(80)半鰆(李铁民)《〈狮声〉编者附语》，见《南洋商报·狮声》，1934年3月1日。

(81)C君(梁志生)《地方作家介绍的商榷》，见《南洋商报·狮声》，1934年3月5日。

(82)则余《地方作家谈的检讨》，见《南洋商报·狮声》，1934年3月5日。

(83)废名(丘士珍)《总算是我抛了一块〈地方作家谈〉的砖》，见《南洋商报·狮声》，1934年3月9日。

(84)C君(梁志生)《显微镜下废名先生的理论的细察》，见《南洋商报·狮声》，1934年3月16日至17日。

(85)见《南洋商报·狮声》，1934年3月19日。

(86)废名(丘士珍)《地方作家谈》，见《南洋商报·狮声》，1934年3月1日。

(87)同(86)。

(88)同(86)。

(89)同(86)。

(90)同(86)。

(91)同(86)。

(92)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新加坡：世界书局，1969)，页157。

(93)杨松年《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新加坡：同安会馆，1990)，页90。

(94)同(27)，页17。

(95)曾艾狄《马来亚文艺界漫画》，见《星洲日报·出版界》，1936年9月2日。

(96)一礁(陈子彬)《关于马来亚文学的诸问题》，见《星洲日报·晨星》，1936年9月22日。

- (97) 马达(张天白)《一九三六年马来亚文坛》，见《星洲日报·新年特刊》，1937年1月1日。
- (98) 一礁(陈子彬)《零零碎碎——给曾艾狄先生》，见《星洲日报·晨星》，1936年10月19日。
- (99) 同(98)。
- (100) 同(97)。
- (101) 林参天《马来亚文艺沉寂的原因》，见《星洲日报·新年特刊》，1935年1月1日。
- (102) 王哥空《一九三五年的马来亚文坛》，见《新国民日报·新年特刊》，1936年1月1日。
- (103) 李润湖《一九三六年的马来亚文坛》，见《新国民日报·新年特刊》，1937年1月1日。
- (104) 同(97)。
- (105) 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副刊论析》，见《东南亚华文文学》(Goethe-Institut Singapore, 1989)，页50。
- (106) 同(101)。
- (107) 同(96)。
- (108) 同(96)。
- (109) 林之间(陈子彬)《关于〈浓烟〉》，见《星洲日报·晨星》，1937年2月3日。
- (110)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理论批评二集导言》(新加坡：世界书局，1971)，页1~2。
- (111) 吴天(洪为济)《论战时文艺》，见《星中日报·新年特刊》，1938年1月1日。
- (112) 絮絮(丘絮絮)《论文艺通俗化问题》，见《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11月25日。
- (113) 更生《文学问题漫谈》，见《星洲日报·晨星》，1937年8月9日。
- (114) 丘康(张天白)《七七抗战后的马华文坛》，见《星洲日报·新年特刊》，1939年1月1日。
- (115) 同(111)。
- (116) 一息(李一息)《文艺的现实性》，见《总汇新报·世纪风》，1939年7月

26 日。

(117)丁倩(张业隆)《抗战文艺的多样性》,见《南洋月刊》第2期。

(118)张楚琨《〈文章漫谈〉读后》,见《南洋商报·狮声》,1938年8月30日。

(119)金丁(林竹铭)《抗战文艺讲座》,见《南洋商报·狮声》,1938年1月26日至5月20日。

(120)张曙生《现阶段马华文艺现象与本质的诸检讨》,见《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10月21日至25日。

(121)同(112)。

(122)同(111)。

(123)同(120)。

(124)同(119)。

(125)巴人(王任叔)《展开反法西斯文学运动》,见《南洋商报·狮声》,1941年9月21日。

(126)同(120)。

(127)实君(杨实君)《南洋的通俗化文艺》,见《南洋商报·狮声》,1938年11月29日。

(128)巴人(王任叔)《关于反侵略文学》,见《南洋商报·狮声》,1941年9月21日。

(129)杨骚(杨维铨)《以纸弹配合子弹》,见《南洋商报·狮声》,1941年9月21日。

(130)金丁(林竹铭)《在反侵略的目标下团结起来》,见《南洋商报·狮声》,1941年9月9日。

(131)铁亢(郑卓群)《论马华文艺》,见《南洋商报·今日文学》,1940年8月30日,31日,9月3日。

(132)同(119)。

(133)同(110),页3。

(134)同(112)。

(135)同(111)。

(136)桃木(王崑)《漫谈诗歌大众化》,见《总汇报·文会》,1940年4月16日。

(137)同(112)。

(138)林锦《战前五年新马文学理论研究》(新加坡:同安会馆,1992),页79。

- (139)同(127)。
- (140)上官豸(区文庄)《漫谈“通俗文学”》，见《星洲日报·晨星》，1938年7月3日。
- (141)叶尼(洪为济)《论南洋文艺大众化运动》，见《南洋周刊》第30期。
- (142)同(119)。
- (143)同(140)。
- (144)同(141)。
- (145)同(127)。
- (146)金丁(林竹铭)《南洋文艺通俗化运动的几个问题》，见《南洋周刊》第31期。
- (147)同(141)。
- (148)陈南纪录《“章回小说”座谈》，见《南洋商报·狮声》，1938年12月24日。
- (149)流浪(刘道南)纪录《“诗歌”座谈》，见《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2月17日至18日。
- (150)拉因(冯蕉衣)《谭诗歌的形式问题》，见《星洲日报·晨星》，1940年8月17日。
- (151)流浪(刘道南)纪录《“民歌与小调”座谈会》，见《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1月25日至26日。
- (152)流浪(刘道南)《略论“大鼓”》，见《南洋商报·今日文学》，1937年11月29日。
- (153)同(141)。
- (154)同(127)。
- (155)老蕾(许清昌)《关于马来亚的报告文学》，见《总汇新报·世纪风》，1939年10月26日。
- (156)上官豸(区文庄)《对马华报告文学的小提供》，见《总汇新报·世纪风》，1939年10月7日。
- (157)同(155)。
- (158)同(119)。
- (159)陈如旧、饶箭纪录《怎样写新形式作品座谈会》，见《南洋商报·狮声》，1938年4月15日。

- (160)叶尼(洪为济)《论街头剧》，见《星洲日报·晨星》，1938年11月26日。
- (161)陈南、文通(郑文通)纪录《“甚么是新形式”座谈会》，见《新国民日报·新园地》，1939年3月25日。
- (162)天白(张天白)《关于“提倡大众语”》，见《星洲日报·晨星》，1934年12月26日。
- (163)实君(杨实君)纪录《南洋的通俗文学座谈会》，见《南洋商报·狮声》，1938年11月24日。
- (164)同(141)。
- (165)同(141)。
- (166)王修慧(王惠风)《方言文学一问题》，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文学》，1939年2月1日。
- (167)同(119)。
- (168)同(127)。
- (169)同(136)。
- (170)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上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页336。
- (171)铁亢(郑卓群)《马华文艺通讯及其运动》，见《马华文艺丛谈》(新加坡：维明公司，1956)，页73。
- (172)铁亢(郑卓群)《我们的话》，见《总汇新报·世纪风》，1939年11月8日。
- (173)铁亢(郑卓群)《文艺通讯的写法》，见《总汇新报·世纪风》，1939年11月8日。
- (174)铁亢(郑卓群)《马华文艺通讯运动检讨》，见《文艺丛谈》，1941年3月31日。
- (175)同(171)。
- (176)同(174)。
- (177)同(171)。
- (178)金丁(林竹铭)《关于写通讯》，见《南洋商报·狮声》，1938年5月4日。
- (179)同(172)。
- (180)同(171)。
- (181)同(173)。
- (182)同(173)。
- (183)张曙生《发展马华文艺通讯的基本认识》，据林英屏《展开马来亚文艺通

讯运动》，见《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12月15日。

- (184)郁达夫主编的星洲日报《晨星》发表林英屏《展开马来亚文艺通讯运动》(1939年12月15日)，施五《漫谈通讯》(1940年7月26日)，鸣珠(郑卓群)《关于报告文学和文艺通讯》(1940年9月4日)，金箭(郑卓群)《马华文艺大众化和文艺通讯运动》(1940年11月27日)，紫军《展开马华文艺通讯运动》(1941年5月7日)，宏铃《杂谈文艺通讯》(1941年5月14日)，符冠雄《关于文艺通讯》(1941年5月27日)。

桃木主持的总汇报副刊《文会》发表斯波《关于文艺通讯运动》(1940年4月27日)，如流《展开文艺通讯运动》(1940年4月27日)，其华《建立通讯站和通讯网》(1940年4月27日)，路因《优良的文艺通讯员》(1940年10月3日)，石燕红《谈文艺通讯问题》(1941年6月2日)。

有秋主编的《南洋商报》副刊《狮声》刊登帝克《展开海外的文艺通讯运动》(1940年9月25日)等。

- (185)同(174)。

(186)刘思(刘世潮)《C市》，见《总汇报·文会》，1940年4月27日。

(187)金箭(郑卓群)《马华文艺大众化运动和文艺通讯运动》，见(184)。

(188)秋枫(吴荻舟)《文艺创造的社会基础》，见《南侨日报·文艺》，1947年10月1日。

(189)凌佐《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及其他》，见《星洲日报·晨星》，1947年11月5日—7日。

(190)普洛(郑德松)记录、秋枫(吴荻舟)整理《“马华文艺的独特性”座谈会》，见《南侨日报·文艺》第47期，1947年12月3日。

(191)周容(陈树英)《谈马华文艺》，见吉隆坡《战友报·新年特刊》，1948年1月1日。

(192)沙平(胡愈之)《朋友，你钻进牛角尖里去了》，见《风下》周刊108期，1948年1月10日。

(193)李玄(杨家驹)《论侨民文艺》，见《南侨日报·南风》，1948年1月8日。

(194)同(192)。

(195)周容(陈树英)《也论侨民文艺》，见《民声报·新风》，1948年1月17日。

(196)郭沫若《关于马华化问题》，见《文艺生活》海外版第1期，1948年2月；

- 郭沫若《申诉马华化问题的意见》，见《文艺生活》第2期，1948年3月；
夏衍（沈瑞先）《马华文艺试论》，见《文艺生活》第2期，1948年3月。
- (197) 秋枫（吴荻舟）报告与整理《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一个报告》，见《南侨日报·文艺》，1948年3月27日。
- (198) 同(191)。
- (199) 铁戈（陈果来）《文艺独特性·任务·及其他》，见《民声报·新风》，1948年2月18日。
- (200) 同(197)。
- (201) 同(193)。
- (202) 同(192)。
- (203) 金丁（林竹铭）《开窗子、透空气》，见《风下》周刊第113期，1948年2月14日。
- (204) 丝丝（洪永安）《侨民作家与逃难作家》，见《现代周刊》复版第89期。
- (205) 同(199)。
- (206) 同(197)。
- (207) 同(199)。
- (208) 同(190)。
- (209) 同(191)。
- (210) 同(199)。
- (211) 同(190)。
- (212) 同(191)。
- (213) 同(191)。
- (214) 同(199)。
- (215) 同(197)。
- (216) 米军《向马华文艺界建议》，见《星洲日报·晨星》，1947年2月24日。
- (217) 同(199)。
- (218) 马达（张天白）《我对于文艺论争的管见》，见《民声报·新风》，1948年2月15日。
- (219) 同(203)。
- (220) 丝丝（洪永安）《马华文艺之路》，见《现代周刊》第94期，1948年2月29日。

- (221)同(196)。
- (222)方修《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吉隆坡: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总会, 1987),页 78。
- (223)钟之陵(郑文通)《一个作家的必备条件》,见《南洋商报·狮声》,1935 年 7 月 9 日。
- (224)老舍《创作经验谈》,见《公报·公余》,1946 年 5 月 21 日。
- (225)同(119)。
- (226)玛戈(许钟祜)《关于艺术之产生及影响》,见《南洋商报·狮声》,1936 年 4 月 14 日。
- (227)张曙生《论诗的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意识与技巧》,见《南洋商报·狮声》, 1940 年 10 月 28 日。
- (228)同(223)。
- (229)天(洪为济)《由〈秘密的日本〉说到散文的创作》,见《星洲日报·晨星》, 1937 年 5 月 27 日。
- (230)陈炼青《论创作与体验》,见《星洲日报·晨星》,1937 年 5 月 27 日。
- (231)同(224)。
- (232)同(223)。
- (233)同(119)。
- (234)天白(张天白)《文艺写作的热情》,见《星洲日报·晨星》,1934 年 11 月 28 日。
- (235)石韞真《题材论》,见《星中日报·星火》,1936 年 7 月 14 日。
- (236)老瞿(许清昌)《论文艺作品与批评问题》,见《星洲日报·晨星》,1939 年 9 月 6 日。
- (237)同(235)。
- (238)同(173)。
- (239)同(120)。
- (240)金丁(林竹铭)《苏联几部文学名著》,见《南侨日报·南风》,1946 年 12 月 5 日至 7 日。
- (241)同(31)。
- (242)晓光(张天白)《文艺的现实性》,见《益群报·洄澜》,1932 年 10 月 9 日。
- (243)冰人(李冰人)《小说中的典型人物》,见《南洋商报·狮声》,1935 年 4

- 月 23 日。
- (244)同(243)。
- (245)同(240)。
- (246)同(243)。
- (247)同(240)。
- (248)同(240)。
- (249)同(243)。
- (250)同(229)。
- (251)金鉴(郑卓群)《马华文艺现实化问题》，见《光华日报·大路》，1940 年 9 月 26 日至 27 日。
- (252)同(16)。
- (253)鸣珠(郑卓群)《漫谈马华文艺理论批评界》，见《星洲日报·晨星》，1940 年 9 月 20 日。
- (254)钟之凌(郑文通)《似乎“言之过早”吧？——关于文艺批评适当与否的问题》，见《南洋商报·狮声》，1935 年 2 月 8 日。
- (255)一村(吴广川)《编后——并略谈批评》，见《新国民日报·新野》，1935 年 10 月 15 日。
- (256)同(236)。
- (257)同(16)。
- (258)同(254)。
- (259)同(16)。
- (260)朱绪(朱桂棹)《提高剧艺水准》，见《南洋商报·狮声》，1939 年 1 月 21 日。
- (261)同(16)。
- (262)同(254)。
- (263)同(236)。
- (264)同(31)。
- (265)同(236)。
- (266)流浪(刘道南)《关于批评的态度》，见《南洋商报·狮声》，1937 年 7 月 20 日。
- (267)炼青(陈炼青)《我们批评家》，见《星洲日报·晨星》，1935 年 5 月 21 日

至 22 日。

(268)同(253)。

(269)同(16)。

(270)同(254)。

(271)同(236)。

(272)横光(王君实)《创作的批评》，见《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1月9日。

(273)同(266)。

(274)同(103)。

(275)同(31)。

(276)同(31)。

(277)同(254)。

(278)同(236)。

(279)同(31)。

(280)同(4)。

(281)同(236)。

(282)同(31)。

(283)同(16)。

(284)同(253)。

(285)同(218)。

(286)陈村(黄望青)《关于整理马华文运史料的建议》，见《星洲日报·晨星》，1941年1月9日。

(287)大吉(曾圣提)《波斯之艺术及教化》，见《南洋商报·文艺周刊》，1929年4月16日，26日。

(288)林参天《戏剧批评概观》，见《星洲日报·文艺周刊》，1934年5月20日。

(289)金丁(林竹铭)《一年来的苏联文学》，见《南侨日报·文艺》，1947年10月1日。

第五章

中国南来作者的创作活动

从 1919 年到 1949 年,南来作者在新马华文文学的园地里辛勤耕耘和努力劳作,付出大量心血与艰辛汗水。在这长达 31 年的时间里,马华新文学从萌芽、成长,以至结出丰硕果实,都与南来作者的勤力耕耘密切相关。南来作者的文学创作,几乎构成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主要特色;他们的不少优秀作品,也成为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探讨南来作者在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创作活动,将有助于我们了解从 1919 年到 1949 年新马华文文学所反映的主要内容与创作特色,以及南来作者对新马华文文学独特的贡献。

本章分为六节。第一节从总体上论析南来作者的创作概况。其他五节进一步探讨南来作者在各个不同时期的创作活动。

第一节 南来作者的文学创作概述

南来作者从1919年到1949年,在新马报章副刊和期刊发表的作品以数千计。他们的文学创作构成新马华文文学极为重要的部分。但至今为止尚未有学者比较全面地论析他们的文学创作。本文作者经过多方收集与仔细查阅有关资料,发现南来作者的作品数量十分可观,其中产生不少高产量作家。从文体创作方面看,不少南来作者有的兼擅各种文体,有的专擅某种文体,这使他们的创作呈现丰富色彩,并取得显著成就。

以下论析南来作者在各个时期的创作概况,并介绍擅长各类文体创作的作者。

一、各个时期的创作概况

(一)侨民意识浓厚的时期(1919—1924)

这是马华新文学草创时期。由于年代久远以及人事变迁等原因,能够确认南来身份的作者只有林穉生、张叔耐、林独步、邱菽园、刘克非、李铁民、潘醒农、吴仲青等人。他们的作品主要发表在一些文白参杂的综合性副刊如《新国民杂志》、《文艺栏》、《叻报俱乐部》、《商余杂志》、《自由谈》,以及各报的“社论”、“时评”等栏位。

林穉生。林氏在叻报“社论”与“时评”栏发表散文61篇,古文78篇。

张叔耐。张氏在《新国民杂志》以及新国民日报的“社论”与“时评”栏上发表论文294篇、散文34篇、古文380篇、旧诗词12首。

林独步。林氏在《商余杂志》、《新国民杂志》以及《新国民日报》的“社论”、“时评”和一些特刊上发表散文17篇、小说4篇、新诗7首、论文10篇、神话1篇、翻译6篇、古文7篇。

邱菽园。邱氏的《邱菽园居士诗集》收入这时期创作的旧诗 52 首。

刘克非。刘氏在《益群报》副刊《自由谈》和“禹甸春秋”栏上发表古文 3 篇。

李铁民。李氏在《新国民杂志》上发表旧诗 32 首、古文 1 篇、小说 1 篇。

潘醒农。潘氏在《新国民杂志》发表杂文、小说和论文各 1 篇。

吴仲青。吴氏在《文艺栏》发表旧诗 1 首。

早期南来作者处于新旧文学过渡时期，其创作往往文言与白话并存。如产量较高的林稗生和张叔耐，作品中白话与文言约各占半数。南来作者对各种新文学体裁也进行尝试，如林独步的新文学作品有散文、诗歌、小说等文体。

(二) 南洋思想萌芽与提倡时期(1925—1933)

这是新马华文文学第一个创作高峰期，也是南来作者文学创作收获丰富的时期。较为活跃的作者有陈炼青、陈树南、丁琅、傅无闷、郭碧峰、林革尘、何采菽、洪丝丝、胡浪漫、胡一声、黄振彝、李词佣、李梅子、李铁民、李紫凤、连啸鸥、林岩、林参天、林鲁生、林姗姗、林仙峤、林建安、柳鞭、罗依夫、玛戈、马宁、潘醒农、彭成慧、丘士珍、谭云山、拓哥、王探、王哥空、王炎之、王仲广、温志新、吴广川、吴仲青、许杰、许欲鸣、杨实夫、杨实君、衣虹、依藤、曾华丁、曾梦笔、曾圣提、曾玉羊、胡戊女、张放、张楚琨、张明慈、张叔耐、张天白、郑文通等，人数多达五六十人。

他们的作品主要刊登于《椰林》、《文艺周刊》、《洪荒》、《新航路》、《新国民杂志》、《狮声》、《商余杂志》、《曼舞罗》、《椰风》、《关仔角》、《南洋的文艺》、《压觉》、《绿漪》、《晨星》、《繁星》、《星光》、《碧野》、《曼陀罗》、《晓天周刊》、《流连》、《公共园地》、《益励》、《小说世界》、《叻报俱乐部》、《瀑布》、《文艺工场》、《华侨周报》、《昶旭》、《诗歌世界》、《翠兰》、《前驱》、《沙漠田》、《文苑》、《浪花》、《诗词专号》

等副刊和期刊上。

发表作品 50 篇以上的作者有：

陈树南。陈氏在《文艺周刊》、《绿漪》、《新航路》、《椰风》、《关仔角》、《南洋的文艺》、《流连》、《椰林》、《叻报俱乐部》、《公共园地》上发表散文 19 篇、诗歌 12 首、论文 15 篇、小说 4 篇、剧本 2 部、古文 4 篇、发刊词 1 篇、启示 3 则。

郑文通。郑氏在《文艺周刊》、《瀑布》、《曼陀罗》、《文艺工场》、《华侨周报》、《益励》、《新国民杂志》、《小说世界》、《诗词专号》等刊登小说 9 篇、散文 3 篇、论文 2 篇、通讯 2 则、旧诗 17 首、古文 3 篇、编后 14 则。

何采菽。何氏在《昶旭》、《绿漪》、《瀑布》、《新国民杂志》、《商余杂志》、《小说世界》、《诗歌世界》、《翠兰》上刊登散文 46 篇、小说 16 篇、诗歌 13 首、散文诗 3 首、剧本 5 部、论文 6 篇、旧诗 2 首。

陈炼青。陈氏在《椰林》、《晓天周刊》和《前驱》上发表散文 54 篇、论文 30 篇、诗歌 1 首、剧本 1 部、编后 13 则、启事 1 则。

林仙峤。林氏在《繁星》上发表散文 115 篇、评论 4 篇。

林建安。林氏在《繁星》和《晨星》上发表散文 268 篇、小说 1 篇、论文 22 篇、旧诗 1 首。

谭云山。谭氏在《星光》、《沙漠田》和《新国民杂志》上刊登散文 25 篇、诗歌 22 首、论文 9 篇、古文 1 篇、启事 1 则。

曾梦笔。曾氏在《新国民杂志》、《瀑布》、《繁星》、《文苑》、《关仔角》、《倒霉专号》、《诗词专号》、《海丝》和《同善》等副刊发表散文 15 篇、论文 20 篇、旧诗词 143 首、古文 1 篇。

杨实夫。杨氏在《椰风》、《浪花》、《学生园地》、《关仔角》、《碧野》、《椰林》和《叻报俱乐部》发表散文 92 篇、小说 8 篇、论文 2 篇、诗 1 首、译诗 1 首、剧本 2 部、古文 3 篇、通讯 1 则、启事 19 则。

在这些高产量作者中，发表作品百篇以上的有林仙峤、林建安、曾梦笔和杨实夫。他们的作品主要发表在自己主持的刊物上。

编者的身份促使他们为维持刊物而频频发表作品，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便利的发表园地。这是他们成为高产作者的重要原因。

(三) 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的时期(1934—1936)

这时期南来作者作品发表量不如上个时期。较活跃的作者有：陈炼青、傅无闷、郭碧峰、洪丝丝、胡浪漫、胡一声、黄科梅、老蕾、李冰人、李词侗、李润湖、李铁民、李紫凤、连啸鸥、林岩、林参天、林建安、流浪、玛戈、潘醒农、彭成慧、普洛、丘士珍、沈兹九、石韞真、桃木、王哥空、王炎之、王仲广、吴广川、吴仲青、西玲、以今、莹姿、曾华丁、曾梦笔、张明慈、张天白、郑文通、朱绪等 40 多位。

作品主要刊登在《狮声》、《晨星》、《星火》、《新路》、《南洋风》、《新国民杂志》、《新野》、《新园地》、《展望台》、《繁星》、《咖啡》、《诗词专号》、《妇女界》、《展望台》、《文艺周刊》、《诗词专号》、《南岛》和《今代》等副刊和期刊上。其中《狮声》、《晨星》和《繁星》成为南来作者发表文学作品的重要园地。

发表作品 50 篇以上的作者有：

李冰人。李氏在《狮声》、《晨星》和《星火》上发表散文 72 篇、论文 17 篇、诗歌 1 首。

吴广川。吴氏在《新国民杂志》、《新野》、《新园地》、《新路》、《儿童世界》、《妇女世界》、《小说世界》上发表散文 38 篇、小说 9 篇、诗歌 3 首、论文 4 篇、编后话 7 则。

李紫凤。李氏在《民国日报》、《狮声》和《展望台》刊发散文 106 篇、论文 3 篇。

玛戈。玛戈在《狮声》、《展望台》上发表散文 54 篇、论文 16 篇、诗歌 1 首。

张天白。张氏在《繁星》、《晨星》、《妇女界》、《星火》、《新国民杂志》、《诗词专号》、《咖啡》、《轮》上发表散文 89 篇、论文 43 篇、诗词 1 首。

林建安。林氏在《晨星》、《繁星》和《今代》等刊物发表散文 382

篇、论文3篇、新诗1首、启事2则。

这时期南来作者似乎更注重散文创作。在各类文体中,散文数量位居首位,林建安甚至发表了近400篇散文。可见散文较受这些作者青睐。

南来作者也出版单行本,如林参天的长篇小说《浓烟》、丘士珍的短篇小说《没落》和中篇小说《峇峇与娘惹》、王哥空的短篇小说集《面包及其他》、许杰的散文集《椰子与榴槔》、老舍的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这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现象。

(四)本地意识挫折的时期(1937—1942)

这是新马华文文学第二个创作高峰期,也是南来作者文学成就卓著的时期。较活跃的南来作者有:陈炼青、冯蕉衣、高云览、洪丝丝、黄科梅、黄望青、老蕾、李冰人、李词佣、李润湖、林岩、林参天、林建安、林鲁生、林英强、流浪、刘思、梅秀、彭成慧、普洛、沈兹九、石韞真、桃木、铁亢、丁倩、汪金丁、王君实、王任叔、王炎之、王仲广、上官彥、温志新、吴天、西玲、絮絮、杨嘉、以今、殷枝阳、莹姿、郁达夫、曾梦笔、张放、张楚琨、张明慈、张漠青、张曙生、张天白、郑文通、朱绪等,计有50人左右。

作品主要发表在《世纪风》、《晨星》、《星火》、《狮声》、《文艺》、《新光》、《新流》、《新路》、《新园地》、《今代妇女》、《妇女与青年》、《生路》、《吼社诗专》、《诗歌专页》、《日落》、《堡垒》、《南潮半月刊》、《今日学术》、《野火》、《槟风》、《现代戏剧》、《舞台银幕》、《野风》、《南洋周刊》、《南星导报》、《救潮》、《电影》、《星海》、《星宇》、《星云》、《中马文艺》、《华侨周报》、《青年月刊》、《南风半月刊》、《文会》、《大路》、《新国民杂志》、《南潮半月刊》、《忠言半月刊》等刊物上。

发表作品超过50篇的南来作者有:

李润湖。李氏在《晨星》、《新路》、《新光》、《今代妇女》、《妇女与青年》、《文艺》上发表散文30篇、论文23篇、编后3则。

刘思。刘氏在《狮声》、《生路》、《吼社诗专》、《世纪风》、《文艺》、《晨星》、《诗歌专页》、《大路》、《日落》、《新光》发表诗歌 87 首、散文 11 篇、论文 1 篇、小说 1 篇、旧诗 2 首。

张楚琨。张氏在《狮声》、《堡垒》、《南潮半月刊》等刊登散文 38 篇、论文 19 篇、翻译散文 2 篇、启事 4 则。

张天白。张氏在《晨星》、《文艺》、《今日学术》、《野火》、《总汇副刊》、《文会》、《新路》、《野风》、《忠言半月刊》上发表论文 55 篇、散文 24 篇。

莹姿。莹姿在《狮声》、《新流》、《大路》、《新光》上发表诗歌 31 首、散文 12 篇、小说 5 篇、论文 3 篇。

金丁。金丁在《狮声》、《晨星》、《槟风》、《星火》、《南潮半月刊》刊登论文 58 篇、散文 14 篇、翻译论文 1 篇。

上官彥。上官彥在《狮声》、《文艺》、《晨星》、《新流》、《世纪风》、《新光》上发表散文 35 篇、小说 20 篇、论文 5 篇、翻译小说 2 篇。

吴天。吴天在《晨星》、《文艺》、《繁星》、《现代戏剧》、《舞台银幕》、《狮声》、《野风》、《星火》、《世纪风》、《南洋周刊》、《南星导报》和《南潮半月刊》刊发散文 33 篇、论文 14 篇、剧本 6 篇、小说 2 篇、诗歌 1 首、翻译散文 2 篇、启事 1 则。

郁达夫。郁达夫在《晨星》、《救潮》、《繁星》、《文艺》、《世纪风》、《电影》、《星海》、《星宇》、《星云》、《世纪风》、《中马文艺》、《教育》、《华侨周报》、《青年月刊》、《南风半月刊》、《南潮半月刊》,以及《星洲日报》的“本坡新闻”和“电讯”栏位等发表散文 203 篇、论文 38 篇、启事 71 则、翻译 4 篇、旧诗词 56 首。

这时期南来作者的作品丰富多彩。除散文仍为大多数作者青睐外,也出现产量颇高的诗人,如刘思和莹姿。冯蕉衣也出版新诗单行本《衡窝集》。发表作品超过百篇的作者有刘思和郁达夫。

(五)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的角斗时期: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时期(1945—1949)

这时期较活跃的南来作者有：白塔、曹兮、丁家瑞、丁之屏、杜边、高云览、洪丝丝、胡浪漫、胡一声、胡愈之、黄望青、李润湖、李铁民、连啸鸥、林参天、刘思、玛戈、马宁、普洛、秋枫、沈兹九、石韞真、桃木、铁戈、汪金丁、王任叔、上官豸、吴天、吴广川、夏衍、絮絮、杨嘉、杨樾、杨实夫、以今、张放、张楚琨、张漠青、张天白等，约有 40 位。

他们的作品主要发表在《晨星》、《南风》、《读者园地》、《文艺》、《和平》、《新潮》、《新妇女》、《突击》、《民主》、《风下》和《现代周刊》等刊物。

发表作品超过 50 篇的作者有李润湖、胡愈之和沈兹九。

李润湖。李氏在《南风》、《突击》、《新潮》、《读者园地》等发表散文 45 篇、论文 30 篇、译诗和潮曲各 1 首。

胡愈之。胡氏在《南风》、《民主》、《风下》等刊物及《南洋商报》发表散文 313 篇、论文 12 篇、中篇小说 1 部、启事 1 则。

沈兹九。沈氏在《风下》、《新妇女》和《南侨日报》刊登散文 71 篇、论文 14 篇。

这时期南来作者的作品以政论散文和剧本较突出。高产量的作者较少，只有李润湖、胡愈之和沈兹九 3 人。由于战后百业待兴，新马文坛至 1947 年才较为活跃，因此作品发表量以 1947 年到 1948 年较盛。但英殖民地政府于 1948 年颁布“紧急法令”，南来作者有的北归，有的前往他处，有的沉寂下来，因此大多数作者创作量不高。胡愈之和沈兹九能成为高产量作者，主要因为他们创办《风下》和《新妇女》杂志，有自己发表作品的独立园地。

二、擅长各类文体创作的作者

马华新文学萌芽于 1919 年。草创初期的新文学作品大多十分幼稚粗糙，一般只初具雏形而已。南来作者林独步的小说和新诗创作有如鹤立鸡群，以晓畅流利的语言和新式成熟的文体，为马华新

文学树立了典范。其后随着南来作者的努力耕耘,马华新文学的文体由初具规模到丰富多彩,发展并形成各式各样文体。到战前五年“本地意识挫折时期”,由于中国抗战局势的刺激,更促成各类文体发展,分出许多细支,如戏剧分出“街头剧”、“活报剧”,散文分出“报告文学”、“速写”和“通讯”等,这是南来作者文学作品在文体方面最为丰富的时期。以下进一步分析南来作者在文体创作方面的几种情形:

(1)南来作者有些擅长各类文体,作品包括各种新文体,如小说、诗歌、散文、剧本和论文。这类作者有拓哥、陈树南、何采菽、曹兮等。

(2)南来作者有些兼擅新旧文学,除创作新文学作品外,也精于古文、旧诗词、旧小说。这类作者有郭碧峰、冯伊媚、黄振彝、李冰人、李词佣、李铁民、林独步、林生、刘延陵、柳北岸、饶百迎、许欲鸣、郁达夫、曾梦笔、张明慈、张叔耐、张紫薇、周了因等。

(3)南来作者中有的学贯中西,不仅善于创作新文学,也擅长外国文学的翻译。他们为新马文坛留下不少翻译作品。这类作者有林独步、黄振彝、林革尘、王仲广、曾圣提、曾玉羊、刘延陵、张楚琨、林参天、马宁、杨实夫、杨实君、吴天、郁达夫、以今、金丁、耶鲁、李润湖、曹兮、梁浩养、傅无闷、上官豸、殷枝阳、杨守默、杜门等。

(4)南来作者中有不少擅长某种文体创作,成为散文、小说、诗歌、剧本和论文等文体类的优秀作者。以下列出擅长各类文体的作者:

A. 散文作者:段南奎、傅无闷、洪丝丝、胡一声、胡愈之、华国、黄科梅、李冰人、李润湖、李紫凤、林岩、林建安、林仙峤、林穉生、沈兹九、王君实、王任叔、温志新、杨实夫、杨实君、郁达夫、张楚琨、张叔耐、张天白等。

B. 小说作者:林参天、林独步、流浪、柳鞭、丘士珍、铁亢、拓哥、王哥空、上官豸、吴广川、吴仲青、絮絮、杨嘉、殷枝阳、姚紫、曾

华丁、曾圣提、曾玉羊、张一倩、郑文通、邹子孟、老蕾等。

C. 诗歌作者：林独步、拓哥、丁琅、冯蕉衣、郭碧峰、林革尘、黄科梅、连啸鸥、刘思、罗依夫、谭云山、桃木、铁戈、西玲、絮絮、杨实君、依藤、曾玉羊、张放、张楚琨、张曙生等。

D. 论文作者：陈炼青、洪丝丝、胡愈之、黄望青、李紫凤、林独步、玛戈、衣虹、秋枫、丘士珍、铁亢、汪金丁、许杰、俞颂华、郁达夫、张楚琨、张曙生、张天白、郑文通等。

E. 剧本作者：陈树南、林参天、马宁、铁亢、吴天、金山、岳野、杨嘉、杜边、白寒、王秋田、朱绪等。

以上是南来作者在 1919 年到 1949 年的创作概况。他们在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创作情形，将在以下五节详细论析。

第二节 侨民意识浓厚时期

1919 年至 1924 年是侨民意识浓厚的时期。这时期的新马华文文学创作处于萌芽状态，但南来作者却以弄潮儿的姿态，投入新时代的洪流中，以他们承先启后的创作，为新马华文文学播下了新文学的种子。早期一些较为活跃的作者如新诗作者胡鉴民、小说与新诗作者陈桂芳等，或因年代久远，或因人事变迁，或因生卒不明，至今无法确认其是否属于南来作者，因此无法在本文研究范围内论及他们对早期新马华文文学的贡献。但是从能够确认南来身份的作者如林稗生、张叔耐、林独步等人的创作活动，我们仍能见出南来作者对马华新文学在文体及创作上的奠基之功。尽管他们开垦的园地在当时并未呈现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景象，但他们毕竟为后人莫下了新文学基础，而且也绽放了几株奇葩异卉。

以下从创作形式、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论析这时期南来作者

的创作特色：

一、新旧交替、文白参杂的创作形式

这时期是新马华文文学新旧交替的时期。由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南来作者纷纷尝试用白话文创作，以这种新式的语体文抒情写意，阐发对社会人生的见解。尽管他们擅长古文体，但也勉力创作了为数可观的白话文。林穉生在百余篇政论散文中，约有半数是用明白晓畅的白话文创作的，如《这是我的随感录》⁽¹⁾、《赞成铸建冯国璋的祠像》⁽²⁾、《对琼崖开辟商港的希望》⁽³⁾、《快些移军费以设工厂好》⁽⁴⁾、《民气嚣张》⁽⁵⁾、《昨天的纪念》⁽⁶⁾、《对直系今后的希望》⁽⁷⁾等。另一南来作者张叔耐在他主持《新国民日报》期间，也积极提倡白话文创作，他发表在《新国民日报》的政论散文有百余篇是用白话文创作的，其中有《和战问题》⁽⁸⁾、《辟顽固家之谬论》⁽⁹⁾、《耳目是遮掩不来的》⁽¹⁰⁾、《南洋华侨社会改良之必要及方法》⁽¹¹⁾、《卿云歌好算国歌么》⁽¹²⁾、《希望中的民国十一年》⁽¹³⁾、《吴佩孚的话靠得住吗？》⁽¹⁴⁾、《国民！毋忘了七十二烈士》⁽¹⁵⁾、《和平统一在哪里》⁽¹⁶⁾、《军阀暴力下的人民不知死所》⁽¹⁷⁾等。张叔耐这种由古文而转向白话文创作的趋向，越至后来越有所递增。这时期另一成就卓著的南来作者林独步，也用白话文创作散文《志士》⁽¹⁸⁾、《伟人崇拜》⁽¹⁹⁾、《处事二要件》⁽²⁰⁾、《专门的哲学家与哲理的思想家》⁽²¹⁾、文艺论文《论艺术与道德之关系并所望于评剧家和编剧家》⁽²²⁾、《自然美与人工美》⁽²³⁾、《新文学概论》⁽²⁴⁾，诗歌《那朵花》⁽²⁵⁾、《谋幸福》⁽²⁶⁾、《在这守旧的火山里，焉能发生恋爱的蔷薇》⁽²⁷⁾、《幸福与努力》⁽²⁸⁾、《理想》⁽²⁹⁾、《活动就是快乐》⁽³⁰⁾、《青春》⁽³¹⁾，小说《珍哥哥在想什么》⁽³²⁾、《笑一笑》⁽³³⁾、《两青年》⁽³⁴⁾、《同窗会》⁽³⁵⁾等。

由于南来作者大多具有较深厚的旧文学创作根底，如林穉生、张叔耐和刘克非精于古文，林独步善用古文译介外国文艺作品，李

铁民、邱菽园则工于旧诗词,长期的创作习惯使他们一时难以完全舍弃旧文体创作,而新文学创作仍属新的尝试,因此他们的创作往往新旧共存、文白参杂。林稗生的《现有男女日校亟宜附设星期义学与夜义学》⁽³⁶⁾、《瓜分》⁽³⁷⁾、《勉乎哉,周君如切!》⁽³⁸⁾、《同是护法奚必相残乃尔?》⁽³⁹⁾,张叔耐的《非生非死之中国》⁽⁴⁰⁾、《弹力果能穿其面颊否》⁽⁴¹⁾、旧词《贺新凉》⁽⁴²⁾,林独步的《地方自治与华侨》⁽⁴³⁾、《学校外之求学》⁽⁴⁴⁾、《伪风雅》⁽⁴⁵⁾等,都是用文言文创作的。这是新马文坛从旧文学过渡到新文学不可避免的现象,也是这时期南来作者创作形式的主要特点。

二、充满“五四”时代精神的思想内容

“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的呼声,对新马文坛造成强烈的冲击。南来作者痛感中国内政专制腐败,人民麻木愚昧,纷纷撰文抨击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军阀割据,社会动乱,以致民不聊生的局面,呼唤“德先生”(Democracy)与“赛先生”(Science)的到来。林稗生的《对国庆纪念日感书》⁽⁴⁶⁾、《昨天的纪念》⁽⁴⁷⁾、《对直系今后的希望》⁽⁴⁸⁾,张叔耐的《非生非死之中国》⁽⁴⁹⁾、《军阀暴力下的人民不知死所》⁽⁵⁰⁾林独步的《地方自治与华侨》⁽⁵¹⁾等,对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孙中山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以及各系军阀割据纷争造成民不聊生的社会状况进行猛烈的抨击,呼唤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取代封建专制统治。同时,也希望以科学技术和教育来振兴衰弱的祖国,提高愚昧民众的素质,以拯救国家的命运。林稗生在《中国文化与欧西文化之比较》⁽⁵²⁾、《勉乎哉,周君如切!》⁽⁵³⁾、《现有男女日校亟宜附设星期义学及夜义学》⁽⁵⁴⁾,张叔耐在《强迫教育》⁽⁵⁵⁾、《愿侨胞移旧历新年之费用以助教育费》⁽⁵⁶⁾、《愿资本家解囊助学》⁽⁵⁷⁾、《上海大学以建国方略为课程》⁽⁵⁸⁾等文章中,认为文化是支配国家的命运,教育为救国之根本,欲使积贫积弱的国家振兴起来,欲使人民摆脱无知愚昧,就非

提倡科学和教育不可。

早期南来作者所极力呼唤的民主科学精神,与他们强烈的爱国爱乡热情交融在一起。他们在呼唤“德先生”与“赛先生”时,往往渗透着浓烈的侨民意识。林穉生、张叔耐、林独步的文学创作,尽管也涉及华侨在新马地区的生活与教育等问题,如林穉生的《吾侨宜注重夜学》⁽⁵⁹⁾、张叔耐的新国民日报《例言》⁽⁶⁰⁾与《南洋华侨社会改良之必要及方法》⁽⁶¹⁾、林独步的《地方自治与华侨》⁽⁶²⁾等文,但多站在侨民立场上,呼吁侨胞们热爱祖国,在侨居地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和素养。这时期的南来作者无意关注英殖民地政府统治下的新马社会,最为关心的是自己的故乡和祖国。他们的创作视野基本上集中在中国社会,那里的政治风云和民生疾苦,时时激发着他们的创作激情。他们从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汲取的民主科学精神,与他们振兴祖国、解除民生疾苦的热切愿望联系在一起。可以说,民主科学精神与侨民意识互为交织是这时期南来作者创作内容的主旋律。

“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个性解放、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的时代精神,也是南来作者重要的创作内容。张叔耐的散文《辟顽固家之谬论》⁽⁶³⁾、克非(刘克非)的散文《论女子剪发》⁽⁶⁴⁾针对女子求学、剪发等问题进行论析,批评社会上顽固保守的思想。林独步的小说《珍哥哥在想什么》⁽⁶⁵⁾、《笑一笑》⁽⁶⁶⁾、《两青年》⁽⁶⁷⁾、《同窗会》⁽⁶⁸⁾则形象反映了“五四”时期北平和新加坡两地青年知识分子的爱情生活和人生观,体现了新的时代精神和高尚价值观。主要内容有:

(1)追求男女平等。在《笑一笑》和《两青年》中,作者借小说中月霞的口,提出女界应与男界地位平等的思想。在《两青年》中,通过李福夫妇的关系,进一步阐明只有男女经济地位平等,双方平等对待,爱情婚姻才能巩固。

(2)提倡真爱的婚姻。在《两青年》中,秀华和天赐的婚姻由于缺乏爱情基础,最后女方无法忍受而与男方脱离关系。《同窗会》里

建由于与如玉热恋而不肯娶表妹秀瑞,也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与秀瑞只有兄妹之爱而无情人之恋。

(3)颂扬高尚的思想情操。林独步的小说充满对真善美的追求与热爱。《笑一笑》里,月霞不忍心让弟弟如松将美丽的花蝴蝶解剖,为此不惜使自己的手指受伤。《同窗会》中,当如玉得知秀瑞为建而伤心欲碎时,为了成全他们而独自悄然离去。她在给建的信中说道:“为他人谋幸福便利,自己常常不得不受不利便。但是人若不这样做,而单单谋自己幸福便利,不同情他人的幸福便利,社会的伦理、道德,是不能成立。人类必陷入悲惨状态……能够牺牲自己的幸福便利之人,才是可敬的,高尚之人。”

(4)提倡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同窗会》中,当建陷于失恋的深渊时,竹青劝他振作起来,将自己的痛苦升华为文学艺术。建受到他的影响,积极从事文艺创造,以纪念他和如玉的爱情。

林独步小说创作中的“五四”时代精神和资产阶级人文主义思想,是这时期南来作者极力提倡的新思想和新内容。

三、多样化的写作特色

这时期南来作者的艺术成就主要在政论散文和小说创作方面。较优秀的政论散文作者有林穉生和张叔耐,杰出的小说作者为林独步。他们善于运用各种表现手法,使其作品呈现独特风格和色彩,成为早期新马华文文学的代表作。

林穉生(林克谐)于1919年到1921年任职《叻报》期间,是“时评”和“社论”栏位的主要撰稿者,在该报发表百余篇政论散文,大多针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民生等问题而发。

林氏善于营造文章结构,常以醒目的开头吸引读者注意力,再配以有力的结尾加强文章的力度。他在文章开头,或开门见山地提出中心论点:“教育为救国之根本,凡有心振兴教育者,即是谋根本上之救国者也”⁽⁶⁹⁾;或一针见血地指出问题的症结:“今日吾国,国

势之不振,社会之腐败而至于此极者,虽曰由于官僚、武人、政客造成之,然吾敢曰,亦由于多数男男女女号称为国民分子者,昏昧无知,而滋扰捣乱,七颠八倒所致之耳”⁽⁷⁰⁾;或触目惊心地点明存在的现象:“中国的盗匪甲于世界,烧毁房屋、杀人劫物,无一日不有的”⁽⁷¹⁾。这种灵活多样而又醒人耳目的开篇,往往能收到先声夺人、吸引读者的效果。林氏也善于在结尾处以疑问句、反问句或感叹句增强文章的力度。他在《对于徐世昌厚礼曹张之感言》⁽⁷²⁾中,将徐世昌以二百万元的巨款作为张作霖和曹锟子女的婚仪,对比之因生活所迫而“卖子”、“饮毒”和“食草根”者,然后于结尾处提出“呜呼!‘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信然乎”的反问,令读者于这种贫富悬殊中体悟军阀豪强的穷奢极欲,以及社会和阶级的不平等。《中国果真贫耶?》⁽⁷³⁾、《通敌的人何止国会议员呢!》⁽⁷⁴⁾、《赌风的热闹何止亚齐地方呢!》⁽⁷⁵⁾等文,结尾处用疑问或感叹的句式,或引起读者深思,或抒发作者的爱憎感情,或进行冷嘲热讽,产生了“言已尽而意未穷”的艺术效果。

林稗生的政论散文,无论文言或白话,其追求民主,抨击封建专政;提倡科学,反对愚昧落后的内在精神都是一致的。其旧文体的政论散文,笔锋犀利,见解精辟,善于调动各种艺术手段表情达意。《是之谓大丈夫》⁽⁷⁶⁾仅二百余字,运用了对比、排比、反问等手法,辛辣嘲讽段祺瑞乞命于吴佩孚之丑态:“吾尝闻大丈夫头可断而志不可夺,今投降者,无志也,畏尾也,言不顾行也。噫!段祺瑞之为段祺瑞欤!”“说者或谓:大丈夫能屈能伸胜不足荣,败不为辱,今跪降为妾臣,安知无复位之日乎?吾然其说,但所可为段氏虑者,即前此倡言欲以武力统一中国之说,目下未审可以实行否?”其他旧体政论散文,大多如《是之谓大丈夫》一样,用精炼生动的语言,鲜明地表达作者的观点。而林氏的白话散文,具有平铺直叙、明白晓畅的特点,不过与旧体散文相比,似乎余味不足。但无论旧文体或白话体,大多饱含强烈的爱憎感情和忧患意识。这种浓烈的情感

色彩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作品中,成为其政论散文的一个特色。

张叔耐从1919年10月《新国民日报》创刊,至1924年底,在“社论”、“时评”与“新国民杂志”等栏位或副刊上撰写了700余篇政论散文,其中百余篇用白话文创作,篇数之多,在当时无过其右。

张叔耐的政论散文不但篇数高居榜首,创作成就也颇为可观。他的创作跨度较长,作品反映现实的广度与深度也超过其他政论散文作者。从1919年到1924年底,在中国大地上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和社会问题,张氏几乎都作出反应,从外政内交、军国大事,至文化教育、民俗风貌,无不成为其议论对象。可以说,张氏的政论散文,是这时期中国社会的“史书”,已非当时其他作者所能企及。

张叔耐的政论散文善于以逐层剥笋式的方法,层层深入地进行说理。在《辟顽固家之谬论》⁽⁷⁷⁾中,他针对当时一些封建保守的人物反对女子受教育的言论展开批判,他说:“须知道做一个自由的人,便有自己尊重及防卫的能力。浮滑男子的诱惑究竟非盗贼可比,只要自己能够尊重,见识无不可防卫的道理。”接着,张氏又进一步论述到:浮滑男子能迷惑女子,是因为女学不昌。女子不解自由,不重爱情,以致容易受骗。如果女界多受教育,解得自由的意义,晓得爱情的尊贵,她在社会上交际,见广识多,匪石不移,卓然自立,也就不会受骗。而社会上也不应当因此而夺却女子的人格和自由,或者把青年男女看得一钱不值。这种层层深入的论证方法,使张氏的政论散文具有较强的说服力。

政论散文的一个使命,就是抨击现实生活的种种不合理现象,以唤起人们对假丑恶的憎恨,而在揭露丑恶时,讽刺就成为一种有力的手段。张叔耐的政论散文很善于运用讽刺的手法来增强艺术效果。在《弹力果能穿其面颊否》⁽⁷⁸⁾中,张氏先讽刺王揖唐抵沪后,面对各界的唾骂却无动于衷,其所恃者“面皮之厚而已”,继而嘲讽道:“虽然,面皮之厚,以御唾骂有余,以御炸弹则不足。今闻哈同花园已两次发现炸弹矣,吾人试拭目以观弹力之果能穿其面颊否。”

嘲讽之尖刻，实在令人忍俊不禁。在《虎和猪狗》⁽⁷⁹⁾中，张氏讥讽那些因选票脱手而失势的北京议员道：“狡兔死，走狗烹，猪狗畜生，事同一例，猪在虎口（虎威），那能幸免呢？”辛辣的讽刺艺术，构成了张叔耐政论散文的一个特色，它使读者在会意的微笑中，不知不觉与作者的爱憎感情产生共鸣，从而接受作者所表达的观点。

这时期的白话小说虽处于草创阶段，但林独步的小说创作，却展现独有的艺术风貌，成为早期新马华文文学中绚丽夺目的奇葩异卉。

林氏的白话小说构思巧妙，结构独特。贯穿在小说《珍哥哥在想什么》、《笑一笑》、《两青年》、《同窗会》中的两个人物，是在中国读完大学后回到新加坡的侨生黄维珍和刘振成。其中《珍哥哥在想什么》、《两青年》和《同窗会》基本上围绕着他们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叙而展开。《笑一笑》叙述的也是黄维珍的弟妹如松和月霞的故事。这四篇小说分开来是独立的短篇小说，合起来又是带有连续性的中篇小说。在当时白话小说尚处于萌芽时期，林独步能有如此巧妙构思，实在令人惊叹。

林独步的小说具有较高艺术成就。在当时文坛仍处于新旧交替、文白参杂的情况下，他的小说语言却具有精炼生动、流丽典雅的特点。林氏善于根据创作的需要，用挥洒自如的文笔写景、叙事、抒情和对话。即使中国古典小说中较欠缺的心理描写，林独步也能够根据情节发展和场面的需要，进行细腻生动的描写，有些甚至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如《同窗会》中叙述建失去恋人如玉，只好独自乘轮船回新加坡的情景：

他见月华照满船，天空海阔，四顾茫茫，就生起一种似是而非的凄婉情绪。他对于这种壮美——非优美——自然美——天然美的凄婉，感慨他处境。初无什么明确的具体意识，是一种不能形容的恍恍惚惚的沉郁。说是苦的，又非苦。说是乐呢，又非乐。好像

在戏院中看了悲剧，悲愁而带美的——审美的艺术美感，而忘去实在的利害实感，及至经过多少时间，这抽象的心境，渐移到各个具象的心理状态。渐渐联想到家中的父母弟妹……交际的朋友……如玉，秀瑞，和自己有关系的人，不觉流出泪来！⁽⁸⁰⁾

这段描写，作者运用了借景抒情、融情入景的手法，将建的忧伤、迷茫和凄婉的心态刻画毕至。其中融入的美学和文艺理论，均能化于了无痕迹之中，使这段情景交融的描写上升到更高的审美层次。在新马白话小说草创阶段，这简直是个奇迹。可以说，林独步的白话小说所取得的成就，在当时是独步一时，首屈一指的，甚至超越了他所处的时代水平。

此外，林独步的新诗创作也值得一提。他的新诗有《那朵花》、《谋幸福》、《在这守旧的火山里，焉能发生恋爱的蔷薇》、《理想》、《幸福与努力》、《活动就是快乐》、《青春》。其诗歌与“五四”新文化运动追求个性解放、婚姻自由的精神一脉相承，如《在这守旧的火山里，焉能发生恋爱的蔷薇》：

在这守旧的火山里，
你们焉能发生高尚的精神的恋爱的蔷薇！
在这守旧的恶习惯的肉欲火山里，
只能把你们引入黑暗的魔窟去！
你们的长者，
不肯给你们公然的高尚恋爱，
就是把你们迫到不得不入黑暗的肉欲的魔窟去！⁽⁸¹⁾

诗歌感情充沛，语句浅白流畅，节奏明快。诗人也以同样风格的诗句歌颂活动就是快乐，赞美以自己的努力去开拓幸福：“活动就是快乐，/快乐就是活动；/无事最苦痛，/无事愁坐最苦痛”⁽⁸²⁾，“世界

有好多给人幸福的路……/但你自己幸福的路,/是用自己的努力开拓的”(83)。尽管林氏的诗歌在诗味与意境方面的创造尚嫌不足,但在马华新文学初创时期,能以明白流畅的诗句和明快的节奏,来抒发充沛的思想感情和体现时代精神的新诗,并不多见。

第三节 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

1925年至1933年是南洋色彩萌芽与提倡时期。由于1919年至1924年的侨民意识浓厚时期是马华新文学草创阶段,当时整个新马文坛基本上还是一片荒芜。

从1925年开始,随着南来作者拓哥和谭云山等人创设的文艺副刊《南风》和《星光》的发行,新马华文文学才真正走上开创与发展的道路。1927年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破裂后,南来作者大量涌入新马。这时期能够确认南来身份的作者多达五六十人。(参见本章第一节)他们为这阶段的新马华文文学开辟了一个蓬勃绚烂的局面,迎来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第一个丰收年。

本节主要从作品内容和创作色彩论析这时期南来作者的创作特色。

一、主要的创作内容

(一)抒发漂泊异乡的流浪情怀。

南来作者大多怀抱“黄金梦”而来,但南洋的现实处境与他们的想象大相径庭。在理想破灭与经济窘迫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在作品中抒发浪迹天涯的漂泊情怀。怀乡、思母、念友是他们经常吟唱的主题。何采菽在散文《雁声》⁽⁸⁴⁾里对同在异域漂流的友人倾诉他的悲哀和寂寞:“今晚失眠之后,起床倚窗小立,默默愁视沉静的街上,此时夜已深了。……从远处传来几声幽怨的虫鸣,和微风吹动

街灯的寒影，怎不令孤独的浪人，倍增凄绝的悲哀呢？……回想起来，越觉得无限凄凉与悲苦。……世界如死了一般的悲哀和寂寞。”而当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友人在青春年华弃世时，更触发他们对亡友的哀思及对自身漂泊命运的感伤。云山(谭云山)获知梦苇(金拓)自杀身亡时，不禁沉痛吟道：“数年前的团聚，/二万里的离隔。/我漂泊天之南，/你流落燕之北。/彼此都为得生活的烦忙，/两年多未通消息，/想不到，而今——/你竟撇开了你青春的年华，/赶去了黝黝的天国。/哦！可痛的人生的微弱哟，/可恨的宇宙的残缺！/梦苇，你哪能知道？/南海岸头底浪花，/在飞溅着漂泊者底——血——泪！”⁽⁸⁵⁾

身居异乡的孤独与寂寞，越发撩动他们对故国故乡的思念。拓哥(金拓)在诗歌《流波》⁽⁸⁶⁾中抒发对故乡的思念之情：“故乡啊！鸬江啊！我今何以不能归？/鸬江啊！故乡啊！为何今朝只能容我怅望，想象？”这种思乡的愁怀，甚至使那些生活境遇堪称不错的南来作者也动起归乡之思。张冲(张楚琨)在散文《漂流到狮子岛去》⁽⁸⁷⁾中这样描述：“那时我的心中反而酝酿着极浓厚的乡思，夜里的梦十次就有九次是乡梦。……故乡的清源山、东西塔、洛阳桥；故乡的龙眼、桃李、荔枝；故乡的夏蝉、秋叶、严冬，都是我所憧憬的对象。于是我对于这炎热的都市，渐渐有点淡漠，终至于厌恶起来；初来的热烈的情绪再鼓不起来了！”

这些年青的南来作者在穷途困厄时，对慈母的思念成为他们在漂泊旅途上的慰藉。拓哥在《流波》中悲伤地吟道：“树林下的鸦儿，/你为什么这样地悲鸣？/失去了你的爱儿？/是丧了你的母亲？/我也是一个人的爱儿啊！/我也已经丧了我的母亲了？/但是，我羡慕你的自由啊！/我只能暗泣，你能如此放声号哭！”黄振彝在《给泉下的母亲》⁽⁸⁸⁾中，希望母亲给他安慰和指示，甚至要母亲携带他同赴黄泉，以脱离漂泊的苦海：“亲爱的泉下的母亲呀！‘受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我们不愿做人上人，我们受苦亦够了。

请你在冥冥之中来安慰我们,指示我们,到必要的时候,请你快快携带我们跳出痛苦的烘炉,向那条单边路,走下去呵!”这种炽热的痛苦,燃烧得南来作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拓哥在诗歌《深沉的悲哀》⁽⁸⁹⁾里抒发欲借自杀摆脱悲哀而不得的苦痛:“越思越深沉的悲哀,/越想丢开伊越丢不开,/伊总是烈火燃烧般在我的心怀,/烧得我真不能容忍了啊!……/我每想仰刎刀剑,/刎断了我的头颅与我的悲哀。/那知我所想的不但不得安怀,/反更加了我的悲哀!”

反映这种流浪心态的作品尚有曾圣提的诗歌《秋晚》⁽⁹⁰⁾和《月落》⁽⁹¹⁾,慎良(汪开竞)的诗歌《鲜花》⁽⁹²⁾和《饮酒》⁽⁹³⁾,丁琅的诗歌《我想起那吴市的吹箫人》⁽⁹⁴⁾,林雪棠的诗歌《给衣霞》⁽⁹⁵⁾和《慷慨的赠与》⁽⁹⁶⁾,何采菽的小说《医院里》⁽⁹⁷⁾和散文《剖心哀嗷》⁽⁹⁸⁾,谭云山的诗歌《寂寥》⁽⁹⁹⁾,欲鸣(许欲鸣)的诗歌《别了故国》⁽¹⁰⁰⁾和《泪空的孤鸟》⁽¹⁰¹⁾,实君(杨实君)的诗歌《我是漂泊无依的浪人》⁽¹⁰²⁾,王哥空的诗歌《漂流曲》⁽¹⁰³⁾,等等。

(二)反映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尤其是苦难人民的生活。

南来作者既有流浪心态的一面,但又有“为这社会干一番改造的工作”的抱负。这在何采菽的小说《医院里》就有明确的表示。他们的作品大量反映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对苦难人民的不幸给予深切的同情。

张冲的散文《漂流到狮子岛去》,就描述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那时候,我的家乡泉州正值兵匪叛乱之秋,全城充满了叫苦的惨声,黑云盖遍了各处,抢劫、绑票、杀人,几乎是天天听得到的消息,一会儿张清旅从北门进城,一会儿‘狂奇’由东门溜去。军官来时‘派饷’‘收税’,土匪去时要抢劫、杀人,倒霉的小百姓,真是苦于应付了!在这风声鹤唳的祸难中,民心只感到恐怖与悲惨的压迫。无论街道上、乡村里,都好像是雨之将至,冷寒得像死了一样。平日那种和平的热闹的气象,已被吹到荒山里去了。”⁽¹⁰⁴⁾罗依夫(罗永年)的小说《决心》⁽¹⁰⁵⁾,借一间小旅店所发生的事件,控诉

了战争与军人对老百姓的蹂躏。丁玲(窈秦白)在诗歌《我想起那吴市的吹箫人》中亦云：“我难忘无辜被杀戮的父兄，/我难忘流离以死的国人。”⁽¹⁰⁶⁾汪开竞的剧本《市侩之子》⁽¹⁰⁷⁾，则叙述农夫被地主恶霸欺凌殴打致死的情形，反映了当时底层人民的苦难与不幸。林雪棠的诗歌《慷慨的赠与》，揭示了黑暗势力对热血青年的摧残与杀戮：“时候赠给青年们是些什么呢？/是惨毒的手腕呀，是阴险的诈术呀！/于是我们底青年因之浴血，/于是我们底青年不免流亡。”⁽¹⁰⁸⁾

在这类作品中，邹子孟的小说《师长》⁽¹⁰⁹⁾叙述一个愚昧无知的青年龙标，被诱骗到军营充当军阀混战的杀人工具，由于蒙昧无知，在战斗中不懂退却，“勇敢”杀敌，受到总司令的赏识，一夜之间晋升为师长。之后龙标搜刮民脂，草菅人命，过着妻妾纳妾，醉生梦死的生活。但这种一呼百应的“尊贵”“威风”生活并未持续太久。在一次战事失利时，树倒猢猻散，部下与妻妾大难到头各自飞，孤家寡人的龙标也被敌军一枪送上西天！这篇小说的叙述方式很独特，通篇采用对话体的形式，通过对话来描述各种场景，展开故事情节，刻划人物性格与心理，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是十分罕见的。作者运用讽刺的手法，描述了龙标愚极而贵，又乐极生悲的喜剧性一生，极富嘲讽意味。这种尖刻的讽刺手法，也是当时的作品少有的。

这时期的南来作者开始将创作视野从中国转向南洋社会。他们在创作里反映了南洋底层人民的不幸与苦难，为他们唱出一曲曲生之哀歌。

连啸鸥(连兴梓)的诗歌《都市与荒郊》⁽¹¹⁰⁾为创造都市物质文明，却如牛马般生活的工人发出不平的控诉：“那林立的每个巨大工场，蠕动着无数鹑衣垢面的蠢虫，万能呵，谁豢养着这一群群的牛马，说是资本者的恩惠吗？为何那烟囱里喷出的黑烟带着血泪的腥臭！”庄羊(曾曼方)的小说《生活圈外》⁽¹¹¹⁾，叙述驳运工人阿番在

世界经济不景气下被老板辞退,衣食无着,只好铤而走险,和一群失业的猪仔合伙行窃,终致锒铛入狱的故事。吴仲宣的小说《梯形》⁽¹¹²⁾描写妓女翠英受着鸨母的囚禁,七年来过着悲惨的卖笑生活。林仙峤的散文《兜风与捉害虫》⁽¹¹³⁾,揭示南洋社会富女与贫女极为悬殊的生活。

曾圣提的小说《生与罪》⁽¹¹⁴⁾叙述人力车夫狗贱的爹的不幸遭遇。狗贱的爹以人力车夫为业维持全家人的生活,可是人力车却被富人的汽车撞毁。失去了谋生工具,一家人顿时陷入生活困境。面对怀孕的妻子和嗷嗷待哺的五个幼子,他只好铤而走险上街抢劫,结果遇上警察被捕,全家人的命运可想而知。作者善于用细腻生动的笔触,描绘主人公窘迫的处境及心理压力:

他移进黝然尘满的“后尾”,他迟疑着,游目所至,冷灶嘲弄着他,锅子呻吟的被反扣在壁上,凸起的弧形的背影,使他联想到狗贱的妈的渐渐凸起的肚子。他很想一拳把那漆黑的事物打碎。不过他没有实行。

五个儿子,好像五颗可怕的子弹,狗贱的妈就是制子弹的枪筒,可恨她同时又是制造火药的兵工厂。……他觉得有物在他的面前擦过,他以为那五颗子弹爆发了。他的心陡然沉重起来,他几乎不能支持那个重量,他的视线,颓然投落在地板上。

在这段精彩描写中,可以见出作者驾驭语言的能力及圆熟的写作技巧。

南来作者反映南洋下层人民苦难生活的作品,在小说方面尚有罗依夫(罗永年)的《猎狗》⁽¹¹⁵⁾,王探的《育南与但米》⁽¹¹⁶⁾,华丁(曾曼华)的《拉子》⁽¹¹⁷⁾,柳鞭(刘柳鞭)的《饥饿的狗》⁽¹¹⁸⁾;诗歌方面有张楚琨的《新世界之夜》⁽¹¹⁹⁾、《戏院门口的苍脸》⁽¹²⁰⁾、《猪的哀号》⁽¹²¹⁾,张放(张楚鸣)的《生之悲惨》⁽¹²²⁾,丘士珍的《子夜歌》⁽¹²³⁾,

王哥空的《穷人的命运》⁽¹²⁴⁾等。

(三)强调对黑暗社会与压迫者的反抗。

南来作者在反映普罗大众的苦难生活时,有的只是表现这些苦难人生的不幸与悲哀,如吴仲青的《梯形》、曾圣提的《生与罪》、曾玉羊的《生活圈外》等。这类作品仅仅在于暴露黑暗,缺乏反抗道路的指示与光明前景的展现。作品中的人物纵使有所谓的反抗,也不外是精神上的自我麻木与安慰,或者行动上的铤而走险,因此给予读者的感受唯有悲哀与压抑。

有些南来作者在“哀其不幸”的同时,更调对不合理社会与压迫者的反抗。未兆(陈炼青)的诗《我彷徨于孤岛上》⁽¹²⁵⁾呼唤“时代巨风”的来临:“我彷徨于孤岛上,/想来一阵时代的巨风,/它告诉我们起来反抗,/命运断不会如此漂蓬,/只要我们的意识苏醒,/祈有热血渐出使物雄。”连啸鸥的诗《火车驰过铁桥》⁽¹²⁶⁾为建筑工人鸣不平:“死在鞭笞下的工人说是命该注定!/饿倒在路旁的何曾有人过问一声?/这不平的社会根本就该捣毁!/这人类的蠹贼根本就该肃清!”依夫(罗永年)在诗歌《高压国的人民》⁽¹²⁷⁾里高唱:“高压国的人民已不像从前那样驯良,/他们现在已有他们具体的主张;/任你是如何……着他们的活动,/却减少不了他们反抗的高吭。”林雪棠在诗歌《赠 WC》⁽¹²⁸⁾中歌咏祖国劳苦群众对豪绅军阀的反抗,号召人民加入革命的潮流:“但是祖国底成千上万的劳苦的群众们,/断不因流血恐怖而屈服,他们只有反抗——/向豪绅军阀们作更有力的反抗。/朋友!假使你真的回祖国时,望你鼓起精神,/加入伟大的革命潮流,为人类解放而努力!”

这类题材中较撼动人心的是曾华丁的小说《五兄弟墓》⁽¹²⁹⁾。小说反映在烟园里劳作的劳工猪仔的悲惨遭遇以及他们的反抗:五位中华猪仔在烟园里过着“爬虫”般的生活,而“热国的阔人”(园主)不时地对他们鞭打鞋踢。他们终于忍无可忍,联合起来刺杀压迫他们的园主,然后一起到警局自首。虽然只须其中一人顶罪偿

命,但他们宁愿同赴黄泉,永久相会。后来烟园里的猪仔将他们合葬,题为“五兄弟墓”。曾华丁在小说中有意运用长句写景叙事,渲染他们受虐待的悲苦生活与联合宰杀园主时的反抗气势,如:

镶着钢片的舌头的凶恶的鞋子,以及用钢线缠牢的没有眼睛的藤鞭,每日里在猪仔身上徘徊的事已是见惯了。猪仔的果子我猪仔本身的冒失在为它的主人跳舞着娱悦热国的阔人的有很灵活的舌子的鞋子及没有眼睛而有很美丽的钢线条子的藤鞭,这也是见惯的事。

结果五个赤条条的嚎吼的中华的猪仔,秉着五把鬼的长舌似的镰刀,在不上五分钟的当下做下滔天大祸。那五把鬼的长舌似的镰刀上,血流流的还继续在日与血的所谓人的血间跳舞。

但长句也由于过分雕琢而出现别扭拗口的缺点。不过,《五兄弟墓》表现的反抗性颇为突出,故事情节也十分感人。曾圣提还在篇后为文推介这篇小说。

强调对黑暗社会与压迫者进行反抗的作品还有衣虹(潘受)的《三等舱客》⁽¹³⁰⁾、罗依夫的诗歌《原始遗民》⁽¹³¹⁾、《送葬》⁽¹³²⁾、《眼睛》⁽¹³³⁾、《黝黑的夜晚》⁽¹³⁴⁾、《五月歌》⁽¹³⁵⁾、《离人的歌》⁽¹³⁶⁾、一工(王探)的杂文《旺相可风》⁽¹³⁷⁾、古月(胡一声)的散文《关于徐志摩的死》⁽¹³⁸⁾、杨实夫的杂文《社会杀了人》⁽¹³⁹⁾、林雪棠的诗《牢狱》⁽¹⁴⁰⁾、《一位女性》⁽¹⁴¹⁾、静倩(黄震树)的剧本《女招待的悲哀》⁽¹⁴²⁾、广川(吴广川)的剧本《跳出象牙之塔》⁽¹⁴³⁾等。

二、主要创作特色

由于中国创造社浪漫主义作家郭沫若、郁达夫等人的影响,以及新马文坛南洋色彩文学理论的提倡,这时期南来作者的创作主

要表现以下两大特色：

(一)浓烈的浪漫主义色彩。

南来作者的许多创作，尤其抒发个人丰富情怀的作品，大多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他们的创作往往具有浓烈的抒情色彩，丰富的想象能力，热烈的情感，以及优美的文字等。

何采菽的小说《医院里》是浪漫主义作品的名篇，几乎从头至尾回荡着抒情的旋律。作者很善于在情景交融中抒发贫病交加的感受情绪，如：

清冷的午后，半窗的蓝天，薄弱的阳光斜斜地晒在院里的阶前。墙外的椰树如锯一样的叶子不绝地将地面来推锯，先生，如其椰树真的像锯能把地面锯开一条缝儿呢，我就要跳落地隙来活葬自己了唉，对此凄凉的病院，久已不流的泪，也交迸出来了。横卧在病床上，将胸间用力不绝的乱捶，终于号响大哭。同院的病人也为我哭声而惊醒。

有时采用直抒胸臆的手法，任一腔热烈情感直泻而下：

啊，先生！一粒如草际飞萤的灯光下，坐在台畔，再将先生的来信番读，却令病入膏肓不能拯救的我，更加深铭肺腑。先生，我在未死之前，灵魂未离开肉体之先，要把这次重活人间后的遭厄，对文艺对人生的态度，将死或死后蕴藏着的热炽的心，和实行社会改革的重任，赤裸裸的交给先生！先生，知我罪我，高明者自有评判。⁽¹⁴⁴⁾

这种浓烈的抒情色彩，使何采菽的小说充满浪漫主义感伤情调。

曾圣提的《秋晚》，也是颇具浪漫色彩的诗篇。诗歌想象丰富，意境十分优美。诗中描画一幅美丽而带着愁意的秋日夕照图，在诗

情画意中融入诗人对“伊人”与故乡的思念：

落日模拟伊人的微笑，
红霞潮泛于苍穹。
林鸟模拟伊人的声音，
引动我的愁思无际。

秋叶纷纷划渡一泓之小湫了，
我的归驹在哪里？
秋风把夜间的旅梦撕破了，
幽灵呵！将向何处投落？⁽¹⁴⁵⁾

诗人发挥丰富想象力，以美丽的落日、清脆的鸟音模拟“伊人”的微笑与声音，由此引发对“伊人”的无边思念，牵动他的归乡之思。而漂浮在小湫之上的秋叶，也引发诗人对归帆的联想，但不可能归去的现实，却撕破了他的“旅梦”。诗中优美丰富的想象，使这首抒发羁旅之愁的小诗笼罩在虽略带忧伤，却充满浪漫情调的氛围中。

南来作者这类文学作品，常以优美的文字，抒发浓烈的浪漫主义激情。谭云山在诗歌《崇高与伟大》⁽¹⁴⁶⁾里，赞美天的崇高与海的伟大，想让自己的身体“化作辉煌灿烂的云霞”，把“心化作无量数的泡沫”。诗歌格调高昂、气势雄伟，表现了诗人热烈昂扬的浪漫激情和开阔不凡的胸襟抱负。丁琅的散文《希腊风》⁽¹⁴⁷⁾以富于诗意的文字，赞颂希腊是“真理的火焰”、“热情之花”、“自由的种粒”和“正义的呼声”。文中对远古希腊文明的呼唤，表达作者追求真理与光明的热烈情感。这种歌咏真善美，“鼓勇前进，创造新生”的浪漫激情，也是曾圣提的诗歌《月落》⁽¹⁴⁸⁾、丁琅的诗歌《我想起那吴市的吹箫人》⁽¹⁴⁹⁾和《伯利恒的新星》⁽¹⁵⁰⁾，以及《洪荒》同人的《恭祝新禧》⁽¹⁵¹⁾等作品共同的色彩。

(二)浓郁的南洋地方特色。

南来作者在反映南洋社会生活时,已有意识地展现南洋独特的自然景物和社会风貌,注意吸收本地俚言俗语,使作品充满浓郁的地方色彩。有的作者十分重视土著民族马来族文化,译介具有本地特色的马来文学。

张冲在《漂流到狮子岛去》,对南洋的景物做了十分细致生动的描述:用“茅草和木板”做成的房子,中间有一间公用的冲凉房;“触目皆是高可三四丈底椰树,树茎光着好像裸体底瘦长底巨人”;“蕉叶似底叶丛里,垂着大的小的青的椰球,每成为我们解渴底良品”;“屋畔栽种着热带水果红毛丹”……⁽¹⁵²⁾陈炼青的《文艺与地方色彩》⁽¹⁵³⁾用喜爱的语调描绘了南洋独有的“椰树”、“树胶”、“芭蕉”,以及“长年夏”,“一雨便成秋”的热带气候。林仙峤的散文《柔佛的夜》⁽¹⁵⁴⁾,则描述了月光下柔佛海峡清幽的景色。南来作者通过对南洋景物特色的构画,为他们的作品营造浓郁的地理色彩,渲染了特有的环境氛围。

南来作者也着重展现南洋独特的社会风貌。《生与罪》中河面上蚂蚁般拥挤的船只,市面上潮水般的人流,工厂的烟突及报更的锣声,士敏土堤路上干净而印着无数正方格的路面,马路上汽车与人力车并用的交通工具,夜市中的咖啡店,令小孩嘴馋的“爱士吉林”(雪糕),脚蹬“皮鞋”身穿黄服、肩扛长枪怀揣“手扣”的“马打”(警察),以及郊野的椰树林,马来人的墓地等等,在在展现了20年代末期英殖民地政府统治下的多元种族的南洋社会,以及它作为国际商港与大都会的独特风貌。曾华丁的小说《五兄弟墓》,曾玉羊的小说《生活圈外》,静倩的剧本《凄凄惨惨》⁽¹⁵⁵⁾和《女招待的悲哀》⁽¹⁵⁶⁾,李梅子(李维纲)的小说《红溪的故事》⁽¹⁵⁷⁾,王探的小说《育南与但米》,吴仲青的小说《辜负你了》⁽¹⁵⁸⁾、《窃议》⁽¹⁵⁹⁾和《梯形》,柳鞭的小说《饥饿的狗》,张楚云的小说《伟大的灭亡》⁽¹⁶⁰⁾,王哥空的小说《实龙岗路上》⁽¹⁶¹⁾等,都展示了人物活动的社会背景。注重南

洋社会风貌的描绘，为他们的创作增添了浓厚的南洋色彩。

南来作者在描绘南洋社会现实，反映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时，注意吸收具有本地特色的俚言俗语，使其作品更贴近现实生活。

新马地区是个多元种族的社会，居住着华、巫、印和欧亚混血等几大种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一些约定俗成的语汇，这些语汇融合了华、英、巫和印等几种语言，具有显著的地方色彩。曾圣提的《生与罪》中，就运用“爱士吉林”（雪糕——英语），“马打”（警察——马来话），以及“后尾”（楼或屋的后面），“入妈的”（他妈的），“风车”（汽车）等地方语汇；曾玉羊的《生活圈外》采用“沽里工”（薪水——马来话+方言），“峇眯”（猪——马来话），“玻璃主”（法官——英语+方言），以及方言“头路”（工作），“公班衙”（办公署），“坐脚龟”（坐牢），“头家”（老板）等地方语汇；柳鞭的小说《饥饿的狗》中的“仙”（分——英语），“银仔”（银钱——方言），“马打寮”（警察局——马来话+方言），“镬”（钱——方言），“搭礼”（拉——马来话），以及张楚云的小说《伟大的灭亡》里“山芭”（农村——方言）等等，都是具有本地色彩的语汇。这些俚言俗语的吸收与运用，使这些作品洋溢着浓厚的南洋气息。

南来作者对土著马来族文化也很重视。单是曾玉羊译过的马来民歌就有 81 首。⁽¹⁶²⁾这些歌咏男女爱情的民歌，经过南来作者的再创作，除了保留马来民歌的风味与本地特色外，其语言生动精炼，极富生命力。如玉羊（曾曼方）《马来民歌选》⁽¹⁶³⁾：

十四

一杯咖啡霜，
滋润了我枯竭的胃肠；
一瞥溶溶的秋水，
滋润了我枯涩的心肝。

二十三

榴连(木旁)虽有刺，
却有浓冽的清香。
姑娘虽是貌美，
却有柔软的情肠。

除了曾玉羊的译作外，草尘(林草尘)翻译的《马来民歌二首》⁽¹⁶⁴⁾也有同样的特色，如其中一首云：“甘蔗今日种，/葱蒜明日栽；/今日仍厮见，/明日隔云埃！”南来作者还十分重视马来文化的介绍，认为有“无穷的价值”⁽¹⁶⁵⁾。曾玉羊在兄长(应为曾圣提)的鼓励下，翻译了英国作家威廉氏的《马来民间传说之研究》。他表示：“这部书对马来文化(包括民间传说、文学、班敦、礼教、家教、风俗习惯以及魔术等)有极精制的探讨和调查。”⁽¹⁶⁶⁾这部译作从1933年5月至7月29日在曾玉羊主持的槟城新报文艺副刊《轮》上连载，可见译作者对它的重视。

不过，由于中国“革命文学”过于强调“反抗”而忽视作品的艺术技巧，也对南来作者的创作造成负面影响，他们在强调对恶势力与强权者的进攻时，往往缺乏形象的塑造与生动的描绘。有时为表现“反抗”与“革命”的需要，甚至偏狭地提出“革命”与“恋爱”的对立。如林雪棠的小说《一位女性》，叙述男生松秋为了革命工作而拒绝女生秀清的爱情，而秀清为了松秋的真正“爱人”(革命)，只好牺牲爱情，投身于革命事业。⁽¹⁶⁷⁾这类作品常常流于概念化和口号式的毛病。

第四节 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时期

从1934年到1936年是马来亚地方性文学提倡的时期。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世界经济不景气的狂澜,严重地打击了完全依赖锡和橡胶出口的马来亚经济。大批的锡矿、胶园、商店和工厂在狂澜的冲击下宣布破产,大量的华工被裁退,失业情况极为严重。另一方面,日本军国主义加快了对中国侵略的步伐。1928年5月,日本在济南肇成“五·三”惨案;1931年“九·一八”事件,日本关东军炮轰沈阳,随后东三省落入日军之手;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役,也使新马华人大受震动。南来作者面对日益危机的祖国与经济不振的南洋社会,严肃的社会使命感使他们无法沉浸在盛行于新马文坛的风花雪月中。他们的创作始终表现对民族命运和人类社会的关怀。

南来作者在创作和出版形式方面也有新突破。丘士珍的短篇小说《没落》、中篇小说《峇峇与娘惹》,王哥空的短篇小说集《面包及其他》,林参天的长篇小说《浓烟》、老舍的长篇小说《小坡的生日》、许杰的散文集《椰子与榴槿》都以单行本出版,成为战前新马文坛数量最多的一批单行本。

一、主要的创作内容

这时期南来作者在创作中一方面反思经济不景气对南洋社会的深刻影响,一方面抨击中国对日军采取的不抵抗政策,燃烧起抗战的怒火。在当时盛行闲适与鸳鸯蝴蝶之风的新马文坛,他们以关怀国事,关怀人类命运的创作,为这时期新马华文文学奏响悲凉而高亢的旋律。他们的创作主要反映以下内容:

(一) 缅思经济不景气对社会各阶层的深刻影响。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期的世界经济不景气,对南洋社会的影响是深巨的。直到1934年至1936年,经济不景气的影响依然余波荡漾,对新马社会各阶层造成严重伤害。这种伤害不仅是失业与贫困,更多的是精神扭曲与情感挫伤。南来作者深刻反映了经济不景气冲击下人们生活的困苦与精神的伤痛。

白荻(黄科梅)的散文《热》⁽¹⁶⁸⁾有如特写镜头,拍摄了经济不景气下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众生相:在“污臭”的弄里,居住着“失业者”、“苦力”、“烟民”、“大胍夫”等可怜虫,和“饿得像猴子似”的孩子。他们喘息在热浪里,挣扎在饥饿线上。作品中“几十年不曾见这样热的天,热死人,不曾见这样的行情,饿死人……”,点明人们生存的境遇如此悲惨,并不仅是天气,更是经济不景气、百业萧条造成的。这场经济不景气形成强烈的冲击波,几乎辐射到社会各行各业。一村(吴广川)的小说《橡林深处》⁽¹⁶⁹⁾反映了橡胶园工人的悲惨生活。从中国来的割胶工人亚材等二百多人在橡胶园里干着繁重的割胶工作,所得工资却十分微薄。包工头趁着经济不景气时期工人无法另谋生路而克扣工人薪水。亚材因无法寄钱回唐山养活妻子和老母,在悲痛绝望之余,决定上吊自杀以解脱痛苦。白荻的小说《离散》⁽¹⁷⁰⁾叙述彬由于经济不景气的冲击而失业三年,为了生存,只得将怀孕的妻子和女儿送回中国的故事。

经济不景气不仅威胁到底层人民的生存,连富裕家庭也受到严重波及。李润潮的小说《阿娥和伊的表妹》⁽¹⁷¹⁾描写“‘黄金窟’里冒着腥臭的黑烟的凶年”,原本颇有资产的老中医陈某,也只好让女儿阿娥和外甥女阿迁休学。最后因为经济窘迫,将两个女孩“嫁”给有钱人家,以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流浪(刘道南)的小说《圈套》⁽¹⁷²⁾则反映经济不景气对教育界的冲击:由于学校经济困难,校长只好设下圈套,让年青美貌的女教师雪华去引诱有钱的商人,以使他出资帮助学校。

这些作品深刻之处在于作者不仅反映了经济不景气对人们经

济生活的影响,更在于揭示人们所受到的精神扭曲和心灵伤害。在散文《热》里,经济极度贫乏的底层人民,自然不可能有高尚的精神趣味和高层次娱乐生活,他们只能用下流笑话来解闷,如几个年青船夫打趣卖烟枝的老妇人“人老心不老”,“夜里还伴着男童睡哩”,或用赌博斗殴来做发财梦和发泄多余的精力;而年幼的孩子在渴望冰甜的雪糕时,只能受到狠心母亲的打骂。白荻的小说《离散》中的彬,在失业的三年中“无日不在和生活搏斗、和死亡挣扎”。一家三口的生活重担压得他“抬不起头,透不过气”,好几次被生活威胁得走投无路而想投海自杀。最后不得不忍受劳燕分飞、妻离子别的痛苦。而离他远去的妻子,又时时担忧彬是否会因为生活的沉重压力而再度投海自尽。

《阿娥和伊的表妹》反映经济不景气前后阿娥一家经济生活和精神上的鲜明变化,控诉造成他们生活与精神裂变的罪魁祸首。阿娥和表妹阿迁是两个纯洁天真的女生,原本过着经济优裕,快乐绮丽的学生生活。她们的父亲和姨丈陈老医生和葛慈祥,使她们常常向同学们夸示她们有这样一位父亲和姨丈。然而,当“腥臭的黑烟”吹散了“黄金窟”的繁荣时,前来求疹的病人寥寥无几,陈老医生的经济渐渐发生恐慌。终于,他将阿迁嫁给“那家伙”,自己得了二千大洋,又得着一个黄金靠山。后来,他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某杂货店的老板。陈老医生这样做的后果,一是使阿迁婚后不明不白的死去,再是使阿娥从一个知书识理的女生成为万人搂抱的舞妹。小说揭示了两代人的道德沦丧与人格堕落:陈老医生曾做过塾师,读过圣贤经书,但其廉耻之心竟被金钱征服,干出变相出卖女儿和外甥女的“无耻”勾当;阿娥本是一个天真美丽的女学生,为了赡养母亲和解决自身生活,终于沦为万人搂抱的舞妹。她并不以自己堕落为耻,反而害怕自己不用外国名字而惹人耻笑。这两代人的沦丧与堕落,反映经济不景气对人们的精神扭曲与心灵伤害。

流浪的《圈套》反映的现象更是令人震惊:由于经济不景气的

影响,逼京的一间女子华校也面临经济危机。身为一校之长的王校长和另一位章校长合伙施展美人计,让她昔日的女学生,如今的歌舞教员雪华去引诱商家“振侨兴”号的店东,以获取该店东对学校的经济资助。小说揭示经济不景气对教育界的冲击:学校原有的六十几株的月捐收已经收不到了,教员也裁减到只剩三人。作品展现了面对经济不景气教育工作者的精神裂变与灵魂吞噬: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王校长,竟然向学生灌输所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竞争法则,教导女教师“灌迷汤”之术,并设下圈套让女教师去引诱商家,成为拉皮条的捐客;而美貌的雪华姑娘,原本在香港已有情投意合的男友,但在王校长的“教导”下,在“振侨兴”赠与钻戒和金钱利诱下,竟移情别恋,成为物欲的奴隶。小说揭示的现象是令人触目惊心的。

(二)抨击中国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燃烧着抗战的怒火。

随着日军对中国的加紧侵略,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南来作者对中国的局势忧心如焚。当此国家民族存亡之际,他们开始反思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抨击其对日不抵抗主义。虽然当时尚未掀起全面抗战的风暴,南来作者的创作已蕴蓄着抗战御敌的怒焰。

天白(张晓光)在散文《谈托说》⁽¹⁷³⁾里指出国内的投降派并不打算应用国力对付日军的侵略:“‘九一八’的炮声响了,应付的是不抵抗;‘一二八’大上海毁灭了,应付的是撤兵;华北福建到处是敌人的势力,应付的是退让。一切一切,都是不应付国力的表示。”天白为此在《阿比西尼亚永远存在》⁽¹⁷⁴⁾中赞颂阿比西尼亚抵抗意大利法西斯狂徒的侵略,批判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阿比西尼亚的面积、人口、兵力、武器,和我们比较起来,相差的程度谁都知道,他们的国力,在意大利法西斯的眼中看来,不出一月可以征服的,然而他们抵抗的结果,居然支持了五六个月这么久。这比之中国,以始终不抵抗的处置,沦亡东北诸省的,惭愧的程度要怎样?”刘郎

(林建安)讽刺那些媚敌畏敌的投降者,他在散文《自大与自卑》⁽¹⁷⁵⁾中道:“在中国还有一个更奇怪的现象,平日自大自高者,一旦碰到阿 Q 口中的‘洋鬼子’,就要驯服而不自觉,连心神都有些战栗——于是,不能说话,也不敢反抗,刀剑之来,只是引颈以待!”白获在散文《古今的参照》⁽¹⁷⁶⁾中对达官显贵身居高位而不谋其政进行尖刻嘲讽与愤怒抨击:

现代的达官,也是不忧天下事的。中国的领土,给日本吞了一大半,他们却若无其事的过着写意的生活:有的说是脊背生了疮,应该上名山去拜佛;有的说是小便里有糖,非到外国去喝些“红毛”药水不可;有的因为春日融和,游兴倍增,所以就游游温泉,做做即景诗若干首;国事这东西简直不敢爬入他们的闲情逸致里去。

国民党政府如此媚外无能,而人民却不甘屈服于外敌的统治。张天白歌颂那些奋勇御敌的抗日志士道:“然而,在中国,一切的惭愧都是统治者的罪过,至于人民,却始终没投降,中国政府实际上放弃了东北诸省已经多年,但东北诸省的义勇军,却没有一天停止过他们的奋斗。……否则,伊藤博文、白川之流可以善终,日伪军队也无须日夜防止义勇军进攻!”⁽¹⁷⁷⁾虽然当时日军气焰正炽,但南来作者已预示法西斯必然灭亡,抗战必胜的前景:“法西斯的疯狂,决不因一时的胜利,而取得乐观。他们的狂暴,是要在群众艰苦奋斗中葬送未来生命的!”⁽¹⁷⁸⁾

这类题材的作品还有张天白的散文《抵抗论》⁽¹⁷⁹⁾,刘郎的散文《清日海战的痛心事》⁽¹⁸⁰⁾、《汉奸》⁽¹⁸¹⁾、《国难与学生》⁽¹⁸²⁾、《抗日与内战》⁽¹⁸³⁾、《还是不要“安内”好》⁽¹⁸⁴⁾,吴广川的小说《松花江潮的怒吼》⁽¹⁸⁵⁾、散文《义军的活跃》⁽¹⁸⁶⁾,李润湖的《苦也斋随笔·六十七》⁽¹⁸⁷⁾,以及李冰人的旧体诗《诗——鼓浪屿水操台怀古》⁽¹⁸⁸⁾等。这类作品或借史喻今,或直陈现实,抨击投降主义者及其卖国汉

奸，歌颂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和抗敌热潮。作品中蕴蓄的抗敌情绪，为本地意识挫折时期的文学创作燃烧起抗战救亡的火炬。

此外，南来作者的创作还表现其他内容，有的反映南洋华侨教育界状况，如林参天的长篇小说《浓烟》⁽¹⁸⁹⁾、李润潮的散文《伤雁先生小史》⁽¹⁹⁰⁾；有的表现底层人民不幸命运和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前者如王哥空的小说《穷人的命运》⁽¹⁹¹⁾、老蕾的小说《小七子的新皮鞋》⁽¹⁹²⁾，后者如白荻的小说《生涯》⁽¹⁹³⁾和《灰色之家》⁽¹⁹⁴⁾；有的抨击中国社会不合理现实，如李冰人的杂文《孝道的内容》⁽¹⁹⁵⁾、吴广川的小说《天鹅》⁽¹⁹⁶⁾和诗歌《摩登》⁽¹⁹⁷⁾、白荻的散文《头颅贴上了印花税》⁽¹⁹⁸⁾；有的抒发作者真挚的情感或积极向上的精神，如丘士珍的散文《哭母亲》⁽¹⁹⁹⁾、沈侠魂的诗歌《小诗二首》⁽²⁰⁰⁾，等等。这类创作或情感真挚，或笔锋犀利，或嘲讽讥笑，都是内容充实、颇有立意的作品，与这时期盛行的闲适与鸳鸯蝴蝶之风大异其趣，为当时的文坛增添了不少光彩。

二、主要的创作特色

这时期南来作者的文学创作虽然未能出现前一时期蓬勃兴旺的局面，但其创作呈现不同特色，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前此水平。

（一）描写深度上的重大突破。

南来作者在反映社会现实和地方特色方面，其深度超过前此作品。小说主要摄取南洋现实题材，在迷人的热带情调下展现社会现实生活。林参天的《浓烟》、丘士珍的《峇峇与娘惹》、老舍的《小坡的生日》、流浪的《圈套》等地方色彩十分浓郁，尤其林参天的《浓烟》、老舍的《小坡的生日》和丘士珍的《峇峇与娘惹》，更着意描绘南洋的独特风光，以及土著民族马来族的生活习俗，华侨在南洋饮食起居的生活特色等，构成广阔的热带风俗画。虽然此前曾圣提、曾华丁、吴仲青、张金燕等人的作品也十分注重南洋地方色彩，但由于受短篇小说体制局限，无法达到这时期南来作者表现南洋色

彩生活的深广度。

在长篇小说《浓烟》出版之前,反映南侨教育的作品有大吉(曾圣提)的小说《不吉的窗》⁽²⁰¹⁾、吴仲青的小说《辜负你了》⁽²⁰²⁾和《窃议》⁽²⁰³⁾等,但林参天的《浓烟》在表现这类题材的深广度上,远远超过前此其他作品。小说以1927年到1928年为时代背景,借一间位于马来亚“啼儿国”的华校,反映当时南洋华侨教育界混乱无序状态;主管学校董事部的是一群“愚而好自用”的商人。他们文化程度不高,却喜干涉校务;校长思想保守,作风畏缩,对董事部的干预只有唯唯诺诺;教员中固然有一批怀有教育热情的工作者,但也有庸庸碌碌,抱着混饭思想的教书匠;在教学法中,又存在现代的“自动教育”与传统的“棍棒教育”的激烈冲突;学校采用的教材全部照搬中国,并不适合南洋的社会与时代;学生家长普遍不重视教育,视教职员为管教孩子的保姆,等等。作者善于在各种矛盾交织中揭示南侨教育界的复杂关系与各种弊端,如董事部与校方、校长与教员、学校与社会、学生与教师、董事之间,以及先进思想与保守势力等的矛盾冲突,使小说反映南洋华侨教育状况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小说也旁及华侨与外国商家的经济斗争,中国北伐战争的局势,“五·三”济南惨案发生后南洋华侨的爱国热情与踊跃捐款支援祖国的情况,以及南洋社会独特的风土人情等,使其在反映现实生活方面具有一定深广度,成为此时期新马华文文学一大收获。

流浪的小说《南京人氏》⁽²⁰⁴⁾在反映抗日题材时,思想也较开放博大。作者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不仅赞颂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也赞赏其他弱小民族包括朝鲜民族在内的解放斗争。作者在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政策时,并未陷于狭隘的国家民族主义,将所有日本人视为仇敌。他说:“是的,东洋人中,是有着不少的思想正确的人的,我们不应该把一切东洋人,都看作是恶毒的类型。这正如我们不应该把一切中国人,都看作是真能为中华民族谋解放的斗士一样。”这种客观公正,博大开放的思想,在当时的文艺

作品中是不多见的。

（二）注重悬念手法的谋篇布局。

作品的谋篇布局是创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环，关系到作品的艺术效果及成败。南来作者为避免平铺直叙而注重悬念手法的采用，使其作品具有较强的艺术魅力。老蕾（许清昌）的小说《小七子的新皮鞋》开头以八岁儿童小七子眼光，看着母亲让人替她换衣服而产生惊异与不解之念，以引发读者好奇心，为下文叙述小七子母亲到有有钱人家帮佣而受少爷侮辱布下悬念。白荻的小说《离散》开篇是“孩子要细心抚养啊”的叮嘱语，以及彬和薇在码头话别的悲愁场面，使人不禁想探究他们夫妻离别的原因，为作品增添吸引读者的艺术魅力。流浪的小说也连续采用悬念手法的布局，如《异族的妻》^{〔205〕}、《圈套》、《南京人氏》等。以下着重论析《圈套》和《南京人氏》的悬念手法，使我们对南来作者在谋篇布局方面的匠心能以一斑而窥全貌。

《圈套》的表现手法较为独特，小说题为《圈套》，开头却叙述雪华浓装艳抹后随两位校长和“振侨兴”店东出外共进晚餐，然后驾车兜风。在阴暗的椰树林里，倾慕雪华才貌的“振侨兴”店东趁机赠与雪华钻戒，以金钱俘获美人心。小说直到结尾才通过王校长的话暗示出这一套貌似无意的“拉郎配”，实际上是章、王二校长精心设计的“圈套”，作者开头对雪华姑娘美丽的容貌和衣饰进行精细的描绘，正是为后文的美人计设下伏笔。读者至此才恍然大悟。这种避免正面平铺直叙的表现手法，不但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而且给人更广阔的回味与思考空间。

《南京人氏》没有复杂的故事情节和线索，但由于悬念手法的成功运用，使其显得跌宕起伏，引人兴味。小说以1933年仲夏日军正在积极推进南进政策为背景，叙述一位自称是“南京人氏”的“陈先生”受聘到暹京一间华校任英文教员。由于他华语发音不正，外貌又酷似东洋人，因此被校方和同事疑为日本间谍，他爱人从美国

寄来的信也被私自拆开。直到此刻,人们才知道他原来是流亡在外的朝鲜爱国志士。小说开头先描述“陈先生”“老于漂泊”的外貌,寒伧的衣着,倨倨生硬的国语发音,以引起校长“心理上某种不安”,也引发读者的好奇心。接着,小说有意渲染东洋人的武士道精神和当时日本加紧推行南进政策的紧张局势,进一步激发读者的好奇心与紧张情绪。而小说中的“我”——学校的教务主任,对“陈先生”的情感也是复杂多变、矛盾交集:既羡慕他的研究精神和苦学毅力,又痛恨日本武士道的传统观念和狭隘的国家主义;既深深怀疑他是东洋人,又希望他能摆脱狭隘的国家主义而同情于中国人民和弱小民族的求解放;一方面极力想探究“陈先生”的神秘来历和真实人格,另一方面又因为误解他而忏悔和惭愧……。小说篇幅不长,却呈现跌宕多变的色彩。结尾处揭示“陈先生”是高丽人的身份,与开头制造的悬念相呼应,从而造成轰动效应,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由于作者善于铺垫,使这一切虽在意料之外,却又在情理之中。

(三)哲理与形象的有机结合。

这时期南来作者创作大量散文,针对中国和新马两地的政治、经济、社会和人生进行论析,在明白晓畅的议论中,将深刻哲理与形象描绘有机结合在一起,取得较佳的“理趣”效果。

林棘的杂文《变与“不变”》⁽²⁰⁶⁾在议论时政时,既有哲理意味,又有形象的生动描绘。作品借阐述“变”与“不变”的关系,一方面讽刺那些所谓“不变”的人物,曾经是高呼“收回失地”,痛骂不抵抗主义的急先锋,如今却摇身一变,坚持着“亲善外交”的政策,在痛饮着救亡学生、“爱国犯人”的热血;另一方面又以无时不在变化着的宇宙万物为例,批判国民党政府在最险恶不测的政治风云中,却坚持“不变”的,乞怜的外交政策。作者以玩猴戏者为例,阐明国民党政府如果没有“一变”的决心与勇气,那就势必做个在他人呼叱之下遵命而变的猴子。如此将导致“全国的领土无疑被变得与满洲同

样,整个的主权也必被变成华北的类似”的后果。文章善于用哲理性的语言说理,如用“先哲告诉我们:人不能在同样的河流中洗澡,也不能沐着同样的阳光”来说明宇宙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着,政府的外交政策也应该适时变化。文章语句形象生动,也能在哲理性论析中运用生动比喻,如以玩猴者说明“这是一种被动的变”,以毛虫成蛹而化为“飞舞自如,娇艳悦目”的蝴蝶来说明“这是一种自动的变”,使文章更具形象性与说服力。

白荻的散文《看灯》⁽²⁰⁷⁾叙述中元节之夜与友人同去小坡看灯的情景。作品表面写“灯市”,实际展示“社会形形色色的景象”,如贫富悬殊、封建卫道、喜新厌旧、偷窃卖淫等。作者并未以抽象化语言议论时弊,而是通过对“灯屏”的精细描绘,以及“灯市”场面的生动描写展现出来,如:

灯台搭在公市前的一块广场,是很长的一排灯屏,灯屏上札着五光十色的灯景:……这一方面札着华园紫陌,朱门院庭,楼阁连云,亭榭接天,另一面又札着田畴沙渊,穷家破户,瓦不蔽屋,雨漏淋漓。这一边是浓春佳日,桃柳争艳时节,踏青女士,连袂于春郊之上;那一边是寒月西斜、竹院风生的夜里,在红楼中有谁家少妇对陌头柳色,细数归期……。这屏上的灯景,就札着社会上形形色色的景象,谁说这不是中国艺术最高的表现呢?

这里借灯景描绘社会的贫富悬殊与人生的悲欢离合,形象生动逼真,文笔典雅优美,又蕴含深刻哲理意味。其他如对“封建卫道”思想的嘲讽与批驳,也寓于“灯市”的生动叙述和形象描绘中。

第五节 本地意识挫折时期

1937年到1942年是新马文学本地意识挫折的时期。这是一个激荡着抗战救亡高涨情绪的时代。1937年“七·七”芦沟桥枪声,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国民党和共产党两党合作,领导全国人民投入了抗日救亡的伟大洪流。侨居海外的新马华侨群情鼎沸,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大力展开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抗战救亡工作。南来作者处身这样的时代洪流,他们继承中国文化中的现实主义传统,以手中笔为武器,以“纸弹配合子弹”,全面描绘中国和新马两地人民保家卫国、抗敌御侮的动人场面,形象地展现这时期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和社会画卷,为战前的新马华文文学树立了第二座丰碑。

一、主要的创作内容

南来作者这时期的创作主要围绕抗战救亡的主题,多方面展现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和新马华人支援祖国抗战的运动:

(一) 控诉日军暴行,关怀狼烟四起的祖国。

日本军阀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在日军铁蹄的蹂躏下,多少中国人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又有多少人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有些南来作者就是从沦陷区逃亡出来的。他们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日军的暴行,这使他们不禁血脉贲张,义愤填膺。即使是未曾经历过沦陷苦难与战火洗礼的,也能感受到祖国人民所承受的战争苦难。他们以文艺创作来控诉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传达出中国人民在日军铁蹄下辗转呻吟之声。

白荻的诗歌《祭之辞》⁽²⁰⁸⁾揭露芦沟桥事变后日军在中国欠下的血债:“古都旗子,/芦沟月下,/翻开血账一页。/抽肠,刖骨,/茹

毛,饮血,/把骷髅当酒杯。”诗人发出悲愤的控诉:“谁践踏我们祖先的庐墓,/谁杀害我们的父母弟妹?”蓬青(张曙生)在诗歌《热风》⁽²⁰⁹⁾中揭露日军对华夏子孙施予的暴行:“一颗罪恶的枪弹/射过万千千人的胸膛,/血心,/穿上火的衣,/闪耀着/光和热,/回响,/反抗,挣开去,/枪弹在每一个人的/身上跳。”在敌人的血腥屠杀下,“中原,我们的母亲/被羁绊在/黑色的刑槽前,/吮吸着炮火的器官/生死,/死生……”日军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的灾难。在战火摧毁下,到处是生灵涂炭,哀鸿遍地。沦陷区人民遭受到前所未有的肉体与精神上的伤害。

铁亢(郑卓群)的中篇小说《试炼时代》⁽²¹⁰⁾以1937年日军攻陷北平,占领华北地区,继而进军江浙上海为时代背景,叙述青年知识分子张健一家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控诉日本军阀在中国土地上灭绝人性的兽行。张健自小丧父,在族叔张川的百般呵护下过着优裕的生活。但是当侵略者的魔爪伸到他的家乡时,他们一家就遭到残酷的厄运:族叔为保护女儿死于为虎作伥的朝鲜人枪下,张川的妻子和两个女儿被日军奸杀,张健只好带着年迈的母亲和怀孕的妻子仓惶逃命。逃难途中,刚生下的儿子不得不遗弃在半路上,母亲也在敌机的轰炸中丧生……小说在在展现了日军铁蹄下沦陷区人民生灵涂炭的惨痛景象。

南来作者面对狼烟四起的祖国和在战火下辗转呻吟的人民,无不感到深深的痛苦。他们对灾难深重的祖国人民寄予深切的关怀。莹姿(刘耘之)在诗歌《窗》⁽²¹¹⁾中沉痛地吟道:“望故国,/烽烟弥漫,/拼将血肉斗豺狼。/远水连天,/云山渺茫,/离愁十万一身担”,抒发了深深的忧国之思。他们在关怀祖国命运时,对祖国人民摆脱侵略者的奴役充满信心。刘思(刘世潮)在《夜读普式庚诗》⁽²¹²⁾中云:“去国万里/蒙尘的琴声早已无声/今夜/我却以稀有的虔诚来歌颂祖国的战争。”诗人预示道:“战争 战争/旧的中原在战争中死灭/战争 战争/新的中原在战争中茁生/鲜明的旗帜/遮

去世的阴影/灿烂的炮火/绘出未来的远景。”

这类控诉日军暴行,表达对祖国关怀之情的作品,尚有林秋(陈子彬)的诗《故乡》⁽²¹³⁾,耶鲁(黄望青)的散文《敌人在华北的暴行与阴谋》⁽²¹⁴⁾,莹姿的诗歌《哭被暴敌掳去的五百儿童》⁽²¹⁵⁾和《哀江南》⁽²¹⁶⁾,温志新的诗《难民的悲哀》⁽²¹⁷⁾等等。这些作品控诉日军在中国土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表达了南来作者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思。

(二)歌颂中国人民的斗争,展示中华儿女抗击侵略的精神。

尽管日本侵略者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人民,但中华儿女并未被日军的烧杀抢掠所吓倒,并未屈服于侵略者的淫威下俯首甘为亡国奴。他们不能容忍乡土遭到野兽的践踏,不能忍受和平安宁的生活受到外来者的侵略和破坏。南来作者西玲(吴章庆)在诗歌《吴家村》⁽²¹⁸⁾里表示抗击侵略者的决心:“今天 当东海的敌人/要闯入吴家村/我们吴家村/不能把菜畦/田 禾场/牛栏 果树园/避风雨的茅舍/以及鸡 猪 羊/给敌人的屠刀伸入/让人随便掳掠

杀戮/还有村中的娘儿/更不能任人奸淫/白罗溪边的清流/决不给敌人战马来饮水。”诗人发出保卫乡土的呐喊:“吴家村愤怒着/吴家村咆哮着/我们要抓回当年/那一股强悍的民风/变革中喷出的火花/看我们斗争的精神/要在保卫乡土/总表现在吴家村。”蓬青(张曙生)的诗歌《十月的烽火》⁽²¹⁹⁾歌颂华夏子孙反抗法西斯侵略的正义斗争:“万里的烽火,/燃红了故国半个天!/汨罗江暗鸣地嘶叫,/我们天然的战鼓。/……中华民族魂依然长存,/武士道的狂梦又一次空做!”

南来作者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但对抗战胜利前景充满信心。胡愈之在《南洋的新时代》中深刻指出:“战争是残酷的、痛苦的,但是战争却推动着历史的巨轮前进。战争划分历史的时代。一切陈旧腐败的在战争中没落,一切光明进步的在炮火中孕育成长发展。……战争,将要带来了人类的新时代,远东的新时代,中国的新时代

代。”⁽²²⁰⁾郁达夫在散文《估敌》⁽²²¹⁾中也道：“最后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同胞们起来吧，一九三九年，便是我们复建国度的更生年！”

在这类歌颂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作品中，南来作者丁倩（张业隆）的小说《一个日本女间谍》⁽²²²⁾是当时蜚声文坛的佳作。小说描绘一个动人的“抗战加爱情”的故事：从事地下抗日工作的“我”，偶然邂逅一位美丽而神秘的女子安娜·莎，开始时怀疑她是日本间谍，后才知道她是位抗日志士的遗孀，对日本军阀怀着刻骨仇恨。他们在共同从事秘密抗日工作中建立了真挚的爱情，但两人并未陷入儿女之情而忽略抗日工作。在一次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活动中，安娜·莎献出宝贵的年青生命。小说以细腻深刻的笔触，表现抗日志士为了将中国人民从侵略者魔爪中解放出来而从事危险艰巨的工作，他们牺牲了家庭和个人幸福，甚至奉献出自己的生命。

这类作品还有刘思的诗歌《起来！中华民族的儿女们》⁽²²³⁾和《保卫大徐州》⁽²²⁴⁾，郁达夫的散文《敌军阀的诤言真象》⁽²²⁵⁾、《“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²²⁶⁾、《“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意义》⁽²²⁷⁾，金丁（林竹铭）的小说《谁说我们年纪小》⁽²²⁸⁾和《沦陷以后》⁽²²⁹⁾，叶尼（洪为济）的戏剧《伤兵医院》⁽²³⁰⁾、散文《神圣的民族抗战爆发了》⁽²³¹⁾，流浪的历史小说《福建暴风》⁽²³²⁾，老蕾的诗歌《珠江怒潮》⁽²³³⁾，莹姿的诗歌《怒吼的黄河》⁽²³⁴⁾，絮絮（丘絮絮）的诗歌《游击队员》⁽²³⁵⁾、《送弟出征》⁽²³⁶⁾、《到前线去》⁽²³⁷⁾、《铁的洪流》⁽²³⁸⁾，温志新的诗歌《大家杀敌去》⁽²³⁹⁾、散文《战地鸿音——勇敢的理弟》⁽²⁴⁰⁾，等等，这些作品或颂扬中华儿女不屈的斗争精神，或强调杀敌御侮的重大意义，或歌颂青年人慷慨从军的豪迈气概，充分展示华夏土地上这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画面，谱写了一曲曲反侵略的昂扬战歌。

（三）反映新马人民多层面的救亡运动，颂扬他们支援祖国抗

战的热情。

日本军阀对中国的野蛮侵略行径，激起新马华人的强烈义愤。面临祖国生死存亡之际，他们群情激昂，以实际行动展开多层面的救亡运动，充分表现了爱国爱乡的强烈感情。南来作者置身于这样一个充满爱国激情、热烈支援祖国抗战的新马社会，又怎能不感染到浓烈的时代气氛？他们的创作反映了新马华人各种形式的救亡运动。

(1)表彰新马华人支援祖国抗战的募捐行动。

面对遭受日军铁蹄蹂躏的故国故乡，新马华人组织各种筹赈会，掀起广泛的募捐活动，从经济上支援受难同胞和抗战军队。这类募捐活动动员了新马社会各阶层华人，从富商巨贾到走卒贩夫，从社会名流到厂矿工人，都能慷慨解囊捐助祖国抗战。义捐形式各种各样，除常月捐和特别捐外，还有寒衣捐、难童捐、药物捐等。老雷的小说《弃家者》⁽²⁴¹⁾反映机工林阿狗每月花费不少工资买月捐，支援祖国抗战。乳婴(陈树英)的小说《八九百个》⁽²⁴²⁾也描写老矿工李大伯伯在家境十分惨苦的情况下，仍挤出钱来买公债。叶尼(洪为济)的散文《卖花队》⁽²⁴³⁾叙述在偏僻的小山芭里，十几岁的小女生上街卖花，以募来的钱救助祖国难民。在当时新马社会，几乎所有华人都懂得支援祖国抗战，“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道理，甚至连正在求学的童稚也深明大义，如乳婴的小说《姊弟俩》⁽²⁴⁴⁾叙述小学生魏牛和姐姐将每日零用钱节省下来救助祖国受难儿童的动人故事。

刘思的诗歌《代募寒衣》⁽²⁴⁵⁾抒发新马华人关怀那些在祖国“雪花片片”中抵抗日寇的“正义的斗士”，为他们集募寒衣，雪中送炭的温情。诗歌意蕴深沉，颇有韵味：

借一天云

裁无数的棉衣

在不易被发觉的地方
绣上最温柔的相思字

在远方

此时

等着的正是暖意呢

(2) 赞扬抵制日货,不与日商合作的各界人士。

新马华人对日军侵略祖国的野蛮行径无比激愤。为了惩治日本军国主义,阻止日军的侵略步伐,他们行动起来抵制日货,不与日商合作。他们拒买拒卖日货,不为日本人做工,不从事与日商有关的工作。对那些执迷不悟的民族败类,则给予严惩。铁亢的剧本《父》⁽²⁴⁶⁾叙述杂粮商郑汉杰利欲熏心,置民族大义于不顾,与日商合伙做粮食生意,终于导致父子反目,粮船也被锄奸团凿沉,落得人财两空。老蕾的小说《新生》⁽²⁴⁷⁾表现商人伟民财迷心窍,替敌人招募开矿的华工,并为敌人散布谣言,后被锄奸团割去耳朵,在血的教训面前才醒悟到自己铸下大错。乳婴的小说《八九百个》则着重从群体展现新马华人爆发出来的爱国激情和伟大力量,是南来作者这类作品中的代表作。

乳婴的小说《八九百个》以青年工人秉初、秉全兄弟和老工人李大伯伯为叙述点,带动整个面的反映:在封闭的矿山里,这群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八九百个华人矿工,一直蕴蓄着反抗日本矿主的力量。当他们得知自己生产出来的铁矿是被日军用来制造杀害祖国同胞的武器时,反抗的怒火终于喷涌而出,八九百个工人发出了“我们不能杀自己的同胞”,“中国工人是不能帮助敌人的”,以及“打倒东洋”的怒吼。于是他们集体辞职,并动员矿区的印度和马来工人也辞职离去,使矿山成为一片焦土。

(3) 歌颂回国当兵、参加救护队和从事机工服务的英雄。

新马华人为了拯救危亡的祖国,除积极募捐和抵制日货外,有

的甚至甘冒生命危险回国从军，奔赴前线请缨杀敌。刘思的诗歌《去，去当兵！》⁽²⁴⁸⁾抒发了慷慨从军的豪情：

好，
你就去！
你到南国：
荔枝花应开了。
紧紧吧，
握一握手；
热烈的掌心——
燃烧着一团笑。
……
去，
去当兵，
去参加战斗，
跟着我就来呀！

尽管亲朋好友在送别时难免有“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感伤：“我泪雨倾涌/临风，一恸/送你去冲锋”⁽²⁴⁹⁾，但为祖国自由而牺牲的信念却鼓舞着这些海外赤子，刘思的诗歌《留别》⁽²⁵⁰⁾咏道：“你们会更敬爱我的/当祖国在我尸体上自由的飞行。”有的组织战地服务团回国从事抗战救亡工作，如叶尼的剧本《没有男子的戏剧》⁽²⁵¹⁾叙述南洋某中学的女生谢美玉参加战地服务团回国工作的故事。有的回国参加救护队，如老蕾的小说《重逢》⁽²⁵²⁾叙述南洋富家女秀英回国参加救护队，和恋人在伤兵医院重逢，最后双双死于敌机轰炸之下。有的回国当机工，为抗日军队从事运输工作，如老蕾的小说《弃家者》描述华人机工林阿狗“遗弃”年老无依的母亲，独自悄悄回国参加抗战的故事。

二、主要的写作特色

南来作者的抗战救亡文学,紧密配合时代风云变化,其创作特色也深深刻上时代烙印,如许多作品笼罩在雄浑悲凉的时代气氛中,在冲突动荡的环境中展开事件和刻画人物心理活动,先抑后扬手法的普遍运用等等,使这时期南来作者的创作呈现独特的色彩。

(一)雄浑悲凉的时代气氛的渲染。

战前5年是一个急剧动荡的时代,日军残酷野蛮的侵略行径,中国人民的悲惨遭遇和艰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新马华人支援祖国抗战输将的救亡运动,以及抵制日货、铲除汉奸的斗争,等等,都对南来作者的创作产生莫大刺激。面对日军的凶狠残暴,人民的辗转呻吟,他们因感时伤世而顿生悲凉之感;对抗战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又使作者着意展现中华大地上华夏儿女不屈的抗争精神,因而使他们反映抗战救亡的创作笼罩在雄浑悲凉的氛围中,这在之前的新马华文文学是少见的。

铁抗的中篇小说《试炼时代》和丁倩的小说《一个日本女间谍》勾画了一幅急剧动荡的时代画卷,无论是广阔的空间展现,或是具体的场面描绘,都渲染一种雄浑悲凉的时代气氛:

原野亦疯狂地惨叫,着,低飞的铁鸟从这边荡到那边。泥土夹杂着铁屑,由裂了的土口溅出,发出可怕的黄焰。大地摇着,似乎向下猛堕,又向上狂升。烟、火,在摇曳的地面乱抖着光影……。

终于飞机的吼声向北隐没,隐藏在田沟、石碑、树丛间的黑影们从昏暗中惊觉过来,匆忙走向轨道和站台,分辨不清的哭声,立刻遍布了受伤的原野。……⁽²⁵³⁾

这里描绘的是日军轰炸原野上运载难民伤兵列车的情形。整个画面完全采用动态的描写,通过原野在敌机轰炸下的摇曳惨叫,泥土

夹杂着弹屑的飞溅,烟、火光影的乱抖,难民伤兵的哭声,渲染了战争的悲凉气氛。然而广漠深沉的“原野”,北方旷野上的田沟、石碑、树丛,以及“原野”人格化的描绘,又使悲凉的场面融合着雄浑的内蕴。小说对张健一家从华北逃难到西北、江浙?时沿途战乱情形的描绘,都有类似气氛的渲染。丁倩的小说《一个日本女间谍》也常常笼罩在雄浑悲凉的气氛中。小说“野祭”中“我”和安娜·莎祭拜安娜前夫的场面,安娜类似黑色丧服的冬装,衬着白雪覆盖的墓地,伴随大理石雕成的十字架,阴冷的北风,以及与白雪相映的血色鲜花,在在烘托一种悲凉的气氛;而“我”对往事的回忆,其中学生激昂慷慨的爱国场面的描绘,安娜·莎前夫富于煽动力的演讲,以及学生对警察残暴镇压的反抗,等等,又使墓地的凄凉哀伤气氛参杂着热血沸腾的雄浑气氛。

《试炼时代》结尾处表现武汉人民庆祝津浦大会战的火炬示威游行场面,则将雄浑的气氛渲染推向高潮:

是地球翻身的第二晚,大武汉烧起十万火炬。

十万人汇成了烘热的血川,在火样的高热中炼出无上刚毅的灵魂与意志。十万火炬血红地烧,英勇地高高擎着。火光闪荡里,几乎加烈了欢呼和歌唱像河也似的流向新生的途道。十万、百万、万万的心,万万的意志在火炬示威大游行中庆祝津浦大会战的空前胜利。

火炬的红焰伸展了翅膀,企图成为暴风雨中的海燕。这海燕是血色的,是中华人民燃烧着的心。火在烧在熔,从街旁的店、的家流了出来,成为这绵长巨大的庆祝游行队伍……

中华民族的每一个细胞已经复活了,就复活在庆祝的十万火炬的红光里,在战斗的奋进的四月里,武汉——中华的心脏,集积着沸腾的血,将向遥远光明的前路倾注……⁽²⁵⁴⁾

(二)在冲突动荡的环境中展开事件和刻划人物心理。

南来作者反映抗战救亡题材的作品,往往将人物与事件置于冲突动荡的大小环境时,使发生的事件具有时代意义,人物也呈现复杂丰富的性格色彩。

铁亢的小说《试炼时代》中故事情节的层层推进、张健一家每况愈下的悲惨遭遇、主人公性格心理的逐步变化,都是在日军侵占华北而后向江浙一带步步推进的战乱中发生的。作者将人物置于急剧动荡冲突的环境时,从而展现被压迫民族如何从心理到行动上爆发出抗争的力量。小说中的张健在目睹日军残杀族叔一家的暴行,以及在逃难途中亲身感受日本侵略者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后,对日军十分痛恨。但作为孝子和尽责的丈夫,他感到自己负有保护妻子母亲的责任。在逃难途中,他将家庭利益置于第一义,认为“青年人固然要抢救邦国,但最主要的却是抢救家庭”。后来在血的教训面前,他和妻子都认识到“当邦国在敌人的铁蹄下的时候,家庭是没有保卫的可能的”。他们主动拆散家庭,决定奔赴郑州从事抗日活动。小说将张健放置于血与火的时代洗礼中,通过故事情节的逐步推进来展示人物的精神巨变:从内心的恐惧走向行动上的坚决反抗,由被动逃难求生到请缨杀敌,最后由个人利益上升到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由此塑造出性格饱满的人物形象,深化抗战救亡的主题。

乳婴(陈树英)反映这类题材的作品也具有同样特色。小说《小根是怎样死的》⁽²⁵⁵⁾和《逃难途中》⁽²⁵⁶⁾都是在日军侵华期间兵荒马乱的环境下展开事件的叙述和人物的心理描写。前者以日军进攻上海为背景,叙述年仅11岁的儿童小根在上海沦陷时与母亲和姐姐失散,后来在一次施食时被抢食的饥民践踏而死的悲惨事件;后者也将难民李大嫂置于战乱中,描述她为使自已免于落入日军魔爪而不得不抛弃亲身骨肉的痛苦抉择场面。乳婴描写新马华人支援祖国抗战的小说《姊弟俩》也以新马社会轰轰烈烈的抗战救亡活

动为背景,对人物丰富复杂的心理活动展开细腻和多方面描写,塑造了新马小学生深明大义和纯真善良的可爱形象。

《姊弟俩》对儿童心理的刻划是较为成功的:小学生魏牛在轰轰烈烈的募捐活动中,响应级长“大人救大人,我们小孩救小孩”的建议,为自己能捐钱给祖国受难的儿童而觉得“高兴”和“骄傲”。但他毕竟是个缺乏自制力的儿童,当天气毒热难忍时,他忍不住用准备捐出的零用钱偷买雪渣吃。小说用符合儿童心理和神态的语言,描绘魏牛为掩饰错误而撒谎的一系列言行。但魏牛毕竟是个深明大义、能辨善恶的孩子,当他得知级长要让自己在戏里扮演汉奸时,不禁怒火中烧,以致挥拳打人;当他看到姐姐误买东洋鱼时,也对姐姐进行叱骂。后来姐姐当众揭露他的谎言,他感到极度羞愧。终于,他克服了嘴馋的毛病,决定把每天的零用钱捐出来。小说叙述生动,对儿童的言行举止有较准确生动的描绘,尤其能捕捉儿童的心理特点进行细致微妙的刻划。如魏牛在班上撒谎时被姐姐揭穿,他就怀着报复的心理,所以当姐姐误买东洋鱼而遭到众学生指责时,他不禁产生报复的快感。这些心理描写十分符合儿童的性格和心理特点。而作者在刻划人物心理,塑造丰富复杂的人物形象时都把主人公置于新马华人踊跃抗战输将的社会环境中,由此达到宣传支援祖国抗战救亡的主题。

(三)先抑后扬手法的普遍运用。

这时期南来作者在创作技巧上普遍运用先抑后扬的手法。这除了艺术表现的需要外,与当时社会现实有着密切关系。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展开的。敌人表面的凶狠强大,战争的血腥残酷,都使人们心头罩上阴影;许多人虽拥有满腔爱国热情,然而生存处境的艰难困苦,人性的脆弱动摇,思想觉悟的高低,等等,也使人们在抗战救亡运动中呈现复杂多元的性格特征。由于这类现实因素,南来作者在反映抗战救亡题材时,普遍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

从作品抗战主题的呈现看,铁抗的小说《试炼时代》、乳婴的小说《逃难途中》、《小根是怎样死的》和《八九百个》、老蕾的小说《新生》、刘思的诗歌《夜读普式庚诗》、叶尼的剧本《没有男子的戏剧》、金丁的小说《谁说我们年纪小》,等等,都以先抑后扬的手法,首先描写抗战前景的阴暗面,如《试炼时代》开头时渲染敌人的凶残强大和来势汹汹,《逃难途中》和《小根是怎样死的》反映人们面对日军的进逼纷纷躲避逃难,《没有男子的戏剧》和《新生》则表现唯利是图的商人罔顾国家民族利益而为敌人效力,以及自私的母亲阻止女儿回国从事救护队工作等,这些阴暗面的铺叙描写,既符合生活与艺术的真实,又为结尾处展示的光明前景起反衬作用。因此,当《试炼时代》最后展现人们在武汉游行时激昂的抗战热情,《逃难途中》结尾李大嫂“抛掉孩子,留着自己好和东洋鬼子拼命”的坚忍抉择,《新生》中奸商的痛改前非,以及《没有男子的戏剧》中母亲支持女儿回国参加抗战的思想转变,都更为撼动人心,抗战主题前景的展示也更加光明灿烂。

从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看,南来作者笔下的爱国人士大多是现实生活中的芸芸众生,他们既非富甲四方的富商巨贾,也非身怀武功绝技的神话英雄,因此作者在塑造他们的爱国形象,展现他们的高尚情操时,也往往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既表现他们作为凡夫俗子的种种局限和弱点,如贫困、低贱、脆弱、私心、鲁莽等,又竭力挖掘他们内心的爱国激情展示他们高尚的精神境界。这种先抑后扬的表现手法在乳婴的小说《八九百个》和老蕾的小说《弃家者》中都被采用。

《八九百个》采用先抑后扬的手法,以李大伯伯惨苦的家庭生活来表现这群华人工人“位卑未敢忘忧国”的伟大情操。李大伯伯年逾五十,但家境堪怜:长子三几个月前刚去世,守寡的媳妇又将分娩,十三四岁的小儿子只好辍学到锡矿谋生。李大伯伯年老力衰,却不得不负荷全家的生活重担。当秉初兄弟号召工人罢工时,

李大伯伯曾为一家人的生计忧虑犹豫过，但在家与国的天平上，李大伯伯终于决定为国家而牺牲自己的小家，以小我来成全大我。他说：“救国是比天还大的事情，国家不亡，同胞不死，自己不做亡国奴，一家饿死也是荣耀的。”这是李大伯伯的心声，也是八九百个华人矿工的爱国心声。小说展示这群生活愁苦不堪却不忘忧国忧民的华人矿工形象，使他们贫乏的物质生活、低贱的社会地位与高昂的爱国热情、勇于自我牺牲的高尚精神形成鲜明的对比，给读者以强烈的震撼力。

老蕾的《弃家者》描述机工林阿狗“遗弃”年老无依的母亲，独自悄悄回国参加抗战的故事。作品先描写林阿狗家境的惨况，以及母亲遭儿子“遗弃”后的孤独生活，而后一步步挖掘事情的真相，从而刻划林阿狗平凡而伟大的形象：林阿狗作为一名普通华人司机，身负养家活口的重任，但在祖国危亡时刻，他瞒着家人捐出大笔钱支援祖国抗战。当妻子和女儿弃世后，他强忍悲痛，毅然辞职回国服务，将风烛残年的母亲独自“遗弃”在马来亚。他在家国与忠孝不能两全的情况下，忍痛舍弃小家而拯救危亡祖国的光辉形象，直到接近小说尾声才揭示出来。这种先抑后扬的表现手法，使作品克服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正面宣传、浅白直露的毛病，给读者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较高的想象空间。小说结尾处的“这一夜，我常常醒来，每回醒来，我似乎听到林阿狗驾着笨重的军车驰过的声音”的渲染，使林阿狗的形象迸射出崇高之美，令读者在对弃家者的同情、对被遗弃者的哀怜中，升华出崇高的敬佩之情。这是《弃家者》运用先抑后扬手法取得的艺术效果。

第六节 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的角斗时期： 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时期

马来亚自1942年1月遭日军入侵，至1945年8月日军宣布投降，共经历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时期。在日军疯狂屠杀与黑暗统治下，新马文坛陷入万马齐喑的局面。虽然有些抗日的地下刊物在秘密印行，但由于战乱和年代久远等原因，这些文学创作已经湮没而无处发掘，所以沦陷期间的新马华文文学至今几乎一片空白。

本节主要论析1945年到1949年的新马华文文学创作。这是本地意识与侨民意识的角斗时期，即马华文艺独特性主张时期。这时期南来作者的文学创作一方面充满对沦陷时期新马人民所承受的战争苦难的追忆，对在法西斯屠刀下牺牲的文化人的悼念，另一方面也展现了战后新马社会百业萧条、人民困苦不堪的生活，预示出光明未来的一线曙光。

一、主要的创作内容

(一)追忆新马人民所经受的战争苦难，揭露日军的残暴罪行。

南来作者由于亲身经历日军侵入马来亚的战乱时期，耳闻目睹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残暴罪行，他们在战后的不少创作，都在追忆日军在马来亚犯下的滔天罪恶。丘天(丘士珍)的中篇小说《复仇》⁽²⁵⁷⁾描述新马人民在这场战乱中承受的苦难：日军从北马入侵，势如破竹，而英军则全线崩溃，节节败退，最后全军撤走，留下手无寸铁的百姓任日军宰割。整个社会陷于混乱无序状态，一些无赖市民又趁火打劫，大发战争横财。平民百姓在兵荒马乱中终日人心惶惶，逃生无门，随时有性命之虞。小说以生动的笔触，揭露所谓的“大日本蝗军决不伤害平民”的无耻谎言：

也来不及喊一声,就“兵令碰郎”地丢下了十几个大小炸弹,燃烧弹在吉宁街一带!人们一阵昏眩,四处混乱起来了!有几处的楼屋崩陷了,火烟浓雾般直冒上空!尖锐的女人喊叫声,小孩哭叫声,男人的沙哑声,织成一片恐怖前奏曲!

天杀的鬼子这样残忍呀!居然又向着逃难的人民用机关枪扫射,一排排的男女倒下去了!凄厉惨痛的哀叫声,简直是震动天地了!可是鬼子却在飞机上狞笑了,胜利了!

“大日本煌军决不伤害平民!”

吴仇逃呀逃地忽然想起文字的传单:

“万恶的鬼子!无耻的鬼子!”

作者通过敌机狂轰滥炸、殃及无辜平民百姓的场面描写,形象地展现了新马人民所遭受到的战争荼毒及苦难。

日军入侵马来亚时,由于受到新马人民,尤其是华人义勇军的顽强抵抗,故对当地人民恨之入骨。他们占领马来亚后,开始实行“大检证”,并建立所谓“良民证”制度,对当地人民进行疯狂报复和杀戮,手段之残忍与毒辣,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李冰人的系列散文《过关与“鬼门”》⁽²⁵⁸⁾、《酷刑种种》⁽²⁵⁹⁾和《“族”与“瓜蔓抄”》⁽²⁶⁰⁾等等,通过追溯中国历史上帝王的残酷暴戾与封建法律的严酷,衬托日本法西斯对新马人民灭绝人性的暴行,其“惨烈残忍,殆或有过之”⁽²⁶¹⁾。在《酷刑种种》中,作者揭露道:“记得当日寇在麻、峇实行‘检证’时,就有一大批侨领们在夕株山被以刀戮……最酷的还以征剿山芭为甚,每到一处乡村,先是四周伏兵包围,再把所有村民,不论老少,无分男女,一律局入屋内,然后一一纵火付之焚如,使你逃生无路,活活烧死。”在《“族”与“瓜蔓抄”》中,作者进一步揭露日军滥杀无辜,株连九族的兽行:“当‘大检证’时期,凡那所被‘抄’

者,不论其家属、朋友、店员或佣工,用人甚至与‘生张熟李’或非华裔的他色人士,只要你和那所谓‘抗X份子’有旧,或一面半面相识,他都可以一样的‘抄’你,而使你不但死不甘瞑目,也还莫名其妙。”作者指出“沦陷时代的敌军所施于新马的‘瓜蔓抄’”,比起明成祖来,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李冰人这类揭露日军暴行的散文,将历史与现实互为结合,以史实衬托和对比日军的残酷,给人予强烈的震栗。

(二)悼念在沦陷时期遇难的文化志士,歌颂他们的崇高精神和伟大人格。

日军占领新马后,对华人知识分子尤其痛恨,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因为“七七”芦沟桥事变后,身居新马的华人知识分子站在时代前列,频频发表抗战言论,鼓吹华人抗战输将,出钱出力支援祖国抗战。在他们大张旗鼓的宣传与身体力行下,整个新马社会掀起支援祖国抗战救亡的热潮,并且抵制日货,不与日商合作,给日本军国主义以经济制裁和打击。马来亚落入日军之手后,日军开始对这些宣传抗战救亡的文化志士进行疯狂搜捕和残酷迫害。不少文化志士就在日军统治新马期间丧失了宝贵的生命,如铁亢、王君实、李词侗、饶百迎、流浪、郁达夫等人。南来作者在战争结束后痛定思痛,不禁更加怀念这些在沦陷时遇难的文化志士。他们纷纷撰文追忆和悼念这些曾经并肩抗战的友人,寄托生还者的哀思。蕴真(石韞真)的散文《记郑卓群》⁽²⁶²⁾回忆铁亢生前的一些往事,盛赞他“在新闻界不失为一个好记者,在文艺界也不失为一个好园丁,在人类进行过程中不失为一个好种子”,但这样优秀的文化青年,却被“日本人的机关枪不分皂白地乱杀”了。上官豸(区文庄)的散文《三人行:王君实、铁亢和郁达夫》⁽²⁶³⁾深切悼念王君实、铁亢和郁达夫,对他们不幸遇害寄予深沉的哀悼之情。依藤(汪开竞)的散文《钟灵中学员生殉难记》⁽²⁶⁴⁾则从较广阔的范围叙述战前热心抗战救亡的槟城钟灵中学员生,在沦陷期间惨遭日军大肆虐杀的事实。

文中有悲愤的控诉,也有对坚强不屈的钟灵中学员生的褒扬。金丁的散文《郁达夫的最后》⁽²⁶⁵⁾叙述郁达夫在苏岛避难后期的一些情形,对郁达夫的被害寄予深切的哀思。刘思的旧体诗《哀君实兄》⁽²⁶⁶⁾则是一首悼念王君实的哀歌。

在这类题材中,流传最广和最具影响力的是胡愈之的散文《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²⁶⁷⁾。

郁达夫是中国新文化运动中一位伟大作家,在中国新文学史占有重要的地位。郁达夫南来新马后,积极参与当地文艺活动,并撰写了大量抗战论文,向新马华侨社会鼓吹抗战救亡的道理,积极从事筹款工作,以支援祖国抗战事业。郁达夫在新马期间,对当地文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这位文化伟人的失踪之谜,中国文化界和当地文坛都十分关注。胡愈之在《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里详细介绍郁达夫在新马沦陷期间流亡到苏门答腊避难,以及日本投降后秘密失踪的经过。作者与郁达夫是相识20年的朋友,战前相继南来新加坡,一同服务于新闻界和文化界;沦陷期间一同出走,一同过流亡生活,对郁达夫流亡期间的生活和失踪前后的情形,知道得比较翔实,因此能够运用真实的事例展现郁达夫的人格风貌。例如当郁达夫被迫到日军宪兵部担任翻译后,棉兰某大侨领的儿子奉日军命令缉拿华侨领袖陈嘉庚及其党羽,来向宪兵部报告并请求协助。郁达夫在替他们翻译时故意添上使日本人不高兴的话,致使日本宪兵把他们痛骂一顿。临走时,郁达夫斥责他们道:“你们忘记了自己是中国人吗?中国人为什么要捉中国人?快滚回去,以后不许。”作者以这样的真实事例,表现郁达夫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作家在流亡期间所具有的民族气节和人格风范,这是胡愈之这篇散文的一个特点。

由于作者对郁达夫精神人格的深刻了解,与郁达夫一同流亡时患难与共的深厚感情,以及作者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分析能力,使他在叙事时融合了议论和抒情,将郁达夫流亡与失踪过程的

叙事,对郁达夫的崇敬和哀悼之情,以及对郁达夫的人格风范的中肯评价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尤其在文章最后一部分,作者将这一特点推向了高潮。作者写道:

当他脱离宪兵部之后,他每天在家里埋头读德文本但丁的神曲和历史。有一天,达夫和我说:“现在日本的情形,正和东罗马帝国的末期完全一样。”他对每天来往他家里的宪兵表示极度的憎恶和仇恨,他说:“我没有勇气和力量杀死敌人,但我可以使他们慢性麻醉而死。”他吩咐酒厂卖给日本人的酒,酒精的度数要越高越好。……

他常把民族问题和人性问题分开来。爱同胞,但也爱人类。他相信人性是善的,他可以说是为了这一信仰而牺牲的。因为假如他早知道日本人在投降后还会杀他,他就应当不用死了。……

作为一个诗人与理想主义者的郁达夫,是“五四”巨匠之一。他永远忠实于“五四”,没有背叛过“五四”。正如赵胡子是郁达夫的伪装一样,他的表面的生活态度,谈醇酒妇人做香艳诗等等,也不过是诗人的伪装,用于应付他的迫害者罢了。所以只有那些没有性灵的,从未和他真正接近过的人,才会从达夫的生活的表面去作评价。如果是接近他的和读过他的作品的会明白达夫对生活是何等严肃,他对人类是何等热爱!……

(三)反映战后新马社会百业萧条,人民困苦不堪的生活。

1945年8月,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新马人民在经历了三年零八个月恶梦般的生活后,一方面医治战争遗留下来的身心创伤,一方面对战后的和平生活充满美好的憧憬。然而战后百业萧条,物价腾飞,人民生活不但未加改善,反而陷入新的困顿处境。南来作

者不少作品反映这时期新马社会百业凋零的状况,展现一幅幅困苦不堪的生活图景。朱绪(朱桂棹)的剧本《和平以后》⁽²⁶⁸⁾叙述一位战前当过高级书记的抗日青年高文,战后却长期失业,无法供养产后生病的妻子和初生的婴儿,最后因偷窃一瓶奶粉而遭警察拘捕,婴儿也惨遭饿死。杨嘉(杨家驹)的散文《第一个晚上》⁽²⁶⁹⁾和剧本《重逢》⁽²⁷⁰⁾,前者反映战后新加坡屋价腾飞,普通百姓住房条件极度恶劣的社会现实;后者通过商人陈宏清在破产时遭昔日同窗陈柏年抢劫的戏剧性场面,反映当时物价高涨,商场不景,工资低微,失业人多,人民生活动摇不安的情形。白塔(赵蔚文)的散文《咖啡花》⁽²⁷¹⁾叙述一位年仅15岁的女孩,由于父亲在日本统治时代死去,母亲无法养活一家人,只好到咖啡店做女招待,过着屈辱的生活。杜边(杜仲人)的剧本《明天的太阳》⁽²⁷²⁾反映女知识青年非非的悲剧故事:非非在战前嫁给青年救亡工作者刘萍,生下一女。沦陷期间刘萍被捕入狱,音讯杳然。非非为生活所迫,嫁给公子哥陈自做姨太太,后又堕入风尘,过着受人侮辱与鄙视的生活。战后非非想重新生活,但社会不能容纳她。一次偶然机会与丈夫刘萍重逢,但因不受谅解而了无生趣,终于服毒自杀,临终时希望女儿小平能够见到“明天的太阳”,走上新的道路。

这类反映新马社会百业萧条,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的作品中,以岳野(郑喜瑞)的剧本《风雨牛车水》⁽²⁷³⁾和《风雨三条石》⁽²⁷⁴⁾为优秀代表。以下通过对《风雨牛车水》的具体分析,见出南来作者对当时新马社会真实生动的反映。

《风雨牛车水》(又名《富贵边缘外》)以新加坡牛车水某巷某号为戏剧舞台,展现这个以住户拥挤闻名的鸽子笼里恶劣的居住环境:这里“烟雾刺喉,阴暗湿臭,衣衫裤缕,满目琳琅,状如万国旗,人们皆低首而行”。居住在这社会底层的人们大多过着困顿的生活:小学教师孙先生课务繁重,经济拮据,育有一儿小坡儿,太太又将分娩,过着捉襟见肘的生活;三轮车夫张亚大和妻子亚翠一家也

是经济窘迫，主要依靠张亚大拉车和亚翠给人洗衣过日子，因此养成亚翠贪小便宜的恶习；廖二姐是房东的堂妹，过着形单影只的寡居生活；刘大姐的丈夫失业，儿子病死，由于邻妇挑拨，丈夫疑她有外遇，夫妻反目成仇，刘大姐只好半夜逃出来，独自住在这里深居简出……在如此拥挤恶劣的居住条件下，家家户户又有本难念的经，因此动辄为点小事或小误会而引起摩擦和冲突，如亚翠的女儿偷吃孙先生儿子的一只鸡蛋而引起亚翠和孙太太吵嘴。作者通过以小见大的手法，借助家庭琐事的冲突，反映战后市民生活的困顿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小学教师孙先生是最具光彩的人物。他和当时普通市民一样，住在鸽子笼似的房子里，过着拮据的生活，但为人忠厚老实，遇上贪小便宜的亚翠和刁泼寡妇廖二姐无理取闹时，总是退避三舍，息事宁人。他说：“为什么邻居就不能和和气气相处呢，尤其是在海外，大家都是中国人，大家应该彼此帮助，不要为了一滴子油或者一粒子盐弄得开口就骂，出手就打，就是跟其他的民族，新加坡是很多个民族杂处的地方，更应该相爱相助……归根结底，大家都因为生活不安定，大家都是穷人，都是好人，穷人应该爱穷人，大家都是同住的邻居，邻居应该爱邻居……大家不爭不吵，和和平平，有苦大家分担，你帮我，我帮你，不然，一旦一天，有什么灾难，大家都不能单独解决。”后来，刘大姐的丈夫追踪而至，失手杀害刘大姐，孙先生被疑为凶犯而遭逮捕时，他的一席发自肺腑的话感动了所有邻居，甚至感动了杀人凶手，以至自己出来自首。孙先生说：“我们都是穷人，都是好人，都是辛辛苦苦拿了自己的良心，拿了自己的血汗，用自己的两只手，找饭吃的人，不过是，就因为这个社会造成了大家不得不自私的坏习惯，并且，缺乏了人类最宝贵的互助互爱的精神！”在孙先生感召下，这些昔日自私自利、庸俗鄙陋的市民，终于团结在一起，在艰难的生活里充分发挥互助友爱的精神。

二、主要的创作特色

南来作者这时期的创作,由于重视反映战争给人们留下的伤痛,以及战后新马的困苦生活,他们的作品呈现如下特点:

(一)追求生活与艺术的高度真实。

马来亚三年零八个月的沦陷生活,给新马人民和南来作者留下不可磨灭的记忆。战争的深重灾难、日军的残暴罪行、亲朋戚友的不幸罹难,如恶梦般萦绕在心间,使他们如鲠在喉,不吐不快。为控诉战争的残酷、日军灭绝人性的暴行,南来作者尽量以真实事件为蓝本,在叙述时追求高度的生活真实,包括事件的发生、场面的描绘、细节的描写、人物的音容笑貌等,都努力重现当时的情景。依藤的散文《钟灵中学员生殉难记》以真实的笔触,追忆钟灵员生在沦陷期间惨遭日军虐杀的经过,对他们悲惨的狱中生活进行真实细致的描绘:

长期监禁!二十多天中,我们没有冲过一次凉,身上已是难堪;受刑的同胞血迹斑斑,久之发出一种臭味,使人作呕。这还不算数,房角落摆着两只桶,一只是便桶,一只是水桶,都没有盖,谁高兴大小便,谁可以拉开裤子,当众出采,旁边的人只好敬闻香味,虽欲掩鼻,也失去效力了。还有几位囚徒喜欢出恭后用手拭肛门,弄得一手是粪,就在水桶里洗;这水桶原是备我们喝水用的,试问谁还敢在洗过粪便的水桶去喝水呢?然而几点钟能够忍耐,要三四天不喝水,实在有些难受;有的人便实行饮鸩止渴。于是,祸事来了,几天以后,许多人都染上痢疾,不久蔓延开去,弄得不可收拾。⁽²⁷⁵⁾

这里对狱中生活的描绘,非亲身经历或耳闻目睹者很难作出如此真实描述。而这种高度真实的生活再现,使读者对日军惨无人道的行径益增仇恨。李冰人揭露日军暴行的散文《过关与“鬼门”》、《酷

刑种种》、《“族”与“瓜蔓抄”》，丘幸之（张晓光）叙述沦陷时期在雪兰莪生活情形的散文《回首集之一》⁽²⁷⁶⁾，沈兹九追叙与胡愈之等文化志士流亡苏门答腊的散文《流亡在赤道线上》⁽²⁷⁷⁾等，也尽量以真实事件或真实的生活情形反映日侵时期的遭遇。然而文学作品如果仅仅停留于生活真实，而未能将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相互结合，创作水准必流于肤浅和粗糙，艺术魅力也将荡然无存。战后南来作者的创作在重现沦陷期间的悲惨生活时，也努力追求作品的艺术真实，我们从一些优秀作品可以见及他们的努力。丘天在《复仇》中主要展现新马人民经历的战争苦难以及他们的反抗精神。作者在描绘战乱场面和叙述人物经历时，既努力追求生活的高度真实，又对现实生活进行加工提炼，以达到艺术真实，使其具有典型意义。小说对日军轰炸马来亚的血腥场面的描绘，即以现实生活为素材进行高度提炼与概括：

满街都是火烟，满地都是死人，焦头烂额的有……不见了头的有，电线杆上摇晃着一条腿的也有……血渗渗地淌着，流着，在坍塌下来的梁柱下，士敏土上，一阵阵凄厉，惨痛的哀叫：

“救命呀！……救命呀！……”

“救我出来呀！……救我出来呀！……”

“阿兴的娘呀！……”

“阿桂的爸呀！……”

“妈呀！……”

“爸呀！……”

可是 ARP 一个也不见，没有人肯去救那些压不死，烧不死的人！人们只顾乱窜，乱叫，乱哭；无目的地四处乱跑！……

跑着，跑着，忽然迎面跑来一个赤身裸体的红毛女人，疯狂地乱窜，慌乱逃难的人们看了这样的情景也不免瞠目吃惊！

“你瞧，红毛婆也疯了，真可怜！”⁽²⁷⁸⁾

作品在反映日军狂轰滥炸的惨酷情景时,一方面表现真实的景象,如人们在仓惶逃命时只顾自己求生而不管他人死活,另一方面也进行艺术概括与提炼,如血肉横飞的场面以及白种女人发疯的情景,使小说达到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较好结合。

此外,胡愈之悼念郁达夫的散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岳野反映战后新马人民生活的剧本《风雨牛车水》和《风雨三条石》等,也是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相结合的佳作。

(二)多着墨于描写地方问题与刻划地方色彩。

战后时期,中国内战局势十分严峻,南来作者对中国政治前途十分关注。他们的不少创作对中国政局作出强烈反应,如胡愈之的散文《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²⁷⁹⁾、兹九(沈兹九)的散文《民主与反民主的大战斗》⁽²⁸⁰⁾表达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关注。他们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沙平(胡愈之)的中篇小说《少年航空兵》⁽²⁸¹⁾展开想象的翅膀,歌颂华侨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的美好图景。另一方面,有些南来作者如巴人(王任叔)、杜边、铁戈、丘士珍、周容、杨嘉、李润湖等与新马人民共同经历日据时期的痛苦生活,对新马土地的感情日益深厚;战后南来的作者如张漠青、丁家瑞、岳野、秋枫、白寒、白塔等,以文学作者的社会责任感,也多着墨于反映地方问题,如经济萧条,民生疾苦,自杀成风,教育落后,以及妇女运动等等。这类作品有杨嘉的散文《第一个晚上》和剧本《重逢》、白塔的散文《咖啡花》、白寒的散文《心照》⁽²⁸²⁾、李润湖的散文《为星洲平民学校呼吁》⁽²⁸³⁾、杜边的剧本《明天的太阳》、朱绪的剧本《和平以后》、岳野的剧本《风雨牛车水》和《风雨三条石》、沈兹九的散文《马来亚妇运前瞻》⁽²⁸⁴⁾和《三八节与南洋华侨妇女》⁽²⁸⁵⁾等。同时,由于他们对新马土地感情日深,有的创作也回顾华侨南来新加坡开垦和奋斗的历史,如丁家瑞、张漠青等人集体创作的长诗《怒吼吧,新加坡!》⁽²⁸⁶⁾;有的配合风起云涌

的反殖运动,抒发对马来亚大地母亲的热爱以及作为新马土地主人的感情,如巴人的散文《无言抄》⁽²⁸⁷⁾、铁戈的诗歌《我们是谁》⁽²⁸⁸⁾;有的表现华侨愿意留在新马,为本地社会进步贡献一份力量,如杨嘉的小说《归侨》⁽²⁸⁹⁾,这类着力反映地方问题和抒发对新马土地热爱之情的作品,成为这时期南来作者创作的一大特色。

他们在描写地方问题时,注意刻划新马地方色彩,使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与地方色彩相结合。岳野的另一剧本《风雨三条石》是这类作品中的佳作。该剧以马来亚吉隆坡郊外的半山芭地带为背景,反映了战后新马人民的困苦生活,带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如剧中对大声公经营的“凉茶摊”的描绘,就活现当时“走遍马来亚任何埠头”都会有的摊位景象:

就在这三条石公路旁几株大树下边,摆下了几家求生的铺子。正中是一个用沙厘皮盖起的凉茶摊,主人是人们所熟习的大声公,大概因为凉茶生意利薄,他便又兼营了咖啡和香蕉、黄梨等生果,以及香烟火柴等生意。凉茶是单独地放在一个四轮车上,卖“笛”(Tea)和咖啡则在一旁另起了一个小炉灶,香蕉生果挂在沙厘屋前檐下。两张不相称的木桌就摆在斑驳的树荫下边,周围环拥着几张木板凳。⁽²⁹⁰⁾

此外剧中关于剃头匠羔丕乌摆设简陋的“剃头摊”、挑沙的三水婆“红头巾”大力姐的描绘,展现 40 年代后半期新马最底层人民的困苦生活图景,富于浓重的地方气息。丘天的小说《复仇》、白塔的散文《咖啡花》等也具有同样特色。

综上所述,南来作者在新马文坛各个时期的创作,为新马华文文学增添了丰富的内容和色彩,成为 1919 年至 1949 年新马华文文学重要的组成部分。

注 释

- (1) 穉生(林克谐)《这是我的随感录》，见《叻报》，1920年2月6日。
- (2) 穉生(林克谐)《赞成铸建冯国璋的祠像》，见《叻报》，1920年3月1日。
- (3) 穉生(林克谐)《对琼崖开辟商港的希望》，见《叻报》，1920年6月25日。
- (4) 穉生(林克谐)《快些移军费以设工厂好》，见《叻报》，1920年4月3日至9日。
- (5) 穉生(林克谐)《民气嚣张》，见《叻报》，1920年3月8日。
- (6) 穉生(林克谐)《昨天的纪念》，见《叻报》，1920年2月13日。
- (7) 穉生(林克谐)《对直系今后的希望》，见《叻报》，1920年8月7日。
- (8) 鸠(张叔耐)《和战问题》，见《新国民日报·时评》，1919年10月23日至30日。
- (9) 鸠(张叔耐)《辟顽固家之谬论》，见《新国民日报·社论》，1919年11月20日至27日。
- (10) 鸠(张叔耐)《耳目是遮掩不来的》，见《新国民日报·社论》，1920年11月26日。
- (11) 鸠(张叔耐)《南洋华侨社会改良之必要及方法》，见《新国民日报·社论》，1920年2月6日。
- (12) 张叔耐《〈卿云歌好算国歌么?〉》，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1年4月14日至22日。
- (13) 痴鸠(张叔耐)《希望中的民国十一年》，见《新国民日报·社论》，1922年1月6日至7日。
- (14) 痴鸠(张叔耐)《吴佩孚的话靠得住吗?》，见《新国民日报·时评》，1922年11月23日。
- (15) 耐(张叔耐)《国民! 毋忘了七十二烈士》，见《新国民日报·时评》，1923年4月24日至26日。
- (16) 痴鸠(张叔耐)《和平统一在哪里?》，见《新国民日报·评论》，1923年4月12日。
- (17) 耐(张叔耐)《军阀暴力下的人民不知死所》，见《新国民日报·评论》，1924年8月20日。

- (18)林独步《志士》，见《南洋商报·商余杂志》，1924年8月1日。
- (19)林独步《伟人崇拜》，见《南洋商报·商余杂志》，1924年8月2日。
- (20)林独步《处世的要件》，见《南洋商报·商余杂志》，1924年8月7日。
- (21)林独步《专门的哲学家与哲理的思想家》，见《南洋商报·商余杂志》，1924年8月7日。
- (22)林独步《论艺术与道德之关系并所望于评剧家和编剧家》，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2年4月5日至7日。
- (23)林独步《自然美与人工美》，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2年10月19日至20日。
- (24)林独步《新文学概论》，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2年10月18日至11月26日。
- (25)林独步《那朵花》，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2年9月9日。
- (26)林独步《谋幸福》，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2年9月11日。
- (27)林独步《在这守旧的火山里，焉能发生恋爱的蔷薇》，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2年9月19日。
- (28)林独步《幸福与努力》，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2年9月20日。
- (29)林独步《理想》，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2年9月22日。
- (30)林独步《活动就是快乐》，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2年9月25日。
- (31)林独步《青春》，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2年9月29日。
- (32)林独步《珍哥哥在想什么》，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1年10月6日至28日。
- (33)林独步《笑一笑》，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1年11月3日至12日。
- (34)林独步《两青年》，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1年11月14日至28日。
- (35)林独步《同窗会》，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2年9月7日至10月11日。
- (36)林克谐《现有男女日校亟宜附设星期义学及夜义学》，见《叻报》，1919年11月22至24日。

- (37) 穉生(林克谐)《瓜分》，见《叻报》，1920年7月27日。
- (38) 穉生(林克谐)《勉乎哉，周君如切！》，见《叻报》，1920年7月27日。
- (39) 穉生(林克谐)《同是护法奚必相残乃尔？》，见《叻报》，1920年1月17日。
- (40) 耐(张叔耐)《非生非死之中国》，见《新国民日报·社论》，1919年10月17日至18日。
- (41) 鸩(张叔耐)《弹力果能穿其面颊否？》，见《新国民日报·时评》，1919年11月6日。
- (42) 痴鸩(张叔耐)《贺新凉》，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0年4月7日。
- (43) 林独步《地方自治与华侨》，见《新国民日报·社论》，1920年6月26日至7月1日。
- (44) 林独步《学校外之求学》，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2年4月14日。
- (45) 林独步《伪风雅》，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22年4月14日。
- (46) 林克谐《对国庆纪念日感书》，见《叻报》，1919年10月11日。
- (47) 同(6)。
- (48) 同(7)。
- (49) 鸩(张叔耐)《非生非死之中国》，同(40)。
- (50) 同(17)。
- (51) 同(43)。
- (52) 克谐(林克谐)《中国文化与欧西之比较》，见《叻报》，1919年2月25日。
- (53) 同(38)。
- (54) 同(36)。
- (55) 痴鸩(张叔耐)《强迫教育》，见《新国民日报·时评》，1920年4月7日。
- (56) 痴鸩(张叔耐)《愿侨胞移旧历新年之费用以助教育费》，见《新国民日报·评论》，1922年2月6日。
- (57) 耐(张叔耐)《愿资本家解囊助学》，见《新国民日报·评论》，1922年11月25日。
- (58) 耐(张叔耐)《上海大学以建国方略为课程》，见《新国民日报·评论》，1923年5月7日。
- (59) 穉生(林克谐)《吾侨宜注重夜学》，见《叻报》，1920年6月9日。

- (60)痴鸬(张叔耐)《例言》，见《新国民日报·社论》，1919年10月1日至6日。
- (61)同(11)。
- (62)同(43)。
- (63)同(9)。
- (64)克非(刘克非)《论女子剪发》，见《益群报》，1920年6月3日，4日，5日，7日，9日。
- (65)同(32)。
- (66)同(33)。
- (67)同(34)。
- (68)同(35)。
- (69)同(38)。
- (70)同(36)。
- (71)穉生(林克谐)《中国的匪患》，见《叻报》，1920年3月2日。
- (72)林克谐《对于徐世昌厚礼曹张之感言》，见《叻报》，1920年10月1日。
- (73)穉生(林克谐)《中国果真贫耶？》，见《叻报》，1920年1月23日。
- (74)穉生(林克谐)《通敌的人何止国会议员呢！》，见《叻报》，1920年1月26日。
- (75)穉生(林克谐)《赌风的热闹何止亚齐呢！》，见《叻报》，1920年2月3日。
- (76)穉生(林克谐)《是之谓大丈夫》，见《叻报》，1920年7月26日。
- (77)同(9)。
- (78)同(41)。
- (79)耐(张叔耐)《虎和猪狗》，见《新国民日报·评论》，1923年10月27日。
- (80)同(35)。
- (81)同(27)。
- (82)同(30)。
- (83)同(28)。
- (84)何采菽《雁声》，见《新国民日报·昶旭》，1929年7月19日。
- (85)云山(谭云山)《悼梦苇》，见《新国民日报·沙漠田》，1926年11月23日。
- (86)拓哥(金拓)《流波》，见《新国民日报·南风》，1925年8月12日，26日，9月26日，10月7日。

- (87)张冲(张楚琨)《漂流到狮子岛去》，见《叻报·椰林》，1929年9月26日至27日。
- (88)黄振彝《给泉下的母亲》，见《新国民日报·荒岛》，1927年6月9日。
- (89)拓哥(金拓)《深沉的悲哀》，见《新国民日报·南风》，1925年7月29日。
- (90)曾圣提(曾曼尼)《秋晚》，见《南洋商报·洪荒》，1927年9月30日。
- (91)曾圣提(曾曼尼)《月落》，见《南洋商报·洪荒》，1927年12月2日。
- (92)慎良(汪开竞)《鲜花》，见《南洋时报·玫瑰》，1928年1月20日，27日，2月10日，17日，24日，3月2日，9日，16日。
- (93)慎良(汪开竞)《饮酒》，见《南洋时报·玫瑰》，1927年12月16日，23日。
- (94)丁琅(窠秦白)《我想起那吴市的吹箫人》，见《南洋商报·洪荒》，1927年10月30日。
- (95)林雪棠《给衣霞》，见《光华日报·绝缘回线》，1930年3月19日。
- (96)林雪棠《慷慨的赠与》，见《光华日报·绝缘回线》，1930年3月26日。
- (97)采菽(何采菽)《医院里》，见《新国民日报·绿漪》，1928年5月9日。
- (98)蔚蓝(何采菽)《剖心哀嗽》，见《新国民日报·绿漪》，1928年5月9日。
- (99)谭云山《寂寥》，见《新国民日报·沙漠田》，1926年9月7日。
- (100)欲鸣(许欲鸣)《别了故国》，见《槟城新报·椰风》，1930年9月2日。
- (101)欲鸣(许欲鸣)《泪空的孤鸟》，见《槟城新报·碧野》，1931年3月10日。
- (102)实君(杨实君)《我是漂泊无依的浪人》，见《槟城新报·关仔角》，1930年9月22日。
- (103)王哥空《漂流曲》，见《南洋商报·狮声》，1933年12月25日至27日。
- (104)同(87)。
- (105)罗依夫(罗永年)《决心》，见《南洋商报·压觉》，1930年9月13日，22日，29日，10月6日，13日，20日。
- (106)同(94)。
- (107)慎良(汪开竞)《市侩之子》，见《南洋时报·玫瑰》，1927年10月21日，28日，12月9日。
- (108)同(96)。
- (109)邹子孟《师长》，见《叻报·星光》，1926年7月16日。
- (110)连啸鸥《都市和荒郊》，见《叻报·椰林》，1927年12月4日。
- (111)玉羊(曾曼方)《生活圈外》，见《南洋商报·压觉》，1930年9月8日，13

- 日,15日。
- (112)仲青(吴仲青)《梯形》,见《南洋商报·文艺周刊》,1929年5月7日。
- (113)仙峤(林仙峤)《兜风与捉臭虫》,见《星洲日报·繁星》,1930年8月11日。
- (114)曾圣提(曾曼尼)《生与罪》,见《南洋商报·文艺周刊》,1929年2月1日至2日。
- (115)罗依夫(罗永年)《猎狗》,见《叻报·椰林》,1930年2月4日。
- (116)王探《育南与但米》,见《南洋时报·荔》第53期,1928年4月3日。
- (117)华丁(曾曼华)《拉子》,见《南洋时报·南洋的文艺》,1929年12月19日,24日。
- (118)柳鞭(刘柳鞭)《饥饿的狗》,见《南洋商报·压觉》,1930年9月1日,8日,20日。
- (119)张冲(张楚琨)《新世界之夜》,见《叻报·椰林》,1929年12月7日。
- (120)张楚琨《戏院门口的苍脸》,见《叻报·椰林》,1930年2月10日。
- (121)楚云(张楚琨)《猪的哀号》,见《叻报·椰林》,1930年2月22日。
- (122)张放(张楚鸣)《生之悲惨》,见《南洋商报·文艺周刊》,1927年12月2日。
- (123)丘士珍《子夜歌》,见《新国民日报·公共园地》,1932年8月13日。
- (124)王哥空《穷人的命运》,见《南洋商报·狮声》,1933年12月13日至18日。
- (125)未兆(陈炼青)《我彷徨于孤岛上》,见《叻报·椰林》,1929年8月24日。
- (126)啸鸥(连啸鸥)《火车驰过铁桥》,见《叻报·椰林》,1930年7月15日。
- (127)依夫(罗依夫)《高压国的人民》,见《益群报·枯岛》,1929年7月18日,25日。
- (128)林雪棠《赠WC》,见《光华日报·绝缘回线》,1930年5月23日。
- (129)华丁(曾华丁)《五兄弟墓》,见《南洋商报·文艺周刊》,1929年2月22日。
- (130)衣虹(潘受)《三等客舱》,见《叻报·椰林》,1930年4月2日。
- (131)罗依夫《原始遗民》,见《叻报·椰林》,1930年1月29日。
- (132)罗依夫《送葬》,见《叻报·椰林》,1930年3月15日。
- (133)罗依夫《眼睛》,见《槟城新报·椰风》,1929年11月18日。

- (134)罗依夫《黝黑的夜晚》，见《槟城新报·椰风》，1929年11月28日。
- (135)罗依夫《五月的歌》，见《光华日报·光华》，1929年6月6日。
- (136)罗依夫《离人的歌》，见《南洋商报·压觉》，1930年9月13日。
- (137)一工(王探)《旺相可风》，见《南洋时报·荔》，1927年11月1日。
- (138)古月(胡一声)《徐志摩的死》，见《新国民日报·公共园地》，1931年12月15日至16日。
- (139)杨实夫《社会杀了人》，见《槟城新报》，1929年9月29日。
- (140)林雪棠《牢狱》，见《光华日报·绝缘回线》，1930年4月30日。
- (141)林雪棠《一位女性》，见《南洋时报·星火》，1929年7月12日，18日，27日。
- (142)静情(黄震树)《女招待的悲哀》，见《光华日报·戏剧》，1931年8月24日。
- (143)广川(吴广川)《跳出象牙之塔》，见《益群报·枯岛》，1928年10月25日及11月1日。
- (144)同(97)。
- (145)同(90)。
- (146)谭云山《崇高与伟大》，见《新国民日报·沙漠田》，1926年9月7日。
- (147)丁琅(宴秦白)《希腊风》，见《南洋商报·洪荒》，1927年12月19日。
- (148)同(91)。
- (149)同(94)。
- (150)丁琅(宴秦白)《伯利恒的新星》，见《南洋商报·洪荒》，1927年10月28日。
- (151)本刊《恭祝新禧》，见《南洋商报·洪荒》，1927年12月30日。
- (152)同(87)。
- (153)炼青(陈炼青)《文艺与地方色彩》，见《叻报·椰林》，1929年9月23日。
- (154)仙峤(林仙峤)《柔佛的夜》，见《星洲日报·繁星》，1930年8月8日。
- (155)静情(黄震树)《凄凄惨惨》，见《光华日报·戏剧》，1931年8月3日。
- (156)同(142)。
- (157)公仪(李维纲)《红溪的故事》，见《叻报·奠基》，1930年1月17日。
- (158)吴仲青《辜负你了》，见《新国民日报·浩泽》，1926年12月6日，27日，1927年1月14日，20日。

- (159)吴仲青《窃议》，见《南洋商报·商余杂志》，1927年12月12日，15日。
- (160)张楚云(张楚琨)《伟大的灭亡》，见《叻报·椰林》，1930年4月8日至11日。
- (161)王哥空《实龙岗路上》，见《星洲日报·晨星》，1933年5月15日。
- (162)曾玉羊以“曼四”笔名，于1930年1月7日，14日，21日，28日在《南洋时报·南洋的文艺》刊登其翻译的《马来民歌选》，标明21首。其中出现两次第“十六”首，误，实则22首。后曾玉羊又于1930年12月29日在《南洋商报·压觉》发表其译述的《马来民歌选》，内收81首，其中部分诗歌与发表在《南洋时报·南洋的文艺》的诗歌相同。
- (163)玉羊(曾曼方)《马来民歌选》，见《南洋商报·压觉》，1930年12月29日。
- (164)革尘(林革尘)《马来民歌二首》，见《南洋商报·文艺周刊》，1929年1月11日。
- (165)玉羊(曾曼方)《马来民间传说之研究》，见《槟城新报·轮》，1933年5月9日。
- (166)同(165)。
- (167)同(141)。
- (168)白荻(黄科梅)《热》，见《星洲日报·晨星》，1936年7月20日。
- (169)一村(吴广川)《橡林深处》，见《新国民日报·新野》，1935年10月22日至11月1日。
- (170)白荻(黄科梅)《离散》，见《星洲日报·文艺周刊》第53期。
- (171)李润湖《阿娥和伊的表妹》，见《星洲日报·文艺周刊》，第24期。
- (172)流浪(刘道南)《圈套》，见《星洲日报·晨星》，1936年2月1日至6日。
- (173)天白(张晓光)《谈托说》，见《星洲日报·晨星》，1936年4月16日。
- (174)天白(张晓光)《阿比西尼亚永远存在》，见《星洲日报·晨星》，1936年5月12日。
- (175)刘郎(林建安)《自大与自卑》，见《星洲日报·晨星》，1936年7月30日。
- (176)白荻(黄科梅)《古今的参照》，见《白荻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1979)，页50。
- (177)同(174)。
- (178)同(174)。

- (179)张天白(张晓光)《抵抗论》，见《星洲日报·晨星》，1935年12月7日。
- (180)刘郎(林建安)《清日海战的痛心事》，见《星洲日报·晨星》，1935年11月29日。
- (181)刘郎(林建安)《汉奸》，见《星洲日报·繁星》，1936年1月11日。
- (182)林建安《国难与学生》，见《星洲日报·晨星》，1935年12月11日。
- (183)刘郎(林建安)《抗战与内战》，见《星洲日报·晨星》，1936年6月5日。
- (184)刘郎(林建安)《还是不要“安内”好》，见《星洲日报·晨星》，1936年8月6日。
- (185)广川(吴广川)《松花江的怒吼》，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34年7月18日至20日。
- (186)吴广川《义军的活跃》，见《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34年8月15日。
- (187)李润湖《苦也斋随笔·六十七》，见《南洋商报·狮声》，1934年12月26日。
- (188)李冰人《诗——鼓浪屿水操台怀古》，见《南洋商报·狮声》，1934年12月19日。
- (189)林参天《浓烟》，中国：上海书店，1935年7月初版。新加坡：青年书局，1959年重版。
- (190)李润湖《伤雁小史》，见《南洋商报·展望台》，1935年1月20日。
- (191)王哥空《穷人的命运》，见《南洋商报·狮声》，1933年12月13日至18日。
- (192)老蕾(许清吕)《小七子的新皮鞋》，见《老蕾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1979)，页3~8。
- (193)白荻(黄科梅)《生涯》，见《星洲日报·晨星》，1936年9月17日。
- (194)白荻(黄科梅)《灰色之家》，见《新国民日报·新路》，1936年11月2日。
- (195)李冰人《孝道的内容》，见《南洋商报·狮声》，1935年1月5日。
- (196)奚因(吴广川)《天鹅》，见《新国民日报·新野》，1935年10月8日。
- (197)拓夫(吴广川)《摩登》，见《新国民日报·新野》，1935年6月18日。
- (198)白荻(黄科梅)《头颅贴上了印花税》，见《星洲日报·晨星》，1935年11月20日。
- (199)丘士珍《哭母亲》，见《星中日报·星火》，1936年9月8日。

- (200) 侠魂(沈侠魂)《小诗二首》，见《星中日报·星火》，1935年11月18日。
- (201) 大吉(曾圣提)《不吉的窗》，见《南洋商报·洪荒》，1927年12月9日。
- (202) 同(158)。
- (203) 同(159)。
- (204) 流浪(刘道南)《南京人氏》，见《星中日报·星火》，1936年5月19日至22日。
- (205) 流浪(刘道南)《异族的妻》，见《星中日报·星火》，1935年11月5日至11日。
- (206) 林棘(陈子彬)《变与“不变”》，见《星洲日报·晨星》，1936年4月8日。
- (207) 白荻(黄科梅)《看灯》，见《星洲日报·晨星》，1936年9月26日。
- (208) 白荻(黄科梅)《祭之辞》，见《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10月21日。
- (209) 蓬青(张曙生)《热风》，见《新国民日报·新流》，1940年2月17日。
- (210) 铁亢(郑卓群)《试炼时代》，见《星洲日报·晨星》，1938年8月26日至11月1日。
- (211) 莹姿(刘耘之)《窗》，见《南洋商报·狮声》，1938年10月15日。
- (212) 刘思(刘世潮)《夜读普式庚诗》，见《星洲日报·晨星》，1941年1月25日。
- (213) 林秋(陈子彬)《故乡》，见《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12月28日。
- (214) 耶鲁(黄望青)《敌人在华北的暴行与阴谋》，见《星洲日报·晨星》，1938年2月19日。
- (215) 莹姿(刘耘之)《哭被暴敌掳去的五百儿童》，见《南洋商报·狮声》，1938年2月2日。
- (216) 莹姿(刘耘之)《哀江南》，见《南洋商报·狮声》，1938年2月23日。
- (217) 温志新《难民的悲哀》，见《总汇新报·总会副刊》，1938年7月16日。
- (218) 西玲(吴章庆)《吴家村》，见《南洋周刊》，1938年12月。
- (219) 蓬青(张曙生)《十月的烽火》，见《新国民日报·新流》，1939年10月20日。
- (220) 胡愈之《南洋的新时代》，见《南洋商报》，1941年1月1日。
- (221) 郁达夫《估敌》，见《星洲日报》，1939年1月1日。
- (222) 丁倩(张业隆)《一个日本女间谍》，见《南洋周刊》第10期至14期。
- (223) 刘思(刘世潮)《起来！中华民族的儿女们》，见《南洋商报·狮声》，1938

年8月24日。

(224)刘思(刘世潮)《保卫大徐州》，见《南洋商报·狮声》，1938年5月12日。

(225)郁达夫《敌军阀的诤言真相》，见《星洲日报·晨星》，1940年2月10日。

(226)郁达夫《“八一三”抗战两周年纪念》，见《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8月15日。

(227)郁达夫《“八一三”淞沪抗战的意义》，见《总汇新报·世纪风》，1939年8月14日。。

(228)金丁(林竹铭)《谁说我们年纪小》，见《南洋商报·狮声》，1938年12月2日至7日。

(229)金丁(林竹铭)《沦陷以后》，见《南洋商报·南洋文艺》，1938年4月17日。

(230)叶尼(洪为济)《伤兵医院》，见《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10月12日至26日。

(231)叶尼(洪为济)《神圣的民族抗战爆发了》，见《星洲日报·晨星》，1937年8月16日。

(232)流浪(刘道南)《福建风暴》，见《南洋商报·狮声》，1938年5月26日。

(233)老蕾(许清昌)《珠江怒潮》，见《南洋商报·狮声》，1938年10月26日。

(234)莹姿(刘耘之)《愤怒的黄河》，见《南洋商报·狮声》，1938年7月1日。

(235)絮絮(丘絮絮)《游击队员》，见《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2月1日。

(236)絮絮(丘絮絮)《送弟出征》，见《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2月4日。

(237)絮絮(丘絮絮)《到前线去》，见《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2月28日。

(238)絮絮(丘絮絮)《铁的洪流》，见《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3月20日。

(239)温志新《大家杀敌去》，见《新国民日报·新光》，1937年12月17日。

(240)温志新《战地鸿音——勇敢的理弟》，见《新国民日报·新光》，1937年12月27日。

(241)老蕾(许清昌)《弃家者》，见《新国民日报·新流》，1940年2月14日至16日。

(242)乳嬰(陈树英)《八九百个》，见《星中日报·星火》，1938年1月11日至21日。

(243)叶尼(洪为济)《卖花队》，见《总汇新报·世纪风》，1938年8月29日。

- (244)乳婴(陈树英)《姊弟俩》，见《星洲日报·文艺》，1938年6月5日。
- (245)刘思(刘世潮)《代募寒衣》，见《星洲日报·晨星》，1940年24日。
- (246)铁亢(郑卓群)《父》，见《星洲日报·晨星》，1941年3月20日至4月11日。
- (247)老蕾(许清昌)《新生》，同(192)，页7~25。
- (248)刘思(刘世潮)《去，去当兵！》，见《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3月4日。
- (249)刘思(刘世潮)《易水曲》，见《星洲日报·文艺》，1940年6月2日。
- (250)刘思(刘世潮)《留别》，见《南洋商报·狮声》，1939年2月16日。
- (251)叶尼(洪为济)《没有男子的戏剧》，见《南洋周刊》第32期，1939年2月13日。
- (252)老蕾(许清昌)《重逢》，见《星洲日报·晨星》，1939年8月9日。
- (253)同(210)。
- (254)同(210)。
- (255)乳婴(陈树英)《小根是怎样死的》，见《星洲日报·晨星》，1938年5月14日至15日。
- (256)乳婴(陈树英)《逃难途中》，见《南洋商报·南洋文艺》，1938年6月16日。
- (257)丘天(丘士珍)《复仇》，吉隆坡：民生社，1948。
- (258)李冰人《过关与“鬼门”》，见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散文一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81)，页46~48。
- (259)李冰人《酷刑种种》，同(258)，页49~52。
- (260)李冰人《“族”与“瓜蔓抄”》，同(258)，页53~58。
- (261)同(259)。
- (262)石韞真《记郑卓群》，见《总汇新报·记者节特刊》，1946年8月30日。
- (263)上官笏(区文庄)《三人行：王君实、铁亢和郁达夫》，见《星洲日报·晨星》，1940年8月22日至24日。
- (264)依藤(汪开竞)《钟灵中学员生殉难记》，同(258)，页30~45。
- (265)金丁(林竹铭)《郁达夫的最后》，见《金丁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1979)，页126~137。
- (266)刘思(刘世潮)《哀君实兄》，见《星洲日报·晨星》，1945年10月8日。
- (267)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见《星洲日报·记者节特刊》，1946年8

月 31 日。

- (268)朱绪(朱桂棹)《和平以后》,新加坡:新民主文化服务社,1945 年。
- (269)杨嘉(杨家驹)《第一个晚上》,见《风下周刊》119 期,1948 年 3 月 27 日。
- (270)杨嘉(杨家驹)《重逢》,见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戏剧一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9),页 54~67。
- (271)白塔(赵蔚文)《咖啡花》,见李廷辉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散文(一)》(新加坡:新民主文化出版社,无出版年月),页 132~134。
- (272)杜边(杜仲人)《明天的太阳》,新加坡:新民主文化服务社,1946 年。又见李廷辉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剧本》(新加坡:新民主文化出版社,无出版年月),页 1~36。
- (273)岳野(岳喜瑞)《风雨牛车水》,新加坡:中国歌舞剧艺社,1948 年。又见李廷辉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剧本》(新加坡:新民主文化社,无出版年月),页 27~60。
- (274)岳野(岳喜瑞)《风雨三条石》,新加坡:中国歌舞剧艺社,1948 年。又见李廷辉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剧本》(新加坡:新民主文化出版社,无出版年月),页 61~102。
- (275)同(264)。
- (276)丘幸之(张晓光)《回首集之一》,见《星洲日报·晨星》,1947 年 4 月 7 日。
- (277)沈兹九《流亡在赤道线上》,见《风下周刊》,第 40 期至第 62 期。
- (278)同(257)。
- (279)胡愈之《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见《风下周刊》第 76 期,1947 年 5 月 24 日。
- (280)沈兹九《民主与反民主的大战斗》,见《新妇女》第 8 期,1946 年 10 月 8 日。
- (281)沙平(胡愈之)《少年航空兵》,见《风下周刊》第 2 期至第 5 期,第 13 期至 28 期,第 30 期至第 32 期,第 34 期至 35 期,第 37 期至 39 期。
- (282)白寒《心照》,见《雕虫集》(新加坡:乐华印务公司,1949)。
- (283)李润湖《为星洲平民学校呼吁》,见《南侨日报·读者园地》,1947 年 11 月 15 日。
- (284)兹九(沈兹九)《马来亚妇运前瞻》,见《风下月刊》第 40 期至第 62 期。

- (285)兹九(沈兹九)《三八节与南洋华侨妇女》，见《新妇女》第25期，1948年3月8日。
- (286)丁家瑞、张漠青等《怒吼吧，新加坡》，新加坡：星洲青年文艺研究社，1947年。又见李廷辉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教育出版社，1972)，页40—50。
- (287)巴人(王任叔)《无言抄》，新加坡：新时代文艺出版社，1946年。
- (288)铁戈(陈果来)《我们是谁》，见李廷辉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诗歌》(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2)，页32~39。
- (289)杨嘉(杨家驹)《归侨》，见《风下周刊》121期，1948年4月10日。
- (290)同(274)。

第六章

中国南来作者对新马华文文学的贡献

从 1919 年到 1949 年,南来作者对新马华文文学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没有他们的开垦与耕耘,新马华文文学就不可能有 1949 年以前的文学成就,也将不可能出现 1949 年之后继往开来的创作局面。

南来作者从中国南渡新马后,以其对文学事业的热爱,对社会强烈的责任感,在这块热带岛国孜孜不倦地耕耘,如长江巨浪般一波又一波地推动着新马华文文学向前发展,终于在新马文坛开垦出繁荣发展的文艺百花园,尤其在战前两个创作高峰期,更是形成波澜壮阔的创作局面。

尽管许多南来作者由于各种原因(如政治因素、生活变动、追求个人志向,英年早逝等)而未能在新马文坛长期从事文学活动,⁽¹⁾或虽然仍居留本地,却在活跃一段时期后沉寂下来,⁽²⁾但不管出于何种情况,他们大多对新马华文文学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本章将对南来作者在编务活动、文学理论以及创作活动方面对新马华文文学的贡献作出总结,并兼及他们在社会活动方面的贡献。

第一节 南来作者在编务方面的贡献

在159位南来作者中,有78人从事过文学编辑活动。他们直接创办或编辑过的文艺副刊、综合性副刊和期刊,就达114份以上,其中副刊84份,期刊30份。⁽³⁾他们对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与壮盛作出巨大贡献:

(一)创立新文艺副刊,开垦马华新文艺荒原。

新马文坛受中国新文化运动影响,从五四时期开始发表新文学作品,但直到1925年之前,登刊新文学作品的只是一些文白混杂、写剪相兼的综合性副刊,南来作者拓哥创办的《南风》成为当时第一份纯粹新文艺副刊,从而摆脱了过去和当时副刊依赖剪稿及文白兼蓄的状况。随后南来作者谭云山、吴仲青、黄振彝、曾圣提、许杰等人继续开垦新马这块文艺上的“沙漠田”、“浩泽”、“荒岛”、“枯岛”,⁽⁴⁾负起创作、栽培有南洋色彩的文艺的使命。他们创办与编辑的刊物多达50余份⁽⁵⁾。在这些刊物上发表的新文学作品不计其数。

由于南来作者的辛勤拓荒和努力开垦,终于奠定了马华新文学健康发展的基础。马华新文学在这时期能取得战前第一个创造高峰期,与南来作者努力开垦马华新文学园地,创办文艺刊物的劳绩密不可分。

(二)培养文艺人才,壮大马华作家队伍。

南来作者在创办文艺刊物时,初期以同人刊物为主,如曾圣提、张放、花都蓉女合编的《洪荒》,郑文通、罗依夫合编的《曼陀

罗》，何采菽、郑文通合编的《绿漪》。这类同人刊物作者群太过狭小，不利于扩大写作人圈子。

随着南来作者编辑思想的开放，他们不再局限于狭小的同人写作圈，而是加强与广大写作者的真诚合作。他们编辑的刊物周围，团结了一大批写作者，如陈炼青主编的《叻报》《椰林》、郁达夫编刊的《星洲日报》《文艺》，都拥有上百名作者。他们编辑的刊物为这些作者提供写作的园地，培养出一批批文艺新苗，壮大了马华作家队伍。如新马文艺界知名的剧作者艾蒙、小说家文之流、诗人刘思就曾受到郁达夫的栽培和提拔。

南来作者在编刊时，也注重指导写作者的创作技巧。李润湖主持下的《新国民日报》《新路》、胡愈之主编的杂志《风下》月刊，不时刊载一些指导写作的文章，如《写作方法讲话》⁽⁶⁾、《来谈读书与作文》⁽⁷⁾等。铁亢在编辑《星洲日报》副刊《文艺周刊》时，也十分重视作品的艺术性，强调作品要有圆熟的技巧。这对于培养马华写作者，以及提高创作技巧，起着重要的作用。

(三)倡导文艺潮流，指示文艺创作方向。

1949年以前的新马文坛，曾有过数次较大的文艺潮流和文艺运动，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南洋色彩文学和新兴文学，30年代后半期的文学大众化与通俗化运动、文艺通讯运动等，而这与南来作者在编刊时的直接提倡和推波助澜有着密切关系。

南洋色彩文学的萌芽，始于南来作者谭云山、段南奎等，后由黄振彝、曾圣提、陈炼青、陈树南、许杰、林姗姗等人提倡和推动，影响及当时文艺创作而形成南洋色彩的文艺潮流，对后来的新马华文文学也产生深刻的影响。

新兴文学由南来作者许杰、杨实夫、罗依夫等人在编刊时所极力倡导。这种强调表现无产阶级对不合理社会与压迫者反抗的文艺思想，使当时产生大批反映新兴意识的作品，对后来的新马华文文学也不无影响。

战前5年抗战救亡时期的抗战文学、文学的通俗化与大众化、文艺通讯运动等,也是南来作者叶尼、张楚琨、流浪、铁亢、郁达夫等编者极力倡导与推动的。他们通过出版“专页”、发表讨论文章,以及频频召开座谈会等方式积极推动,使其成为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从而产生大批反映抗战救亡内容和努力追求通俗化形式的作品。

(四)关怀民族命运,提倡爱国文学。

南来作者在新马从事编务活动时,都属侨民身份。他们对多灾多难的祖国和民族表现了深切的关怀之情。早期的南来编者张叔耐强调要以白话文向新马侨民灌输“爱国”思想。⁽⁸⁾“九·一八”事变发生后,陈树南在他主编的《民国日报》《公共园地》频频发表斥责日本侵略者的文章,以致为英殖民政府所不容,而被勒令停刊旬日。“七七”抗战爆发后,南来作者在编刊时更是坚决主张抗战。张楚琨在《狮声》上呼吁写作者应以抗战救亡为主题,所有作品不要忘记“国防意味”。⁽⁹⁾他还推出“保卫大华南特辑”、“华侨团结救亡问题专号”、“纪念九一八周年专页”等。吴天表示编刊《星火》的目的,就是要将它作为“救亡的武器”。⁽¹⁰⁾郁达夫编辑《晨星》期间,登载作品的内容都围绕着抗日救亡的主题,也不时推出一些特辑,如“七七抗战四周年纪念号”等。

在南来编者的积极宣传与身体力行下,抗战救亡成为战前五年新马华文文学的主旋律,新马文学界产生大量反映中国人民抵抗侵略者和新马华人踊跃输将的作品,其中不乏优秀之作。

(五)沟通中马文艺,促进文化交流。

新马华文文学在1949年之前与中国新文学关系十分密切,这固然由于地缘上的接近,交通上的便利,文人来往的频繁,书籍交流的迅捷等缘由,但南来作者在编刊时对中国新文学的介绍传播,与中国文艺界的沟通联系,也是促成中马关系密切的重要因素。

张叔耐在1919年主编《新国民杂志》时,就注重介绍中国五四

新文学著名作家的作品,如郭沫若、刘延陵等的诗歌、小说等。这有助于当时新马文学界了解中国新文学作家及作品,并提供学习与仿效的对象。其后南来作者十分注意加强与中国文学界联系,如郁达夫主编《晨星》副刊,胡愈之主编《风下》周刊时,都向中国的一些知名作家如老舍、艾芜、叶圣陶、姚雪垠、茅盾、许地山、汪静之、欧阳山、郭沫若、艾芜、楼适夷、司马文森、许广平等约稿。这对马华写作者和读者了解中国作家作品,沟通中马文艺界联系产生重要作用。

南来作者铁亢为进一步沟通与“上海各地文艺界”的联系,以及“充实自己,表现自己,正确反映自己所居的社会,推进南洋文艺运动的独立言论机关”,⁽¹¹⁾甚至创办文艺杂志《文艺长城》,在上海印刷和出版。该刊作者除新马文学界的作者外,还有当时上海文艺界的作者巴金、巴人、锡金、许幸之等。《文艺长城》为中马文艺界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园地,因而引起上海香港等各地文艺界的特别注意,被认为是沟通“祖国和南洋的一座文艺长城”⁽¹²⁾。

第二节 南来作者在文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新马华文文学理论从1919年开始,由最初摸索、探讨,到发展为丰富多采的文学理论,南来作者发挥着重要作用。没有南来作者在文学理论方面的引进、倡导与建设,就不可能有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文艺潮流和文艺运动,也不可能形成各个时期体现这些文艺理论的创作活动,新马华文文学也将不可能出现如此繁荣发展的局面。

以下从三个方面总结南来作者在文学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

(一)引进和确立现实主义文学理论,使之成为新马华文文学的主流。

新马华文文学萌芽时期,文学理论处于摸索和探讨阶段,如张叔耐对文学社会功能的探讨,林独步有关文学美感功能的论述。至20年代末,许杰等人把中国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理论介绍到新马文坛,倡导新兴文学运动,现实主义文学理论逐渐在新马华文文学中确立了主导地位,并形成系统的现实主义理论。

现实主义强调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文学应来源于现实生活,反映现实的生活本质。文学是为人生的艺术,应能够指导生活,创造人生。这一现实主义文学理论对新马华文文学影响十分重大,它使新马华文文学在后来各个时期紧密联系社会,充分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由此产生一系列配合时代需要的文艺运动,如战前5年的抗战文学、文学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文艺通讯运动等等,都是在现实主义理论影响下产生的文艺运动。战后在“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中,主张马华文艺应有独特性的作者,也是坚持新马华文文学应该走现实主义道路,反映新马社会的现实生活;作家不该身处新马,却凭空虚构中国的社会情形。他们认为这不是现实主义作家应有的态度。

综观20年代末至40年代末的新马文坛,新马作者大多秉承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对现实生活与人生充分表现其关怀之情与忧患意识,以作品反映社会、干预生活和指导人生。他们基本上沿着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前进而创作丰富多采的作品。到六七十年代后,由于新马社会逐步迈向现代化进程,以及西方现代主义文化的传入,新马作者的创作道路由此呈现更多元的色彩。

(二)主张马华文学应具有地方特色,塑造新马华文文学独特的个性。

南来作者在新马从事文学活动时,仍为侨民身份。早期的南来作者侨民意识很浓,把文学作为激发新马华人爱国热情的工具。到20年代后半期,他们开始萌生南洋色彩的文学观,注意塑造新马华文文学独特的个性。黄振彝、曾圣提、陈炼青等人主张文学应反

映南洋的自然景物和社会现实生活,由此形成影响深远的南洋色彩文学运动。它表明南来作者已意识到新马华文文学应该摆脱中国文学的影响而另辟新途径,建立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学。

到 30 年代上半期,南来作者丘士珍提出“马来亚地方文学”的概念,进一步将新马华文文学从笼统的“南洋色彩”缩小到“马来亚地方文学”。丘士珍批评新马文艺界趋附上海文坛的现象,向文艺界推举 14 位“地方作家”,认为“地方作家”应与与中国文坛中心地的作家群站在同等地位。丘士珍的“地方作家谈”引发一场大论争,使读者和文艺界注意到“马来亚地方文学”这一概念。此后马华作者曾艾狄受丘士珍关于“马来亚地方文学”的影响,作文《马来亚文艺界漫画》批评新马作者从中国文艺界“搬尸”而引起另一场论争,使新马文艺界的“移民”观念得到纠正。南来作者一礁在论争中指出本地文坛应该放弃“南洋文学”的称号,而代之以“马来亚文学”。此后“马来亚地方文学”的观念在新马文艺界得到确立。

战后新马文坛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的论争,是由南来作者周容引发的。他认为马华文学应该反映“此时此地”的现实生活,批评“侨民文艺”脱离新马社会现实。在论争中,大部分南来作者如秋枫、普洛、张天白、铁戈、杜边、刘思、丘天、马宁、王崑等都主张马华文学应具有独特性,从而使新马华文文学摆脱作为中国文学附庸的地位,塑造自己独特的个性而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到 50 年代新马文艺界提倡“爱国主义文学”,终于使新马华文文学成为独立的国家文学。

(三)以文学理论作先导,指示作者创作方向。

新马作者的文学创作,受文学理论影响很深。南来作者的文学理论,往往起着引导作者创作方向的作用。从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的南洋色彩文学与新兴文学运动,到战前 5 年的抗战文学、文学的通俗化与大众化、文艺通讯运动等等,主要由南来作者黄振彝、曾圣提、陈炼青、陈树南、林姗姗、许杰、罗依夫、衣虹,以及叶尼、金

丁、杨实君、流浪、丘絮絮、张楚琨、丁倩、铁亢、上官彥等人的文学理论作先导,随后才展开轰轰烈烈的文艺运动,创作出体现这些文学主张的作品。

南来作者以文学理论为先导,由此影响到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创作。新马作者大多以这些文学理论确定其创作方向,形成各个时期的创作潮流。如20年代末30年代初张金燕、曾圣提、曾华丁、曾玉羊、吴仲青等人创作的南洋色彩文学,罗依夫、林雪棠、吴广川、杨实夫、衣虹、浪花、海底山、王探等人创作的新兴文学,战前5年铁抗、丁倩、乳婴、郁达夫、李蕴朗、杨骚、金丁、胡愈之、高云览、流冰等发表的抗战救亡文学,以及陈南、国华、田坚、秀的、刘思、叶尼、怒剑等为响应文学通俗化与大众化和文艺通讯运动而创作的章回小说、民歌小调、弹词大鼓、报告文学、速写、墙头小说、街头剧、活报、文艺通讯等等,大多在南来作者文学理论先导下产生,因此南来作者各时期提倡的文学理论,对新马作者的创作影响极大。

第三节 南来作者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贡献

从1919年到1949年,在新马文坛辛勤耕耘和努力劳作的马华作者中,能够确认南来身份的作者至少有159人,他们创作的文学作品以数千计,其中不少成为新马华文文学的优秀作品。可以说,没有南来作者的创作活动,就不可能有新马华文文学各个时期的文学成就。

以下总结南来作者在创作方面的重要贡献:

(一)反映新马社会生活,充实新马华文文学的现实内容。

南来作者继承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深刻反映新马社会各个时期的现实生活,为新马华文文学留下一幅幅生动的社会生

活画卷,丰富了新马华文文学的现实内容。

南来作者在 20 年代末至 30 年代初的创作,主要展现新马社会底层人民的不幸遭遇和苦难生活,为他们唱出一曲曲生之哀歌。连啸鸥的诗歌《都市与荒郊》、曾玉羊的小说《生活圈外》、吴仲青的小说《梯形》等,都反映了新马人民苦难的生活。他们在描绘南洋社会生活时,已有意识地展现南洋的景物特色和独特的社会风貌,吸收新马本地的俚言俗语,使作品更贴近现实生活,以构成整体的南洋色彩。其优秀作品如曾圣提的《生与罪》、曾玉羊的小说《生活圈外》,至今仍为读者和文学史家所津津乐道。

由于受新兴文学的影响,南来作者在“哀其不幸”时,也强调及表现底层人民对不合理社会与压迫者的反抗精神,这在罗依夫、林雪棠、衣虹等人的作品中有突出的表现,其中以曾华丁的小说《五兄弟墓》为代表作。

到 30 年代初期,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对新马社会的严重冲击,南来作者着力于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困苦生活和精神创伤。白荻的散文《热》、一村的小说《橡林深处》、流浪的小说《圈套》等,深刻反映经济不景气对人们的深刻影响。

“七七”芦沟桥事变爆发后,新马华人社会掀起抗战救亡的热潮。南来作者的创作则着重反映新马华人各种形式的救亡运动。有的表彰新马华人支援祖国抗战的募捐行动,有的赞扬抵制日货,不与日商合作的各界人士,有的歌颂回国当兵、参加救护队和从事机工的英雄,老蕾的小说《弃家者》、乳婴的小说《八九百个》等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作。

战后南来作者的创作,一方面追忆新马人民所经受的战争苦难,揭露日军的残暴罪行,另一方面反映战后新马社会百业萧条,人民困苦不堪的生活。其中胡愈之的散文《郁达夫的流亡和失踪》、岳野的剧本《风雨牛车水》和《风雨三条石》成为当时优秀之作。

(二)关怀祖国民族命运,丰富新马华文文学的内容和色彩。

南来作者出生于中国,南来新马时仍是侨民身份。他们认识到文学必须摄取现实题材,反映“此时此地”的新马社会现实,同时又继承中国文学中的爱国主义传统,对积贫积弱的祖国和灾难深重的民族寄予深切的关怀。他们的忧国忧民之作,已成为新马华文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极大地丰富了新马华文文学的内容和色彩;他们关怀社会、关怀民族的忧患意识,也给予新马华文文学有益的滋养。

早在五四时期,南来作者林稷生、张叔耐等人的政论散文纷纷抨击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军阀割据,社会动乱,以致民不聊生的局面,呼唤民主与科学的到来。“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来作者开始反思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抨击其对日不抵抗主义,蕴蓄着抗战的怒焰,如张天白的散文《谈托说》、流浪的小说《南京人氏》等。“七七”芦沟桥事变后,中国爆发全面抗战运动,南来作者热血沸腾,以文艺为武器,以“纸弹配合子弹”,大力展开反法西斯反侵略的抗战救亡宣传工作。他们的创作或控诉日军暴行,关怀狼烟四起的祖国,或歌颂中国人民的斗争,展现华夏儿女抗击侵略的精神,其中铁亢的中篇小说《试炼时代》和丁倩的小说《一个日本女间谍》堪称这时期新马华文文学的重大收获。战后面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纷争,南来作者对祖国的前途与命运十分关切,胡愈之的散文《反饥饿·反内战·反独裁》、沈兹九的散文《民主与反民主的大战斗》表达对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不满和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关注。对祖国和民族的关怀,成为南来作者重要的一个创作面,丰富了新马华文文学的内容和色彩。

(三)抒发个人丰富情怀,增添新马华文文学浪漫主义色彩。

南来作者主要秉承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而着重反映社会现实生活,但有的作者深受中国浪漫主义作家郭沫若、郁达夫等的影响,注重抒发个人内在情感和丰富情怀。这类充满浪漫主义激情,注重抒发个人情怀的创作,为马华新文学增添了绚烂的色彩。

拓哥、谭云山、曾圣提、丁琅、何采菽等人的创作往往带着浓烈的感情色彩。他们有时以情景交融的手法抒发漂泊异乡的流浪情怀,如拓哥的诗歌《流波》、何采菽的散文《雁声》;有时以优美的文字抒发不满世间污浊,热烈追求光明的情感。谭云山的诗歌《崇高与伟大》格调高昂,气势雄伟,表现诗人热烈昂扬的浪漫激情和开阔不凡的胸襟抱负。丁琅的散文《希腊风》表达作者追求真理与光明的热烈情感,充满浓烈的抒情色彩,浪漫主义激情一泻无余。这种歌咏真善美,“鼓勇前进,创造新生”的主题,也是曾圣提的诗歌《月落》、丁琅的诗歌《我想起那吴市的吹箫人》和《伯利恒的新星》,以及《洪荒》同人的《恭祝新禧》的共同特色。

可惜由于后来南来作者对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极力强调,以及中国政局的急剧变化,南来作者对国家民族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压倒一切,因此新马华文文学中的浪漫主义风格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

(四)创作大量优秀作品,繁荣新马华文文学。

由于年代久远、人事变迁和材料散失等原因,许多马华作者(如双双、陈桂芳、谛克)的身份无法得到确认,但相信仍有不少作者属于南来身份,只是缺乏足够证明材料,这确实令人遗憾。然而综观 1919 年到 1949 年的新马华文文学史,各时期的优秀作者和在各种文体方面有独特建树的作者绝大多数属于南来身份却是不争的事实:

小说创作方面,早期南来作者林独步的白话小说取得卓越的成就。20 年代末期,曾圣提的小说《生与罪》、曾华丁的小说《五兄弟墓》、柳鞭的小说《饥饿的狗》、吴仲育的小说《梯形》等,成为这时期新马华文小说的代表作。30 年代上半期,丘士珍的短篇小说《没落》、《峇峇与娘惹》、王哥空的短篇小说集《面包与其他》都是新马华文文学史上最早的小说单行本。林参天反映南洋华侨教育的长篇小说《浓烟》,也是马华新文学史上第一部长篇小说。战前 5 年的

新马华文文学第二个创作高峰期,南来作者丁倩的短篇小说《一个日本女间谍》和铁亢的中篇小说《试炼时代》成为新马华文小说代表作。铁亢的短篇小说集《义卖》⁽¹³⁾和《白蚁》⁽¹⁴⁾,是当时少有的小说单行本。战后丘士珍的中篇小说《复仇》、姚紫的短篇小说《秀子姑娘》,也是新马华文小说的优秀之作。

诗歌创作方面,早期作者林独步的诗歌明白流畅,感情充沛,为当时不易多得的新诗。20年代末30年代初,拓哥《赴吊》、曾圣提的《秋晚》、丁琅的《我想起那吴市的吹箫人》、谭云山的《崇高与伟大》等,为这时期的优秀诗作。谭云山的诗集《湖畔》⁽¹⁵⁾,是新马华文文学史上第二本诗集。战前5年,西玲的《吴家村》、刘思的《代募寒衣》等,是抗战救亡文学的佳作。冯蕉衣的《衡窝集》是当时唯一出版的诗集。战后铁戈的《我们是谁》、丁家瑞、张漠青等的《怒吼吧,新加坡!》,为较有名的诗作。铁戈的《在旗下》⁽¹⁶⁾是战后初期新马华文诗坛唯一出版的诗集。

剧本创作方面,30年代初期马宁的《凄凄惨惨》、《芳娘》、《女招待的悲哀》在剧坛上较有影响。抗战救亡时期,叶尼的《伤兵医院》为当时著名剧作。战后杜边的《明天的太阳》、朱绪的《和平以后》是优秀剧作,岳野的《风雨牛车水》和《风雨三条石》取得突出成就。战后这些剧作都印成单行本出版。

散文创作方面,早期作者林穉生、张叔耐的政论散文是当时的代表作。20年代末30年代初,张冲的《漂流到狮子岛去》、曾圣提的《醒醒吧!星城的艺人》、丁琅的《希腊风》是散文中的名篇。郁达夫的抗战政论散文洋溢着强烈战斗性,为抗战救亡文学的著名篇章。战后胡愈之追忆郁达夫在印尼苏岛的流亡生活的散文《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是脍炙人口的佳作。连士升的《祖国纪行》⁽¹⁷⁾、王仲广的《北归与欧游》⁽¹⁸⁾、白寒的《雕虫集》⁽¹⁹⁾都是当时少有的散文集单行本。⁽²⁰⁾

第四节 南来作者在社会活动方面的贡献

南来作者在新马从事文学活动期间,对新马的影响十分深巨。他们不仅在文艺方面对新马华文文学产生重大影响和作出巨大贡献,同时也以他们对社会的关怀,对本地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新马文艺界至今对郁达夫、巴人(王任叔)等南来作者怀着亲切和崇敬之情,除了仰慕他们的文学业绩,还在于他们对国家民族和社会民生的关怀。

南来作者在社会活动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对中国社会和新马社会的关怀:

(一) 关怀祖国命运,培养新马民众爱国意识。

南来作者十分关怀祖国命运,注意培养新马华人的爱国意识。因为爱国是每个公民应有的道德和责任,唯有民众热爱祖国,愿意为它贡献力量,才能建立繁荣健全的社会。

1949年以前的马来亚属于英殖民地,南来作者是中国侨民,本地华人也大多以中国为祖国宗邦。面对灾难深重的祖国,南来作者以其强烈的爱国心和社会责任感,从事各种爱国宣传活动,希望拯救危亡的祖国。尤其在抗战救亡时期,他们在报章上大力宣传,以“纸弹配合子弹”,激发侨民高昂的爱国热情,在新马社会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战救亡运动。叶尼、杜边、朱绪、金山、王莹带领各个剧团如“星洲业余话剧社”、“南岛剧团”、“实验流动剧团”、“茶花歌剧团”、“新中国剧团”在新马各地巡回演出,进行抗日戏剧宣传和筹赈活动,将筹来的款项尽数汇回中国,支援祖国抗战。有的南来作者还担任抗战救亡团体的职务,从事实质性工作,如郁达夫一方面在《星洲日报》等报章频频发表抗战言论,一方面担任星洲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筹募大量款项;衣

虹(潘受)、李铁民担任南洋各属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的秘书,积极参与筹赈工作。衣虹还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团前往抗战中的中国进行慰问活动。中国能够坚持八年抗战,与新马华人踊跃输将,支援祖国抗战的活动密不可分,也与南来作者在海外的宣传活动和筹募工作不无关系。

总之,南来作者所从事的抗战宣传、筹募赈款等活动,充分表现他们对祖国和民族的关怀之情。在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他们的爱国活动应给予高度评价;他们对于新马华人爱国意识的培养,也应给予肯定。因为爱国是一种高尚和伟大的情操,也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只有使民众热爱祖国、关怀社会,才能建立繁荣健全的社会。而南来作者在新马期间的爱国活动,对于培养新马民众的爱国意识,无疑发生积极的作用。

(二)传播新思想新文化,以教育开启民智。

南来作者南渡新马后,“居于斯”,“衣食于斯”,对这块土地的感情日益深厚。他们在关怀祖国命运时,对新马社会也表现极大的关怀。他们将新思想新文化传播到新马,希望通过教育开启民智,提高本地文化水准。

新马华人多为闽粤移民,大多从事体力劳动和商业活动,思想文化较低落。南来作者从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即将中国五四精神与新思想新文化传播到新马社会,林穉生、张叔耐对科学与民主的呼唤,谭云山、段南奎、邹子孟等人大力提倡新思想和新文化,以改造社会思想为己任,无不显示南来作者改造新马社会的努力。

南来作者大多从事教育工作,谭云山、衣虹、铁抗、马宁、高云览、杨骚、殷枝阳、莹姿、金丁、杜边、白寒等数十人担任过教职。在当时新马社会华侨教育比较落后的情况下,他们将丰富的文化知识和进步思想传授给莘莘学子,对培养华侨子弟发挥积极作用。

他们除了在教学时言传身教外,面对南洋民众落后思想和封

建意识,也主张以教育开启民智,培养民风,提高文化水准。他们在报章上频频探讨南洋华侨教育问题,鼓励兴办教育。从早期张叔耐、林穉生呼吁开放女子教育、兴办义学,⁽²¹⁾到30年代林参天揭示南洋华教混乱无序状而希望加以改进,⁽²²⁾战前郁达夫有志于振兴教育、培养民风而主编《星洲日报》《教育》副刊,⁽²³⁾以及战后卢心远对华侨教育改造问题的看法,⁽²⁴⁾无不显示南来作者对新马华社教育的重视,以及希望通过教育达至开启民智、提高文化水准、塑造华人健全思想与人格的努力。南来作者这些活动无疑会对新马教育界及社会产生有益影响。

(三)抗日卫马,支持反殖独立运动。

南来作者以其对新马土地的热爱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积极参与新马人民抗日卫马和反殖独立运动,为新马人民反抗侵略和争取独立作出贡献。

1942年日军入侵马来亚,英军闻风撤退时,不少南来作者投入保卫马来亚的战斗。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张楚琨等人成立“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简称“文工团”),郁达夫任团长,胡愈之任副团长。他们组织“青年干部训练班”。当日军迫近新加坡,对新加坡岛轰炸次数渐渐增加时,郁达夫、胡愈之、杨嘉等率领青年干部训练班成员分驻后港等地进行宣传组织工作。马来亚沦陷后,金枝芒等人投笔从戎,拿起枪杆捍卫这块土地。战后英殖民政府卷土重来,王任叔、铁戈等人对此深表不满,积极支持新马人民反殖独立运动。

由此可见,南来作者不仅在文学方面对新马华文文学作出巨大贡献,在社会方面也对新马社会发生积极影响。

让我们重温赵戎在《论马华作家与作品》里的这段话,对我们了解南来作者在新马华文文学开创过程中的艰辛和伟绩,应该是不无裨益的吧?

马华文学运动,完全得力于中国南来的作家们的大力推动,才有今日的成就。30 年来的马华文学运动史,大半部是南来作家们以热血以生命在恶劣的环境中辛勤写下的。他们在这文化落后的殖民地社会里,不顾一切歧视、冷笑与压抑,披荆斩棘,尽了开路先锋的任务……同时,还须着重地指出,他们的影响是健康的、正确的,而不是破坏的、麻醉的、毒害的。他们之中即使有些微不足道的缺点,也无伤其贡献与成就的。⁽²⁵⁾

——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

注 释

- (1)许多南来作者未能在新马长期从事文学活动,主要由于政治因素、生活变动、追求个人志向、英年早逝等原因。其中受政治因素影响而离开新马者最多,如许杰、林仙桥、胡愈之、沈兹九、王任叔、张楚琨、连啸鸥、高云览、吴广川、洪丝丝等人;因生活变动而辍笔者如曾华丁在 30 年代中期弃文从商;因追求个人志向而离开新马文坛者如谭云山、曾圣提前往印度,或沟通中印文化,或追随圣雄甘地;英年早逝者如铁亢、流浪、王君实、冯蕉衣、郁达夫、饶百迎、铁戈等。参见本论文第二章。
- (2)南来作者中有些曾在新马文坛活跃一时而后封笔,如张叔耐、林独步等。
- (3)见本论文第三章。
- (4)“沙漠田”、“浩泽”、“荒岛”、“枯岛”依次为谭云山、吴仲青、黄振彝、许杰主编的文艺副刊刊名。见本论文第三章第二节。
- (5)见本论文第三章第二节。
- (6)见《风下周刊》第 91 期,1947 年 9 月 6 日。
- (7)楚耘《来谈读书与作文》,见《风下周刊》第 105 期,1947 年 12 月 13 日。
- (8)痴鸪(张叔耐)《例言》,载《新国民日报·新国民杂志》,1919 年 10 月 1 日至 6 日。
- (9)载《南洋商报·狮声》,1937 年 8 月 29 日。
- (10)叶尼(洪为济)《一九三八年的〈星火〉》,见《星中日报·星火》,1938 年 1 月 8 日。
- (11)铁亢(郑卓群)《〈文艺长城〉的过去现在及未来》,见《星洲日报·晨星》,

1939年8月10日。

- (12)寄鸿《〈文艺长城〉创刊号》，载《光华日报·文艺》，1939年4月30日。
- (13)铁抗(郑卓群)《义卖》，文艺长城出版社，1940。
- (14)铁抗(郑卓群)《白蚁》，文艺长城出版社，1940。
- (15)谭云山《海畔》，广州(出版社不详)，1930。
- (16)铁戈(陈果来)《在旗下》，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7。
- (17)连士升《祖国纪行》，新加坡南洋商报，1948。
- (18)王仲广《北归与欧游》，新加坡南洋商报，1949。
- (19)白寒(谢耀辉)《雕虫集》，新加坡乐华印务公司，1949。
- (20)本节未标明号码的篇名注释请见本论文第五章。
- (21)痴鸠(张叔耐)《辟顽固家之谬论》，《新国民日报》，1919年11月20日至27日；林克谐《现有男女日校亟宜附设星期义学及夜义学》，《叻报》，1919年11月22日至24日。
- (22)林参天《浓烟》，上海：上海书店，1935年初版。新加坡：青年书局，1959年重版。
- (23)郁达夫《发刊词》，《星洲日报·教育》，1940年4月7日。
- (24)卢心远《华侨教育改造问题》，《风下》周刊第32期，1946年7月13日。
- (25)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1967)，页82。

参 考 资 料

一、报章

- 1.《叻报》，1919年至1932年。
- 2.《檳城新报》，1919年至1941年。
- 3.《总汇新报》，1919年至1946年。
- 4.《新国民日报》，1919年至1940年。
- 5.《国民日报》，1919年。
- 6.《益群报》，1919年至1934年。
- 7.《南洋商报》，1923年至1949年。
- 8.《光华日报》，1927年至1949年。
- 9.《南洋时报》，1927年至1930年。
- 10.《民国日报》，1930年至1934年。
- 11.《星洲日报》，1929年至1949年。
- 12.《新益群报》，1935年至1936年。
- 13.《星中日报》，1935年至1940年。
- 14.《华侨日报》，1945年至1946年。
- 15.《新民主报》，1945年至1946年。
- 16.《民生报》，1945年至1948年。
- 17.《公报》，1946年至1947年。
- 18.《南侨日报》，1946年至1949年。

19.《中兴日报》，1947年至1949年。

二、专书：

1. 上海暨南大学校友会编《许杰先生纪念文集》（上海：上海暨南大学校友会，1996）。
2. 马《马华写作人剪影》（马来西亚：泰来出版社，1979年）。
3. 马《新马华文作家群像》（新加坡：风云出版社，1984年）。
4. 马《新马文坛人物扫描》（柔佛：书辉出版社，1991年）。
5. 方修《马华文坛往事》（新加坡：星云出版社，1958年）。
6. 方修《马华文艺史料》（新加坡：四海书店，1962）。
7. 方修《文艺杂论》（新加坡：星洲书屋，1964）。
8. 方修《文艺杂论二集》（新加坡：星洲书屋，1967）。
9. 方修《马华文艺思潮的演变》（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0）。
10. 方修《马华新文学大系》第1集至第10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0—1972）。
11. 方修《马华新文学及其历史轮廓》（新加坡：万里文化企业公司，1974）。
12. 方修《马华新文学简史》（新加坡：万里书局，1974）。
13. 方修《马华新文学史稿》修订本上、下卷（新加坡：世界书局，1975、1976）。
14. 方修《马华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新加坡：洪炉文化企业，1976）。
15. 方修编《白获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1979）。
16. 方修编《老蕾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1979）。
17. 方修编《张天白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1979）。
18. 方修编《金丁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1979）。
19. 方修编《胡愈之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1979）。

20. 方修编《铁抗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1979)。
21. 方修编《叶尼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1979)。
22. 方修编《李润湖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1980)。
23. 方修编《流浪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1980)。
24. 方修编《马华新文学大系(战后)》(新加坡:世界书局,1979)。
25. 方修《新马文学史论集》(香港:三联书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
26. 方修编《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吉隆坡:马来亚华校董事联合总会,1987)。
27. 方修、张笪合编《郁达夫选集》(新加坡:万里书局,1977)。
28. 方修、叶冠复合编《王君实选集》(新加坡:万里书局,1979)。
29. 方修、连奇合编《郁达夫轶文集》(新加坡:风云出版社,1984)。
30. 方修《马华文学史补》(新加坡:春艺图书贸易公司,1996)。
31. 方北方《马华文艺泛论》(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写作人协会,1981)。
32. 文天行、王大明、廖全京编《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资料汇编》(成都: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3)。
33. 王慷鼎《新加坡华文报刊史研究的回顾与前瞻》(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学术论文第99种,1994)。
34. 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修订重版上、下册(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35. 王自立、陈子善合编《郁达夫研究资料》上、下(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36.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下册(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7. 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
38. 丘正欧《华侨问题研究》(台北:国防研究所,1965)。
39. 丘柳川《中国抗战文艺与马华抗战文艺的比较》(新加坡:新加

- 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1978)。
40. 王盛治夫妇编《邱菽园居士集》(康有为序本,1949)。
 41. 石昭贤等《现当代外国现实主义文学四十讲》(贵州: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42. 艾芜《南行记》(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
 43. 艾芜《漂泊杂记》(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44. 庄钟庆等编《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
 45. 李廷辉主编《新马华文文学大系》第1集至第8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3)。
 46. 李子玲《南洋色彩的提倡——早期马华作品译论》(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论文,1981)。
 47. 吴天才《马华文艺作品分类目录》(马来西亚:马来亚大学中文系,1975)。
 48. 许杰《椰子与榴菝》(上海:1936年)。
 49. 老舍《小坡的生日》(上海:生活书店,1934)。
 50. 杨松年、周维介合著《新加坡早期华文报章文艺副刊研究(1927—1930)》(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80)。
 51. 杨松年《新马华文文学论集》(新加坡:南洋商报,1982)。
 52. 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所反映的华工生活》(新加坡:全国职工总会,1986)。
 53. 杨松年《战前新华报章文艺副刊研究(甲集)》(新加坡:同安会馆,1986)。
 54. 杨松年《早期新马作家研究(1927—1930)》(香港:三联书店,1988)。
 55. 杨松年《大英图书馆所藏战前新华报刊》(新加坡:同安会馆,1988)。
 56. 杨松年《南洋商报副刊〈狮声〉研究》(新加坡:同安会馆,1990)。

57. 杨松年编《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新加坡:同安会馆,1994)。
58. 杨松年、王慷鼎合编《东南亚华人与文化》(新加坡:亚洲研究会、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出版,1995)。
59. 邱新民《邱菽园生平》(新加坡:胜友书局,1993)。
60. 陈炼青《陈炼青文集》(香港:南洋文艺出版社,1962)。
61. 陈嘉庚《南侨回忆录》(香港:草原出版社,1979)。
62. 张曙生《剪刀声里》(新加坡:春艺图书公司,1986)。
63. 张若英编《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上海:光复书局,1934)。
64. 苏卫红《战前五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1937—1942)》(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1996)。
65. 余秀斌编《新马华文文学研究书目提要》(新加坡:新社,1991)。
66. 郑卓群《马华文艺丛谈》(新加坡:维明公司,1956)。
67. 郑文辉《新加坡华文报业史》(新加坡:新马出版印刷公司,1973)。
68. 林万菁《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1927—1948)》(新加坡:万里书局,1978年初版,1994年修订版)。
69. 林参天《浓烟》(新加坡:青年书局,1957)。
70. 林徐典编《林稗生政论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0)。
71. 林徐典编《郁达夫抗战论文集》(新加坡:世界书局,1977)。
72. 林锦《战前五年新马文学理论研究》(新加坡:同安会馆,1992)。
73. 林琮《狮城狮声》(新加坡:东升出版社、热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0)。
74. 周亚珠《马华文学南洋色彩的提倡 1927—1930》(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论文,1978)。
75. 林顺福《战后五年的新马戏剧(1945—194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论文,1982)。
76. 林顺福《战后五年新马文学理论研究(1945—1949)》(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1994)。

77. 卓金香《三十年代初期经济大萧条背景下的新马华文文学》(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1994)。
78. 柯思仁《战前新马的戏剧副刊与戏剧评论(1924—1941)》(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硕士学位论文,1994)。
79. 郭荣贵《战前五年的新马戏剧(1937—1942)》(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论文,1982)。
80. 赵戎《论马华作家与作品》(新加坡:青年书局,1967)。
81. 赵戎《赵戎文艺论文集》(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0)。
82. 赵戎《马华新文艺词典》(新加坡:教育出版社,1979)。
83. 忠扬《新马文学论评》(香港:三联书店、新加坡文学书屋,1986)。
84. 南洋大学中国语文学会编《马华文艺的起源及其发展》(新加坡:狮岛书报社,1964)。
85. 胡愈之、沈兹九《流亡在赤道线上》(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
86. 费孝通、夏衍《胡愈之的印象》(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6)。
87. 姚梦桐《郁达夫旅新生活与作品研究》(新加坡:新社,1987)。
88. 姚紫《咖啡的诱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7)。
89. 骆明主编《杏影研究专集》(新加坡:新加坡文艺协会,1995)。
90. 高迅莹编《永远的纪念——高云览和〈小城春秋〉纪念集》(厦门:鹭江出版社,1996)。
91. 崔贵强《星马史论丛》(新加坡:南洋学会,1977)。
92. 崔贵强《新马华人国家认同的转向》(新加坡:南洋学会,1990)。
93. 谢克等编《新马文艺创作索引》(新加坡:华文中学教师会、南大毕业生协会,1969)。
94. 盛秀华《马华抗战文学译论》(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荣誉学位论文,1983)。
95. 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加坡文艺协会合编《新华作家传略》(新

加坡:新加坡国家图书馆、新加坡文艺协会,1994)。

96. 戴小华、柯金德《马华文学七十年的回顾与前瞻》(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1991)。

三、论文

1. 上官豸《三人行:王君实、铁抗和郁达夫》,见《星洲日报·晨星》,1946年8月22日至24日。
2. 马达《一九三六年马来亚文坛》,见新加坡《星洲日报·新年特刊》,1937年1月1日。
3. 今富正巳《马华文学在抗战初期的一些问题》,见《中国现代文学》创刊号,1986年12月。
4. 方修《马华文艺独特性问题》,见方修《避席集》(新加坡:文艺出版社,1960),页14。
5. 方修《新大所藏旧报章的文学史料价值》,见新加坡《中文学会会报》,1967年第8期,页8~12。
6. 方修《关于马华新文学史的几个问题》,见新加坡《中文学会会报》,1968年第9期,页17~21。
7. 方修《中国文学对马华文学的影响》,见新加坡《中文学会会报》,1971年第11期,页29~31。
8. 方修《救亡剧运的全面展开》,见蔡史君、许云樵《新马华人抗日史料(1937—1945)》(新加坡:文史出版私人有限公司,1984),页113~118。
9. 王润华《论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阶段与方向》,见庄钟庆等编《东南亚华文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页16~23。
10. 王慷鼎《〈檳城新报〉编采部人员点将录》,见《亚洲文化》,1997年第21期,页171~180。
11. 王慷鼎、杨松年《马来亚战前华文报刊系年初稿》,见新加坡《南

- 洋商报·人文》，1982年2月22日，29日，3月1日。
12. 王君实《论蕉衣的诗》，见《星洲日报·晨星》，1940年11月22日。
 13. 王哥空《一九三五年来马来文坛》，见《新国民日报·新年特刊》，1936年1月1日。
 14. 丘康《七七抗战后的马华文坛》，见《星洲日报·新年特刊》，1939年1月1日。
 15. 区如柏《胡愈之、夏衍与新加坡报界》，见新加坡《联合早报》，1997年5月11日。
 16. 石蕴真《记郑卓群》，见《星洲日报·记者节特刊》，1946年8月31日。
 17. 李润湖《一九三六年的马来文坛》，见《新国民日报·新年特刊》，1937年1月1日。
 18. 李向《战前的马华文艺》，见香港《海洋文艺》，1975年第2卷第2期，页112~123。
 19. 杨松年《〈新国民日报〉与二十年代的新马华文文学》，见新加坡《南洋商报·人文》，1982年5月17日，24日。
 20. 杨松年《传统的烙印与个性的塑造——从另一角度看新马华文文学的发展》，见新加坡《星洲日报》，1982年6月4日。
 21. 杨松年《南洋商报副刊与新马华文文学》，见《联合早报·人文》，1983年5月9日，16日，23日，30日，6月5日。
 22. 杨松年《文学应该反映人性还是时代？——论早期新马文学史上两场论争》，见新加坡《联合早报·人文》，1984年9月3日，10日，17日。
 23. 杨松年《早期〈光华日报〉的文艺副刊（1927—1930）》，见《〈光华日报〉七十五周年纪念刊》（檳城：光华日报社，1985），页1~9。
 24. 杨松年《战前新马文学副刊期刊论析》，见《东南亚华文文学》（新加坡：新加坡歌德学院、作家协会联合出版，1989），页43~

55。

25. 杨松年《李树梧与新马华文文学》，见新加坡《中教学报》，1990年第16期，页50~60。
26. 杨松年《五四运动前后的新马华文文坛》，见《五四文学与文化变迁学术研讨会》（台湾：学生书局，1990），页237~263。
27. 杨松年《金丁与新马华文文学》，见《亚洲文化》，1991年第15期，页77~100。
28. 杨松年《新中国剧团在新加坡》，见《中教学报》，1993年第19期，页83~102。
29. 杨松年《新马文学论争与社会变迁的关系：以战前新马文学论争为例的说明》，见《传统文化与社会变迁》（新加坡：同安会馆，1994），页295~315。
30. 杨松年《早期新马作者的流浪意识》，见杨松年、王慷鼎合编《东南亚华人文学与文化》（新加坡：新加坡亚洲研究学会、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新加坡宗乡联合总会联合出版，1995），页77~108。
31. 苏卫红《从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看新马华人社会变迁》，同（30），页168~179。
32. 陈贤茂《新加坡华文诗坛的历史回顾》，见第三届全国台湾与海外文学艺术讨论会编《台湾、香港与海外华文文学论文选》（台湾：海峡文艺出版社，1988），页89~104。
33. 陈贤茂《新加坡华文文学简论》，同（9），页89~104。
34. 陈子善《一支彩笔耀南天——试论郁达夫与战前新马华文文学》，同（30），页134~145。
35. 陈如旧《一九三八年马华文艺界之一角》，见新加坡《南洋商报·新年特刊》，1939年1月1日。
36. 陈如旧《一年来的马华文艺界》，见新加坡《南洋商报·新年特刊》，1941年1月1日。

37. 苗秀《五十年来马华文学一瞥》，见新加坡《民报·新生代》，1969年8月22日。
38. 林顺福《论战后五年民族自主浪潮中的新马华校戏剧活动》，同(30)，页146~167。
39. 林水滢《马华小说中的华教情结》，同(30)，页180~192。
40. 林文锦《铁抗的文学理论及其对新马文运的推动》，见新加坡《亚洲文化》，1987年第9期，页195~206。
41. 林之间《关于〈浓烟〉》，见《星洲日报·晨星》，1937年2月3日。
42. 金丁《郁达夫的最后》，见《金丁作品选》（新加坡：上海书局，1979），页126~137。
43. 郁达夫《悼诗人冯蕉衣》，见《星洲日报·晨星》，1940年10月17日。。
44. 柯思仁《槟城的“南洋新兴戏剧运动”（1930—1937）》，同(30)，页109~133。
45. 胡愈之《郁达夫的流亡与失踪》，见《星洲日报·记者节特刊》，1946年8月31日。
46. 赵戎（以多）《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见南洋大学创作社编《现阶段的马华文学运动》（新加坡：南洋大学创作社，1959），页1~17。
47. 赵戎《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见南洋大学创作社编《论马华文艺的独特性》（新加坡：南洋大学创作社，1960），页1~11。
48. 赵戎《论二十年来马华文学思潮》，见新加坡《南洋学报》，1970年第25卷第2期，页91~99。
49. 赵戎《新马文学概论》，见新加坡《新加坡文艺》，1976年第4期，页33~40。
50. 铁抗《一年来的马华文艺》，见新加坡《新国民日报·新年特刊》，1940年1月1日。

51. 梁山《战前的几个副刊编辑》，见新加坡《星洲日报·星云》，1976年12月30日。
52. 黄石《一九三六年马来亚文艺界动态述略》，见新加坡《星洲日报·新年特刊》，1937年1月1日。
53. 温梓川《马华文坛二十年》，见《星报·银禧纪念册》（槟城：星报日报社，1964），页B44。
54. 温梓川《马来亚文学与文化的形成》，见马来西亚《蕉风》，1962年115期，页3。
55. 彭杜生《马华文学与中国文学的关系》，同（7），页125~130。
56. 崔贵强《星马华族社会运动的主流问题》，见柯木林、吴振强编《新加坡华族史论集》（新加坡：南洋大学毕业生协会，1972），页119~132。
57. 崔贵强《胡愈之在新加坡》，见北京《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页28~38。
58. 萧遥天《忆铁抗》，见《（光华日报）七十五周年纪念刊》（槟城：光华日报社，1985），页41~44。
59. 蔡贞坚《一九三七年马华文坛概况》，见新加坡《南洋商报·新年特刊》，1938年1月1日。
60. 黎明《一年来的马来亚文坛》，见新加坡《星中日报·新年特刊》，1937年1月1日。

后 记

本书被厦门大学出版社列入“东南亚华文文学丛书”正式出版,是对我从事新马华文文学研究工作的一大鼓励。

1996年4月,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杨松年副教授的指导下,我开始进行有关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关系的专题研究,至1997年11月,终于完成硕士论文《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1919—1949)》的撰写工作。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就是在该硕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订而成的。

回顾自己在研究这个专题时走过的足迹,我深深觉得,如果没有导师杨松年副教授、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前系主任陈荣照教授、新加坡文艺协会会长叶昆灿先生,以及厦门大学中文系庄钟庆教授的支持和鼓励,就不可能有这篇硕士论文的完成及正式出版。谨此向诸位师长致以最深的谢忱!

同时感谢刘宏博士、王力坚博士、王慷鼎博士、朱纯深博士、刘维新先生、林秋英小姐、郭玉芳小姐、徐艰奋女士、林纬毅先生、王志伟先生,以及所有在我撰写论文的过程中从各方面给予帮助的人士。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央图书馆缩微胶片室的李刘翠英女士等人,为我查阅新马华文报刊缩微胶片提供诸多方便,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的题字,为南来作者之一——新加坡著名书法家和诗人潘受先生在世时亲笔题字。谨以此书的出版,告慰潘老的在天之灵。

杨松年副教授和庄钟庆教授在百忙中拨冗写序,谨此敬致谢

意。

马来西亚文学史家和作家马岩先生曾为本书提供诸多南来作者像片。原计划将这批像片作为本书插图,以使读者能够一睹南来作者的风采。可惜由于年代久远,不少像片清晰度较差,最后只好放弃。但对于马岩先生的热心支持和无私捐献,我一直感铭于心,谨此申谢。

最后,感谢我的家庭对我的支持和爱护,使我能够在海外完成硕士学位,并继续从事战前新马华文新诗的研究工作。

由于才疏学浅,本书纰漏和谬误之处在所难免,希望各位专家学者不吝赐教,以使本书将来再版时能够重新修订。

作 者

1999年8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南来作者与新马华文文学:1919~1949/郭惠芬主编. —厦
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99.11

ISBN 7-5615-1553-7

I. 中… II. 郭… III. ①现代文学-人物研究-中国-1919~
1949②现代文学-文学研究-新加坡-1919~1949③现代文学-文学
研究-马来西亚-1919~1949 IV. I3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67820 号

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厦门大学 邮编:361005)

厦门新嘉莹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地址:厦门市莲前北路 77 号 邮编:361009)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0.75 插页:2

字数:266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定价:1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

责任编辑 / 陈福郎

封面设计 / 莫 水

ISBN 7-5615-1553-7



ISBN 7-5615-1553-7/I · 77

定价: 16.00 元